

彭述之選集

第三卷



彭述之選集

第三卷

出 版 說 明

編入本卷的文章或訪問記，是著者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間所作的論述中國問題的部份。

我們特地編入《當權的中國共產黨》（彭述之選集英文本）一書的序言作為代序，是由於它對著者的有關論述作了扼要的介紹和闡釋，會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的了解。此外，收入了陳碧蘭關於《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與文化大革命》的訪問記，作為附錄，以便提供讀者對這問題更多的參攷。

本卷的文章，屬於著者以中文寫成的原著，有《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以及《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兩文的絕大部份。其餘都是從英文本譯出的，中譯文大都未經著者仔細過目。

我們期望讀者對譯文等提供意見及指正，以便同一些技術上錯漏，在再版時改正。

本卷之先於其它三卷出版，是因為計劃編入第一、二卷內的一些著作，還需要多方設法去收集；但我們相信這將不會拖延得很久。

目 錄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〇年)

《當權的中國共產黨》英文本出版者導言	1-6
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	7-30
不斷革命論與俄國革命	8
不斷革命論與階段革命論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的又一次考驗	14
不斷革命論在中國第三次革命中的曲折反映	2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新經驗	26
結論	30
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31-93
中共對蔣介石國民黨勝利的諸原因	32
中共奪取政權是否由於群眾壓力並違反了克里姆林宮的目的?	42
中共的勝利是否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開始?	54
中共及其政權的階級性	65
中共政權措施的演進	72
中國的前途	79
我們的基本態度和方針	82

關於「中國局勢報告」的幾點補充和修正

(一九五二年五月)..... 85 - 93

關於中共的性質問題..... 85

關於新政權的性質問題..... 92

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日)..... 94 - 101

爲什麼要保持秘密?..... 94

毛澤東的政策..... 96

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表現..... 97

斯大林的誣蔑制度..... 99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 100

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 102 - 117

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原因..... 102

毛澤東政權的構成因素及其性質..... 107

土地改革的巨大成就及其隱藏的危機..... 110

經濟建設及其矛盾..... 113

新政權的對外政策..... 115

中國的前途..... 117

對擁護人民公社各種意見的批評與我們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118 - 177

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與農民的自願原則..... 119

所謂「農業大增產」和「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¹³²

公社是「自願的農民合作」並「由公社選舉的委員會

而不是由官僚命令管理的」嗎?..... 143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還是中共榨取農民的 有力工具？.....	154
關於梁和史兩同志再說幾句.....	165
我們對公社的態度.....	169
附記.....	172
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 還是民主改良？（一九六〇年四月廿六日）.....	
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	178
中共的性質——它不再是斯大林主義的政黨了嗎？.....	179
中共政權與蘇聯斯大林政權的對照.....	187
特權階層的形成、發展及其特權享受.....	191
關於「無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之證據」.....	201
全國人大選舉和全俄蘇維埃大會選舉相類似嗎？.....	204
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 和 不斷革命論的被歪曲.....	208
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	218
史和梁往那裏走？.....	223
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	
	229-240
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241-253
給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254-266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和分歧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267-286

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287-295
林彪的倒台(一九七二年一月).....	296-300
論「批林批孔」運動(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301-321
天安門示威的意義(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	322-330
毛嫡派倒台的背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	331-341
毛澤東政治生涯的評價(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342-379
中國今日的異議運動(一九八〇年六月).....	380-395

附 錄：

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與「文化大革命」.....	陳碧蘭 396-409
-----------------------	-------------

《當權的中國共產黨》英文本出版者導言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如下兩個世界制度鬥爭的焦點：一個是沒落中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另一個是上升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後者以產業工人階級為旗手。除蘇聯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這樣由於這兩種社會力量衝突而導致如此龐大、複雜的戰鬥，和如此激烈的翻天覆地。

在這個世紀，中國經歷了三個偉大的革命。在一九一一年，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建立了共和國。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動搖，這次革命未能達到主要目的：脫離外國帝國主義控制而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結束農村的半封建關係。相反地，共和國崩裂為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軍閥割據局面。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較為幼小的城市工人階級成功地引發了城鄉貧民的一次大規模起義，這次革命譏起，指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統一分裂的國家的前途，就如十年前俄國工人所做的那樣。但這個走向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難得機會，却由於當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被日益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國際領導強迫實行階級合作路綫，將力量從屬於國民黨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因而被叛賣、被擊敗。

最後，在抗日戰爭中和戰後的外國侵略、農民起義的壓力下，毛澤東領導的斯大林化共產黨，發覺日益難以實行與蔣介石建立穩定聯盟的前景。無論共產黨的政綱如何機會主義，或其領導

如何願意達致妥協，國民黨却非要殲滅共產黨就不罷休。農民紅軍在此困境，只得戰鬥，並奪取了政權，開啓了全球最大的國家走向革命社會變革的大門。

可是，即使是這樣偉大的革命，雖然取得了無可爭議的成果——將中國從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並摧毀資本家和地主的權力，但却未導致中國工人階級取得社會的領導地位。正如毛澤東七六年逝世後所披露的資料——多年的鎮壓性警察統治和嚴重的經濟挫敗的倒退——所證實，在今日中國仍未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仍未民主化。

彭述之親身經歷了這些激盪的事變，而且在大部份時間不是作為旁觀者，而是作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政治領袖和戰略家。他的生命緊密地連繫於中國工人階級，在差不多六十年來，他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不屈的代言人。他個人的政治生涯在本書開頭的傳記性文章，由陳碧蘭生動地描述了，陳碧蘭是彭述之的一生伴侶，她本人也是傑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家。*

彭述之是中國最早一批參加共產主義運動者之一，不久就成為一位中央領導人。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湖南省一個農民家庭，一九二〇年八月加入由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協助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未成立。從一九二一到二四年，彭氏在莫斯科「共產主義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是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的代表之一。

在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開的第四次黨大會上，彭述之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局五名委員之一，被任為中央宣傳部主任，又是黨機關報《嚮導週報》和理論刊物《新青年》的主編。

* 編者按：陳碧蘭該文見本選集第一卷。

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內，彭述之成爲反對斯大林及其中國代表所制訂的災難性路線的最大膽批評者。他與毛澤東成了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徹底支持中共加入蔣介石的國民黨的致命路線，這路線導致一九二七年春夏中共和工會被血洗。

早在一九二四年，彭述之就堅持認爲，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進行一條一貫的反帝路線，工人階級要取得革命的領導。他也堅持認爲，農民雖然已證實有能力參加反壓迫的爆炸性鬥爭，但農民本身作爲一個階級太過分散，不能發揮全面社會結合和領導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爭取農民跟隨那牢牢扎根於城市無產階級的獨立革命工人政黨的領導。基於這些立場（它們與托洛茨基和蘇聯左派反對派的主要立場相一致，後者當時在中國仍未爲人知曉），彭述之提出論爭，反對中共從屬於國民黨，一直爲重建脫離中國資產階級控制的獨立共產黨而鬥爭。

彭述之的政治戰鬥並不成功。共產國際機器的壓倒性勢力施加在中共之上。所有軟弱的或機會主義的黨領袖都附和共產國際的路綫。結果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工人被他們誤信爲同盟者的蔣介石所殘殺。之後是七月武漢相類似的大屠殺，主持者是汪精衛的所謂國民黨左派，在蔣介石與中共破裂後，汪精衛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在這些事變發展的過程中，彭述之說服了陳獨秀——中共總書記和最著名的黨創立人。在一九二九年，彭述之、陳獨秀及其支持者被逐出黨，因爲他們支持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政策提出的革命性批評。這就標誌了中國的獨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開始。陳碧蘭的傳記式描述，是現有英文著作中最可靠的描述，敘述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此後的革命鬥爭的艱難歲月及如何受到國民黨和斯大林主義者的政治及肉體鎮壓。彭述之本人從一九三二到三七年被

囚獄中五年，同囚者有陳獨秀及其他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負責人；他們在國民黨法庭的審訊中曾轟動一時。

彭述之今天是仍然生存的幾個參加者之一，他們與列寧、托洛茨基時代處於革命中的共產國際領導有關聯。一九四八年，他受斯大林主義的迫害，被迫流亡海外；此後，他和陳碧蘭一直將精力放在發展第四國際的工作上面；第四國際是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他們今天同是第四國際最受尊敬的領袖之一。他們留在中國的同志所遭遇的命運，是每一個斯大林主義政權對工人階級利益忠實維護者所預定的；他們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和五三年一月的全國性大逮捕中失蹤了，從此被囚在中共的監獄內；堅持不屈地被囚二十七年而仍活下來的幾十人，在七九年夏天被釋放。

本選集所收的文章、訪問記和政治文件，是一位積極的革命者的著作。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詳細分析了一九四九年掌權的斯大林主義政制的社會性質，它們原先不是為一般讀者，而是為第四國際的幹部研討而作的，這些文章的形式，是與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一些個人或小組作辯論，後者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於將中國資本主義政權及其後將資本主義財產關係被推翻所造成的巨大成就，等同於毛澤東政權的領導。

第四國際內部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圍繞於：中共沉浸在這樣深遠的革命過程中，是否已令它從官僚階層特權的維護者，轉變成現在反映被壓迫者真正階級利益的黨。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從遠方看中國革命，看到毛澤東似乎是與斯大林主義漸然決裂才能奪取到政權。這個評價令他們視毛政權正朝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方向走，因而他們抱有一廂情願的期望，希望中共將來會幫助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

正如彭述之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國際世界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中所指出，上述整個論據的前提是錯誤的。毛澤東一開始是沒有以奪權為目標的。毛澤東及他的黨發覺被客觀形勢迫着走上了這條道路，於是就尋求一個拖長的時間，運用他們的權力來維持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關係而不是消滅它。（在一九五一年當彭述之作這個報告時，毛澤東仍未取消他對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支持；這個決定性行動在兩年後才作出，當時是在韓戰後期親資本主義勢力對經濟的破壞的壓力下做出這個行動的。）

最後，毛澤東實行的措施，比他們預算或主張的要來得急激。這些改變合起來，等於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工人國家。但它不是像俄國革命最初幾年由蘇維埃扮演決定性角色那樣的，由工人民主機構控制的工人國家。中國工人國家一開始就遭受中共最高指揮的不受控制的官僚支配。中共利用它對國家機器的控制，鞏固了在蘇聯已滋生了的那類寄生性特權官僚階層。彭述之明確地認識到中國第三次革命這個深刻的矛盾。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將毛澤東領導層與革命成果等同起來，從這種錯誤認識導致出傾向於毛政權或為它辯護；但彭述之與他們不同，他一貫地將他對國有化計劃經濟所造成的革命進步的不懈支持，同壟斷了政治權力的獨裁政權區別開。

不能作出這個區別，就只會導致政治混亂和放棄革命前景。這是史渥培 SWABECK 的可悲命運；他在五〇年代後期與彭述之就北京政府在「大躍進」時期建立的農村「人民公社」進行尖銳的論爭。史渥培在美國共產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有着一個長期和可敬的階級鬥爭戰士的經歷，但他不能掌握中國斯大林主義取得政權的原因，他相信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的組織，代表了人民民主的興起。這就導致他在一九六七年根本離開托

洛茨基主義，雖然他是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在一九二八年建立的其中一名創始人，也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長期的領導者。

選集一些最吸引人的部份，是彭述之在所接受的許多訪問中對毛最後十年的統治的評價。這些訪問文章以豐富的資料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落，中共黨內部由於毛澤東個人崇拜日益牢固地樹立而進行的連續清洗浪潮（對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等），以及最後是毛本人的親信在他死後被推翻。彭述之表現了他的不同凡響的洞察力，其基礎是他曾在中國生活了超過五十年，他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和他對許多涉及的中心人物有廣泛的個人認識。

一九八〇年

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

現在我們所面對着的正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不斷興起，它們動搖了整個世界帝國主義的統治。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正缺乏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缺乏一條正確的革命路線，以致革命的領導權都落在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政黨手裏，因而在這些已發生或正在發生革命運動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徹底解決了民族民主的任務——推翻帝國主義羈絆的民族獨立與消滅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革命不是停留在半途上，便是陷於僵持的狀態中。爲要打開僵局，替革命開闢走向徹底勝利的道路，必須給這些國家的革命指出一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戰略方針，以便根據這個方針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此外的道路是沒有的。

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提供了正確的戰略方針的便是托洛茨基。他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所提出的不斷革命的思想概念加以發揮，而形成了他自己的「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首先在俄國十月革命中受到考驗。隨後，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從反面，從革命的慘敗中獲得了證明。當我們今天紀念托洛茨基——與列寧携手領導十月革命勝利的領袖——被斯大林謀殺的二十周年時，將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命運有決定關係的不斷革命論提出於一切革命者之前，

* 英文本曾刊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的《國際社會主義評論》。

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者之前，給以簡要的解釋，特別是根據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加以解釋，決不會是多餘的。

不斷革命論與俄國革命

馬克思解剖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階級關係，曾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轉變為社會主義，像以前的封建制度轉變為資本主義一樣。而担负這個「轉變」的歷史任務的便是無產階級，而且也只有無產階級。因為「在現時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祇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一切階級都隨着大工業底發展而趨於衰落和滅亡，而無產階級却是大工業本身底產物。」（共產黨宣言中譯文第四九頁）因而馬克思替無產階級革命所製定的戰略綱領是：無產階級在自己的先鋒隊、政黨領導下準備舉行暴動，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專政，以此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綱領，當然是根據當時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即根據先進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製定的。但資本主義發展到它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一切落後國家都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被帝國主義壓榨和統治，不得不進行民族民主的革命解放鬥爭時，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綱領是否適用於這些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這便在馬克思主義的隊伍中引起了嚴重的思想爭論，終於走到不可調和的兩條路綫的鬥爭。

這個鬥爭首先在俄國馬克思主義隊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爆發了出來。由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得較晚，在本世紀初，它雖已躍登為帝國主義國家，但它還遠落在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後面（如就它與法國和比國的財政資本投資關係說，還帶有半殖

民地性質)。首先是它的落後的土地問題未得到解決，國家政權還停留在代表土地貴族的沙皇制度手裏。這便使得俄國的革命帶着錯綜複雜的性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糾纏在一起。

就俄國當時革命的直接任務說，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但那個階級來領導革命走上勝利以解決這一民主任務呢？從這個基本問題出發，便形成了以下三個基本立場：

一、蒲列哈諾夫根據俄國當前革命任務（他所指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是資產階級性的，因而認定無產階級應當與自由資產階級聯盟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以此替資本主義的發展肅清道路。蒲列哈諾夫的立場顯然是機械地依照西方先進國家發展的道路，把俄國革命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先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完成民主任務，發展資本主義，經過幾十年之後，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較高的水平上進行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鬥爭。這便是全體孟雪維克所奉的「革命階段論」路線。

二、列寧同樣從革命的直接任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性出發，但他認為土地問題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而能完成這一任務的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因為自由資產階級與土地剝削的財產制有千絲百縷的聯繫。它不但不能站在農民的利益上解決土地問題，而且當工農群眾起來鬥爭時，將不可避免地要與代表土地貴族的沙皇制妥協，轉過來反對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的。要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堅決反對自由資產階級的妥協和背叛，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才有可能。列寧這一思想充分發揮在他的「兩個策略」中，他最後強調說：「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黑土重分社』或『土地自由社』

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我們不應忘記，在現時，除了完全的政治自由，實現民主共和國和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外，既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方法更接近於社會主義的了。」（列寧選集兩卷集第二版第四一四頁）

列寧反對蒲列哈諾夫的無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聯盟，而代之以工農聯盟的思想，無疑地是前進了一大步，但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是否可能實現，以及這個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如何，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提綱」提出前，他從沒有作過明白的解釋。因而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始終被束縛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念上，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視為一個未知的不定的遠景，認為只有當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完成之後，無產階級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從這一基本觀念說，那是布爾塞維克的路綫仍是「革命階段論」的。

三、托洛茨基完全同列寧站在一起反對蒲列哈諾夫的「無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聯盟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的公式，並接受了後者「以土地問題為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的觀念。但他對於由工農聯盟演繹出來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却深表反對，因為在他看來，農民雖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是一個極重要的革命力量，但由於它本身的矛盾和散漫性，絕不能成爲一種獨立的革命力量、與無產階級聯盟、建立「民主專政」。它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支持無產階級的專政，才能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絕不能以解決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爲限，必然要將社會主義的任務提出於議事日程。這樣，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不但不能有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的歷史階段，即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也是不可能的幻想。這便是「不斷革命論」。

托洛茨基在他的《總結與前瞻》中，對於不斷革命論曾作了有系統的解釋。（請參考M·J·奧爾更的《總結與前瞻》的摘譯本。一九五四年三月錫蘭社會平等黨出版）他分析了俄國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並根據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和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經驗及廿世紀初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對俄國革命得出了如下的基本觀念：

「資本主義增長，同時無產階級也壯大而鞏固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底發展就是無產階級向着專政的發展。但政權落於工人階級之手的日子和時辰，不是直接受決定於生產力水準的，而是直接受決定於階級鬥爭關係、國際狀況，及若干主觀因素：傳統、創意力、鬥爭決心……（托著《俄國革命史》第三卷附錄中譯本三四三頁）

「一個經濟落後國家，無產階級可以比資本主義更先進國家早些得到政權……（全上第三四三頁）

「我們的社會歷史關係底性質，使得資產階級革命底整個負擔都落在無產階級肩上，這對於將來的工人政府雖然要惹起很多的難題，但也要造就一些不可估價的便利，至少當工人政府存在初期是如此。這個將表現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关系裏面。（全上第三四四頁）

「俄國革命不容許（以後還有好長久不能容許）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憲政制度，可以解決民主政治底最初步的任務……所以農民底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甚至整個農民底社會地位，其命運是與整個革命命運，即無產階級命運，相聯繫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將成爲解放農民的階級（全上第三四四頁）

「但農民也許要排除無產階級而佔據其位置麼？不可能

的。全部的歷史經驗都反對這個假設。歷史經驗表示：農民是絕對不能起一種獨立的政治作用。（全上第三四四頁，重點係原有。）

「俄國資產階級將所有的革命陣地都讓給了無產階級。它也必須將對於農民的領導權讓給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得到政權以後造成的局面之中，農民除了結合於工人民主政制，便沒有其他辦法……（全上第三四四頁）

「無產階級祇能在全國高潮之上，依靠於全體人民底突進，而走到政權，無產階級以全國革命的代表資格，以反專制政治和反農奴制度的鬥爭中公認的民衆領袖資格，加入政府……（全上第三四五頁）

「無產階級代表，既不是以無力的人質資格，而是以起領導作用的勢力資格，加入政府，那他們便以此打破了最低限度綱領和最高限度綱領之間的界限，即是說將集產主義（述之按即社會主義）提出於議事日程……（同上第三四五頁，着重點係我所加一述之。）

「所以談不到甚麼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底一種特殊形式，即談不到甚麼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工人階級非超出它的民主政綱界限以外便不能保證它的專政底民主形式。關於這點所有的幻想都是絕對有害的。（全上第三四六頁）

「但在俄國經濟條件底下，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政策能前進至那一點上呢？有一點可以斷定，即是這個政策未曾碰到本國落後技術障礙以前早就碰到政治障礙了。若無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政權幫助，俄國工人階級便不能保持政權，並轉變其臨時的統治為一種持久的社會主義專政……（全上第

三四七頁)

上面所摘引的這些最精深的意見，不僅是反對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論，而且是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工農民主專政」觀念的。如果我們拿「總結與前瞻」和列寧的「兩個策略」來對照一下，便清楚地看出，前者對於俄國革命所發揮的思想是最能經得起往後事變的考驗的。

上面所敘關於俄國革命的三個基本立場，確定地形成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但在一個頗長的期間內，還只限於思想上的爭論。只有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這三個立場才能在實際生活上獲得大規模的，也就是最後的考驗。

整個孟塞維克根據他們的「無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同盟，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的思想，把工人階級在二月革命中取得的政權讓給資產階級，幫助它成立「臨時政府」並把工人階級群眾在革命中自動成立的蘇維埃作為這個政府的附庸，以此去抑制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而這個政府不但將土地問題放在一邊，甚至連立憲會議的召集也無限期拖延，却用全力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結果如眾所周知，孟塞維克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最後支柱。

布爾塞維克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為代表，根據「工農民主專政」的舊公式，在列寧回國前，採取了孟塞維克的立場，以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對派自限，企圖通過向該政府施行壓力的手段達到民主改革，因而使布爾塞維克在思想上陷於混亂和無出路的狀態中。

列寧看到了工人群眾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和自行成立蘇維埃，以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反動態度，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農民黨）的背叛行為，他回到彼得格勒後決

定拋棄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認為完成民主的任務必須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因而立即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提出於議事日程。這便是他的著名的「四月四日提綱」的基本內容。這樣，列寧的思想便與托洛茨基的完全達到一致了。正因這種對革命戰略思想的一致，布爾塞維克才能領導工人階級和農民（穿軍服的農民）在十月革命中踏上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府，完成了民主任務（宣佈土地歸農民和民族自決），隨即將社會主義的任務，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提出日程加以解決。從此為社會主義的建設開闢了道路。

這樣，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不斷革命論，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斷地生長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完全為歷史事實所證實了。如果我們將前摘引的托洛茨基在他的「總結與前瞻」所發揮的意見與十月革命的歷史事實對校一下，便更顯得不斷革命論的預測——民主革命不斷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是如何驚人地正確！同時也就證實了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論之完全破產，它只能替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服務而已。最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綱領，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專政的綱領，不僅是為先進國家，即在落後國的革命中，基本上也是適用的，只是革命所經的道路（不斷地發展）較為錯綜複雜而已。

不斷革命論與革命階段論

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的又一次考驗

俄國革命的偉大歷史經驗，本來已給一切落後國家——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革命指出了極其明確的道路。但由於俄國的落後和沒有獲得西方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及時援助，再加列寧的逝世，以致無產階級的政權，首先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權落

在以斯大林爲代表的官僚手裏。斯大林在列寧剛去世不久即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的民族保守主義路線來代替世界革命的方針。差不多同時，他又把孟塞維克在俄國革命中完全破產了的革命階段論，通過共產國際的領導機關輸入其他一切落後國家。這首先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一九二五—二七）進行了大規模的表演。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在經濟上它當然較俄國更爲落後，但在社會階級關係上却更有利於革命的不斷發展。即是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乘着民主革命的潮流走上政權。但斯大林在中國所實行的政策比俄國孟塞維克還走得更遠和更可恥。因爲後者至少還主張無產階級政黨組織上的獨立，而斯大林則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美其名曰「國共合作」，實際上是把無產階級領導勞苦群衆（農民和城市貧民）的革命政黨變爲資產階級欺騙群衆的工具，中國第二次革命慘敗的根因即導源於此。

一九二五年五月革命爆發後斯大林根據他的「國共合作」政策，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盟的孟塞維克政策，以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蘇聯的物質幫助國民黨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和汪精衛，在群衆中提高他們的威望和影響，並且把資產階級及國民黨的廣東政府（一九二七年秋天成立的）宣揚爲各階級擁護的「革命政府」，或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另一方面，斯大林盡力限制中共的政治活動，使後者屈服於國民黨的紀律，以執行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政策爲限，並命令中共及其領導的群衆無條件支持國民黨的政府，不許對它加以任何批評，爲的恐怕破壞「國共合作」關係。斯大林這種政策的目的是顯然是：中共幫助國民黨完成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即幫助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然後在不定的將來去進行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鬥爭。

但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還不以斯大林政策所給他的幫助為滿足。因為他看到工農群眾的蓬勃興起和鬥爭精神，特別是省港罷工委員會所領導下的工人群眾的英勇戰鬥行爲，以及共產黨的迅速生長及其在工農群眾運動中的鉅大作用。他本能地覺得這對於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必須加以排除，這便是他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舉行政變的動機。

蔣介石在這次政變中，解除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逮捕了在他直接指揮下的軍隊中擔任政治工作的共黨份子，附帶地他趕走了他的政權競爭者汪精衛，建立了他個人的軍事獨裁。最後提出了「黨務整理案」，把共產黨在國民黨組織內部的活動限制於極狹小的範圍，禁止共產黨批評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但斯大林對於蔣介石這種反革命的政變採取什麼態度呢？他不但沒有對蔣介石加以任何的抵抗（且不說進攻），反而強迫中共完全接受這次政變所造成的既成事實，承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爲的是希望他進行北伐，打倒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完成中國的獨立統一，建立全國的「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

但蔣介石領導他的「北伐軍」到達了揚子江沿岸，便立即與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進行秘密的妥協談判。當他抵達上海後，更公然以屠殺工人群眾的又一次政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來報答斯大林對他的幫助和期待。而斯大林在這次政變前六天還在宣揚蔣介石是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可靠盟友呢！（見斯大林四月六日對莫斯科黨務人員的演說）

在蔣介石四月十二日大屠殺上海工人的反革命政變之後，斯大林又將全部希望從蔣介石轉移到汪精衛身上，稱後者所代表的「左派國民黨」爲革命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甚至認爲它可以代替蘇維埃，稱汪精衛的武漢政府爲「革命中心」，並訓令中共

派遣兩個黨員加入這個政府，擔任工人部和農民部的部長，以此去保護工人利益和實行土地改革，但實際上是執行斯大林的政策去抑制工人的「過火行爲」，壓制農民的土地革命。因而在這時期內，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退出左派國民黨、組織蘇維埃、武裝工農以挽救革命危局的一切主張（詳見後面），都斥之為破壞共黨與左派國民黨的合作、「替反革命服務」，瘋狂地加以拒絕。

但汪精衛和蔣介石一樣，正在選擇時機舉行他自己的反革命政變。結果他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實行了政變，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及工農群眾的領袖，解散工農群眾的革命團體。中國第二次革命便是這樣悲慘而可恥地失敗了！

斯大林在這個極度悲慘而可恥的失敗之後，爲了抵制托洛茨基的批評，推卸自己的責任，便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冒險主義，命令中共不斷地舉行暴動，最後以廣州暴動成立蘇維埃政府的流產，把革命的殘餘力量消耗殆盡。

托洛茨基在中國第二次革命時實際上雖已被排除於蘇聯共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之外，但他對於斯大林和布哈林所執行的孟塞維克政策曾不斷地給以批評，並不斷地提出了革命的建議。他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已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他又正式提議共產黨立即退出國民黨，以便它成爲「完全獨立的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以領導無產階級，以繼續不斷地在工會爭取工人群眾，以領導無產階級爭取農民的鬥爭。」（見托氏致拉狄克的信，載托著《中國革命問題》中譯本第二頁。）

隨後，托洛茨基在他的「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一文中，批評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之後，強調地指出「不管中國經濟如何落後，一部份也正因爲這種落後性，中國革命完全

能使那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走上政權。」最後提出警告說：「革命佔了上海和漢口，因而陷入中國最發展的階級矛盾之中。……它必須或者向着無產階級，或者向着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必須向着那反資產階級鬥爭的數百萬下層隊伍，一方面，我們具備了這。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以其南京的屠殺（指那時帝國主義軍艦砲擊南京一述之）表明着它們不是開玩笑了。……它們首先是想迫使民族運動中的資產階級上層了解：如果不願世界帝國主義對他們的試砲，那麼他們和下層群眾決裂的時候業經到了」（全上第十三—十五頁）。這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寫的，僅僅經過九天之後，蔣介石果然遵照帝國主義的指示，用流血的政變（四月十二日）「和下層群眾決裂了」！

在蔣介石用流血手段和「下層群眾決裂」，而直接依靠帝國主義之後，斯大林不但沒有得到任何教訓，反而在他的《中國革命問題提綱》（THE THESIS OF PROBLEMS OF CHINESE REVOLUTION）中，一方面為他對蔣介石的破產政策辯護；另一方面提出支持武漢的汪精衛左派國民黨，這正是為下階段的革命設下陷阱。這時（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托洛茨基寫出了他的對中國第二次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文章：《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同志的提綱》，對斯大林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給了精確的批評，並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底下便是他的批評和建議的要點：

「以為帝國主義機械似地從外面焊合了中國底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但是凡使勞動者的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站立起來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民族資產階級去和帝國主義者作公開的同盟。帝國主義的壓迫不是減弱資產階級與工農群眾之間的階級鬥爭，反而使這鬥爭激烈起來，在每一嚴

重的衝突中都達到流血的內戰地步。……」 (托洛茨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中譯本第二十一—二十一頁。)

「蔣介石扮了共和自由派卡文涅克底角色，這一點已成爲周知之事。斯大林提綱跟着反對派，也承認了這個類比。但這類比必須加以補充。假使沒有雷特路·洛林們，路易·勃浪們以及那無所不包的國民陣綫底其他空談家，則卡文涅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是誰扮演着這些角色呢？不僅汪精衛，而且中國共產黨底領袖們，首先是他們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的那些教唆者。除非把這一點公開說明了，解釋了，而且深刻地記住了它的意義，則兩條發展途徑的哲學，只能替路易·勃浪與馬丁諾夫的機會主義作烟幕，也就是說，只能準備在中國革命底新階段上，重演四月悲劇吧了。」(全上第二十六頁)

「要有權利談那爲民主革命底布爾塞維克道路鬥爭，必須有無產階級主要工具：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它在自己的旗幟之下鬥爭，永遠不許它的政策與組織解消在其他階級政策與組織之中。……」(全上第二十六頁，着重點係原有。)

「……他們(指斯大林們——述之)要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對小資產階級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依賴，這小資產階級政黨不可避免要變成大資產階級底一個工具。」(全上第二十七頁。)

「……宣佈成立蘇維埃的時期尚未成熟，同時却提出武裝工農底口號，乃是散佈混亂。祇有蘇維埃，在革命底未來發展時，能成爲真正武裝工人且率領這些武裝人們的機關。」(全上第三十頁)

「要加強這個浪潮，並要加深它，我們需要高揭土地革命旗幟的農民蘇維埃，不是在勝利之後，而是立即需要，以便保證勝利。

假使我們不願讓農民浪潮歸於消滅，像泡沫似地飛散，則那些農民蘇維埃必須由城市底與產業中心底工人蘇維埃聯合起來，同時還須將城市中商業與手工業區域底貧民蘇維埃，加添到工人蘇維埃去。

假使我們不讓資產階級離間革命群眾與軍隊，則兵士蘇維埃必須安排進革命底鍊子中去。

必須儘可能地敏捷，儘可能地勇敢，儘可能地有力，去加深革命，不是在勝利後，而是要立即地，否則就不會勝利。

加深土地革命，農民立即奪取土地，將立即減弱蔣介石底力量，將使他的軍隊陷於紛亂，且使內地的農民行動起來，其他沒有走向勝利之路，也不能有其他道路。（全上第四十頁——四十二頁）

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的機會主義提綱所指出的，如上面所摘引的革命政策，假如當時能被共產國際採用而在中國付諸實施，革命危機還有可能扭轉過來走上勝利的道路。因那時革命雖在上海和廣東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在湖北和湖南等省還有鉅大的力量。只要中國共產黨號召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實行土地革命，工農群眾將如洶湧怒發，兵士將跟着蘇維埃的成立轉到工農方面來，汪精衛的反革命陰謀將在工農兵的革命火燄中化爲烏有。而湖北湖南工農兵蘇維埃的興起，將吸引上海和廣東的工農群眾重新走進革命的浪潮中，「將立即減弱蔣介石底力量，將使他的軍隊陷於紛亂」。但異常不幸，托洛茨基這個最能挽救革命危局的主

張完全爲斯大林所壓抑下去，以致中國的革命繼續沿着孟塞維克的路綫走向陷阱。

托洛茨基看到斯大林不顧一切地推行他的置中國革命於死地的政策，在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會議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末）不得不作如下的聲明，建議和警告：

「我們和這個政策無共同之點。我們絲毫不要替武漢政府與國民黨領導者底政策負責，我們迫切地勸告共產國際拒絕負擔這個責任。我們直接對中國農民說：假使你們服從武漢領袖，不組織你們自己獨立的蘇維埃，則汪精衛一類的左派國民黨領袖，一定要出賣你們的。土地革命是一樁嚴肅的事情。汪精衛型的政客，在困難情形中，將十次地與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人與農民，在這情況中，兩個共產主義者參加於資產階級政府，如果不是它準備對勞動群衆以新打擊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爲無力的人質了。我們對中國工人們說：假使農民不由你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而由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領導，那是不能將土地革命推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們的工人蘇維埃，將它與農民蘇維埃聯合起來，由蘇維埃武裝你們自己，吸引兵士代表們到蘇維埃來，槍斃那些不承認蘇維埃的將軍們，槍斃那些組織暴動來反對蘇維埃的官僚與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只有經過農民兵士蘇維埃，你們才能爭取蔣介石底兵士底大多數到你們方面來。你們，前進的中國無產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萬人的（指左派國民黨——述之註）那個領袖們底組織，小資產階級與妥協成性的領袖組織，能夠代替那包括成千百萬人的工農兵蘇維埃，那你們便是你們的階級與你們的歷史使命底叛徒。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不將在蘇維埃形式中前進而勝利，則將完全

失敗。」（全上第六一頁，重點原有。）

但托洛茨基這個迫切的建議和警告的呼聲，最後還是被斯大林所封鎖，不能達到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耳中。「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完全失敗」，便成了極不幸的預言！

對於斯大林在革命失敗後所推行的冒險主義政策，托洛茨基不但給了它以嚴厲的抨擊，並且還提出了在反革命勝利情形下的防衛戰略路綫（請參閱「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一文，見《中國革命問題》中譯本第二〇三頁。）最後，他從廣州蘇維埃政府的流產經驗中指出了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性質——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前途。

從前面的簡單敘述中已十分清楚地顯示出：斯大林所執行的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路綫，是如何驚人地把一個最有勝利希望的革命導致成最悲慘的失敗！同時，從這個革命的失敗中又是如何驚人地證實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路綫的正確性。

但在這次革命慘敗之後，斯大林和布哈林除了把失敗的全部責任推到中共的領袖們，特別是陳獨秀身上，以脫卸自己的罪惡外，又繼續為致使中國革命失敗的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路綫辯護，並加以理論化和系統化，寫在「共產國際綱領草案」之中，以此為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未來的革命準備了一條絞繩！

因此，托洛茨基在批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中除了批評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思想和其他的錯誤意見外，並特闢一章：「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在裏面給斯大林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革命所準備的絞繩路綫以徹底的暴露。（見《列寧逝世後的第三國際》英文本第一六七至二三〇頁。）最後，他根據俄國三次革命的經驗和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新經驗，以爭論的形式寫成了他的《不斷革命論》的不朽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他給一

切落後國家的革命指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針：

「關於遲起的資產階級諸國，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不斷革命論的意義就是：它們的任務——民主和民族的解放——之完全和真正的解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使這個專政成爲全民族，尤其是農民羣衆的領袖時，才可想像。」（英譯本《不斷革命論》第一六六頁。）

「不僅土地問題，而且民族問題，使得這個在落後國家人口中佔壓倒多數的農民，在民主革命中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沒有工農聯盟，民主革命的任務既不能解決，甚至不能嚴肅地被提出來。但是這兩個階級的聯盟，除了通過對民族自由派革命影響之不妥協的鬥爭之外，別無他途。」（全上第一六六——一六七頁。）

「無論如何，在個別國家，革命將會有最初的插話階段，但工農革命聯盟的實現，只有在組織在共產黨中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領導底下，才可想像。換言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有通過與農民聯盟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去解決民主革命諸問題，才可想像。」（全上第一六七頁。）

「無產階級專政作爲民主革命領導的權力興起時，不可避免地而且很快地會提出與深刻侵犯資產階級財產權有聯繫的諸任務來，民主革命便立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革命，因此變成不斷革命。」（全上第一六八頁）

「在民族限度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因爲資產階級社會的危機事實上就是它所建立的生產力與民族國家結構的衝突。由此，一方面產生帝國主義戰爭，另一方面，產生資產階級歐洲聯邦的空想。社會主義革命在民族範圍內開始，進而發展成爲洲際的，最後達到了

世界範圍。因此，社會主義革命在更新的更廣闊的世界意義上變成不斷革命；它的新社會的最後勝利只能在我們整個地球上完成。」（全上第一六九頁）

不斷革命論在中國第三次革命中的曲折反映

在第二次革命慘敗後，中共在斯大林的嚴厲控制之下經過了一連串的冒險暴動，建立蘇維埃和紅軍，並經過了長期內戰，結果還是繼續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論」。隨後，毛澤東並將這種理論發展成爲他的新民主主義。根據這種「主義」，中國革命須首先進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即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之後，再走上社會主義。

因此，當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特殊有利條件下（這主要表現於蔣介石政府的自動崩潰和美帝不能直接干涉），雖然單靠農民武裝極輕易地摧毀了蔣介石的統治，走上政權，但還與民族或「民主的」資產階級聯盟，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宣佈「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綱，甚至爲此延緩了土地改革和保護帝國主義的在華財產，企圖以此在幾十年內，或如周恩來所說的，在二十年內，完成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階段。但階級矛盾的邏輯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一步一步放棄他的新民主主義的陣地，而向客觀的革命不斷發展的規律低頭。

首先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在抵抗美帝國主義進攻的直接威脅之下，中共不得不侵犯帝國主義的在華財產，以資報復。同時，在地主和資產階級乘着美帝進攻而大肆反革命活動的情勢下，又不得不提前實行土地改革，爭取農民以反對地主，進行「五反運動」打擊資本家。隨後，（一九五三年初）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

，中共更進一步宣佈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實施工業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由於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怠工，中共又被迫於一九五六年實施「公私合營」政策，逐步地取消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公開拋棄了新民主主義的路綫，而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同時，中共在它的第八屆全國大會上（一九五六年九月）宣稱中國人民政府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制。（見劉少奇對大會的報告。）

從前面這一系列的政策的轉變中，不可否認地表明：中共已被迫地放棄了它的革命階段論而屈服於不斷革命的規律，換句話說，不斷革命論已在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過程中被歪曲地反映了出來，又一次證明它的正確性。但正因為它是被歪曲地反映，因而也就替革命的往前發展埋伏了新的巨大障礙。

這種障礙明顯表現於：中共既非自覺地理解不斷革命論，了解十月革命的經驗和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依靠無產階級領導農民舉行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府，解決土地問題，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以此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而是單靠農民軍攻打城市，推翻蔣的統治，在四個階級聯合政府的名義之下，建立了邦拿巴特的軍事獨裁或官僚專政，剝奪了工農群眾的一切民主權利。並把革命限制於本國範圍內，企圖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因而從它原來的機會主義又跳到冒險主義，此種冒險主義的突出表現是：在農業集體化上，毛澤東完全不顧農民的意志，強迫他們於最短期內加入農業合作社，甚至公社化，同時迫使農民勞動達到空前緊張程度。在工業方面，以行政的鞭子強迫工人極度緊張地勞動，增加生產，以便加速完成經濟計劃（如以兩年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但工農群眾在極度緊張勞動之下所得的報酬，却遠不足以維持他

們的最低生活，特別是農民經常陷於半飢餓的狀態之中。另一方面，官僚們則享受一切特權，過着最奢侈的生活。這便在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工農群眾與特權的官僚階層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像蘇聯和東歐各國一樣，正在向着政治革命的爆炸方向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第三次革命雖然體現了革命不斷發展的客觀規律，從中共政策的凸凹鏡中歪曲地反映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但中國不斷革命的徹底完成還不可避免地要經過一次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型的官僚獨裁，建立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制，並把革命擴展到其他的國家去，特別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這樣，才能符合不斷革命的自然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新經驗

斯大林根據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在「共產國際綱領」（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世界大會通過的）中所定下的路綫，是把各國共產黨變成爲執行克里姆宮外交政策的簡單工具，他爲落後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所定的政策，在人民陣綫或民族陣綫的標榜之下，早已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變成了自由資產階級欺騙工農群眾的附屬工具。這種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差不多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充分地暴露了出來，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印度。

印度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大國，像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半殖民地大國一樣，它完全具備着不斷革命的客觀條件。但印共在第二次大戰前經過長期的機會主義政策，把自己弄成了毫無生氣的資產階級的玩物之後，在大戰中，爲了蘇聯與英國同盟反對希特勒戰爭的理由，公然主張放棄反對英帝的民族獨立鬥爭，墮落到最

不名譽的地位。當戰爭結束後，英帝國主義由於其自身所遭到的困難，迫不得已允許印度「獨立」，把政權交給尼赫魯所代表的土著資產階級以便保持它在那裏的經濟特權時，印共又以奴顏婢膝的態度擁護尼赫魯政府，把民族的完全獨立（取消英帝在印的經濟特權）和急待解決的土地問題寄託在這個政府身上。

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三〇年即已指出：「印度農民需要一次『公正』的土地分配。這是民主主義的基礎，同時也是整個民主革命的社會基礎。」他在批評甘地所領導的「消極抵抗」之後，接着說：「農民的消極抵抗以及他們的流血暴動，只能在已變成革命民族領袖，且在勝利後會成為革命政權領導的城市階級領導下才能轉變成為革命。在現時代，這樣的階級即使在東方，也只能是無產階級。」「……只缺少一個條件：一個布爾塞維克黨。」（以上均見托著《革命在印度——其任務及其危機》載於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戰士報》）

上面托洛茨基對印度革命的基本思想，直到今天還是生動而有效的。印度資產階級雖已得到英帝國主義的允許而踏上政權，但印度不過從殖民地變成半殖民地，土地問題依舊未得到解決，就是因為「只缺少一個條件：一個布爾塞維克黨。」因此，現在印度革命面臨的中心問題，便是根據不斷革命論建立「一個布爾塞維克黨」。

印度尼西亞是僅次於印度的一個殖民地大國（就人口數量說）那裏的共黨也差不多扮演了印共同樣可恥的角色。它在第二次大戰前及戰爭中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欺騙群眾的工具，以致後者在戰爭結束時得以「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踏上政權。但當資產階級建立其政權時，它又突然來一次冒險的暴動，以致遭到慘敗，在冒險失敗之後，這個黨又回過頭來忠順地掩護蘇加諾為代

表的資產階級政府，把解決土地問題的民主任務寄託在後者身上。但事實又一次證明：蘇加諾政府不但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並在加緊剝削農民，壓迫工人群眾。最近一年來，蘇加諾已逐步地轉向軍事獨裁，準備於時機到來時向工農群眾和共產黨舉行蔣介石式的反革命政變。

與印度尼西亞類似的經驗又表現於中東的伊拉克。在卡遜領導的軍人政變推翻那個腐敗透頂的皇朝之後，工農運動已如暴風雨般地爆發出來，形成一種真正的革命潮流，但伊拉克的斯大林黨却盡力把這個革命潮流引導到以支持卡遜的地主資產階級政府為限，希望它完成民主任務，但卡遜同蘇加諾一樣，愈來愈仇視工農群眾，削弱共黨（例如只承認從該黨分裂出來的一部份為合法黨，而否認其他一部份的合法地位），向着軍事獨裁的道路走去。

在拉丁美洲的危地馬拉，那裏的斯大林黨根據無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同盟路線，在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中，不及時武裝工農，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却把資產階級推上政權，等待它去完成民族獨立和土地改革的民主任務。結果是代表地主和資產階級的軍人政客，在美帝國主義陰謀策劃之下，輕易地完成了他們的反革命政變，使工農群眾陷於血泊之中。這是斯大林主義者的孟塞維克政策在拉丁美洲所演的第一次悲劇，它對於拉丁美洲的工人階級和農民是一最新鮮而直接的教訓。

古巴現正處於革命狀態中。卡斯特羅領導農民游擊隊摧毀了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巴蒂斯塔的反動獨裁，成立了他的革命政權，並在美帝威脅下實行了一系列的帶有革命意義的措施（如接收美、英、荷帝國主義者的煉油廠及其一部份土地），這些都證明這個政權正向着革命不斷發展的方向走，但卡斯特羅政權還是一

種小資產階級的政權，只能是過渡的政權形式。古巴要把革命推行到底，完成它的不斷革命，只有將現時的小資產階級政權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沒收美帝國主義者及本國地主的一切土地分給農民，進一步沒收國內外一切資本家的財產歸國有，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把這個革命擴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去，轉過來推動美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才是可想像的。

總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鮮經驗無可爭論地證明：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無論是得着帝國主義的允許，或乘着群眾的革命潮流，或通過軍人政變走上政權（如印度、錫蘭、緬甸、印度尼西亞、伊拉克、埃及等），沒有一個國家完成了真正的民族獨立，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同時證明：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特別是他的使落後國家民族資產階級「中立」的政策，已將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完全變成支持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和工農革命運動的絞繩。

結 論

經過俄國三次革命的經驗，中國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的經驗，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鮮經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所指出的戰略路綫，對於一切落後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乃是唯一正確的路綫。這條路綫結晶地被寫在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之中。最後，讓我將這個綱領的基本要點摘引下來作為本文的結論：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就其本質說，乃是落後國家，但落後國家却是帝國主義所統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綜合的性質：最原始的經濟形式聯合着最

新式的資本主義的技術與文化。同樣情形，也決定了落後國家中無產階級之政治的鬥爭：爲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之最基本完成的鬥爭，與那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鬥爭相聯結。在這一鬥爭中，民主口號，過渡時期要求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並不是分成各別的歷史時期，而是直接從此到彼地邁進的……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心任務是土地革命，即：消滅封建殘餘；與民族獨立，即：推翻帝國主義的羈絆。這兩項任務是緊相聯繫的。

「簡單地將民主政綱予以拋棄，那是不可能的。群眾一定要在鬥爭中去超出這個政綱。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的口號，……這口號一定要同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問題不可分離地聯繫着，在初步，工人們必須用這民主政綱來武裝自己。只有工人才能號召與統一農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綱基礎上，必須使工人們與『民族』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用革命的民主口號來動員群眾，到了某個時期，才能而且應該產生蘇維埃。……蘇維埃遲早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有蘇維埃才能完成民主革命，同時開啓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過渡綱領中譯本〔校正本〕第三〇——三一頁。）

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自中共對蔣介石反動政權取得完全勝利，佔領了整個中國大陸，建立「人民共和國」（或「人民民主專政」）後，這不但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巨大的、甚至劃時代的事變，而且在遠東乃至整個國際關係上都引起了極深刻的變化。但這一事變和變化，不僅出乎一般資產階級統治者及小資政客們意料之外，引起了前者異常的驚疑憂懼與後者的惶惑或眩慕，而且由於中共以極反動的孟什維克主義「革命階段論」政綱，配合着完全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農民武裝隊伍達到了今天這樣的勝利，實遠非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連托洛茨基本人在內）始料所及。正因此，中共的勝利在我們隊伍中引起了不少迷惑，對它勝利的原因、意義及其政權的性質和前途，都發生了極度分歧的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因此根本懷疑到不斷革命論的真實性。這些分歧意見如不及時加以合理的解釋和解決，在我們隊伍中，特別是在我們中國支部中，可能發生最嚴重的後果，——一部份同志可能因懷疑不斷革命論而向斯大林主義投降（上海一部份同志已微露此種傾向），另一部份同志則因厭惡毛澤東機會主義的勝利係完全違反了不斷革命論，而走到極端的消極（中國的少數派〔按即指「新旗派」——編者〕即已明白表現了這一傾向）。因此，我們對中共的勝利及其所引起的

* 這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第四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上的口頭報告，同年十一月寫成文字，在第四國際的內部公報上發表。

特殊局勢，必須予以極慎重的極嚴肅的檢討。首先，我們絕不應因共黨的勝利而忽視斯大林主義的反動作用，向它讓步或低頭。我們必須堅持我們不斷革命論的基本立場（因為這是引導中國乃至一切落後國家走上真正解放的唯一指南），並以此立場去判斷和推動已經發生的事變。但在進行討論時，我們不僅要拋棄一切主觀的成見、願望或機械的類比，而且要擺脫某些傳統的公式（可絕不是擺脫原則）。我們必須面對着活的具體事實（不管事實的好壞），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局勢之對於中國事變所發生的決定影響。同時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斯大林主義在事變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及強使事變本身及其後果所形成的畸形或變態。總而言之，我們必須嚴肅地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去觀察事變，分析事實，從分析事變本身發展的後果關係中獲得正確的理解，並由此正確地估計其可能發展的趨勢。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採取我們國際研究南斯拉夫及東歐問題的同樣精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從迷惑中，從極度分歧的意見中解脫出來，正確地決定我們對中共領導運動的基本態度和方針。因此，本報告的目的不在於多多提供事實，而是希望從事變邏輯發展中提出必須的基本事實去解釋某些已經引起了嚴重糾紛的意見，藉供國際合理地解決中國問題的參考。

中共對蔣介石國民黨勝利的諸原因

中國托派過去廿餘年來所堅持的傳統觀念（即托洛茨基再三提示的觀念）之一，亦即對抗斯大林黨單靠武裝農民隊伍以征服城市的觀念之一，認為要推翻資產階級地主國民黨的政權，必須城市工人階級站起來領導全國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特別是農民群眾進行最堅決的鬥爭，最後舉行武裝暴動，才有可能。單

只依靠鄉村農民武裝力量，是無法推翻資產階級地主政權的，因為在現社會的條件下，鄉村是受城市的支配的。鄉村農民必須由城市階級領導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現時我們面對着的事實却正是一個依靠農民武裝隊伍的斯大林黨摧毀了它，並奪取了政權。由於這種「事實」與「傳統觀念」間的極度矛盾，便在中國同志中首先引起了迷惑和紛歧意見。同時國際間某些同志，由於不甚了解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傳統觀念及毛澤東勝利的特殊原因，便以強調「群眾的壓力」來解釋毛的勝利。因此，我以為詳細而正確地解釋中共何以勝利的問題，不但為消除中國同志間的分歧意見所必須，而且也是為糾正國際間某些同志的偏向所必要的。此外，而且是最重要的，只有正確地解答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進一步理解中共勝利的客觀意義，它的一切措施的盤旋曲折及其可能的前途。為了盡可能解答這一問題，我先從幾方面的事實說起。

A. 蔣介石政權的絕對腐朽與自動崩潰 大家知道蔣介石政權是從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血泊中產生的。因此，它生來就極端害怕民衆，仇視民衆，壓迫民衆，並以亞洲式的極野蠻方式剝削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為其生存條件。同時又因為它所代表的東方資產階級（即資產階級愈到東方愈卑怯無能）使然，故只有依賴帝國主義（至少是其中的一派）為靠山，並團結一切反動勢力（連同封建的殘餘勢力在內）以對抗群眾，壓迫群眾。正因此，它不但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的任何一個民主任務，即連極微少的任何民主改良（如「二五減租」之類）也不可能。它的主要特徵是：亞洲式的極度專橫、腐敗與無能。這些特點在抗戰過程中已暴露無遺：一方面，蔣政府對日帝長期謀求妥協（即實行「不抵抗主義」）失敗而被迫進行抵抗時，即對抗戰暴露出絕頂無能，不斷喪城失地；另一方面，却絕對壓制群眾的任何自

動抗戰活動；同時，它的官僚軍閥利用了抗戰機會盡量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如囤積、走私、勒索……所謂「發國難財」）；因而大大地引起了一般民衆的不滿和怨恨；——此種不滿和怨恨，曾在抗戰末期的學生示威與某些地區的農民騷動中反映了出來。

日帝投降後，蔣政府的專橫腐朽與無能更是登峰造極。首先是軍閥官僚們在接收「敵偽財產」的名義之下，盡量盜劫公產以飽私囊，並在生活上極盡窮奢縱慾之能事。同時則藉進行內戰之實，徵糧、徵兵、濫情搜刮（因應徵兵士可以納賄免徵，故亦為官僚勒取錢材的一個資源），橫施壓迫，這便更加引起了一般人民的憤懣，因而爆發了幾次大規模的抗議與示威運動（以學生為主體）。但蔣介石對這些憤懣、抗議與示威的唯一答覆只是：憲兵、警察和特務的鎮壓、屠殺乃至暗殺和綁架等等。

在抗戰過程中，蔣政權的財政基礎原已耗竭殆盡，除了橫征勒索外，便只有靠印刷機無限地印發紙幣來維持。因此，通貨膨脹的速率差不多是依照幾何級數而增加。到「和平」後，此種通貨膨脹的增加則由幾何級數進到閃電的速度，以至最後爆發了一九四八年末「金元券」的總崩潰與經濟上空前的大混亂——那時一切工商業都趨於停頓和解體，中下級各層人民，連同政府機關中的一切中下級職員的生活都已陷入絕境。工人迫於飢餓，又掀起了頗為普遍的罷工潮，尤其是搶米風潮到處發生，當時美聯社對此種情形有一個簡括的描寫：「恐慌和飢餓正在威脅着上海人民……一般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民都無法生活下去，對現狀不滿和怨憤，幾乎普遍存在，人心思變，大家都要求改變現狀。」那時的蔣介石政府真是搖搖欲墜：假使中共在當時的各大城市號召工人及一切群衆起來舉行暴動推翻蔣介石政權，簡直有如摧枯拉朽。但中共却叫人民安靜地等待它的「解放軍」來解放他們。

蔣介石唯一信賴的是他的軍事力量，因而堅持內戰到底，絕不與毛澤東妥協，希圖以其「優越的軍事配備」消滅中共的農民武裝，以此挽回其末運。事實上蔣介石的軍隊不但在數量上，就是在配備上確是遠遠超過了中共。因為它有頗大的一部份軍隊（約五十萬至六十萬）是配有最現代化的美式武裝的。但它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大多數的兵士們是從農村中強徵來的，有些甚至是綁架來的，因而他們天然地或多或少反映農民的不滿和怨恨。二、所有的上中級軍官們都早已腐化透頂，對兵士橫加壓迫，經常剋扣軍餉，致兵士生活陷入極端痛苦，這更加深了兵士們的不滿和怨恨。這種怨恨只需碰到一個適當的機會便會泛濫成爲投降或潰逃的洪流。毛澤東的「總反攻」便給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前述的事實表現之下，蔣政府不但對於一般民衆是絕對孤立的，極端被仇視的，就是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曾經擁護過它的，現在也離開它，怨恨它，甚至欲犧牲它而另尋出路了。這種情形反映在國民黨裏面，便是各種各式的反蔣派系之公然出現。因而使國民黨本身陷於分崩離析。其中一部份，成立了所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李濟深爲領袖），看到蔣介石的無望，即亟亟於同毛澤東謀取妥協或「諒解」；另一部份則準備起義響應（如湖南省長程潛及雲南省長盧漢等）或等待投降（如北平的傅作義及四川的劉湘等）；第三部份以李宗仁及白崇禧爲代表（所謂桂系）則準備取蔣介石的地位而代之。而國民黨外的資產階級份子則愈來愈圍繞於「民主同盟」的周圍，希圖通過這個集團去找尋他們的出路。總而言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基礎及其上層結構是完全崩解了，再也不能維繫下去了。

這時給蔣介石留下的最後一點希望，就是華盛頓的緊急救援，他爲此曾特派宋美齡赴華府作最後哀求。

B. 美帝最後拋棄了蔣介石 第二次大戰前，在中國政治和經濟上最佔優勢而具有決定作用的是日、英、美。在戰後，日帝勢力完全消失了。英帝由於本身的過度衰朽，除了勉強維持港九的統治外，在政治上可說已完全退出了中國舞台。最後企圖支配中國的只有美帝。美帝原想用全力支持蔣政府，以此壟斷中國整個市場，作為抵抗與進攻蘇聯的堡壘。所以它在大戰末期及戰後初期，曾以鉅量的物質與軍備支援蔣介石。但當美帝看清蔣政府的行政與軍事機構的絕頂腐朽無能所招致的可怕危機時（如美援物資大部份為官僚中飽，美援武裝則常為作戰無能的軍官們「送」給共黨等），它便一方面企圖「說服」蔣介石實施某種「改良」（如排除某些過份腐朽無能的高級官僚和將領，進用較有能力的「民主人士」以及抑制某些過份的專橫和壓制等等），另一方面，則希圖在蔣毛之間謀取暫時的妥協，以便等待時機去收拾後者，——這便是馬歇爾特使來華的使命。但蔣介石不僅拒絕施行任何「改良」，而且頑強地拒絕了與毛澤東作任何妥協。結果，馬歇爾的使命便完全失敗了。此時留給美帝的唯一道路就是直接以軍事代蔣進攻共黨，並直接控制其軍事行政大權，如當時一部份共和黨人所主張的。但異常之明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局勢並不容許美帝如此蠻幹。假如美帝這樣蠻幹下去，不但會使它的全部物質和精力陷入廣大中國的泥沼中，而且可能因此直接引起新的世界大戰。在當時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不僅美帝不敢冒此大險，就是他的同盟者（例如英帝）也會極端反對的。這便最後迫使美帝放棄了援蔣政策，對中共採取觀望和等待時機的態度。但美帝這最後決策，對蔣政府便無異於一道「催命符」，——這從杜魯門上次選舉獲勝及其最後拒絕援蔣的消息傳至中國後，在蔣介石集團內所引起的異常頹喪與絕望氣氛中充分地反映了出來。

C. 中共的主觀力量 中共的主要力量或基本力量，即是它的農民武裝。此種農民武裝力量係導源於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華南諸省繼續爆發的農民暴動。那些農民暴動雖在當時沒有任何前途，但由暴動中集合起來的農民武裝，經過當時共黨全力的組織與訓練（因共黨自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即退出了城市而專門從事於農民暴動，組織農民軍〔「紅軍」〕及建立「蘇維埃」等），並因中國經濟上的落後及地理上種種特殊條件（如地域廣大與交通的異常缺乏等），一般農民群眾陷於毫無出路，以及資產階級政府的特別無能等等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便得以繼續維持和發展，形成了長期的農民戰爭。後來雖因蔣介石獲得了帝國主義的大量援助（如飛機、軍火及軍事專家等）迫使中共的農民軍由華南逃到華北，並向蔣政府投降，取消了「紅軍」番號、「蘇維埃」及土地革命。但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共的武裝又在華北獲得了空前發展的機會。尤其是戰爭末期及戰後，中共的武裝力量更獲得了大大的發展，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以前江西時代，形成一股巨大的軍事力量。

在政治上，中共雖然盤旋於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之間；雖然在抗戰前夕取消了土地革命與「蘇維埃」和「紅軍」番號；雖然在抗戰期間它卑屈地與國民黨「合作」，擁護蔣介石的領導；但由於它對蔣政府曾進行過長期的反抗鬥爭，並在抗戰中對後者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作過某些改良主義的批評，以及在戰後提出過某些民主改革的要求，特別是在華北某些地區施行的土地改革；再加上蘇聯十月革命的傳統威望，以及蘇聯在上次大戰中所表現的顯赫戰果和戰後在國際上的強盛地位；在一個絕頂專橫、腐化無能的蔣政府壓迫和剝削下深懷憤懣而正陷於無出路的一般民眾，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農民群眾，在缺乏一個真正革命

黨去領導他們時，便將一切希望寄托於斯大林主義的中共了。這便是中共政治資本的泉源。此種「政治資本」與「農民武裝」配合起來，便構成了中共的主觀力量。但若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共的勝利還是大成問題的。

D. 蘇聯對中共的援助 蘇聯官僚層雖然極端害怕中國有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勝利的革命，雖然它的對外政策是希圖與美帝謀取妥協，但為自身的特殊利益，尤其為對抗美帝的過份威脅，在它可能控制中共的限度內，是不惜予後者某種援助的，所以克里姆林宮除了在政治宣傳上聲援中共所領導的運動外，即在軍事上也確曾給了後者以決定性的援助。蘇聯之佔領東北（這是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區，由日帝在幾年內經營起來的，和最富裕的農產區，並擁有人口三千餘萬。）在客觀上就等於給了蔣介石一個致命的打擊，蘇聯在表面上雖然承認蔣政府為合法政府，並將東北的大部份城市和礦區移交後者。但實際上蘇聯官僚層却盡量地破壞了那些最重要的工礦設備（並搬走了一部份）幾使之全部停頓；並藉控制旅順大連以截斷蔣政府的對東北的主要海上交通，阻碍它對東北工商業，特別是對駐軍的運輸和補給。另一方面，則以解除日軍的龐大輕重武裝（據估計可以武裝百萬人）以武裝中共隊伍，並使之佔領各鄉村及小城市，重重包圍蔣軍駐守的各大城市和礦區——這樣，蔣介石所收回的大城市和礦區不但毫無裨益，反而成了極不堪忍受的負擔，最後則變成一個陷阱。首先，蔣介石便必須派遣配備最好的（也就是美式配備的）龐大軍隊（約五十萬人）在那裏防守，同時又須維持那些大城市和礦區的巨額開支，這便大大地牽制了並分散了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和加速了它的財政破產。

至蘇聯以俘獲日軍武裝替毛澤東建立起來的軍隊（有名的林

彪第四野戰軍便全是由蘇聯武裝起來的），這在毛澤東的軍事配備和戰略上都起了決定的作用。人們應當知道，毛澤東原有的農民隊伍雖然數量龐大，但在武器配備上不僅是極落後的，且是異常缺乏的，尤其缺乏重武器。自從經過蘇聯之手獲得日軍此項龐大的輕重武器後，再加上蘇聯及日俘的人批的軍事技術人員，毛澤東原來極落後的農民武裝，就有一部份一躍而為現代化了。此種現代化的武裝與農民作戰的勇敢和中共將領軍事上的熟練配合起來，這才使中共的軍隊有從單純的游擊戰轉變為陣地攻城戰之可能。這從一九四八年秋冬交替時共軍完全勝利地攻取東北各大城市和礦區（如長春、瀋陽、錦州等大城市及鐵嶺、撫順、本溪、鞍山等大礦區）的諸戰役中，充份地表現了出來。共軍對東北各大城市勝利的結果，除獲得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基礎外，在軍事上既一方面摧毀了蔣介石軍隊中最優良的，即美式裝備的最大部份（據估計約佔全部美式裝備百分之八十）；另一方面，又因獲得蔣軍的龐大新式武器和人員（投降與被俘者約近四十萬人）與以前從蘇聯所獲得的日俘武裝綜合起來，這便使中共在軍事配備和技術上原來對蔣軍所居的劣勢，現在反過來變成為壓倒的優勢了。因此也就根本改變了中共軍隊的戰略地位，即由單純的游擊戰轉變為大規模的陣地戰與攻城戰了。這對於單靠農民軍以奪取城市的中共的勝利，無疑地是具有決定作用的。

× × ×

將前面的事實綜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幅明顯的圖畫：資產階級地主的蔣介石政府，無論在經濟、政治及軍事的機構上都完全白趨瓦解了，以前唯一支持它的美帝也已最後放棄它了；中共的農民軍獲得了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擁護，尤其從軍事上獲得了援助，便已成為空前龐大而多少具有現代化設備的軍隊

了。這些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配合起來便促成了中共的異乎尋常的軍事勝利。假如我們將共黨軍事勝利的過程加以簡括的描寫，更顯出上述諸原因的真實性。從共軍一九四八年秋發動「總反攻」時起，在東北諸戰役中，除錦州發生過嚴重的戰鬥外，其他如長春、瀋陽等大城市，全是由於守軍的投降或崩潰，未經過任何嚴重的戰鬥而取得的。而在長江以北的諸大城市或軍事重鎮，除徐州蚌埠經過一番戰鬥外，如濟南、天津、北平、開封、鄭州、西安等不是守軍叛變（濟南）就是投降（北平）或自動放棄的（天津、開封、西安等），西北的甘肅和新疆更是完全由於投降。只有山西的太原曾經過長期的慘酷戰鬥，但對於整個戰局是無關重要的。至於長江以南的諸大城市，除上海有過象徵性的抵抗外，不是事先放棄（如南京、武漢、杭州、福州、南昌、桂林、廣州等）就是臨時投降（如整個的湖南雲南等）。所以共軍越過長江直抵廣州都等於「如入無人之境」。因為殘餘的蔣軍，除投降者外，早已自行撤退或逃跑了。因而形成了中共「解放軍」不是攻取，而是「接收」的奇特情形，從這一軍事的具體過程中，人們便可以充分看到資產階級蔣政權的腐朽與自行崩解達到何等稀奇的程度，而中共農民軍的勝利是在怎樣一種特殊情形下表現出來的。

× × × ×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共依靠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農民軍對資產階級地主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勝利，是完全在一種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條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特殊條件配合下所促成的。這一特殊條件的基本點是：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趨於極度的衰朽和解體，而中國則是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之自動崩解，僅是整個資本主義的腐朽與解體之一個極端體現。另一方面，②斯大林官僚層憑藉

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並利用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以空前地擴張其勢力和影響，這便大大地吸引了在資本主義極度衰朽和解體下而陷於無出路的群眾，特別是東方落後國家的群眾，這便促使這些國家的斯大林黨特別強大起來。而中共正是這類斯大林黨之登峰造極的典型。③再加上美帝在當時國際局勢（也即是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局勢）中所居的不利地位，而被迫放棄對蔣的援助或對毛的干涉。同時，④蘇聯因在大戰結束時對東北所取得的特殊地位，並以此為根據給蔣政府以嚴重的損害而直接援助中共，使後者的落後的農民武裝趨於現代化。假如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中共單純依靠農民武裝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倘使東北不被蘇聯佔領而完全由蔣介石所控制，蔣利用東北龐大的經濟資源和日軍武裝，並以此隔絕中共與蘇聯的直接聯系，阻止前者對後者的武裝援助；或當時情勢容許美帝直接干涉中共的軍事活動；——在這兩者的任一情形下，中共的勝利是大成問題的。如果我們將中共農民軍在以前江西時代（一九三〇至三五年）所以陷入失敗的情形，——當時資級地主國民黨政權的相當穩定；帝國主義對蔣的不斷援助以及中共與蘇聯的隔離，——回憶一下，就可從反面證明：今天中共的勝利，完全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特殊條件底下所促成的。

托洛茨基和我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曾經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地主國民黨政權，不能單靠農民武裝力量，而必須由城市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群眾舉行暴動去完成——這一基本觀念，即在今天看來還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是根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落後國家在內）無產階級領導農村民眾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和許多革命的經驗，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而來的。這正是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觀念之一，不管毛澤東今天的勝利怎樣，我

們的國際仍然不能放棄這一觀念。例如在印度，我們仍然要堅持印度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去摧毀國大黨的資產階級政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落後的印度順利地走上真正解放和發展的道路，即由民主革命「不斷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我們之沒有能預見中共今天的勝利，等於我們和托洛茨基沒有能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斯大林主義的特別擴張一樣。我們的錯誤並非原則性和方法上的。毋寧說是過份堅持了原則，以致多少忽視了事變發展的特殊條件，因而影響了我們策略上的及時轉變，我們當然應該接受這一教訓，以估計今後東方斯大林黨具有強大勢力的某些國家的事變發展（如越南、緬甸等），並預先準備在策略上的正確應付。但同時我們必須了解：像中共這種脫離工人階級而專靠農民武裝所取得的勝利，不但其本身是畸形的，而且替往後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種下了許多極難克服的障礙。我認為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評斷中共所領導的整個運動的成就和前途，以及決定我們的戰略和策略，都具有重大意義的。

中共奪取政權是否由於羣衆壓力 並違反了克里姆林宮的目的？

我們國際間某些同志，由於不甚了解中國事變的具體經過和特殊條件，便特別強調「羣衆的壓力」或以南斯拉夫事變的例子來解釋中共的勝利。例如歇爾曼同志說：

「我們的運動會傳統地了解羣衆之超過斯大林主義，在共黨內部包含了深刻的裂縫。南斯拉夫和中國的實例已經充份指明：在某種特殊條件下，整個共黨會超過克里姆林宮的目的，而能改變它們的政治路線，領導羣衆去奪取政權。在這種條件下，這些黨便已經不是斯大林主義原來意義的黨了。」

（見歇同志著《第四國際斯大林主義問題決議案中什麼是應當

修改，什麼是應當保留的？》載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的《第四國際消息公報》第五頁。）

這段文字裏面的含義顯然是：中共之勝利地奪取政權，同南共一樣，是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並違反了克里姆宮的目的而完成的。但不幸，這一根據「傳統的了解」的類比，却很難在中國事變中找到足夠事實的證明。現在讓我們先說事實吧。

關於中共與群眾的關係（連受群眾壓力的關係在內），我們在這裏且不遠溯抗日戰爭前及抗日時期所表現的事實（即常常違反群眾意向不顧群眾壓力的事實），只從戰爭停止後說起。在戰後的第一時期，即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四六年末，可說是中國群眾運動相當蓬勃和復興的時期。在這時期內，首先是工人群眾在各大城市（以上海為中心）要求依照物價指數增加工資，爭取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隨後反對凍結工資等等，曾經普遍地繼續地舉行了怠工、罷工，甚至示威等等。雖然這一鬥爭本質上還沒有越出經濟的範圍，也沒有達到全國規模的水準，但至少證明工人階級在戰後已昂起頭來向資產階級及其反動政府作改善生活和地位的鬥爭了（這鬥爭事實上曾經獲得了相當的成果）。這顯然是中國工人運動開始復興的表現。同時農民群眾在徵糧、徵兵、徵實等不堪忍受的壓榨與土地飢餓的威脅之下，普遍地深懷憤懣，即在蔣介石控制的某些地區也已發生了騷動。特別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學生群眾，在反對國民黨專政，要求民主，反對反動內戰，要求和平，及反對特務迫害等口號之下，曾經在重慶、昆明、南京、上海、廣州、北平等大城市鼓動了許多次大規模的抗議、罷課和示威運動。另一方面，蔣介石政府回到「收復區」不但因為行政上所暴露出的異常腐敗無能，立刻引起一般民衆的劇烈反感，本身呈現動搖，而且它的權力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沒有達

到華北，特別是東北（直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初蘇聯才逐漸將瀋陽、長春等大城市和重要礦區移交蔣政府。）而在這時期內共黨的軍事力量和一般在一般群眾中的政治影響又正在迅速生長。這些工人的鬥爭，農民的憤懣和騷動，學生的大規模示威運動，蔣介石政府的腐朽和動搖，與中共本身力量的生長配合起來，顯然構成一個「革命前夜的形勢」。假如中共當時能夠順着此種形勢（即接受「群眾壓力」）提出打倒蔣政府的口號（即奪取政權口號），使之與其他的民主改革要求，特別是土地改革要求配合起來，很快就可以將革命「前夜的形勢」轉變為直接革命形勢，順利舉行暴動奪取政權的。但中共在這一時期內所採取的基本路線却與此完全相反：它不但不提出打倒蔣介石政府和土地革命的口號去動員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卑躬屈膝地向蔣介石要求建立「聯合政府」（如毛澤東之飛重慶與蔣進行直接和談，並在群眾集會上表示擁護後者等），並以全力拉攏各派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上層政客們，在美帝指導下，進行妥協和談。當時共黨對於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不但不積極地去領導，使此種經濟鬥爭轉變為政治鬥爭（這在當時是極可能的），反而在工人群眾中宣傳不要「過份」反對民族資本家（為的是與之建立「聯合戰綫」），並極力與黃色領袖拉攏，以此抑制工人的「過份」要求。它在農村中的活動，僅限於組織游擊隊，而極力避免一切足以鼓動和組織農民群眾的廣大運動。對於城市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只是利用它們作為壓迫蔣政府接受和談的簡單工具，而從未企圖將此種運動與工人罷工運動配合而形成為反對蔣介石政權的鬥爭。共黨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宣佈在其所控制的某些地區開始進行土改，以為鞏固其軍事力量的輔助（這也是因為蔣介石不斷的軍事進攻所迫），但此種「土改」既極不徹底（即盡量與地主富農妥協

，如保留地主富農的「全部工商業財產」，容許他們分佔較好和較多的土地等。）而其範圍又甚為有限。（例如在其所控制山東、江蘇、河北、河南省的地區，不許進行土改。）更有甚者，共黨爲了渴求與蔣介石謀取妥協，甚至不惜將它在廣東和浙江的農民武裝隊伍加以解散（這一解散曾在共黨內部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僅把其中的一部份遷移至華北。這一切都充分證明：當時共黨的政策不但沒有接受「群眾的壓力」，反而是在完全違反群眾的意向與要求下專斷地進行的。

但在蔣介石方面，却盡量地利用和談的時間：一方面，將它的軍隊迅速地從內地運到「收復區」的各大城市和軍略據點（當然是藉美帝飛機軍艦之助）以鞏固其地位，並積極準備對中共的軍事進攻；另一方面，將新起的群眾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壓平下去。所以至一九四六年末，當蔣介石認爲自己的準備工作完成時，他不但公然堵住了一切和談的門徑（如召集自己的「國民大會」及準備組織自己的「立憲政府」等，實爲從根斷絕與共黨共同建立「聯合政府」之表示），而且在軍事上發動了對共黨的大規模進攻（如奪取張家口及蘇北某些城鎮等）。但此時中共還不會放棄與蔣介石妥協的企圖，它的和談代表還滯留在上海和南京，希圖通過所謂「第三方面」（即「民盟」）的從中調解，與後者重開談判。迄至蔣介石驅逐了中共的和談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並實行攻佔它的根據地延安時（同年四月），它才開始感到與蔣妥協的絕望，才積極從事軍事上的抵抗。但即在此時，它還不敢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更沒有提出實行土改以動員群眾的政綱。最後，因爲蔣政府公開宣佈了「通緝毛澤東」（六月廿五日），並發表了「戡亂動員令」（七月四日），中共經過了幾個月的猶豫（大概是等候莫斯科的訓令）之後，才於十月十日以

「人民解放軍」的名義發表宣言，公開號召「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並同時以共黨中央的名義宣佈了「土地法大綱」，申言實行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仍保留其所謂「工商業財產」）分配給無土地及土地不夠的農民（但差不多同時宣稱新解放區一概停止土改）。這算是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宣言擁護蔣政府，放棄土改等以來在政治上的一個大轉變，如就對蔣介石而言，可說是該黨（自一九三七年降蔣以來）一個根本轉變。

但這一轉變是否由於「群眾的壓力」呢？顯然不是！因為群眾運動此時已被蔣介石殘酷地鎮壓下去（特務到處橫行無忌，成千成萬的青年學生不斷地被逮捕、被毆打、甚至被暗殺，工人中的活動份子亦經常被逮捕、被監視等），而處於極低沉的狀態了。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中共這一「轉變」，完全是在蔣介石截斷了任何妥協橋樑，並實行猛烈進攻的致命威脅下（即企圖根本消滅中共勢力的威脅下），被逼迫出來的。這正是我們中國俗語所謂「逼上梁山」，換句話說中共的「轉變」與其說是「群眾的壓力」毋寧說是由於「蔣介石的壓力」。

僅僅從這個時候起，中共爲了有計劃地準備反攻，才在政策上開始「左轉」，即開始遷就群眾的要求（或可稱爲接受「群眾的壓力」，）特別是遷就在它控制下的農民群眾的要求，俾便獲得他們的擁護，以加強其軍事力量。因此，它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次年春間，曾在那些已經進行土改的地區發動了一個「糾正右傾偏向」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中共將以前給予地主富農的許多特殊權利加以清算，將他們佔得較多和較好的土地重新沒收分配給貧農，取消他們在鄉村行政機關乃至黨和軍隊中的地位。（因爲由於以前的妥協政策，有很多的地主富農份子加入了黨和軍隊，並在其中佔有相當的地位。）並成立「貧農委員會」，給

予貧農群眾以若干民主權利，讓他們直接去向地主富農進行鬥爭，甚至讓他們去批評它的下級幹部，並因此撤換了和懲罰了大批下級幹部，——這一切確實大大地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大大地增強了它的反蔣的軍事力量。但不要忘記，中共這一切「向左轉」的新政策和舉動，都是在「蔣的壓力」下逼迫出來的。

關於中共與克里姆宮間的問題，我在這裏也只能舉出它在歷史上的幾個重要的「轉變」為例。當中國第二次革命慘敗後，克里姆宮的政策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轉入極左的機會主義時（就其整個國際路線言，即所謂「第三時期」），那時的中共領導機關即毫不猶豫地跟着前者跑。雖然在此種「轉變」下不斷遭受了極嚴重的損害，雖然有托洛茨基及中國「左派反對派」不斷的嚴厲批評，但當時的領導機關還是不顧一切地執行了那種冒險主義的政策，即在資產階級已完全勝利和相當穩定的反動局勢下，完全脫離城市工人運動，在荒僻的鄉村進行建立「蘇維埃」與「紅軍」的毫無出路的鬥爭。

當共產黨的「紅軍」被蔣介石驅逐出華南而逃至華北的延安時，已是克里姆宮在希特拉的威脅下，從「第三時期」回到了極右的機會主義，即建立了所謂「民主陣綫」或「和平陣綫」的時期。中共對克里姆宮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亦完全同以前一樣，毫無保留地提出了「人民陣綫」或「國防陣綫」的主張，重新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合作」。甚至當張學良（即當時指揮討伐共軍的前敵總指揮）在「群眾的壓力」下，主要在他的士兵與下級軍官的壓力下（因為他們都是滿洲人，極恨蔣介石對日帝攻東北時採取不抵抗主義，致使他們無家可歸。）在西安囚禁了蔣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引起了全國民眾，特別是中共黨員們的歡欣和希望時（當蔣介石被囚禁的消息傳出時，全國民眾無不興

高彩烈，滿以為反革命的劊子手這回是完蛋了，一個新的時代會到來了！），中共也竟然毫無抵抗地奉行了克里姆宮的訓令，強迫張學良將蔣介石——第二次革命的劊子手與中共作戰八年的死敵——加以釋放（周恩來便是當時中共派往西安與張學良談判釋放蔣介石，並與蔣直接談判「國共合作」的全權代表），為的僅是求得蔣介石同意與之「重新合作」（在取消土地革命，「蘇維埃」與「紅軍」番號等條件下），「共同抗日」。中共領導機關對克里姆宮這種稀奇的奴顏婢膝的服從態度，不但引起了當時一般民衆的極度反感，即在它自己的黨員群衆中也發生了極大的失望和震動。

大戰停止後，中共不顧一切地，即完全違反群衆的意向，卑屈地追求與蔣介石進行和談妥協的政策，係完全在克里姆宮的訓令下，使之完全隸屬於它的外交政策，即隸屬於與美帝謀取妥協的政策，——這是最新鮮的事實，而毋需加以說明的。隨後，中共政策之大轉變（即從謀取與蔣妥協轉變為打倒蔣介石的政策），也是完全與克里姆宮的外交政策的「轉變」（即從謀取與美帝妥協失望轉而採取抵抗政策——所謂「冷戰」）相適應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僅指出中共一九四七年十月之「大轉變」恰與克里姆宮同年九月間成立「九國共黨情報局」這一時間表的配合，就可充分證明前者的「轉變」不但絕對沒有「違反」後者的「目的」，反而全是在它的指導下所完成的。 *

我們前面所舉的事實，就可充分證明歇爾曼同志將中共與南共放在同一平面上，認為它們之奪取政權同樣在「群衆壓力」下，並「超過了克里姆宮的目的」，不但是機械的，而且完全是虛偽的。假如我們將南共與中共在事變過程中所表現的政策和行動略加比較，那就更顯得它們之間含有極大的差異。南共在反帝的

民族解放過程中（一九四一——四五）即已一步一步地摧毀了舊的資級地主政權，並在戰後初期（一九四五年十月）完成無產階級的專政（雖然這專政是變態的）。與完成無級專政同時及稍後（一九四五——四六年），它又完成了土地改革與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通過法令沒收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南共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都與克里姆宮發生了歧見，並依照自己的「經驗」，即經驗主義地遷就「群眾的壓力」與「違反克里姆宮的目的」而進行。（請參考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會議「對南斯拉夫與第四國際的決議」，及巴比洛同志《論南斯拉夫的階級性》一文。）但中共在反日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以及戰後的初期却完全追隨着克里姆宮的外交政策，不顧群眾的壓力，專意與資產階級地主政權謀取妥協，即在已取得全部政權後，還是堅持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並保護後者的私有財產。甚至於對土地改革也儘可能地拖延實行。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中共與南共在事變中所表現的這些差

* 國際間某些同志會舉出中共在抗戰期間與莫斯科「隔離狀態」的事實，證明中共最後反蔣政策的轉變係出於違反克里姆林宮的「目的」。但這「事實」恰好證明與真正的事實是相反的。真正的事實是：在抗戰前，延安即已經常駐有克里姆林宮的代理人（當然是秘密的），且有無線電經常與莫斯科傳遞消息。抗戰後，蘇聯更派有大使駐重慶（還有其他的特務人員），得以公開地合法地與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團或特務人員經常接觸、傳遞消息和訓令。因此我們有充份的理由說，在抗戰期間，中共與克里姆林宮的關係，不但沒有隔離，反而變得愈加緊密了。這可以從這一時期內，中共的報紙和文件迅速地反映莫斯科的一切宣傳和策略中明顯地暴露了出來。至於在戰後，由於蘇聯佔領東北，並派了許多代表在中共黨和軍隊中工作，其雙方關係之如何密切更是無須說明的了。

異，並不單是數量上，且是質量上的。因此說中共與南共完成了同樣的事變，並已同樣不是原來斯大林主義的黨，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

中共在事變中所表現的這些差異（與南共比較）怎樣獲得解釋呢？第一，中共自一九二八年起由城市轉入農村後，即建立了相當強固的軍隊（農民軍）和政權，它二十年來利用此種軍隊和政權一貫地控制着農民群眾（我們必須明白落後而分散的農民群眾是容易被控制的），因而形成了頑強的官僚主義（尤其就它對群眾的態度與作風而言是如此，所以它即是對國民黨統治下的工人和學生群眾，也往往是命令式的或欺騙的，而極少採取說服的方式）。第二，在意識形態上，中共在應付許多重大事變中（第二次革命的失敗，農民戰爭與抗戰等），尤其在抵抗托洛茨基及中國托派對它的思想和政策的批評中（請同志們注意：托本人及中國托派在中國問題上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是遠超過蘇聯以外的任何國家的），特別強化和深刻化了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那種「有系統的」，固執的「新民主主義」，即是斯大林主義在「理論上」與「實踐上」深化的體現，也就是特別頑強地堅持「革命階段論」以對抗「不斷革命論」的表現。第三，中共是廿餘年來特別受到克里姆宮注意的一個組織，所以它們間的關係也是特別密切的。尤其自蘇聯佔領滿洲，以俘獲日軍的武裝去武裝中共後，中共受克里姆宮的控制便愈加嚴密了。* 由於以上三個特點，中共既不容易接受「群眾的壓力」來改變自己的政治路線，更不容易「違反克里姆宮的目的」而自行其是。而南共的情形則不同，它差不多全是從反帝的民族解放的群眾運動中生長起來的，且為時極短，故不能形成像中共那樣堅強的官僚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時又因為它在抗戰中確是與克里姆宮相隔離

的，因而便容易經驗主義地接受群眾的壓力，跟隨事變的發展而逐步地改變自己的政治路線，以致最後走到了違反克里姆宮的目的。因而我們可以說，中共與南共之奪取政權，只是外表上的相似，而其所以被迫奪取政權的動因及其所採取的方式和政權的內容是大不相同的。

但由前面的判斷和解釋，我們是否可以作出一個結論：中共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拒絕接受群眾的壓力，並與克里姆宮不發生任何歧見的呢？否，我們前面所證明的只是：中共在過去幾個極關主要的轉變中，是完全在克里姆宮的壓力下，違反着群眾的意向或壓力的。即在這次奪取政權的「大轉變」中，也

* 當然這一種「控制」亦是經過一場鬥爭才徹底完成的。當蘇聯開始以日軍武器武裝林彪等的強大軍隊時，曾表現對毛澤東不大信任。故以一向與毛對敵的李立三為東北共軍的政治領袖，代表中共對外發言，希圖以此牽制毛澤東或壓制他使其馴服。因而曾經一度引起了毛澤東的抵抗：他一方面命令劉少奇公開發表談話，申明李立三無權代表中共中央發言（時在一九四五年末）；同時在黨內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反李立三主義」（亦稱之為「宗派主義」的「思想運動」，或稱之為「整風運動」）。克里姆林宮看到這種情形，恐生意外，便特別派人與毛澤東談判，只要「忠實地執行國際路線」，蘇聯可以「完全信任他」，「協助他」，並解除李立三的職位，由毛澤東派人代理。結果毛澤東當然完全答允「執行國際路線」以此獲得克里姆林宮的信任。毛李間的一段競爭風潮也就這樣地平息了下來。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毛澤東便愈加小心地馴服地表示擁護蘇聯，表示「一面倒」忠實地執行克里姆林宮的訓令了。

並非由於接受群眾的壓力和違反克里姆宮的目的，反而是在蔣介石的致命壓力下，並獲得了克里姆宮的完全同意而完成的。至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共爲了保持自身的存在和發展，不能不設法獲得某些群眾的支持，以便在群眾中建立它的基礎，因而在某種限度內，即在它所能控制的範圍內，是需要或多或少遷就群眾的要求，向群眾讓步，即接受群眾的壓力的。它的政策在過去曾經許多次「向左」搖擺，如一九四七年五月提出有限度的土改政策，同年末至一九四八年春的「清算土改右傾偏向」，以及奪取政權後所執行的某些較左傾的措施（最近的土改在內）等等，便是遷就群眾壓力的事實表現。像這類的遷就群眾壓力的政策，在將來還有更多和更大表現的可能。根據上面的同一理由，中共與克里姆宮間在過去許多事變中，一定曾經發生過某些分歧意見或衝突，不過沒有公開暴露出來而已。像前面所指出的「毛李衝突」便是反映了中共與克里姆宮的衝突之顯例。像這類的衝突，在將來不但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變得更爲嚴重，因此我應當說，歇爾曼同志的錯誤（像前面所指出的）並非屬於原則性，而只是事實上的。

但同時我亦應鄭重聲明：像在這種極關重要的問題上所犯的事實上的錯誤，不但要引出一連串的其他錯誤（如過低估量中共的官僚主義，它的斯大林主義的作風和意識形態，過高估量它與克里姆宮的衝突性和群眾的壓力——即群眾在事變中的作用，以及對中共前途的過份樂觀等。）而且會引到原則上的錯誤。例如國際間某些同志斷言中共政權爲「無產階級專政」，便是從認定中國事變與南斯拉夫事變同型，而南共政權爲無產階級專政，按照形式邏輯的演繹，則中共政權也無疑是無產階級專政了（關於中共政權之絕非無產階級專政，將在下面說明）正因爲這種根據某

一公式強奸事實的錯誤可能引到原則錯誤的危險性，我們對於「原則」翻譯出來的「公式」，便必須審慎地加以運用。我們絕不隨便將原則或公式套在某一表面看來相似的事實頭上，或強使之遷就我們的原則或公式，而必需首先精細地觀察和分析事變本身的具體事實，尤其是顧到某些對事變起着決定作用的特殊情形。然後以此去判斷事變是否與某一原則或公式相符，是否為某一原則或公式之無誤的體現。正如列寧所說，事實永遠是活生生的，而公式往往會變成死板板的。我們的運動曾經認定並堅持：群眾可能超過斯大林主義的頭，在各國共黨與克里姆宮間隱藏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在某種特殊條件下，整個共黨可能改變自己的政治路線超過克里姆宮的目的，領導群眾去奪取政權。這一原則，這一公式，在基本的理論上是正確的，且為南斯拉夫事變所證實（或更正確些說，這一公式是由南斯拉夫事變抽出來的），但我們這裏須要特別注意的，正是「某種特殊條件」。在「某種特殊條件下」，固然共黨會受群眾壓力，違反克里姆宮的目的，去奪取政權（如南斯拉夫已實行者），但在另一種「特殊條件下」，共黨可能不經過群眾壓力而接受克里姆宮的訓令，至少不違反它的目的去奪取政權的。中國所發生的事變該是屬於這一範疇。我們相信這種類似的事變將來還可能在東方其他的落後國家（如越南、緬甸甚至伊朗等國）重演。克里姆宮所害怕的只是真正的工人革命運動的勝利，尤其是先進工人國家革命運動的勝利，因為它對這種勝利無法加以控制，會反過來威脅它的存在。但假如沒有這種威脅，同時又不致直接引起帝國主義的可怕干涉，而且可以擴大它的勢力範圍的條件下，克里姆宮是不會放過機會讓它控制的共黨不去奪取政權的。從中國事變中所得來的這個教訓，我認為我們的國際必須加以接受，即使不將它看作共黨奪取政權的另

一類型，至少也要拿來作為南斯拉夫事變的重要補充。只有如此，我們才不致將原則變成死板的公式，任意套在任何類似的事變頭上，引出連串的錯誤結論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事變的態度，應當是：根據我們的方法與原則去分析事變過程中的具體事實，從事實的分析中去考驗我們的原則，豐富我們的原則，必要時修正我們的原則和公式。因為真理永遠是具體的。

中共的勝利是否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開始？

國際第七次執委會對中國問題決議案曾指出「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勝利為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開始」。當這個決議初次傳至中國時（一九四九年秋），當時我們的領導機關（中央政治局）對此雖大體同意，但因為被迫匆促遷移他處，以至未能詳加討論正式用文字表示意見。因此，不久即引起了某些同志對國際決議的懷疑（最初見於文字者為焦馬兩同志合寫的《中國斯大林主義運動勝利的意義及其本質》載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的中文版《第四國際》第一卷第二號），近一年來且形成了最激烈的爭論，一部份負責同志完全贊成國際的意見（以前曾表示不同意的焦馬兩同志且轉為贊成的主要支柱），而另一部份負責同志則堅決反對。關於這爭論的文件，國際已選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個文件* 譯成英文以供參考，因此我在這裏無需詳敘他們的分歧點，只提個人對他們的，尤其是對反對派同志的主要論據的批評和解釋。

反對派同志（即「任務」一文的簽名者——引者）方面的主

* 「第三次革命與革命共產黨的任務」，「中共統治與我們的任務」，「為何稱這次內戰為革命與這個認識的重要性」，「關於所謂革命局勢的問題」。

要論據是：中共之走上政權，並不是基於群眾的，特別不是基於工人群眾的革命行動（如從總罷工進到武裝暴動的革命行動），而只是依靠農民的武裝，以純軍事的行動達到其目的。他們根據革命的傳統觀念與近代革命的，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認為必須從下至上動員一切龐大的群眾，尤其是動員工農群眾，從一般的民主鬥爭昇華到武裝暴動，直接摧毀統治階級的政府機構，建立新政權，才能算一個真正革命勝利的開始。而中共這次所領導的奪取政權的運動，不但沒有完全動員龐大群眾，而且儘量避免號召廣大的農民群眾組織和行動起來進行革命的鬥爭（如驅逐地主和分配土地等）。換言之，中共是以農民武裝的純軍事行動代替了工農群眾的革命行動。因此他們斷言中共的勝利只是一個農民戰爭的勝利，而絕非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開始或初步勝利。

我完全承認：這些反對派同志所根據的傳統革命觀念是正確的，所指出的事實是不可爭辯的。但這些同志忘記了一件「小事」，那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不是列寧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的時代，而是斯大林官僚層篡奪了十月革命的遺產——蘇維埃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走到了極度墮落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是：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已趨於極度的衰朽，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由成熟變為爛熟；而另一方面，斯大林官僚層憑藉着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蘇聯的物質基礎，儘量控制着各國的共產黨，並經這些黨儘量使各國的革命運動隸屬於蘇聯的外交利益。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不但使某些國家的革命運動接連遭受挫敗（如法意等國），而且使另一些國家的革命運動變成畸形。而中共所領導的運動之勝利便是此種畸形革命之最顯著的表現。

從中共之儘量避免動員廣大群眾，特別是避免號召工人群眾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header or title, which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blurriness. I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or sections.

Handwritten text line, possibly a title or section header.

宮所指派的共黨官僚所執行和操縱的。因此，我們國際間各種各式的「少數派」（實際上是已離開或將要離開我們的運動的份子——假如他們堅持自己意見的話）便認定這些國家的性質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或「官僚集產主義的」。但我們的國際却根據托洛茨基研究和判斷斯大林官僚層所控制的蘇聯國家性質（即墮落的工人國家的性質）的傳統方法，斷定這些東歐緩衝國已是一個同化於蘇聯的「變態的工人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財產關係已根本改變，即國有化了，這正是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所必須的前提。僅憑這一財產關係的根本改變，即可以斷定這些國家的性質的改變。但同時我們的國際亦沒有忽視蘇聯官僚及這些國家的共黨官僚把持國家的一切經濟和行政大權，警察和特務控制着群眾的一切自由和創意——這些可惡的事實。正因為這些「事實」，所以我們的國際稱這些「工人國家」是畸形的或「變態的」。只有這樣，才算是辯證地理解事實，才算是「以真名呼實物」。

假如我們的中國反對派同志們，能採用我們國際判斷東歐緩衝國家性質的方法，即採用托洛茨基的傳統方法，來判斷中共奪取政權的勝利，那就異常之明顯：不管中共在奪取政權運動中所採取的方法是純軍事的和官僚主義的，但它所已達到的成果——推倒蔣介石政權，政治上對帝國主義的獨立及土地改革——確是中國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進程中所必須實現的，因而是革命的。但也因為中共沒有動員廣大的工人群眾，經過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群眾來徹底進行此種革命，換句話說，正因為毛澤東黨以斯大林主義的純軍事的官僚的方式代替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動員工農群眾的革命行動的方式，以孟什維克的「革命階段論」政綱對抗了「不斷革命論」政綱來進行此種革命，因而大大

地歪曲了並傷殘了此種革命，以致使得革命的面貌變成畸形怪狀，令人難於辨認。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判斷任何事變或事物，不是專憑外表，而是要看掩藏在外表裏面的本質如何來判斷的。所以不管斯大林官僚層所控制的蘇聯國家的外表如何的醜惡，但因為它保留着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有財產制，我們仍然承認它是一個「工人國家」，不過是「墮落的」。也不管東歐緩衝國一產生下來即被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弄得醜惡不堪，但由它已根本改變了私有財產制為國有財產制，我們也得稱它們為「工人國家」，不過是「變態的」。同樣，不管中共的官僚機會主義如何歪曲了和傷殘了它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但因為它已推翻了蔣介石政權，爭取了對帝國主義的相當獨立和施行了某種程度的土改，我們也就不得不認它是革命，但是「畸形的」。

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現時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最錯綜複雜的時代。因此，許多事變和運動，在極度錯綜複雜的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之下，往往不是按照我們所想像（縱然是根據歷史的經驗和原則）的常軌或常態發生和發展的。我們尤其要了解，自第一個工人國家墮落後所產生的斯大林主義的稀有的擴展與橫行干預（最後分析起來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錯綜複雜的產物之一），更使得許多事變和運動脫離了常軌而變成畸形。在這個時代要求一切事變和運動都要合乎自己的理想或常態，且只有合乎自己的理想或常態的事變和運動才肯承認它，才去參加它，那就無異於一個十足的烏托邦主義者，其結果不是對事變和運動作無謂的咀咒（美其名曰「批評」）就是對歷史進行絕望的鬥爭。這是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的。我們為革命負全責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不但要有「自己的理想」，不但要懂得「常態的運動的發展」，而且要

特別認識某一時代某一環境的錯綜複雜的特殊條件所產生的非常態的、不合乎理想的事變和運動。換言之，我們必須承認已成的現實，不管這一現實如何不合乎我們的理想，甚至醜惡，在現實中去進行不懈的鬥爭，在鬥爭的過程中去改變現實，使之朝向我們的理想前進。

現在整個人陸既已落入中共的掌握中，整個運動既已為該黨所控制或領導——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現實」。雖然這現實是被歪曲了的，違反我們的理想的。但我們除了接受這個現實的運動，打進這個運動中去，走進群眾中去，積極地參加一切群眾的鬥爭，以我們托洛茨基主義的政綱去影響群眾，在鬥爭過程中耐心地去說服群眾，獲得他們的信任，使他們通過自己的經驗逐步地從毛澤東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幻想與控制下解脫出來，以他們自己的力量轉變這個運動的方向，則其他一切的「批評」都是無用而有害的。當然我們這一工作不但是異常艱苦的，而且不一定能按照我們的願望與努力直接達到我們的目的。但至少我們可以在運動過程中安置我們的基礎，在未來的有利條件下，使我們有干涉運動，乃至領導運動的可能。假如不承認中共的勝利是一個畸形的革命的開始，不從積極方面去參加運動，改變這個運動的畸形性，而只是從消極方面去批評它，結果我們一定走到宗派主義（我們中國的少數派即已完全陷進了這一傾向），脫離運動，脫離群眾，那時我們自身將不可避免地要退出一切的實際的政治鬥爭，而被歷史所淘汰的。

此外我還得指出：我們的反對派同志們強調中共所領導的運動只是一單純的農民戰爭，因而完全否認了它所包含的群眾運動的意義，那是過份機械的。我們必須了解，中共所領導的農民軍，不但本身是一個廣大的農民群眾（即穿上軍服的農民群眾），

是農民群眾中最積極的一群，而且在他們的後面還有更大的農民群眾在支持他們。歷史的經驗證明：農民群眾一昂起頭來往往是與武裝不能分離的。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廣東和湖南的農民群眾一經組織起來（「農民協會」）差不多同時便出現了他們的武裝隊伍。因為他們沒有武裝是很難與已經武裝的豪紳地主進行鬥爭的。這差不多成了農民運動的一種本質。中國這次的農民軍與以前任何單純的農民軍絕大不同之點，便是它是在一個多少具有現代智識和技術的斯大林黨有計劃地有系統地組織起來，長期地訓練出來，並給了一個全國性的現代化的民主改革的綱領（姑不論這綱領是如何機會主義的）作為它鬥爭的總方向。正因為這一點，所以我們不能稱中共這次所領導的運動為單純的農民戰爭，而應當稱它為畸形的革命運動，才是合乎事實，合乎辨證邏輯的。

擁護國際決議的中國同志在某些基本點上是對的。但他們為證明中共的勝利是第三次革命的開始，中共所領導的是一個群眾的運動，它的政策的轉變是受了群眾的壓力，便不惜誇張乃至曲解事實，我認為這樣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例如焦馬兩同志將「第三次革命的開始」時期移前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即中共正式發表宣言打倒蔣介石之時），以至解釋中共政策之轉變係受了群眾壓力，是代表群眾的意向，這不但是機械的，而且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虛偽的（關於這一轉變的事實，我在前面已經詳細指出）。又如馬同志說：「若單以動員起群眾的數量為準，則現在這次運動比之第二次革命還要正式，因為第二次革命組織起來的群眾不過一千多萬，但這次在「解放軍」渡江以前已經有一萬萬以上的農民起來分配了土地。」（見馬同志《為何稱這次內戰為革命與這個認識的重要性》）。像這樣的說法不但是過份誇張的

，而且對於群眾運動的觀念是根本錯誤的。重源同志在他《關於所謂『革命局勢』問題》一文中，對此已有詳細指責，我認為他的指責大體是正確的，合符歷史事實的。我這裏只特別指出一點，在第二次革命中，工人階級不但絕大多數已經組織起來（像「省港罷工委員會」和「上海總工會」實際上已等於蘇維埃），動員起來，站在全國運動的領導地位，舉行了許多次的總罷工和大示威運動，而且還舉行了幾次勝利的武裝暴動（如漢口和九江工人群眾暴動奪取英租界，及上海工人群眾暴動佔領了租界以外的全部市區等）。而中共這次奪取政權的運動，自始至終不但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工人群眾起來舉行總罷工和暴動，即連一個小小的罷工和示威運動也沒有。絕大多數的工人群眾，都是消極不動的。至多在心理上對這個運動表示某種願望而已。這是絕對不可否認的事實。怎麼可以將這次中共所領導的運動（就群眾運動的觀點說）拿來與第二次革命相比擬呢！？國際的決議案明白地指稱：「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勝利，是農民運動對一個徹底崩潰的政權之軍事的勝利」。這意義就是說，毛澤東黨的勝利，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工農群眾革命對資級政權之政治上的勝利。由此證明我們擁護國際決議案的馬同志未免走得太遠，未免將中共所領導的運動加以美化了！但對事實過份的美化不僅在主觀上會引起幻想，而且在客觀上不可避免地作出錯誤的判斷的（這同時也就是忽視了或者掩飾了斯大林主義黨的投機與專橫的罪惡）。這兩者都是危險的，因為幻想總是失望或幻滅的根源，而錯誤的判斷又不可避免地構成錯誤的政策。

我們絕對不可忽視毛澤東所開始的「第三次革命」那種畸形裏面所包藏的一切非常嚴重的危險性：頑強的機會主義，專橫的官僚主義，對群眾的嚴厲控制，對革命思想的異常仇視，對革命

份子，尤其是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兇殘迫害（我們的組織已在許多地方被破壞，我們的同志已大批被逮捕、被監禁，被迫「悔過」，並有不少最好的負責同志被槍決）。這些危險因素總合起來，對於這個已在開始的「第三次革命」的發展和前途是絕不容許樂觀的，而對於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這一運動中的工作亦將成為前所未有的艱苦。固然，我們絕不應因為這些而採取教派主義或悲觀主義的態度，放棄我們儘可能努力去推動以至改變這一運動的革命責任。但我們同時亦應排斥一切天真的或過份的樂觀主義——這種傾向往往忽視運動的危險性和工作的艱苦，雖然在開始參加運動和從事工作時是滿懷熱望和興奮的，但在運動和工作過程中遭遇到嚴重的困難和異常的艱苦時，便變得心灰意冷而向後退了。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我們整個運動的前途說，是具有絕對不可動搖的樂觀主義的信念的。換句話說，我們是深信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以及整個人類社會的改造，一定是，而且只能是在托洛茨基主義（即異常地豐富了和深化了的現代馬列主義）的旗幟和政綱下完成的。但同時我們絕不可忽視橫在我們面前的，即從現階段走上勝利這段過程上所橫着的非凡的障礙，尤其是斯大林主義所種下的障礙。我們首先必須嚴肅地認清這些障礙，然後以極正確的政綱，極精密的方法配合着非凡的毅力和耐心去克服這些障礙，以至走上最後勝利的道路。教派主義者是藉口運動不合乎理想，而事先設法躲避它。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則事先將運動加以美化或理想化，但在運動中碰到與原來的理想不符時即離開它。革命的樂觀主義者與前兩者都不相同，它既對革命的勝利具有無比的信心，而同時又深知達到此種勝利的途程中橫着無比的困難，所以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和無比的堅毅排除一切困難而向勝利之途邁進。

在我們的中國組織內部，因為毛澤東的勝利而檢討黨的過去政策，亦曾引起了頗為嚴重的爭論，並在黨內發生了不良的影響。我在這裏當然沒有可能詳細敘述和批評那些爭論。但我亦應當表示我對於他們爭論的根本態度（事實上已有許多同志要求我表示這種態度）。一個政治組織在經過一個鉅大的事變後，為了重新確定它的政治路綫，對於過去的政策是應當予以特別檢討的。因此我不贊成某些同志反對這樣的檢討。但同時我亦堅持：檢討過去的政策必須站在為革命為黨負責的立場上，極端審慎而精確，絕不可用輕率或誇張的（更不用說別有企圖的）態度去任意批評過去的政策，以致引起混亂，發展黨的離心傾向。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一個政黨在巨大的事變打擊和壓力下，而又碰到工作的環境愈趨於困難時，是最容易發生離心傾向的，這時對於過去政策的批評一不小心或誇大或不正確，便最容易引起黨員群眾對黨的信心發生動搖，因而助長此種離心傾向的發展而走到可怕的分裂或潰散。但不幸，我們某些同志對黨過去的批評是太欠謹慎的，多少是誇張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例如焦同志《論思想重新武裝》一文便是顯例。雖然這篇文章意在糾正「教派主義」，但它對於黨過去政策的批評不僅是過份誇張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在他看來，至少是依他說話的口氣看來，我們黨過去整個的政治路綫根本上是錯誤的，因而模仿列寧提出「四月提綱」的態度，「要從思想上重新武裝黨」。以致引起了另一部份同志強烈的抗議和批評（見明明同志論《重新武裝還是修正主義》一文）。

事實上，我們的黨在過去的長期鬥爭中，都堅持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路綫，亦即不斷革命論的路綫。在這兩次鉅大的事變——中日戰爭與中國抗戰轉入世界大戰中，以及在這兩次事變內

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與意因所領導的極左教派主義（少數派）的鬥爭中，都充份證明我們黨所堅持的路綫是正確的。在國內戰爭中我黨所採取的基本路綫，對中共的基本態度，也是正確的。並且與國際決議對中國內戰所採取的基本態度完全一致（可參考一九四七年一月我黨對內戰的決議及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通過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即在中共開始奪取政權後我黨所提出的政綱（見一九四九年我黨「致中共黨員的公開信」及一九五〇年一月我黨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通過的「對中共統治中國後的政治決議」）與國際第七次執委會所通過的政綱也差不多完全相同。焦同志主張「在思想上重新武裝黨」就無異於說我們的黨在過去，至少在毛澤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已背離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而需要用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來重新武裝黨了。像這樣的說法，不但是誇大的，而且完全歪曲了歷史的事實，對黨的過去是一種侮辱。所以結果引起了同志們強烈的反感、憤怒、抗議，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混亂與動搖，因此我曾經對此提出警告：「不要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但我並非說，我們在過去，尤其在中共奪取政權的事變中，沒犯過錯誤。我已經在前面指出，我們對中共之勝利地奪取政權，是完全沒有估計到的。由於對這個事變估計上的根本錯誤，便派生出了對事變發展進程一連串的估計上的錯誤，以及某些對外宣傳上策略性的錯誤，因而影響我們黨對整個事變的態度或多或少趨向於消極方面，而低估了它在客觀上的革命意義。這是應當鄭重地予以糾正的。但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我們的錯誤並非原則性的，而只是對事變估計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我們還得了解，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連馬、恩、列、托在內），可能保持原則上或方法不犯錯誤，但却不能保證對任何事變發展的估計

完全正確。因為馬克思主義固然是預測社會現象最有效的科學方法，但還沒有達到像天文學或氣象學預測天氣或氣象那樣準確的程度，原因是社會現象較自然現象遠為錯綜複雜得多。所以馬、恩、列、托對事變發展的估計也曾犯過錯誤。如馬恩對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局勢發展的樂觀估計、列托對十月革命後歐洲局勢發展的樂觀估計，以及托對斯大林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前途的估計等。他們的超越處並不在於對任何事變的估計不發生錯誤，而只在於經常審慎地精細地注視事變發展的客觀進程，一經發現事變發展與原來的估計錯誤或不符時，便立刻加以糾正或重估而已。這正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是我們應當努力效法的。

中共及其政權的階級性

對於這問題，在中國同志中雖沒有引起甚麼爭論，但在國際某些同志間却隱藏着極大的分歧意見。因此我認為必須公開提出來加以嚴肅的討論，並明確地予以決定。因為這是確定我們對中共及其所建立的政權的基本態度所必須的前提條件。

關於中共的性質，在中國所有的同志中差不多毫無例外地認為它是一個以農民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性的黨。這是將近二十年來中國托派的傳統觀念。而這一傳統觀念又是由托洛茨基確定下來的。

約自一九三〇年開始後，托洛茨基即不斷地指出：中共已從工人的黨逐步墮落為農民的黨了。他有一次甚至說（在給中國某同志的信中）中共已在走上俄國社會革命黨的道路了。托洛茨基這一判斷的基本理由是：中共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即放棄了城市工人運動，脫離城市工人階級而完全轉入農村，以全力從事農村的游擊戰，因而大量地吸收了農民群眾入黨，結果使黨的組織基

礎變成農民的。雖然這個黨有少數由城市退出的工人參加，但這些份子的數量既極微弱，絕不足以影響黨的組成基礎，而且因為他們長期間在農民中生活，他們的意識形態也就逐步地與農民同化了。

托洛茨基這一判斷，從伊羅生的《中國革命悲劇》一書後面對中共組織份子及其性質的描繪中也明顯反映了出來。因為伊羅生的書是經過托洛茨基的親自閱讀和修正的。

但自托洛茨基去世後，中共黨員的組成基礎是否朝工人方面轉變而有所更改呢？不但沒有，它的農民及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組成基礎反而是更加強了。因為中共在抗戰中及戰後組織上的空前膨脹，幾全是由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構成。像中共在奪取政權前所宣佈，它約有三百五十萬黨員。但這三百五十萬黨員中，工人黨員是非常微弱的，至多不會超過百分之五（連手工業的工人黨員在內），因此我們可以斷言，直至中共走上政權時候，它還是一個以農民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黨。

但國際間某些同志認為中共已是一個工人的黨。例如歇爾曼同志便是這樣判斷的，當我們將托洛茨基以前判定中共是一個農民小資產階級性質黨的意見告訴他時，他說：我知道，我承認，以前是如此的，但到中共來到城市奪取政權後，便已經變成為工人的黨了。他的理由是，決定一個黨的性質，不能單拿它的組成份子的數量為標準，而要看他所導演的作用如何而定。中共既已摧毀了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政權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這便證明它的黨性已經改變了。可惜這樣說法是似是而非的。因為中共之推翻蔣介石政府，既非憑藉工人階級領導群眾的革命行動，而只是依靠農民的武裝，而同時所建立的政權又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關於政權的性質在下面即將說明），怎麼可以拿來作為改

變中共性質的標準呢？我們倒可以說，正因為中共不去動員工人階級而單靠農民武裝奪取政權，這便恰好反映了它的性質是農民小資產階級性的。

至中共進入城市奪取政權後，是否一下即改變他的黨性？不能！因為一個政黨的組織基礎的改變絕不是在廿四小時之內可以完成的。尤其像中共那樣具有異常龐大而沉重的農民基礎的黨，更非極短時期內所能改變。因此我們可以說，直到現在為止，中共還是一個農民黨員佔壓倒優勢的，因而多份是小資產階級的黨。但這並非說，中共黨的農民性是固定了的，永久不會改變的。實際上，中共自鄉村轉入城市取得政權後，爲了急於在工人階級中尋找支持，它已經經驗主義地在工人群眾中着重地吸收工人黨員了，而另一方面，它又在農村中暫時停收農民黨員。像這樣繼續下去，中共在將來可能逐漸地改變它的組成基礎，由小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黨而轉變爲多少具有工人性的黨的。但這還是將來的事。我們不能把將來的可能代替今天的現實。

國際第七次執委會決議案指出：「從社會觀點看，中共是個兩階級的政黨（BI-PARTY）……這個兩階級政黨，直到今天在城市工人階級中還只有極微弱的基礎。」這對於中共的性質算是一個極審慎的判斷，假如我們將這個判斷當作中共企圖從農民黨轉向工人黨（單就其組織基礎說）的過渡時期中的一種客觀表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我們不要忘記托洛茨基對於「工農黨」（即兩階級政黨）的批評所指出的嚴厲教訓。這意思是：凡是在現社會條件下（連落後國家在內）企圖組成工農黨的都是反動的，是替資級服務的，而對於無級革命說來是極度危險的。因為就革命的觀點說，沒有兩個階級平等地建立共同政黨之可能、所謂兩階級的「工農黨」，結果總是小資產階級政客欺騙工人階級的一種

反動企圖（見托著《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一文中「論東方各國『工農兩階級政黨』的反動思想」一章）。

關於中共所建立新政權（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性問題，國際對中國的文件中尚未指出，中國同志間雖然在解釋上存有若干歧見（中國少數派的同志除外，因為他們認定中共的政權是代表「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集產主義」的！）但一般地都認定這個政權是建立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上，是一種邦拿巴特式的軍事獨裁，最後分析起來，即就它對財產關係所起的作用說來，是資產階級性的。但我們國際間某些同志却抱有與此完全相反的見解。例如有位同志（利夫斯東）親自向我說：「中共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雖然他沒有說出任何理由，但據我推測，他可能是根據南斯拉夫南共政權的公式演繹出來的。另一種見之於正式文件的意見，認為中共政權還含有「雙重政權」的性質（見歐爾曼同志：《中國第三次革命》——載英文版《第四國際》一九五一年一、二月聯號）。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們國際的同志間，而且是負責的同志間，竟發生如此分歧和混亂的意見，我認為必須加以肅清。先讓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見略加批評吧：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決定任何一個政權的性質，必須根據兩個基本條件：階級關係與財產關係，而後者更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我們稱俄國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所建立的政權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這個政權完全掌握在受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手裏，雖然當時的財產關係還沒有來得及根本改變，但因為階級關係的根本改變，即已足夠稱它為無產階級專政了。我們稱南共在一九四七年後的政權為無產階級專政，主要是因財產關係已根本改變（即已由私有財產轉變為國有財產），雖然南共政權不是完全由

無產階級控制，帶有某種程度的官僚主義的畸形，但由於財產制的根本改變，也就足夠稱它為「畸形的無產階級專政」了。

但中共的政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就階級關係說，這個政權自認為「四個階級」（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這就異常明顯地指出它絕對不是由無產階級所控制的或「專政」的了。事實上，這個政權的社會基礎乃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小資產階級所構成的，這是絕不可否認的事實。資產階級在這個政權中雖沒有決定的作用，但比之無產階級還是佔顯著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至於就財產關係說，這個政權不但沒有從根本上掃除私有財產制，反而是自覺地制定法律或憲章在保護此種私產制，發展所謂「新民主主義」的，即非社會主義的經濟。這怎麼能談得上中共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呢？！

歐爾曼同志對於中共政權所含的雙重性的論據是：「不論這個政府（指中共人民政府）願意與否，它將發現自己被迫地在華南建立真正的雙重政權。在省和縣，大多數是老幹部仍留在那個地位上；但在各地方，他們的敵人——農民協會的貧農，在實行土改中是要取得真實的政權的。」（見上引「第四國際」一、二月號一九頁）這段話雖然很模糊，但其意義似乎是：在省縣的政權是資級性的；在鄉村的政權是貧農的。我們姑且承認這是事實，但不能因此判定中共在華南的政權是雙重性的。因為貧農的政權並不等於無產階級的政權，至多只能說它是最徹底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政權而已。要使貧農的政權改變其小資產階級性，只有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有可能。而現在的中共政權正是缺乏這樣的一個基本條件。所以歐同志的意見是經不起批評的。

為使大家更具體更明確地認識中共政權的性質，我可以指出它所包含的幾個基本特點如左：

(A) 這個政權的主要支柱是龐大的農民軍。而這支農民軍則操在早已斯大林主義化（亦即官僚主義化）的中共手裏。因此，中共對這個政權具有完全的決定權或控制權。

(B) 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在這個政權中佔有相當顯著的地位，可沒有直接的控制作用。他們只能憑藉他們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勢力來間接地影響它。

(C) 工人中有個別分子被指定參加這個政權（很少佔着重要地位），但就整個工人階級說來，對於這個政權是處於被統治地位。因為工人群眾不但被剝奪了自由選舉代表參加和管理這個政權的基本條件（如蘇維埃或其他類似的代表會議等），而且連一般的政治自由也被嚴厲限制的（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信仰自由等），甚至完全被禁止的（如罷工）。所以工人階級雖在名義上被這個政權推崇為「主人翁」，實際上却只有在「法律範圍內」向它「請求」改善生活的權利而已。

(D) 在社會經濟上，這個政權已經施行了相當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並在準備「有步驟地」（即依照中共的官僚主義方式）完成這種土改，掃除封建殘餘，——這在中國歷史上確是一個空前偉大的改革。但這個改革是以不妨害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即保留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和土地自由買賣為限的。

(E) 關於資本主義的財產，除接收原來國有化的產業（所謂官僚資本）為新政權的國有產業外，對其他一切私有財產不但完全沒有觸犯，且予以新的法律保障。但對於私人資本的利潤則加以相當嚴厲的限制。因此，工人階級在這個政權底下，一方面仍處於僱傭勞動的地位，另一方面則可以避免過份殘酷的剝削。

從上述幾個特點，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中共政權所包含的性質絕非單純的常態的，換句話說，這個政權既是在異常特殊條件配

合下所產生，因而它所包含的性質和所具有的形態也是異常複雜和變態的，在近代歷史上很難找出另一個政權可與它相比擬。假如我們將中共政權和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甲可賓政權比較一下，或許更能顯出它的特質吧。

甲可賓黨政權的社會基礎，是當時城市一般勞苦群眾（所謂「無短褲者」）的小資產階級，它徹底完成了土地改革，肅清了封建勢力；中共政權則建在鄉村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之上，它亦在執行土改，掃除封建勢力的殘餘；而兩者都是高度的專政；——從這些基礎方面看，這兩種政權是頗為類似的。但甲可賓黨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剛在發軔的時代，它之徹底完成土改，肅清封建勢力，乃是替資產階級執行了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替未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開闢了康莊大道。因而甲可賓黨的政權徹頭徹尾是革命的，只有後來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後所建立的政權才可與之前後互相輝映。中共所處的時代則與甲可賓黨所處的時代完全相反，乃是資本主義已迫近衰亡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真正的革命政權，即是在落後的國家，也必須建立在無產階級（現代的「無短褲者」）的社會基礎上。而實行土改，則不應，且不可能替資本主義的發展肅清道路，而必須直接地替社會主義開闢前途，因而必須與沒收地主土地國有化同時進行剝奪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這正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政權所曾實現過的。但中共的政權則與之相反，因而最後分析起來，這個政權將是歷史發展的絆腳石，在本質上是反動的。總而言之，中共政權在階級關係上，既以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為其基礎，企圖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進行「仲裁」，在財產關係上，它一方面在廢除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並將大部份產業國有化，而另一方面則又企圖建立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制（容許土地

自由買賣及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等）並一般地保護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企圖在國有財產與私有財產之間進行「調節」，以此在長期間建立「新民主主義」（即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因此，這個政權本身便充滿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和爆炸性，從歷史的觀點看來，它只能是極短暫的過渡性的。在未來事變的發展中，它將被迫地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選擇它的社會基礎，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選擇它的前途。否則，它不是被兩個階級的一方所推倒，就是被雙方的勢力所壓毀，而成爲歷史的插話的。

中共政權措施的演進

關於中共政權兩年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這個政府正式宣佈成立起）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措施，如要加以適當的敘述和批評，必須寫一個專門的文件。本報告爲篇幅所限，同時手裏又缺乏足夠的材料，故對此只能將其措施的一些基本特點及其方針的主要變化予以極簡略的描繪而已。對這方面我們已準備繼續提供材料，以資補充和參考。

關於中共政權措施的演進，就其政策所表現的特點與變化，我們可以用朝鮮戰事爆發爲標界，將它劃分爲兩個時期。在第一時期（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的頭幾個月內，中共在軍事第一（即肅清國民黨在大陸上的殘餘軍事力量）的口號之下，在經濟上是傾注全力搜刮金錢和食糧，以支持前綫及維持行政的開銷：其所表現的主要措施便是：對一切工商業苛徵捐稅，對一切人民強迫派銷公債——「勝利公債」、「支前公債」、與及「愛國公債」等——強徵農民糧食（所謂「獻糧」），不足之數則

大量發紙幣來補充，以及公開停止土改和壓低工資等。在政治上則盡量向資產階級地主及富農妥協，拉攏各種各式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政客和軍人，甚至國民黨的官僚和特務（當時名之為「靠攏」）企圖以此瓦解敵方而增強自己的勢力。因而對於工人和農民的活動則極力予以限制，工人因反抗與罷工而被捕，被監禁，甚至被槍殺者亦時有所聞。

上述種種措施的結果是：通貨膨脹，物價奔騰，整個社會貧窮化，私人工商業加速地趨於崩解，大部份的工廠和商店絕對無法支付，紛紛要求關閉，或自行關閉，即不關閉者亦無法支付工資。因此引起了資級的極度恐慌和憤懣。工人群眾則因工資抑低（與國民黨統治時代比較）而又被剋扣工資去購買公債，生活日趨困苦，但又無法表示自己的意見，提出合理的要求，因而普遍地對新政權表示不滿，甚至公開抱怨。但表現得最嚴重的還是農村。一般農民群眾，在停止土改之下，即絲毫得不到好處，反而被迫無底止地「獻糧獻捐」（此時地主富農多份將他們的獻捐轉嫁在農民群眾身上），以至最後連維持生活和作種籽的一點食糧都被迫「捐獻」出來了，弄得無法生存，深懷怨恨，又加以地主富農和國民黨特務從中煽動，於是其中一部份便走到公開的反抗，如抗拒「獻捐」，成群搶分「公糧」，襲擊中共的官吏和黨員，甚至上山打游擊去了。這在客觀上便大大增加了國民黨的反共游擊勢力。這種情形到一九五〇年春天已到達了危機的爆炸點。這迫使中共的領導機關也不得不公開承認：「現在廣大農村的封建制度尚未解除，戰爭的創傷尚未恢復，又加以去年公糧徵收中存有畸輕畸重情形，不法地主乘機轉嫁負擔，以致許多地區的農民缺糧缺種，難於進行春耕，其被災地區情形尤為嚴重。當此時機復有少數敵特匪徒，威脅群眾組織暴動，搶分公糧，襲擊團體

與革命人員，製造社會混亂，破壞生產秩序……使社會生產關係與社會秩序，陷於動盪不安的危機局面。」（見「中共中南區軍政委員會」佈告，載於香港出版三月六日的《文匯報》）當時漢口出版的官方的《長江日報》且將此種危局總括如下的結論：「當前危機的性質，乃是農民跟着共黨和人民政府走，還是跟着豪紳惡霸和特務份子走？」

中共政權在這種嚴重危機和各方壓力，尤其是農民群眾和工商業家的壓力之下，被迫着在政策上來了一次「轉變」，這個轉變的最初表現是公佈實施土改（三月初），名為有步驟地實行土改，即在長江以北重新進行分配土地（西北與西南除外），在長江以南則先進行「反惡霸」和「減租、退租、減息」的鬥爭，並修改了「徵糧法」。這是緩和農民反抗的一種救急劑，差不多同時又公佈了一個整理財務案，多少減輕了捐稅，並使全國稅收歸於統一和劃一。這便多少緩和了一般納稅人的憤懣，另一方面又使財政略趨穩定，因而通貨膨脹也緩和下來。對維持工商業的緊急措施是：普遍設立「勞資協商會議」。這個會議在政府監視和仲裁之下，其「協商」的結果往往是為了維持私人的工廠和商店，工人被迫減低工資，甚至不要工資，或「自動」辭職，回鄉生產；或「自動」延長工作時間，以減低成本等等。工商業家對此當然「相當滿意」，但工人方面却是更加怨恨了。

上面的一切緊急措施，在五月間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又經過一番檢討、修改和補充，成為種種法案（如「土改法」、「工會法」等）由政府公佈成為法令。此外，有一個財政整理報告，也由政協通過，由政府批准實行。這些法案值得特別加以指出的是：新的「土改法」與以前的「土改法大綱」大體相同，但在執行時「必須保持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根據劉少奇的報告），並

必須嚴格禁止亂打、亂殺、亂逮捕及戴高帽遊行等行爲（見政務院的指示），它的意義是嚴格地禁止群眾自動地組織起來，以自己的革命方式懲罰地主豪紳惡霸，一切均須訴諸於法律，所謂「法理鬥爭」。其次在經濟上由政府以低息貸款方式，或以「委托加工」方式（即政府或國營工業出原料，託私營工業加工，予以一定的利潤）或以購買製成品方式，以及給予購買原料、燃料及運輸等方便，以此援助工業家。並縮小公營商業以便利私營商業。在「工會法」裏面承認工人有爭取改善生活的權利，但須在法律範圍內。如果法律不許可時，工人仍然是無辦法的。此外對於公債的強迫派銷也予以某種修改。

我們可以總括地說，中共政權這一次政策上的「轉變」，主要是在農民和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深刻感到對自身的危害而進行的。因而在這次「轉變」中多少獲得利益或讓步的也是他們。至於工人階級，尤其是私營企業中的工人們，不但獲益很少，在許多方面甚至是被犧牲的。

自朝鮮戰爭發生至現在這一段時期中，中共政府的措施大體是根據五月「政協會議」的決定方針進行。但在「援朝反美」的號召之下，尤其在動員參加朝鮮戰爭的情勢下，中共的政策又迫得作了某些「轉變」。

在經濟上，由於美帝的封鎖，使得某些工業上的原料和機械供給日趨缺乏，同時又因爲本身財政日益陷於困境，中共政府對於私營企業的援助便愈來愈減少，愈來愈限制，因此曾一度趨於相當恢復的私營企業又表現了停頓和衰落。此時中共政府希望全力發展國營企業，並強調建立「自給自足的重工業」，但因資本設備的異常缺乏而很少成就。在商業方面，尤其是對外商業，又多少恢復了以前對私營企業的控制。因此商業又趨於停頓狀態。

對農村的土改，爲了在援朝戰爭中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確比之原來規定的步驟增加了速度，並擴大了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放鬆了對農民群衆的控制，且將基礎建立在貧僱農身上。如最近幾個月來強調農民，尤其是貧農群衆之重要性，及糾正土改運動中之右傾機會主義的偏差，懲罰某些幹部之「違反群衆意向」及其「官僚作風」與貪污腐化等等便是顯例。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共已完全信任農民群衆，讓其自動發揮其革命創意，自動組織起來，自動地進行分配土地和打擊地主富農的革命鬥爭了。實際上，「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有步驟地執行土改」及「說理鬥爭」的基本路線，還是完全有效的。僅僅在執行上較之以前放鬆或放任而已。

對於工人階級，由於「抗美援朝」需要他們支持的同一理由，中共政府已對工人生活作了若干的改善。近來對國營企業中工人的待遇已逐漸提高，並在生產管理的技術方面已較前傾聽工人們的意見，但管理生產的行政權還是完全操在由上級指派的經理或委員會之手。而且在「增加生產競賽」的口號之下，一方既加強了普通工人的過份勞動，他方又逐漸培養了一批貴族工人（史達哈諾份子），壓在普通工人群衆頭上，因而分裂了工人隊伍。中共對私營企業的工人群衆爭取生活改善，較之以前也放任得多，就是說，它容許工會「在不妨礙生產的條件下」向資方爭取改善生活的「合法鬥爭」，因此，像以前那樣的減低工資和辭退工人，已受到嚴厲的限制。最近通過的「勞動保險法」雖然並不徹底，一般說，對於工人群衆的地位和生活，確是一個大大的改良。但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和生產上的基本權利，即直接參加管理行政和生產的權利還是被剝奪的。

在政治上，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一切反動份子乘機活躍，這

便迫使中共多少改變了它以前的妥協拉攏政策。這表現在雷厲風行地進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在這運動裏，不但有成千成萬的反動地主富農（名之爲惡霸）土賊、國民黨官僚特務，被監視充軍、處決，而且有不少的「靠攏」份子以及民盟和李濟深的黨徒，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進步。但對於真正的資產階級份子及其代言人（如李濟深的「民革」及「民盟」本身）不但沒有被觸犯，而且還是照舊被支持的。而且在另一方面，工人和貧農中較進步的不滿份子，尤其是托派，也在同一「鎮壓反革命」名義之下被監禁，甚至被槍殺了。這就顯得這個政權在執行某種程度的進步措施中，總是拖着斯大林主義的陰影走的。

在對外關係上，中共政府確表現了重大進步性。對帝國主義說，自中共政府成立後，在政治上確已爭取了相當的獨立地位，如完全收回海關及取消外國駐軍等，這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是劃時代的。但在經濟方面，還是「申明保護外僑在華的一切財產」，並默認香港、九龍和澳門的租讓權，希圖以此謀求對帝國主義的妥協。但從韓戰發生後，中共對外政策又表現了若干進步，由於美帝實行經濟封鎖並凍結中國在美財產，中共政府即採取了報復措施，「管制了」美商的銀行和企業，收回了一切外人經營的學校、醫院及其他類似的機關。甚至因香港政府「徵收了」一艘「起義」的油輪，中共政府也即宣佈「徵用」亞細亞煤油公司在華的一切資本。這些進步措施雖然還沒有改變「保護外僑在華的一切財產」的基本路線，但已多少侵犯了外僑的財產。正因為中共政府直接參加韓戰及以上種種措施的結果，它不但與領導資本主義世界的美帝妥協的可能性已趨於極度微弱，且已成爲後者在東方最仇視的目標了。

中共政府對於蘇聯的關係，由於其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在地理上和經濟上的牽制，它一開始便是居於依賴和屈就的地位（所謂「一面倒」）；這從一九五〇年二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協定」中明顯地反映了出來，在這條約中爲了緩和中國民衆對蘇聯的反感（請特別注意：自蘇聯根據雅爾達協定攫取了旅順大連及共管中長路等等特權，尤其搬走和破壞了東北大部份的工礦生產設備後，在中國民衆中，尤其是在東北的工人羣衆中，曾發生了極強烈的反感）。同時也由於南斯拉夫的痛苦教訓，克里姆林宮官僚已被迫表示「尊重中國人民政府的主權和獨立地位，應允至遲於一九五二年底交還旅大和中長路的管理權（但究竟是否如期交還仍是問題）。但在經濟上，在貿易和所謂中蘇合股公司等方面，幾全是偏利於蘇聯的。在本質上與蘇聯向東歐國家所簽訂的協定是相類似的。尤其自韓戰發生，中共直接參加這一戰爭後，中共政府對於蘇聯官僚層的依賴是愈來愈趨緊密而難於解脫了。換句話說，克里姆林宮對於中共政權的控制是愈益堅強而不易動搖了。單從這方面說，韓國戰爭使有如一條鍊子，已將中共政權縛在蘇聯的戰車後面，不得被動地跟着走。

就中共政府參加韓戰本身說，這在國際舞台上確已大大地增加了它的比重，提高了它的地位，在國內一般民衆中加強了它的威望。但在另一方面，由於這次戰爭中所已遭受到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損害，已使經濟困難重重的中國在經濟及社會的建設上（即令是依照中共方式的建設）更是難上加難，同時由於韓戰所給予的重大犧牲，一般民衆已發生了某種反感，甚至怨恨。假如戰爭再繼續下去，這種惡果是更難於估計的。從這方面說，也許韓戰會停止或緩和下來。但假如克里姆林宮企圖利用韓戰來束縛中共，那就可能拖延。

總而言之，中共政府兩年餘來對內對外的一切措施，在國內外一切複雜而強大的勢力的壓迫與牽制之下，已是經驗主義地在改變着。就一般的傾向說，乃是「向左」轉動。但它的機會主義的根本方針和官僚主義的行政手法，即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論和「階級合作」路綫及從上而下地有系統地有計劃地嚴厲控制群眾活動，壓抑其創意力，仍是原封不變地被保存着的。因此，它本身所包藏的基本矛盾和爆炸性（如前章所指出的）不但沒有被兩年來的措施所消解和緩和，反而是跟着事變的邏輯發展而日趨於尖銳化的。

中國的前途

由於中共對國民黨政權的勝利，已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局勢，一個變態的第三次革命開始的局勢。但由於它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用，及其所包藏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階級關係及國際關係的一切深刻而尖銳的矛盾，這個局勢本身命定地只能是過渡性的。它將被導向底下幾個可能的前途。

(A) 退向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就現時一切資本主義財產關係之被保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仍具有某種程度的勢力和影響，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被壓抑，以及基於農民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上的容易被腐蝕的官僚主義的專政機構——這一切條件配合起來，從客觀的最後分析上，我們不能排除中國有倒退到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之可能。但這一可能的實現，必須經過一個極劇烈的反革命的流血鬥爭。這在現時所具有的另一基本條件下，即在中共全權控制着一個極強大的農民武裝勢力下，是談不到的。但假如在未來國內外事變發展至不利的情勢下，中共內部可能發生分化而有利於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復辟。尤其在未來第三次大

戰當中，假如沒有其他國家革命及時而有力的干涉，美帝國主義可能在軍事上予蘇聯以致命的打擊之後，回過頭來領導台灣和日本軍隊進攻中國大陸，那時中共的統治便可能被摧毀或分裂，即一部份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份子向美帝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便重新出現於中國大陸舞台。當然，這種極壞前途只是或然性的，但我們要根本否認它是不智的。我們必須認識這一極壞的可能性，因而有所警惕，並盡力從革命的主觀努力上去防止其發展和發生。

(B) 走向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土地改革之逐步實施，對封建殘餘勢力之大規模掃蕩，大部份產業（如主要的工礦業、運輸交通機關及大銀行等）之國有化，蔣介石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之被清算，廣大農民群眾之相當興起，城市工人階級之重新結合（如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及工農群眾一般文化水準和政治覺悟之逐步提高（如普遍的識字運動及馬、恩、列著作之成爲合法讀物等），這一切便在客觀上替革命的發展安置了一個有利的基礎，現時橫在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乃是中共的頑強的機會主義與專橫的官僚主義。但如在未來國內外有利局勢的開展下，工農群眾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壓迫中共進一步打擊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爭取某些有利於革命發展的條件（如某些民主權利），逐步向革命的道路前進。尤其在第三次大戰爆發後，如有世界革命的興起，中國工農群眾在國外革命的強大刺激和鼓舞之下，大有可能昂起頭來，向中共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進攻，使後者本身發生破裂，產生一個革命的左翼，從斯大林主義的羈絆下解脫出來，與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合流，以此領導革命走上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即徹底完成中國第三次革命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

(C) 與蘇聯同化的道路。以上兩個前途乃是就中國局勢發展之

最基本的與最後的結局而言，但就中共領導機關所堅持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及其與克里姆林宮現存的緊密關係說，上述兩個前途都是要受到拼命抵制的。因為兩者對於中共領導機關都是致命的。因而它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選擇第三條道路，即逐步地「同化於蘇聯的道路」。這就是說，中共在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在帝國主義的影響下）日漸威脅與群眾不滿的壓力增加底下，它一方面，經驗主義地在政治上逐步排除資產階級的黨派，即用「肅清」與「合併」兼施的手段取消那些黨派和「聯合政府」，形成名符其實的一黨專政，這即是所謂由「人民民主專政過渡到無級專政」。在經濟上，它逐步沒收資產階級的私有產業，擴大國有化產業的範圍，即所謂「由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另一方面，中共在執行上指的政治和經濟措施時，可以遷就或利用群眾的壓力以打擊反動勢力，但在基本上仍然以官僚主義方式嚴厲控制着群眾活動，尤其是要控制工人和貧農的群眾活動，使其不致超越它所允許的範圍，干涉它的基本路綫。這條路綫亦可稱為「東歐化的路綫」。但有一巨大不同之點，即東歐國家之「同化」，是完全處在克里姆林宮的軍事控制下，並由它所直接指派的各該國共黨官僚所完成的。在中國，由於南國事變的教訓，和中國土地的廣大與人口的衆多，以及中共本身勢力的相當強大，克里姆林宮只能憑藉它在經濟和軍事上的一般優越地位及對東北新疆和內蒙的控制，以此威脅和壓迫中共，同時又在表面上尊重它的「獨立自主」，讓它「自動地」去進行。

這一「同化路綫」，雖然主要根據中共本身的主觀傾向，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絕不可忽視一個已經掌握政權並且擁有龐大物質力量（強大的農民軍在內）的黨，它的主觀傾向在一定環境和一定時期內所起的重大作用（斯大林黨在蘇聯起的作用便是顯例）

在世界各國沒有新的革命興起及第三次大戰沒有爆發以前，中共同蘇聯同化這一前途是極可能或極現實的。我們否認它，不但是不聰明的，在實際的政治上是很有害的。但當第三次大戰一經爆發，或新的革命運動在其他國家興起時，中共這一同化進程即將立刻被打斷，迫使中國局勢向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兩個可能的基本前途中某一方面發展。

我們還可以指出，中共在執行這種同化路線的進程中，絕不是平穩的，中共政權本身所包藏的深刻而尖銳的矛盾，以及中國革命利益與克里姆林宮官僚外交利益的矛盾將不可避免地跟着局勢的發展而暴露出來，形成各種各式的波濤和悲劇的。

一般地說，中國局勢的發展將是帶着慢性的，拖延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絕難有決定性的改變。因而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命運將被拖延到第三次大戰及其可能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巨潮中去獲得總的解決。因此，我們還有相當充分的時間作準備以迎接這一總解決局勢的到來。

我們的基本態度和方針

根據前面的估計和分析，我們必須公開承認：一個新的革命局勢不但已經開始，並已達到某種成就，而且還有向前發展的可能。因此，我們排斥一切教派主義的批評。我們必須將我們的組織完全置身於這個革命運動之中，置身於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之中，盡可能地將運動推向勝利之途發展。但同時我們亦必須認識，由於領導這個革命的中共的官僚機會主義，不但已使這個革命變成了畸形，而且正在阻塞它，領導它向危崖的邊緣走。因此我們排斥一切天真的樂觀主義幻想，我們必須面對着危險的艱苦的現實，必須向群眾指出中共的官僚機會主義路線本身造成的巨大

矛盾和危機，耐心地堅毅地向他們解釋，說服他們，鼓勵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克服這些矛盾和危機，以此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這便是我們對現局勢應取的基本態度。

我們對於推動這個變態革命走向真正勝利的基本方針是：

(A) 徹底完成土地改革，以此根絕一切封建殘餘勢力，實行土地國有化。同時剝奪一切城鄉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完成財產國有化，以此奠定社會主義的建設基礎。

(B) 取消階級合作的「聯合政府」，結束邦拿巴特的軍事獨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貧農的專政。以此完成真正民主集中制的國家統一。

(C) 對外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一切租借地及割讓地（如香港、九龍及澳門等），沒收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財產，並取消蘇聯官僚在華的一切特權，以此完成真正的民族獨立。

為貫徹上述的基本方針而鬥爭，我們的黨必須訂定一個具體而詳細的行動綱領。在這個行動綱領中，我們應着重地指出：我們將支持中共的每一進步措施，但批評他的任何反動措施。在任何時候及任何地方，我們必須盡可能爭取實現工人和貧農的基本民主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及信仰等的自由權），爭取工人群眾參加監督和管理行政和生產的權利，以及建立工、農、兵的代表會議等等。

現時我們的組織尚極微弱，又受到新政權的兇殘迫害，當然遠談不到直接干涉運動，轉移事變，但我們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路綫是極適合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邏輯的。只要我們堅毅地勇敢地站在運動之內，站在群眾的鬥爭之中，謹慎地耐心地說服群眾，事變的發展將逐步地幫助我們取得群眾的信任，在一個新的轉變，一個新的革命潮流到來時，我們便有可能被推到領導

的地位，領導群眾向勝利之途邁進的。

× × × × ×

最後，我應當指出，中國已發生的事變，不但因為它所包含的土地廣大，人口衆多，在遠東乃至整個國際局勢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值得我們特別注意。而且我們還得了解，中國在所有的落後國家中，是一個綜合與不平衡發展得最典型的國家，半世紀來不斷地爆發了一連串的巨大事變（兩次革命及幾次長期的內戰和對外戰爭，現在又正在走上第三次革命），且在二十五年來，托洛茨基及其所領導的中國托派又直接參與了這些事變中的大部份，因而積累了極豐富的經驗。所以正確地解決中國問題，不但對於今後中國的托派運動具有決定意義，而且對於我們國際往後指導東方及其他一切落後國家，乃至先進國家的運動也將成爲寶貴的指南。因此，我們重複一遍：我希望我們國際的同志們討論中國問題時，不要拘泥於任何公式的類比或抽象觀念，而應嚴格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客觀事實，以此獲得圓滿的結論。

關於「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的幾點補充和修正

(一九五二年五月)

將最近收到有關中國局勢發展的一些最新的材料加以分析，並重新檢討關於南斯拉夫及東歐緩衝國的演化情況後，我覺得我以前的《中國局勢報告》中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分析和評斷，必須作一簡略的補充和修正，以便將來執委會議討論此等問題時獲得更多的一些真實材料作參考。

關於中共的性質問題

對於這一問題，托洛茨基和我們中國托派以前根據中共自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即完全放棄了城市工人運動而轉入農村，專門從事農民的游擊戰，大量吸收農民入黨，因而判定這個黨已由工人的黨逐步墮落而變成以農民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性的政黨。但國際間某些同志似乎對此頗為懷疑，甚至有人說，即使托洛茨基有此判斷也是不正確的。因此我覺得對這一問題首先有引用一些事實加以解釋的必要。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判定一個政黨的性質，主要是根據兩個基本因素：黨的組織成分和政治傾向。如果組織成份是以工人佔多數，而領導的政治傾向又是真正代表多數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的，便可以稱之為健全的或革命的工人黨。如果其組成份子以工人佔多數，而其領導是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或機會主義的，我們仍可稱之為工人黨，但是一個機會主義的或墮落的工人黨；如果組成份子是小資產階級佔絕對優勢而其政治領導又是機會主義的，

不管它仍以工人黨自居，那我們只能稱爲小資產階級性的黨了。因此我們判定一個黨是否工人的黨，其組成份子是具有決定性的。

如就中共的組成基礎的演化說，可以作出如下的圖畫：當第二次革命的末期，像一九二七年四月召開的第五次黨大會上的報告，黨員人數約六萬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外，該團團員人數大約多於黨員人數）其組成份子大產業工人佔百分之五十八。但自這次革命慘敗，再經過多次的盲動，尤其是經過廣州的大冒險慘敗之後，大多數的工人黨員不是被犧牲，就是自動脫離了黨，所以一九二八年工人黨員只佔百分之十，一九二九年則降至百分之三（見周恩來《論組織問題》），一九三〇年三月降至百分之二·五（見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紅旗》），同年九月份爲百分之一·六（見周恩來在三中全會的報告），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公開承認：「黨員的工人成分已降至零點以下」。經過一九三二年上海多數工人支部轉入左派反對派（托派）之後，所以一九三三年十月廿三日的《紅旗》報曾發出黨在全國最大工業城市的上海「已沒有一個真正產業工人支部」的怨言了。但在同一時期內，據說黨員人數已增至三十餘萬人，這就充分證明中共的黨員成份幾乎全是農民了。正因此，托洛茨基得出結論說：「中國斯大林派……在反革命的幾年中，他們從無產階級那裏跑到農民那裏去了。他們擔任了中國社會革命黨還是革命時代所擔任的任務」。「黨在事實上和它的階級脫離了」。「那些成份上是農民而領導者是小資產階級的軍隊，同工人衝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沒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環境，都是使這些衝突極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的任務的內容，不但不允許那依靠武裝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在

政治上和軍事上命令無產階級，並且要預備和獲得無產階級對農民運動的領導，特別是領導它的『紅軍』……」（見托氏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三日《致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及同月廿六日寫在該信後面的附錄）。

中共被迫由華南逃至華北延安後，因環境的更為落後，工人黨員的成份只有比以前更少，可能增加的工人黨員也僅僅是鄉村的手工業者，因而這黨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氣氛便壓倒一切，以致正式形成了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主義論」。他在其《論新民主主義》中公然宣稱：「斯大林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際上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毛稱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為繼承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以別於蔣介石等所繼承的「假三民主義」），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由毛澤東這段話充分證明：中共不但在黨員的組成上是一個以農民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性的黨，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完全表明為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的黨了。

因此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共在擁護國民黨蔣介石的領導下，不但在宣傳上強調階級合作的必要，而且在實際上公然主張「工人應增加生產協助政府抗日」，反對工人階級對民族資本家的「過火要求」，特別攻擊托派的「階級鬥爭政策」為「賣國資敵政策」，因而大事誣蔑托派為「漢奸」。所以在實際鬥爭中，中共總是站在民族資本家方面反對甚至破壞工人的合理要求的，同時盡量引誘較積極的工人份子離開城市去參加鄉村游擊戰。正因此，這個黨在抗戰期中雖然大大地增加它的農民武裝力量，但在城市工人群眾中的影響是極為微弱的。

在抗戰停止後，中共雖然重新參加城市的工人運動，並在工人中吸收黨員，建立組織。但其主要目的是獲得工人的支持，以便迫蔣介石促其與他妥協建立「聯合政府」。所以在這時期內，它對工人的政策總是引導工人群眾對民族資本家謀取妥協，意在通過民族資本家迫使蔣介石與他完成協議的目標，因而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還是微弱的。

最後，當中共被迫對蔣介石進行總反攻，佔領各大城市時，它不但絕對沒有號召工人群眾起來進行任何鬥爭，而且還極力抑制它們的活動。其唯一的號召就是命令他們「保護生產，不讓蔣匪破壞」。迄至佔領城市後，中共對工人群眾的自發的活動和組織都加以嚴厲的壓抑。甚至對工人自動組織起來「武裝保產隊」也毫不猶疑地解除其武裝。至於工人群眾因減低工資舉行罷工及因其他的壓迫而進行反抗時，更是殘暴地施行壓迫，甚至屠殺了。如天津某數廠的罷工工人被逮捕和槍決、上海申新九廠工人（該廠有工人八千）因反抗遷移，致被機槍掃射而死傷三百餘人。河北省井陘煤礦工人因反抗蘇聯顧問和專家們的橫暴，* 中共竟開去大批軍隊鎮壓，結果死傷二百餘人，致被解職而充軍至東北或西伯利亞者近千人（這是一九五〇年五月發生的事）。這一切都充分證明了小資產階級的毛黨對工人階級的不信任、仇視，甚至屠殺的程度。這便已部分地證明了托洛茨基遠在十八年以前的預見和警告了。假使當時城市工人群眾有較強的團結，並在另一革命力量（如托派）領導之下，中共極可能以內戰手段來打擊工人群眾，即托洛茨基所謂「他們是要以武裝農民來打擊先進

* 因該礦生產最優良的焦煤，可供鍊鋼之用，故蘇聯派有特別顧問和專家控制該礦，以便將該礦生產之煤全部運至蘇聯。

工人」(見上引信附錄)。

從前面所敘述的歷史事實，究竟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對中共性質的判斷是否正確，我們可以讓懷疑的同志們去重新檢討和糾正。假如人們有充分的事實和正確的理论證明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過去對中共性質的估量是不正確的，我們是不惜放棄我們的判斷而接受新的評價的。

× × × × × ×

但在另一方面，我現在應當指出：中共在第二次革命失敗後，雖然在組成上逐漸墮落成了以農民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性的黨，並在意識形態上形成了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授權給農民」的「理論」。但由於它產生的歷史根源(共產國際的支部)經過第二次革命所遺留下來的某些工人階級的傳統，以及與國際斯大林黨(雖然是墮落的但還是工人的黨)的緊密聯繫，和一般地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的專政，共產主義的前途等，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即在它已墮落成農民黨時，它內部還隱藏着某種程度的工人傾向，不過這種傾向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的生活中被損害被壓迫而已。但這個黨一旦進入城市與廣大的工人群眾接觸之後，尤其是當這個黨感到迫切地需要工人階級的支持與抵抗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威脅時，黨內隱藏而被壓抑的工人傾向，便獲得機會抬起頭來向黨的領導層施行壓力，要求將黨的基礎由農民轉到工人方面去，並向群眾的要求作某些讓步。近兩年來的事實，尤其是最近半年來的事實，確已明顯地反映了此種傾向。

首先是中共暫停吸收農民入黨而着重地加緊吸收工人黨員。《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在紀念中共廿九週年的社論中，特別強調改善黨的組織成份即強調吸收工人入黨。並稱在過去

短時期中，天津增加的六，六四八個新黨員中，工人的成份佔百分之七三，北京的三，三五〇新黨員中，工人佔百份之五十強。根據這兩個事實的推測，在東北各大工業城市和礦區及上海武漢等城市，中共近兩年餘來所吸收的工人黨員一定相當的大。當然，就整個中共的組織基礎說（據上引《人民日報》同一社論中宣稱：中共已有黨員五百萬人）工人的成份還是很微弱的（中共中央東北分局書記高崗在本年一月十日召開的東北高級幹部會議上演說時承認：「我們黨內工人階級的成份甚為微弱」。並以此解釋該黨右傾而趨於腐化的嚴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中共這一着重吸收工人入黨企圖改變其組織成份的轉向，無疑地對於該黨的性質是具有重大影響的。

這一「轉向」，在中共實施土改的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出來。依照中共與各黨各派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政治協商會議」上所通過的土改計劃，是特別強調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政務院的指令並嚴厲禁止貧農對地主富農的「過火行爲」。所以在實施土改的初期，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不但一般地被保護，而且在許多地方還分得了更多和更好的土地，甚至繼續支配地方的權力機關（如農會及村公所等）。但隨後，當貧農群眾在運動中逐漸覺醒起來時，許多下層幹部在貧農的要求與壓力之下，都大大地修改了土改計劃，甚至違反了它。這就是說，不少地主與富農的工商業財產不但被侵犯，而且地富本身亦遭到了貧農方面的嚴厲懲罰呢（最近中國報紙關於土改的報導中常常透露出這類的事實）。中共領導機關這次對下級幹部違反其領導路線，自行遷就群眾利益的此種「左傾」，不但沒有表示任何嚴厲的指責，反而完全予以默認了。雖然中共對「保護地主富農工商業財產」的政策並沒有根本改變，但該黨有一種擁護或同情貧農利

益的傾向，在它的某些下層幹部和黨員中確是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是值得我們特別予以注意的。

在最近幾個月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中，一種反資產階級的工人傾向更明顯地從中共內部反映了出來，這運動的主要原因是：在所有國家機關、軍事機關、群眾團體，特別有關財政經濟的工商業與合作社負責的幹部，却普遍地發生了極嚴重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那些幹部們不但在他們管轄的範圍內盜用公款以自肥，任意浪費公款以度其奢侈生活，而且與他們有關的資產階級份子勾結，「盜買商情、盜買資財、偷工減料、以賤報貴、以壞報好、塗改單據、偽造帳目、走私偷稅，並借公家的名義和各種便利條件替資產階級追逐暴利。資本家爲了籠絡這些貪污份子，不惜出大的本錢，以資賄賂」（同見上面引的高崗的報告）這種情形，一方面使各種機關在財政經濟上受了巨大的損害，同時又引起了各種群眾，尤其是工人和下層黨員群眾的憤懣（請參考方興同志關於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報告）。因此迫使中共的領導層爲了維持自身的存在，便不得不發動這個運動排除某些過份腐化的幹部，同時打擊某些資產階級份子，因而藉以緩和黨內和下層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的憤懣。

至於中共各級幹部之所以形成如此腐化墮落，其主要原因係在於它的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政策及其違反工人階級民主主義的官僚作風。在這次三反運動中，中共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既沒有任何的根本改變，且是用官僚主義的方式進行的。當然這個黨的腐化傾向絕不會因此阻止或根除，只是稍被抑制而已。雖然如此，但在這一運動中，中共內部反資產階級的傾向確已加強起來，因而在這次運動中不但口頭強調「必須認識資產階級思想對黨

的侵蝕和黨員的右傾思想的危險」。「依靠資產階級，就是丟掉工人階級，就是丟掉人民大眾，就是亡國亡黨」（同見上引高崗報告），而且實際上也已接受了工人群眾的控訴和要求。例如在國有財產中，工人群眾所受中共幹部壓迫和剝削的情形，在以前極少被披露或禁止披露的，現在不僅在許多報章上公佈出來，並且被中共的輿論認為必須加以改善了。

由前面的敘述，我們可以說：中共在其社會的組成基礎上，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成份雖仍然佔壓倒的優勢（佔現有五百萬黨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兩年餘來確已增加了工人黨員的成份，並在土改和反貪污等運動中加強了工人的傾向。因此，我現在認為中共的性質是含有雙重性的，就其組成傾向說，即就其有計劃地加緊吸收工人黨員而停止農民入黨說，這個黨是在走向工人黨的一個過渡階段中。

如果就意識形態說，我們可以在中共內部看出三種傾向：代表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富農的右派，代表工人和貧農的左派，以及上層領導層在前兩者之間所代表的中派。當然，這三種傾向，尤其是向右的和向左的傾向，是模糊的，還遠沒有形成或結晶化的。但在未來的階級鬥爭進程中，向右和向左的傾向勢將逐步結晶起來，因而形成組織上的分化。最後，在國內外達到嚴重的決定階段時，這個黨便將趨於分裂，甚至不可免地要走到分裂。

關於新政權的性質問題

如果我們重新認定中共的性質是帶着雙重性的，則這個黨所控制的新政權便自然而然地受到雙重性的影響。再將大部份產業國有化這一重要因素配合起來則新政權的雙重性便更顯得明白。

當然，中共所控制的新政權，與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後所稱謂的那種雙重政權或古典的雙重政權是不同的。這是一種在特殊情勢下形成起來的特殊的雙重政權。這與南斯拉夫及東歐緩衝國家那種過渡時期那種雙重性是頗為類似的。因而中共所建立的雙重政權也只能是一種過渡的形式，將來不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不管是正常的或變態的），便要回到資產階級的反動專政。但就現時的趨勢看，它是向着變態的無產階級專政走的，因此，我們對於它的前途的估計還是同以前一樣的。

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日)

最近兩年來，我連續接到來自大陸同志的消息，得悉你們黨不斷加害我們的同志：你們的特務到處跟踪、監視、搜查、逮捕、監禁甚至槍殺我們的同志。例如：一九四九年秋天，上海和溫州我們有數十個同志被捕，其中兩人已遭殺害。一九五〇年，廣西省的桂林和柳州，廣東省的中山縣及其他地方，也同樣有一批同志被逮捕，其中數人已被槍殺。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你們的特務來到我家，甚至連我也有被殺害的危險。

最近收到的詳細報告尤為驚人：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與今年一月八日深夜，你們黨在上海、廣東、北京、重慶及其他地區，同時對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大批圍捕，被捕人數達數百之多！

更甚的是連我們的同志們的妻子、兄弟、姊妹、親戚、朋友與同情者也難於倖免。像以前各例一樣，這些大批逮捕並未經法院批准。被捕者從來不經法庭審訊，他們一旦被捕，就完全失蹤，音訊杳然。

為此，我不得不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向你們黨提出最強硬的抗議。

* 譯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美國《戰士報》，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爲什麼要保持秘密？

首先，我要問：你們憑什麼權力或什麼「罪名」竟如此專橫地及有系統地打擊與迫害托洛茨基主義者？再者，即使你們有什麼零碎的「證據」使你們不得不「鎮壓托洛茨基主義者」，你們亦有責任將那些證據公諸於群衆與社會，進行公開逮捕、公開審訊，以使被捕者與被迫害者能夠行使他們的上訴與答辯權利。爲什麼你們完全秘密地處置他們？你們黨自從奪取政權之後，已成爲執政黨而且已制定了無數法律。爲什麼你們不遵照你們自己的法律行事？

從你們對我們的一貫態度與宣傳來判斷，你們似乎認爲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思想和觀點與你們大不相同，是「極端危險」甚至是「反革命」的，是「必須特別嚴厲鎮壓」的。

當然，我從不會否認，自從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失敗之後，無論關於這次失敗的教訓，或對資產階級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的基本態度，或中國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即不斷革命論對階段革命論）的關係，或許多重要事變上的戰略問題（如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雙方仍然存在着嚴重的分歧。至於誰是誰非，歷史事實已有定論。在某些地方，在客觀環境壓力之下，你們已經驗主義地做出重大的轉變和修正。

例如，日帝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極度腐敗的蔣介石政府實際上已在崩潰中。局勢最有利於動員廣大工農群衆，在革命綱領領導之下準備推翻蔣政府，建立革命政權。但你們黨已完全放棄革命綱領（包括土地改革，八小時工作制，民族獨立等）。在美帝代表馬歇爾的甜言和遊說之下，你們便與蔣介石這個反革命的劊子手進行不斷的、延長的妥協性和平談判，希望建立

「聯合政府」及走向「建設新中國」。

與此同時，我們批評與警告你們：你們的機會主義妥協政策不僅沒有出路，而且一定會錯失了革命局勢，幫助蔣介石爭取時間以穩定其極度動搖的地位，策劃軍事陰謀來對你們黨作全面進攻。（請參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們出版的《對戰後國際國內局勢的主張》）事變的發展不幸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批評與警告。

毛澤東的政策

後來，當和平談判完全失敗，蔣介石已開始進行他的軍事進攻時，你們才被迫再度提出土地改革，最後以軍事手段推翻了蔣介石在大陸的反動政權。自一九三七年你們與國民黨「第二次國共合作」以來，這次無疑是你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政治轉變。正是由於這個轉變，才有今天的勝利。我們認為：你們「修改」你們以前與蔣介石妥協的政策，不僅是你們黨政策的決定性轉變，而且是中國革命發展的一個歷史性跳躍。

然而，在你們黨推翻蔣介石政權之後，你們並不依靠工農群眾的革命力量，直接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工農蘇維埃政府，相反，你們卻與蔣集團以外的其他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政治黨派以政治協商會議的方式組成「統一戰綫」，建立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所謂「聯合政府」或「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完全違反馬列主義的基本學說與十月革命的傳統的。

在土地問題上，你們已實行沒收土地，分給農民。你們也對帝國主義獲得了重大的政治獨立。這些都是革命道路上的重大成果。但是，你們的法令，卻仍舊容許地主與富農合法保有其「工商業財產」的權利，而你們也公開宣佈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

這不但不徹底，而且成爲革命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

尤其重要的是，你們並不立即將生產手段與資產階級私有財產沒收和國有化，作爲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反而給他們法律保護，這就使得資產階級能夠阻礙今天的國家經濟建設的實施，而且留給資產階級一個物質基礎，使它可能恢復反革命統治。

下列事實對於革命前途更具重要性與決定性：你們黨自稱代表工農，特別褒揚工人階級爲國家「主人」，在實際上卻極力束縛工農，限制其民主權利，尤其是限制工農群衆的革命活動，不許他們直接選舉自己的代表來組織工農會議或代表大會，來監督與管理國家行政及所有生產組織。甚至工會和農會的代表大部份也是指派的，此外，工人以罷工行動反對資本家剝削而保護自身利益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官僚的專橫獨斷得以飛揚跋扈。這種情況將必然損害革命的創意力與工農群衆的活力，而且成爲革命進一步發展到最後勝利的制動機。

儘管我們上述觀點與你們有極嚴重的分歧，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自覺到革命的責任，仍盡一切能力贊成和支持你們已獲得的革命成果（如推翻蔣介石政權與土地改革）。我們參加了你們黨發動的所有進步運動與鬥爭，如肅清蔣介石殘餘勢力的鬥爭，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鬥爭等等。而且我們隨時準備盡我們一切能力保衛這些革命成果，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進攻。

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表現

不管政治意見如何不同，我們仍負擔對革命的責任——這就是我們的態度。這一點，可以在考查被你們逮捕的我們的同志過去幾年的實際活動中得到證實，其中不少人在各個鬥爭與運動中

的艱苦工作與自我犧牲精神，也會被你們的報紙公開贊揚。第四國際各個支部的公開立場與行動同樣清楚證明了這點。

在美國，並無第四國際支部，但「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托洛茨基主義報紙「戰士報」(THE MILITANT)，會不斷反對美帝國主義給予蔣介石的支持及對朝鮮的侵略；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公開要求美國承認你們的「人民政府」。他們反對美國以蘇聯及中國等為對象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備戰工作。

錫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不僅一般地宣傳贊成和支持你們的革命運動，而且他們的國會代表還進一步建議錫蘭政府與你們政府簽訂貿易協定，且大力推動這運動成功；去年在北京你們主持的和平會議上，他們的代表團公開地堅持地號召所有國家的工農群眾保衛你們所領導的革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

在這裏，我們必須請你們特別注意下列事實：二十五年以來，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爲了中國民族獨立，爲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群眾解放，爲了社會主義前途，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與反對資本家及地主對工農群眾的剝削與壓迫，曾經進行了最堅決的鬥爭。

正由於這一鬥爭，我們的同志遭受到所有反動勢力的最殘酷的迫害。許多同志被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及蔣介石汪精衛所殺害，其他許多同志在我們與你們的共同敵人的監獄中，與你們的同志一起度過了漫長的慘痛的歲月。兩年前被你們逮捕的尹寬同志及剛剛被你們逮捕的鄭超麟同志，就曾經與你們的同志一起被關在蔣介石的監獄中凡數年之久，而我也曾一度與你們的牛蘭同志（當時任國際駐中國的代表）一同被關禁在南京監獄的同一牢房中。即使在今天，我們還有不少同志仍被蔣介石關在台灣的監獄裏。

當你們現在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傀儡蔣介石、反對反動地主、而且部份地反對資本家的決定性鬥爭之際，你們又根據什麼理由如此殘酷地迫害在同一戰綫上的最堅決的戰士托洛茨基主義者呢？

斯大林的誣讒制度

讓我特別提醒你們：你們黨現在正在進行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蔣匪幫」侵略的「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包括所有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黨派（比如那些團聚在你們的「政治協商會議」之中的）；而且，甚至像李濟深、楊虎等這些第二次革命的創子手，和程潛、龍雲等那樣的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幫兇，都在你們的政府中高居要位。

與此同時，你們却特別不容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你們禁止他們在你們領導的革命中為革命服務，為廣大工農群衆的利益鬥爭。這個怪誕的現象如何解釋？假使不是以傷害革命左翼來取悅反動的右派機會主義者的話，則只是表明你們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反映了克里姆林宮的壓力。這表現在你們領導的革命中，是多麼深刻的諷刺呵！

自從列寧死後，斯大林逐步消滅整代老布爾什維克，屠殺了十月革命的首批偉大領袖。他特別仇視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思想與革命立場，為了迫害他及其戰友與擁護者，就用盡一切方法，以最惡毒的「反革命罪行」來中傷、誹謗、誣讒。如此形成的極端仇視的氣氛，迄今在蘇聯及各國共產黨間仍很流行。你們以前及現在對我們同志的仇視與迫害，無疑是斯大林官僚層這種罪惡與惡毒傳統的結果。

然而，在斯大林死後一個短時期內，在日趨緊張的國際局勢

與日趨增漲的群眾不滿的壓力下，他的繼承者，因為要負上斯大林統治下的惡毒的迫害與罪咎，已開始感覺不安，他們也曾公開揭露以前被公安部逮捕的十五位醫生的控訴全部是「誣蔑」的，而且暴露了蘇共及公安部在喬治亞對工人的迫害事件。

這表明過去斯大林的一連串審判案完全是陰謀消滅他的政敵的誣蔑，同時又顯示出，斯大林建立的格柏烏制度正在開始崩潰。所有這一切都值得你們特別注意，催促你們糾正你們的立場。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

在這次革命中你們已獲得的一切成果——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爭取民族獨立……的確是偉大而且是劃時代的。你們應該引以為榮。但是你們仍須清楚與警惕這一事實：這些成就距離最後勝利的目標仍很遙遠。

許多障礙橫在這條道路上。國家中資產階級的影響一般仍然存在。帝國主義的僱傭武裝力量仍然包圍國家邊疆的大部份。最重要的，美帝國主義正加速準備以蘇聯與中國為主要目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這個局勢下，要克服國內外的危機與阻礙，要抵抗與擊潰將要到來的美帝國主義的全面進攻，你們必須極之冷靜警覺和毫無成見地考慮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

你們必須站在中國無產階級與農民群眾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利益的基本立場上，你們必須立即擺脫克里姆林宮官僚層的束縛。

首先，必須全部改變現在的官僚集中制，代之以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必須無保留地信任與依靠工農群眾的革命創意力。他們必須有完全的自由來充分表示他們自己的意見與願望，來徹

底推行他們的革命鬥爭，民主地毫無阻撓地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機關——蘇維埃（代表會議）以代替現在的四個階級聯盟的「聯合政府」。（你們現在正籌備的各階級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是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必須沒收一切資產階級現在佔有的生產手段，作為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步。

在國際平面上，你們無論如何要拋棄你們的教派態度，支持與聯合一切在進行推翻各該國反動統治與奪取政權的鬥爭中的各國工人革命政黨與組織，以代替今天的「和平」運動。只有全世界，特別是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與一切被剝削階級的革命鬥爭的發展且獲得勝利，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或者在戰爭過程中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

釋放所有被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為了推動革命向前發展，給托洛茨基主義者與其他一切以工人名義組織起來的政黨有發表革命的意見與批評你們黨現行政策的完全民主自由！

就我個人而言，我與你們中某些同志，對第二次革命中執行斯大林的機會主義政策都有責任，這造成了最悲慘的失敗。正是從這個痛苦的經驗中，我才極深刻地了解一個革命失敗的不幸的後果及其教訓。由於這個理由，我不願看見目前的革命在你們領導下中途被毀而使工農群眾的鮮血白流。

假使你們能拋棄斯大林的官僚主義與機會主義而回到馬列主義及十月革命的傳統立場上，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來支持你們，以及在推動這個革命走向最後完成中與你們共同合作。

彭 述 之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日

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 *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

中國這次所發生的第三次革命，就它在本國已經產生的深刻變化，以及它對東方乃至整個國際上所發生的鉅大影響，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是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世界上第一個巨大事變。從這個觀點說，不管人們對它贊成與否，對這次革命在國內外所引起的一切後果及其前途，是特別值得重視和探討的。

但不幸，直到今天為止，對中國這次革命，不僅反對它的人們往往予以盲目的抨擊，就是贊成它的，除了一些膚面的描繪和頌揚之外，也極少能夠對它勝利的原因，它的成就及其所包含的矛盾予以深刻的觀察和分析，而得出合理的評價。因此，作者願根據一些不可爭論的基本事實，將中國這次革命勝利的原因，它的成就和它本身所含的矛盾及其前途，給以概括的評敘，以供國外讀者探討和理解的參考。

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的原因

中國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在資產階級的代表孫中山領導之下，除了推翻滿清王朝之外，對於革命最基本的民族民主任務，如對外民族獨立、土地改革以及國內弱小民族的解放等，不但根本未予觸動，反而產生了新舊軍閥割據的局面，引起了不斷的軍閥混戰，使人民陷於痛苦的深淵之中。

* 德文譯本發表於一九五五年一月的第四國際瑞士支部機關報。

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雖然是在代表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但由於這個黨那時完全受蘇聯斯大林的控制，以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四個階級合作」的孟什維克路線代替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獨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路線，並迫使中共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它欺騙群眾的輔助工具，因而根本摧毀了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農民奪取政權的鬥爭，所以結果使這次革命完全歸於慘敗，在工農群眾的血泊中建立了蔣介石的反革命的軍事獨裁，因而招致了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前所未有的侵略戰爭，使整個國家陷於滅亡的邊緣。

這次中共所領導的第三次革命，不但摧毀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反動政權，而且對外爭取了相當的民族獨立，並已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巨大成就。

然而領導這次革命勝利獲得巨大成就的中共，却仍舊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它仍舊沿着「四個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路線，放棄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暴動去奪取政權，而專靠農民的武裝力量去打城市取得勝利的，這不但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違背，而且與近代革命史的經驗遠不相符。正因此，中國這次革命在中國及全世界的革命集團中引起了極大的迷惑、混亂、曲解、紛爭及各種各式的乖離意見。

爲了澄清各種各式的乖離意見，以便正確理解這次革命的真相，我認爲這裏首先解釋一下它所以勝利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就毛澤東黨的機會主義的階級合作路線，就它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農民武裝的純粹軍事行動，無論在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經驗上說，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慘敗，以及往後毛澤東在農村建立「紅軍」（農民游擊隊）攻打城市的接連失敗，已可作充分的證明。

然則中共領導這次革命勝利的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它在於：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異常錯綜複雜的特殊局勢，這種局勢在中國表現的特點是：

(一) 蔣介石政權的異常腐朽和自動崩解。蔣介石政權，由於它所代表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利益使然，自始即表現其亞洲式的專橫、腐敗與無能。它這種專橫、腐敗與無能，在八年抗日戰爭中達到了登峰造極，因而不但引起了一般群眾對它的異常怨恨和仇視，即以前擁護它的資產階級的大部份，亦已對它深懷不滿，乃至絕望而脫離它、反對它。這種情形反映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便形成了各種各式的反蔣派系，以致國民黨四分五裂，政府癱瘓，軍隊瓦解。另一方面，由於在抗戰中耗竭了它的全部財政基礎，因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經濟恐慌，絕大部份工商業陷於破產或停頓。這反過來又使絕大部份人民（包括蔣政府各機關的中下級職員）陷於飢餓死亡的邊緣，更加深了對蔣政權的憤懣。總而言之，自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政權，從它的頂層到它的基礎，都已徹底腐朽而趨於自動崩解了。那時，它唯一所賴以支持而苟延殘喘的是美帝國主義。

(二) 美帝國主義最後放棄了蔣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不僅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完全被毀滅，即英帝國主義由於自身的衰朽，除了保持它在香港和九龍的地位外，亦已等於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此時只有美帝國主義企圖支持蔣政權，以期壟斷中國市場，並以此為其抵抗或進攻蘇聯的堡壘。因此，它在大戰末期，特別是戰後，曾以大量物資支持蔣介石，並以大量軍備重新武裝蔣的軍隊。但當美帝國主義看到蔣政權的過份腐朽，及日趨生長的中共勢力的威脅時，曾派馬歇爾為駐華特使，企圖說服蔣介石進行某種改良以為防腐劑，並在蔣毛之間謀取暫時妥協

，以便獲得時間來收拾後者。但由於代表資產階級地主利益的蔣介石的愚昧、昏庸和頑固，不但不能實行任何改良，而且絕對拒絕和毛妥協，致使馬歇爾的使命完全歸於失敗。這時留給美帝國主義的唯一道路，只有直接實行控制蔣政權，並以自己的軍事力量代它進攻毛黨。但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特殊局勢絕不容許美帝如此蠻幹，因為這樣，不但會使美國全部力量陷進中國大陸的泥沼中，而且很有可能引起新的大戰，這是當時美帝絲毫未曾準備，並為它的盟友英帝國主義所極端反對的。這便迫使美帝國主義最後放棄了對蔣介石的救援，並對毛黨反攻蔣政權採取了觀望等待的態度，這使得已經在崩解中的蔣介石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

(三) 毛黨的農民武裝力量的特別生長。毛澤東的基本力量是從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農民武裝暴動中生長起來的農民武裝，此種武裝力量曾經被蔣介石數次圍剿，由華南逃至華北，大為削弱，最後向蔣介石表示屈服，取消「紅軍」和「蘇維埃」番號，放棄了土地革命，並承認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抗日。但在抗日戰爭中及戰後，由於蔣政權的絕頂專橫、腐敗與無能，以及因此引起一般民衆，特別是農民群衆對它的怨恨，這便給了毛澤東的農民武裝一個重新發展的絕好機會，因而在短期內形成爲一種龐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毛黨雖然仍舊沿襲其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路線，希圖與蔣介石謀取妥協，建立「聯合政府」，因此，曾緩和了，甚至癱瘓了工人階級和貧農的階級鬥爭。但由於它會對蔣介石政府作過某些批評，並提出過一些改良的要求，——在一般群衆陷於極端痛苦，而又缺乏一個真正的革命黨去領導他們的條件之下，毛黨便成了一般群衆，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群衆寄托希望的中心，這便是這個黨的政治資本的源泉，此種「政治資本」與「農民武裝」配合起來，便構成了毛黨的主要力量。但如果沒

有蘇聯的援助，毛黨的勝利還是大成問題的。

(四) 蘇聯對中共的援助。蘇聯官僚雖然極端害怕中國有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勝利的革命，雖然它在戰後的外交政策是希圖和美帝國主義謀取妥協，達到「和平共存」的願望，但爲了保持它自身的特權利益，爲了抵抗美帝的過份威脅和進攻，在可能控制毛黨的限度內，是不惜給以某種援助的。例如蘇聯佔領東北（這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區），雖然盡量摧毀了那里的生產機構，癱瘓了那里的工人階級的鬥爭，並將大城市和礦區交給蔣介石，但同時又盡力阻礙了蔣利用東北的工礦業，並將俘獲日軍的大量武器武裝了中共的軍隊，使之包圍那些大城市和礦區，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以龐大的軍隊去駐防那些城市和礦區，並用最大的財政力量去支持那些防軍，這對於蔣介石不啻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此外，蘇聯並控制了旅順大連，以此截斷了蔣政府對東北的主要的海上交通綫。同時，以此爲基地供給了山東與河北等地的毛澤東的軍隊以武器和軍火，再以蘇聯及日俘的大批軍事技術人員供給毛軍，這便使原來十分缺乏現代武器，特別是缺乏重武器的落後的農民武裝隊伍，便一躍而成爲現代化的軍隊了。因此，原來只限於作游擊戰的農民軍，現在可以進行大規模的陣地戰而攻打大城市了。這對於專靠農民軍以奪取城市的毛黨的勝利，無疑地是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的。

將前面所列舉的事實綜合起來，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的畫圖：地主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無論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機構上，都完全自趨崩解了；以前唯一支持它的美帝國主義也最後拋棄它了；中共的農民武裝獲得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擁護，尤其在軍事上得到蘇聯俘獲日軍大量武器的援助，已成爲空前龐大而多少具有現代化的軍隊了。這些客觀和主觀的因素配合起

來，便促成中共專靠農民武裝隊伍攻打城市的異乎尋常的勝利。假如缺乏前敘這些特殊條件之一，中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例如，倘使美帝國主義當時能以軍事手段直接干涉中共對蔣政權的反攻，如後來干涉朝鮮事變一樣，則中國必然陷於一個相當長期的戰爭局面。在此種局面下，中共至多控制華北一部份地區而已。又如，假使蘇聯在第二次大戰中不曾奪取東北，讓蔣介石在美軍的指揮下控制了那個區域，利用那里的工業基礎和所俘獲的大量日軍武器，並以此截斷中共和蘇聯的聯繫，進而攻擊毛的軍隊，則中共不但談不到佔領整個中國大陸，即要控制華北也是大成問題的。

正由於上敘各種特殊條件的配合，才使機會主義的中共，完全放棄城市工人階級的動員，而專靠農民武裝推翻了蔣政權，建立了「人民政府」或「人民民主專政」，因而使中國這次革命成爲異乎尋常的畸形。正因此，在這個革命中便包含了極度深刻而嚴重的矛盾。這些矛盾嚴重地影响到中共一切政治和經濟的措施，並大大地歪曲了革命的自然發展，替它的前途種下了難以克服的危機。

毛澤東政權的構成因素及其性質

要瞭解毛政權的內容及其政治和經濟的措施，必須簡括地說明一下毛澤東的機會主義的體系。

毛澤東的機會主義最深刻而有系統地表現在他的「新民主主義」中。這種新民主主義，乃是根據斯大林的，亦即孟什維克的「革命階段論」的圖式，把中國革命人工地劃成爲兩個歷史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依照此種革命階段論的圖式，在所謂民主革命階段中，除了進行土地改

革和民族獨立外，不但不可推翻整個資產階級，沒收其私產，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必須與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並保護其財產，使其獲得「合法利潤」。只有等到這個「民主革命階段」通過後，才允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和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無須說，這不但和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相反，而且與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完全違背的。十月革命的活經驗指出：在落後國家的革命，必須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和資產階級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最後舉行暴動，摧毀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此解決民主任務，並將沒收資產階級的私產提出於議事日程加以解決，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便是「不斷革命論」之具體的和生動的表現。

但毛澤東既以他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階段論」對抗「不斷革命論」，所以在推翻蔣介石政權之後，他仍舊和民族或民主資產階級保持「聯合陣綫」，以便建立他的「新民主主義政治」。這種聯合陣綫具體地表現於所謂「政治協商會議」之中。這個會議由中共、各資產階級黨派、小資產階級黨派及工會和農會所指派的代表所構成，成爲決定國家政策的最高機關。所以新政府的人選絕不是由工農兵代表會議（如蘇維埃之類）選舉的代表產生，而是由「政治協商會議」所指定的。因而這個政權便包含了中共、工會、農會及各派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稱之爲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或「人民政府」。

當然，無論在「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政府」或「人民政府」中，操有決定權的都是中共。尤其是全國軍隊和警察完全在它的控制之下。但資產階級不但以其財產和社會勢力或多或少影響「政治協商會議」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而且它的代表在各

級人民政府中都佔有相當顯著的地位。如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六個副主席中，資產階級佔有三個。有好幾個部長和副部長，有三個省的主席也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和農民不但沒有他們自己的代表會議，直接選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權，反而在言論和行動上大受限制（如完全剝奪工人罷工權）。他們至多只是由中共所控制的工會和農會指派其信任的若干代表去參加各級政府機關而已。

今年開始以來，各地方所召開的人民代表會議，以及九月間所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產生的各級正式人民政府，並沒有改變以前的臨時人民政府的實質。人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法乃是所謂「普選法」。依照這種選舉法，一切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事實上，所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都是中共和各派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通過各級「政治協商會議」所指定的。人民的投票只能投那些被指定的「候選人」，所以結果，由人民代表會議所產生的各級人民政府，尤其中央人民政府，和以前的臨時人民政府絕少改變。因此，今年所召開的人民代表會議，不過是給原來的人民政府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

就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而言，是十分矛盾的。它的著名口號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即：一方面，它已沒收了所謂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進行國營計劃經濟；同時却仍舊保護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的私產，使其獲得「合法利潤」，僅對它們的生產加以「調節」而已。另一方面尊稱工人為「主人翁」，但同時仍然讓他們留在資本家的僱傭地位，只是對他們的剝削加以某種限制。

從前面所敘述的關於中共政權的構成份子及其基本的政治路

總看來，這個政權固然不是資產階級的專政，但也沒有進到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從前者到後者的一種過渡的，被歪曲了的雙重政權。此種雙重政權與古典的雙重政權（如俄國二月革命後所表現的）極少共同之點。可以說在歷史上是沒有前例的。但它和戰後東歐諸國（南斯拉夫除外）所成立的至一九四七爲止的政權，基本上極相類似。因此，這個政權是不穩定的。它如不向前發展成爲無產階級專政，便有可能倒退到資產階級專政的軌道上去。

土地改革的巨大成就及其隱藏的危機

毛黨的土地改革是逐步地實施的，故名之爲「有步驟地實施土改」，實際上乃是在資產階級地主反動勢力與農民群眾的雙重壓力之下，被迫地經驗主義地一步一步地進行的。

早在一九四六年，由於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農民的迫切要求，毛黨爲了加強它的軍事力量，曾在它所控制的一部份地區進行過有限度的土改。一九四八年，爲了向蔣介石進行大反攻，它將土地改革擴展到所有的「老解放區」和東北（滿洲），在推翻蔣政權之後，曾一度宣佈停止土改，即延至一九五四年去進行。但自一九五〇年開始，特別是自朝鮮戰爭發生後，由於廣大群眾的異常不滿和地主富農的反動勢力的猖獗，才迫使毛黨全面地實行土地改革。

此種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二年末，除了少數民族地區外（如內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某些弱小民族地區），可以說，基本上已經完成了。這就是說，所有地主的土地及富農多餘的土地都被沒收重新分給了無土地及土地不夠的貧僱農。因此，中國兩千餘年拖延下來的半封建式的土地制度已徹底被摧毀，整個地主階級及其半封建式的剝削制度一同被消滅，兩萬萬以上的貧僱農已分

得了土地，農業生產力已獲得初步的解放，一般農民生活的改善已獲得相當客觀的可能性。隨著這一根本改變而來的，是農村政權由地主富農轉入貧農和中農之手。同時，支配着農村的最落後最反動的宗法、習慣和傳統也已大體掃除。無疑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巨大而深刻的改革，是一種社會革命的表現。同時也是中共所領導的這次革命具有進步意義的偉大成就。

但在這種偉大改革的成就下，由於中共在土地改革中「保留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和允許土改後「土地自由買賣」的機會主義政策，這便在經過土改的農村中埋伏了新的危機。

地主，尤其是富農，因為得以保持他們的「工商業財產」，自然在鄉村經濟基礎上佔着優越的地位，再加上新政權提高農村生產為名，鼓勵農民「發家致富」及其保護富農的種種措施，這便給了後者以迅速發展的機會。現時中農中的富裕層已上升為富農（名之新富農），與原來的富農一起，已在農村中取得了經濟的支配地位。鄉村手工業和工業原料種植及絕大部份商業（零售商業）都操在他們的掌中。另一方面，中農中另一部份已逐步降為貧農。而那些分得土地的貧僱農又日益陷入貧困，逐步走向無法生存的舊路。人民政府看到此種情形，曾極力鼓吹，乃至強迫一切農民成立「勞動互助社」（即由各個農民聯合耕種，而按照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分配成果）和「農業合作社」，企圖以此救濟貧農群衆，並作為走向農業集體化的過渡橋樑。但勞動互助社既然是按照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分配成果，則佔有足夠生產工具（如馬、牛及馬車之類是貧農所沒有的）的富農當然分得特別多。至於農業合作社，乃是依照出資的多少而分配利潤，也只有利於富農。所以結果，人民政府的農業政策只是加速富農的生長與貧農的貧窮而已。

因此，土地集中和高利貸又重新出現於農村，尤其在華北的老解放區和東北。據人民日報（共黨機關報）偶然透露：有些農村甚至有百分之二十的農民（即貧農）出賣其全部或一部份土地給富農。高利貸亦成爲愈來愈流行的現象，尤其可驚的是：在東北某些地方，鄉村的共產黨員竟是經營商業、買進土地和放高利貸者，要求退出黨。因爲這種現象相當普遍，迫使東北共黨領袖高崗不得不接受他們的要求，只是希望他們「作一個政治上良好的公民。」

另一方面，鄉村政權雖然名義上操在貧農和中農之手，但這並不等於說，已經由貧農和中農的群眾代表會議選出的代表掌握了鄉村政權。事實上，是共黨指派其信任的某些貧農和中農份子把持鄉村政權。因而這些分子便成了鄉村的特權官僚，日漸和廣大的貧農生活相隔離。以致一般貧農在富農經濟的壓力和對新官僚的不滿情緒下，日益趨於消沉，往往不願出席任何集會。

總而言之，土地改革雖然已徹底剷除了封建式的土地佔有制，建立了新的小生產的土地所有制。但由於「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的機會主義政策，又在新的土地制上準備了土地重新集中，高利貸流行，富農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生長和貧農日趨消沉，中農向兩極分化，以及少數官僚特權分子把持鄉村政權的嚴重危機。要消除這種危機，只有首先實行土地國有化，限制土地買賣，沒收一切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成立貧農和中農的代表會議，讓其自行選舉代表成立鄉政府，以代替現時由少數特權分子把持的政權。然而要辦到這些改革，只有改變中共的整個機會主義路線才有可能。

經濟建設及其矛盾

假如中共在農村中經驗主義地進行了一次社會革命，推翻了地主階級的財產，那它在城市中却遠沒有達到這點，還是沿着階級合作的路綫在爬行。這從它保護整個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的政策充分地表現出來。

從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及其「合法利潤」這一基點出發，新政權的一切經濟措施和建設計劃便脫離了經濟發展的自然軌道，而產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

一方面，新政權沒收了所謂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事實上，絕大部份是原來的國有財產）為國有。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國營經濟建設，並在事實上獲得了相當的成就。在通貨的穩定，對外貿易的有效控制，舊有工業的整理和修復，某些新工業的建設，幾種主要商品的國營（如糧食、棉花、紗布、鋼鐵、煤、木材、食油及鹽等），並以此控制國內市場，支配着大部分的批發商業，等等——這已使得原來殘破和停滯的全國工商業經濟獲得迅速的恢復和相當的發展。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另一方面，為了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及其合法利潤，新政權絕對無法依照整個國民經濟的需要，進行全盤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以此儘快地提高工人階級和一般群眾的生活水準，走向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它雖然企圖利用國營企業的優勢以盡力控制或調節私營企業（如國家銀行限制對私營企業的放款，由國營企業的「加工訂貨」等）。但這不僅不能解除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間的基本矛盾，而且無法避免私營企業對國營企業的侵蝕和阻礙。這從所謂「三反和五反」的運動中，充份暴露了出來。尤其在私營企業普遍存在的條件下，國營企業不能不受全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如市場供求律，價格和工資律、利潤分配律和

均分利潤律等)。由此便產生了一些最嚴重的後果：

國營企業爲了提高生產，減低成本，以與私營企業競爭而獲取最高利潤。這不但加深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間的基本矛盾，而且大大地破壞了各種國營企業間的互相協調，互相補助的作用，同時盡量加強工人的勞動速率，延長工作時間，減削工資，減少有關勞動衛生的設備等，這一切都使工人群眾的生活陷於異常緊張和痛苦的狀態中。此外，除了普遍實行計件工資外（這是資本主義最殘酷的一種剝削制度），便是盡力鼓吹「勞動英雄」或「勞動模範」（即 STAKHANOVISM）以加強其勞動速率，以此示範（實即強迫）一般工人群眾特別加強其勞動速度。這不但使得一般工人群眾感到疲勞痛苦，增加了疾病和傷亡的事件，而且在工人內部人工地培植一批特權貴族，壓在工人群眾頭上，以此分化了工人階級。以上這些惡果，是完全違反工人階級解放的基本利益，是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合理改造背道而馳的。

除前面所敘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並存所產生的基本矛盾及惡果外，便是官僚主義所加於經濟措施和工業建設上的嚴重損害。由於中共根本排斥工人階級管理和監督生產，因而便完全以官僚主義的行政命令去處理一切生產機關。這首先表現在他們的生產計劃與其實現的可能性之間遠不相符這一事實中。例如一九五三年初所公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整個計劃仍未公佈，只公佈了計劃中第一年的數字）。去年上半年所完成的僅原計劃百分之三十。這便充分暴露了計劃追求數字的盲目性。即在所完成的計劃的百分之三十中，並非按照其真實的可能性，而是以勞動競賽等突擊生產方法去進行的。以「突擊生產完成計劃」已成爲最普遍的現象。由此便可怕地破壞了生產的均衡性和協調性，形成突擊生產的惡性循環，並由此引致了品質的降低，廢品率的提高

，生產設備的損壞，以及勞動者傷亡事件的增加等。

另一方面，官僚不顧群眾生活的需要，特別強調重工業的重要性，而大大地忽視了輕工業。這不但破壞了重工業和輕工業間的有機聯繫，而且使一般群眾所必需的日用品陷於異常缺乏，價格特別高昂，嚴重地壓低了群眾生活的水平。

假如不沒收一切資產階級的私產，並由工人階級直接選出代表代替現時的官僚去管理和監督生產，前面所指出的矛盾和惡果是絕對無法解除的。

新政權的對外政策

這次革命的巨大成果，除了土地改革，就是收回了關稅自主，取消了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駐軍權及內河航行權等。由此爭得了相當的民族獨立。雖然人民政府還沒有正式宣佈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財產。但自朝鮮戰爭後，已被迫地接管了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某些產業和文化機關。這些都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此外，人民政府被迫地參加了朝鮮戰爭，並獲得了輝煌的戰果，以及對越盟的大量援助。由此不但大大地提高了中國民族在國際間的比重，並嚴重地削弱了帝國主義在東方的地位，大大地改變了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之間的力量關係。

但就新政權對帝國主義的基本政策而言，是不徹底的，機會主義或斯大林主義的。它在朝鮮戰爭發生後，雖然被迫強調反對美帝國主義，但對其他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對英帝國主義還是採取妥協態度。它到今天還不敢提出收回香港和九龍的租借地，便是最明顯的證明。事實上，它是在克里姆林宮官僚的外交政策指揮之下，企圖聯合或拉攏美國以外的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帝國主

義，以及其他的資產階級國家（如印度等），以對抗美帝國主義，並希圖和後者謀取妥協，以期達到「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的願望。無須說，這是與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真正解放事業完全相違背的。

新政權對蘇聯的關係，由於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傳統，以及中共在推翻蔣政權的過程中，和取得政權後所受到蘇聯的相當援助，可以說是密切的。但這不等於說是真正平等與和諧的。

由於毛澤東在長期鬥爭中建立了自己的黨和軍隊，以及取得政權後，由於中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在東方所佔的重要地位，因而中國人民政府便和東歐各國（南斯拉夫除外）的人民政府大不相同。它對克里姆林宮的主人不是奴顏婢膝，唯命是聽，而是保有相當的獨立性的。但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壓倒優勢，這便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向克里姆林宮低頭，以便獲得它的援助和保護。因此，在對內的政治和經濟措施上，尤其在對外政策上，都不得不請教於克里姆林宮。

過去五年中，蘇聯除了在經濟和財政方面給予毛政權以有限的援助及在軍事上予以支持外（如在朝鮮戰爭中），並已派了好幾萬的「顧問專家」，分佈於全中國的軍隊、政府機關、黨部、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及其他商業、合作社和文化機關之中。這些顧問專家們，固然給了中國的軍事和工業建設的技術方面以相當的貢獻，但同時也因此加強了克里姆林宮對於毛政權的影響和控制力。總而言之，蘇聯官僚對於毛政權的援助及其獨立性的尊重，是在其可能控制後者的範圍內進行的。就中國整個革命來說，從蘇聯所得的益處遠不及它的害處。這便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利益與蘇聯官僚的特權利益不可調和的所在。

中國的前途

中國這次革命，既因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圖式，以孟什維克—斯大林主義的「革命階段論」代替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大大地歪曲了革命的發展進程，並在經濟和政治各方面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這就決定了它將來可能的演化趨勢。

就現時已經存在的一切條件和毛黨所決定的基本路向看來，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作如下的推測：在沒有新的世界大戰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達到勝利來干涉之前，毛黨最可能依照類似東歐所經過的道路爬行。這就是說，在國內外階級矛盾的壓力之下，毛黨將逐步地排除資產階級的代表於政權之外，取消「聯合政府」，建立其單一政黨所控制的政權，所謂「由人民民主專政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將逐步合併或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所謂「由新民主主義經濟進到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中國在實質上將類似於東歐的變態的工人國家。果真如此，中國要走到真正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也將同東歐各國和蘇聯一樣，還須要經過一個政治革命。

但如果新的世界大戰在最近將來爆發，或某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無產階級的勝利革命，則上面所指出的前途將被打斷。中國的命運將隨着大戰或革命去解決。

最後，作者希望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黨或革命集團，站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利益上，盡可能保衛中國這次革命所已經獲得的成果，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對它的侵略。同時，對毛黨的機遇主義政策和官僚主義的政權，必須給以不留情的批評，以此幫助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和自身力量的團結，逐步擺脫毛黨的機遇主義和官僚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前進。

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

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農村人民公社運動，由於它的規模的無比巨大，它的驚人速度，它所引起的全部農業生產關係的急劇變化，以及對五億農民生活方式的劇烈改變，不但在中國各階層的群眾中，特別是在農民群眾中，掀起了暴風般的震撼、驚慌、幻想、憂懼和反抗，而且震動了整個世界。一切帝國主義者、地主、資產階級，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匪幫，固然是瘋狂地詛咒它；即蘇聯集團內(除中國外)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和全世界的斯大林黨徒亦對之保持稀有的緘默，從緘默中暗示他們的極度不安。而在另一方面，遠離中國的某些小資產階級分子，特別是某些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臨死的掙扎的痛苦壓力之下，在中共誇大宣傳的影響之下，似乎從人民公社中窺見了他們的憧憬，而天真地迎接它，廉價地歌頌它。

面對着這樣極度眩人而非常錯綜複雜的局勢，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它予以極其謹慎而精細的研討，給以客觀的評價，以此確定我們對人民公社的正確態度。但要做到這點，我們不但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理論，特別是恩格斯和列寧對農民問題的全部理論和戰略，而且要吸取十月革命後蘇聯四十餘年及東歐各國十餘年來農業改造的全部經驗和教訓，作為研究當前中國人民公社化的指針，並儘可能收集公社化運動中所表現的最可靠的事實，予以分析和綜合，才有可能。

* 本文是參加當時第四國際內部對中國政府農村人民公社政策的討論而寫的，其中部份文字由英文譯成中文。

假如人們只根據某些抽象的或片面的原則，或根據中共官方的宣傳報導，即做出對人民公社的評價和結論，並由此確定其態度，那將不可免地要犯輕率武斷的錯誤，甚至走到背離馬克思主義而向斯大林主義妥協的道路上去的。

關於人民公社問題，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主要是中國和美國同志中所發表的文件看來，便已表露出了頗為嚴重的分歧。就這分歧意見的實質說，如果依照各自的邏輯發展下去，很可能走到原則上的分歧，而導致不幸的後果。但我希望通過國際範圍的充分的民主討論，徹底澄清各種偏差而達成共同的正確意見，以此避免嚴重的後果。我相信真理將從認真的辯論中顯現其本來面目，獲得大多數的同意的。

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與農民的自願原則

在擁護人民公社的許多論據中，以「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為根據者，可說是最有力的一種。因為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大生產優於小生產」這一原則為根據的。

代表這一主張並給以系統地發揮的，是我們中國同志蘇達。他在「論人民公社」的長文中寫道：

「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方面是『大』；另一方面是『公』。所謂大是指每一公社由原來的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而成。……現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農戶已經參加了人民公社，共組成了二萬六千多公社，平均每一社近五千農戶，一萬多個勞動力和耕地約六萬畝（約等於一萬英畝或四十平方公里），平均規模這樣大的農莊，在全世界要佔第一位。……蘇聯近幾年將集體農莊大事合併之後還有農莊七萬八千個，平均每個有耕地約二千公頃，農戶約二百三十戶；美國全國五

百多萬個農莊平均每個的面積也只有二萬四千畝，——中國公社的規模遠超過了它們。……

「農業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農業和工業一樣，是大生產比小生產優越的。……」

「農業和工業一樣，是大生產比小生產優越的」，這個經濟學上的一般原則，毫無疑義地是正確的。正因此，一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都主張並堅持以農業合作的或集體的大生產去代替個體農民的小生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分散的生產率低的小農經濟過渡到高度生產率的社會主義經濟。但在改造落後的農業經濟上，與這個大生產優越的「經濟原則」緊相聯系而絕不可分離的，還有一個「政治原則」，即農民參加大生產或集體生產的「自願原則」。如果將後一原則與前一原則割裂開來，只抓住前者而忽略或拋棄後者，那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不但無益，而且必然造成損害乃至災禍的。

因為事情很明顯，至少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很明顯，農民與工人階級是本質上不同的，他是從前資本主義來的一個過渡階層。這個階層，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不斷地分化，其中一部份逐步降為僱農或農業工人，農村的無產者；另一部分（少數）則上升為大農或富農，農村的資產者。絕大多數則停留為小農或中農，但他們本身是充滿矛盾的。即一方面是勞動者，另一方面則是財產私有者。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曾經指出：「小農是勞動者，他與現代無產階級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還保有他自己的工具；因而他是過去生產方式的殘存者。」（英文本馬恩選集二卷三八三頁）

恩格斯在這同一文章中精細地分析了小農在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壓力下日趨衰落後，得出結論說：「生產資料的公有便這樣被

提出作為奮鬥的唯一原則目標。不僅在工業方面（這裏已經準備好了基礎），而且一般地在農業上也是如此。」（同上書三八七頁）

恩格斯雖然從經濟學的觀點上指出大生產的優越性，堅持農業方面的生產資料的共有制，但同時却宣稱：

「這對於我們是明顯的，當我們掌握政權時，我們絕不會想到以武力去剝奪小農（不管有無賠償），像我們必須對付大地主那樣。我們對小農的任務，首先在把他們的私有經營和私人所有引到合作的經營，不是憑藉暴力，而是靠作出模範例子，以及為此目的而予以社會的援助。」（同上三九三頁）

「當然，我們是堅定地站在小農方面的，我們將盡可能地作到使他的命運更好受些。假如他決定參加合作社，我們要促成他的轉變。假如他自己還不能做出這個決定，我們甚至要盡可能讓他保留他的小塊土地，給他以充分的時間去徹底考慮。」（同上三九四頁）

恩格斯便是這樣地將「經濟學的原則」與農民的「自願原則」辯證地結合起來，他將農業集體化的大生產原則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配合起來，以此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對農業改造和工農聯盟的戰略方針。自這時起，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個方針作為行動的指導的。因此，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中取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府後，在農業改造方面，即完全遵循了恩格斯這一方針。例如列寧在他的「農業公社和農業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演說」中說：

「大家當然都從蘇維埃政權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及一切力求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

爲共耕農業或勞動組合農業，並逐漸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組織。我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早已撥出十萬萬盧布基金來幫助創辦這個事業。在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條例上特別指出了公社、勞動組合及一切共耕企業的意義；蘇維埃也就用全力使這個法令不致成爲一紙空文，而能收到它所應收到的成效。所有這種企業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因爲貧困不堪的農民經濟如果仍舊不變，那末任何堅固地建立社會主義的事業就無從談起。」

列寧在上面這一段話裏強調「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爲共耕農業」方針的重大意義後，對怎樣實現這一種方針則立即作如下的說明：

「掌握國家的工人階級，只有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公共的、集體的、共耕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的優越時，才能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萬的農民群眾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的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那一種促進共耕制、勞動組合制農業的意義，都不可過份誇大。我國有千百萬分散於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要想用某種急速辦法、某種命令從外面、從旁邊去加以改造，那都是完全荒謬的思想。我們明白懂得，要影响千百萬小農經濟，只能採取逐漸的謹慎的辦法，只能用實際模範例子來表明。因爲農民非常講求實際，與舊式農業方法聯結得非常堅固，要使他們作某種嚴重的改變，單靠忠告和書本知識是不行的。這樣辦，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謬。只有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身經驗來證明了必須而且可能過渡到共耕的和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裏，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經有了重大的進步。」

(列寧選集第二卷六五〇至六五一頁，重點係我所加)

列寧在上面這段話裏異常清楚指出：要證明「公社的、集體的、合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方法的優越性」，絕不可以「採用強迫的命令」，「只能用實際的模範例子」，才能把千百萬的群眾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而且這種政策不只限於落後的俄國，即在某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應如此。所以他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所起草的「關於土地問題提綱初稿」中寫道：

「在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政權決不應該立刻完全取消私有制。並且無論如何都要使小農和中農不僅保留他們的土地，且要把這些土地的面積擴大到他們租來的面積（廢除地租），這種辦法與無情地去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結合起來，就可以完全保證中立政策的成功。無產階級政權只有在極端謹慎、按步就班、藉實例之助、不對中農施用任何強力的條件之下，才能施行過渡到集體農業的步驟。」

(同上七八三頁，重點我所加)

對於「農民自願的原則」，即反對採取強力迫使農民參加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列寧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更是特別強調，並說得更詳細而具體：

「我們首先所應依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迫方法其實是什麼也作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完全以另一個方式擺著的。……在這裏採取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長期的教育工作。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上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證明『康姆尼』(COMMUNE)是最好的東西。」

(同上書五五六頁，重點字原文用黑體字)

「我們是鼓勵建立公社，但應把公社組織得盡善盡美，

以便爭取農民的信任。……誰在中農經濟上採取強迫手段，那他就是最愚昧不過的了。」（同上五五六頁，重點字原文用黑體字）

「既然必需求得自願同意，也就是說，要說服農民，要在實踐中說服農民。農民不會相信空話，而他們不相信空話，是做得很對的，要是他們一聽到宣讀法令和鼓動傳單就妄自相信，那倒不是好事情。假如可以這樣來改造經濟生活，那這種改造便一文不值了。」（同上五五七頁）

「我們應當和中農和平共處。只有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的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在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能夠拿出十萬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在目前這還是一個幻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爲了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迫他們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來自己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來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同上五五九頁）

正由於列寧在農業改造計劃中，在實行農業集體化中，堅決反對採用強制，堅持用模範的例子以說服農民，所以他認爲農業集體化或合作化，決不是短期內所能倉卒完成的。因而他在「論合作制」一文中說：

「但是爲要經過新經濟政策來做到使全體農民個個都參加合作社——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要花一二十年的功夫，才能通過這一歷史時代。但這終歸還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時代，如果不經過這一歷史時代，不做到人人都識字，沒有足夠的知識程度，沒有充分教

導居民去閱讀書報，以及沒有做到這一切的物質基礎，例如沒有做到防荒防飢等等的相當保障，——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同上一〇〇七頁)

在列寧看來，要使俄國從它的種種落後情況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包括農業合作化在內），便必須有一個條件，即全國「電氣化」，所以他說：

「如果我們能夠建成幾十個區域的電站，……如果我們能從這些電站中把電力傳導到每個村莊裏去，如果我們弄得到充分的電氣摩托及其他機器，那時就不需要，或者幾乎不需要由宗法制進到社會主義去的中間環節與過渡梯級。但我們知道，實現這『一個』條件，只是做到頭批工作，就至少要花費十年的功夫，至於縮短這個期限，也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在英、德、美這些國家獲得勝利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同上八六五頁)

我在前面不憚其煩地詳細引證列寧所重三再四地強調農業集體化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不僅因為所有斯大林黨的官僚違反了這個原則，就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也有不少人在中國人民公社「建立成功」的眩惑之下，忘記了或忽視了這一個原則。但這一「原則」不但在當時，在列寧本人所領導的蘇聯農業改造上，實際證明完全是正確的，即在往後的歷史事件中從反面證明它的正確性也是不可爭論的。

斯大林在列寧去世後的一個時期內，爲了與富農謀取妥協，在農民「發家致富」的口號之下，放棄了、至少拖延了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以致便利了富農勢力的生長，引起了嚴重的糧食恐慌。隨後，從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富農勢力日益生長的威脅之下，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完全不顧農民群眾的志願，以

行政命令強迫農民於二十四小時內全體參加集體農莊。迄至碰到富農分子及大部分中農反抗時，他甚至動員紅軍和格柏烏去鎮壓，乃至消滅他們。由此種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暴行所造成的空前悲劇是我們所熟悉的。這種悲慘的事實證明：恩格斯所堅持，列寧所再三強調的農業集體化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是如何地頑強有力，一旦違反它便災禍隨來了！

戰後東歐各國，在斯大林官僚命令之下強迫農民參加集體農莊的新鮮經驗同樣證明，違反農民自願的原則而進行集體化，不但招致了農民的不滿，而且造成農業生產的停滯，甚至後退，因而不斷地發生糧食恐慌，以致迫使狄托和哥穆爾卡不得不向農民作某些讓步，調整集體化，以緩和其危機。

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鬥爭中，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也曾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他完全繼承了恩格斯和列寧關於農業集體化和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所以當斯大林向富農妥協而拖延農業集體化時，他領導的左派反對派曾提出並堅持了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一九二六年）。但當斯大林完全不顧農民的意志而以暴力強迫集體化時，他又無情攻擊了斯大林，斥之為製造災禍的冒險主義。最後，他把恩格斯和列寧對於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及其在俄國實踐的經驗，特別是斯大林強迫集體化的悲慘經驗和教訓，總結起來寫在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裏，當作工農聯盟的戰略方針：

「制定土地國有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爲了在農民眼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底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

是爲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爲着官僚的利益。」

現在讓我們來看中國人民公社這種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生產，這種最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是否出於農民群眾的自願，或如中共所宣稱「獲得農民群眾熱烈贊助的」？關於這點，贊成公社化的蘇達同志自己作了如下的判斷：

「整個公社運動……帶有很大強迫性。

「中共在口頭上是同意自願的原則的，但在實際行動中並沒有遵守這個原則。……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開始試辦，八月才開始發表有關的資料，此後不到兩個月就將全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農村人口組織在公社裏面了——在這短促的時間裏既不能以增加生產和改善群眾生活的事實證明公社的優越性（只靠理論的證明），也沒給群眾充分的時間去討論成立公社和怎樣訂立公社的制度。……在急躁的『躍進』中，群眾根本沒有機會去充分考慮和討論這些問題，一切都是由簡單的命令決定的。」

實際上，中共不僅在農民改造的基本立場上完全繼承了斯大林主義的傳統，甚至在實行此種改造的步驟上也是斯大林式的。當它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一個時期內，爲了與地主和富農妥協，不但沒有宣佈土地國有，進行任何的農業集體化的措施，甚至連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這一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再三拖延執行的。迄至在朝鮮戰爭過程中，遭到地主富農夥同資產階級的反抗後，才不得不解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問題。但對於農業集體化的方針，還是遲疑不定的。迄到一九五五年末，中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如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一樣）突然宣佈農業集體化的命令，不到一年便把全國農民圈進農業生產合作社去了。

但此種不顧農民志願的強迫集體化，自然要引起農民的反感和憤怒。所以一九五七年中國農村中便產生了普遍的不安，種種反抗，混亂，甚至暴動，乃至某些合作社自行解體，或農民自行脫離合作社的現象。中共在這種尷尬的局勢之下，除了用反右派的名義鎮壓農民群眾的不滿和反抗外，便是提出「大躍進」的口號，強迫農民加倍勞動，增加生產，企圖以此轉移他們的反抗情緒。而人民公社運動，不過是繼續「大躍進」的方針加以登峰造極的發展而已。

從前面所敘述中共對農民問題，即土地改革問題的矛盾，在農業改造演化過程中所表現的時而極右、時而極左這一曲線看來，便可以充分判斷它完全違反了恩格斯和列寧對農民問題，對農業改造的原則和工農聯盟的基本戰略方針了。因而我們可以說，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的農業生產合作運動及一九五八年的實施公社化，「不是爲着農民或工人的利益，而是爲了官僚的利益」。

不錯，蘇達同志是承認農民在集體化中的自願參加的原則的，例如他說：

「公社固然有很大的優越性，但它同時意味着生產關係和生活習慣的巨大改變，因此必須經過試驗，經過實例的證明，才能取得群眾的充分了解和衷心擁護，在群眾沒有充分了解和衷心擁護的時候就急燥地採用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就會引起群眾的反抗。而且不經過謹慎的設計和試驗，所建立起來的新制度一定充滿缺點，給群眾帶來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和不便，因而增加了群眾的懷疑和反抗。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農業社會化過程中要堅持自願原則的理由。」

假如蘇達同志自己真是「在農業社會化過程中堅持自願原則」假如他前面指出的「急燥地採用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又是

事實，那麼，他之一般地贊成公社化運動，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放棄了他所「堅持的自願原則」了！

他爲什麼在這個有關工農聯盟的基本問題上，有關五億農民的實際生活的如此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如此的矛盾，乃至放棄其「原則」呢？事情很明顯的，他是在「農業生產的優越性」這一原則的片面固執之下，在「公社有很大的優越性」的眩惑之下，因而不自覺地忽視了或輕估了「急躁地採取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的危險性，及其可能做成的惡果，因而不夠了解或忽視了「自願原則」「在農業社會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他沒有深刻地領悟到列寧所說的「我們所應首先依據的真理，就是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以及「再沒有比在中農經濟關係中施行強制的觀念更愚蠢的了」等等的嚴肅指示。同時他又忘記了或忽視了斯大林強迫農業集體化的痛苦教訓，以及近十年來東歐各國強迫集體化的新鮮經驗。假如蘇達同志把列寧的指示和斯大林在蘇聯及斯大林派官僚在東歐各國所強迫施行的集體化的經驗和教訓再加以認真而仔細的思索，我相信他一定會得出如下的結論的：

「農業大生產是比小生產優越的」，「公社固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沒有經過試驗，沒有經過實例的證明」，「在群眾中沒有充分的了解和擁護的時候，就急躁地採用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這是極大的冒險主義。這種「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因而這種公社的「施行，並不是爲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爲着官僚的利益」。

而且，讓我們把「農民自願的原則」暫時放在一邊，即以「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這一原則的本身來說，也不是萬能的。正

如蘇達同志自己所說：「大生產的優越性是有限度的，就是說，根據生產技術的水平，農業面積之有利的擴大是有限度的，過分擴大反而變成不利，……」尤其是中國農業技術水平是如此的低，不但絕少現代農業機械，甚至異常缺乏獸力。絕大部分的耕種還是依靠原始的人力來進行的。另一方面，每一公社擴大到如此巨大的規模，以致每社的平均面積達六萬畝，擁有五千農戶，而且其中許多大公社甚至佔有耕地十多萬畝至幾十萬畝，包括農戶二到三萬以上（見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報新華社的報導），這便更顯得耕地面積的異常擴大和農業生產技術極低的水平之間的驚人的矛盾了。要克服此種矛盾，除了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之外，絕不能有其他的辦法。但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又絕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的。

所以列寧雖然十分重視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堅持實施集體化的方針；但同時除了強調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之外，又特別指出集體化必須逐步地實現，必須與機械化和電氣化配合起來進行。因此他說：「爲要……使全體農民個個參加合作社——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要一二十年的功夫，才能通過這一歷史時代。」

像中共，在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如此低的情況下，在沒有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條件之下，竟強迫全體農民於極短時間內參加集體農莊（一九五六年生產合作社），參加大規模的公社，即是說，它把需要「整個歷史時代才能達成的任務」在短短的幾個月之間完成——像這樣急躁的「大躍進」，除引起「農民的痛苦和不便」外（如蘇達同志所承認的），即從純粹的生產觀點看來也是不利的。因爲農業生產率的真正提高，只能依靠現代農業技術的普遍採用（如拖拉機、化學肥料、電氣化及農藥等），單靠增加勞

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和勞動組織的嚴密化（軍事化），至多只能增加生產於一時，而絕不能以此改變農業生產技術落後的實質的。因此，公社化後的農業生產率究竟能否提高及提高的程度怎樣，還要看往後的事實來證明（關於這點，我在下面將予以較詳細的說明）。

贊成或擁護公社的另一論據，是大規模的公社便於建立大規模的水利或公共工程（灌溉、疏濬河流、建立蓄水庫、預防洪水等）。蘇達同志甚至說：「這次併大社運動（公社化運動）是在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中感到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爲要建立大規模的水利或公共工程便必須建立公社，這種說法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即在事實上也是不實際的。

關於水利建設問題，讓我們先看蘇達同志自己的報導：「在一九五二年的時候，全中國耕地中有水利灌溉設備的不到百分之二十，現在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在一九五五年冬至五六年春的高級合作社化的高潮和一九五七年冬至五八年春這兩段期間內興修的。」這便表明：耕地的水利灌溉早在公社化前，即在生產合作化的高潮中至一九五八年春，已興修了百分之三十，公社化後所興修的至多不過百分之五而已。並且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向「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會的工作報告」中說：「在農業方面，最突出的躍進是合作社農民興修水利的運動。在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五八年四月），全國灌溉擴大的面積達三億五千萬畝，比解放八年內增加灌溉的總面積還多八千萬畝。……」這些事實便無可爭論地證明：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公社，在原來的合作社的範圍內仍舊可以興修大規模的水利；這同時也駁斥了只有建立大規模的公社才能建設大規模的水利——這一點論據是站不穩的。

事實上，要建設大規模的水利，如建立大規模的蓄水庫、水閘、疏濬河流、開鑿運河、特別是防禦像黃河和長江、珠江等那樣巨大河流的洪水，不但公社的規模（不管如何鉅大）還不能勝任，甚至一個省份的力量尚嫌不夠。這必需藉國家的力量才有可能，這是簡單的常識。因為建設大規模的蓄水庫、水閘（如現在正在建設中的黃河大水閘）和疏濬河道或開闢運河等，不但需要巨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還要大規模的機械設備和高度的工業技術。過去淮河的修治及某些大規模的蓄水庫和水閘，如北京附近的十三陵水閘之類，正是在國家力量的支持之下完成的。

總而言之，把農業大生產或大規模集體化的優越性從農民群眾自願參加的原則割裂開來，單以前者為論據去擁護公社化運動，是完全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農民問題，對農業改造的基本立場的，就是以建設大規模的水利和公共工程來替公社辯護，也是不合事實的，因而是荒謬的。

所謂「農業大增產」和 「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

在支持和讚揚人民公社的「有利」中，除了「大規模農業生產的優越性」外，「農業大增產」和「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這兩個論據算是最為有力的了。例如梁同志在他「評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批評中強調說：「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形式，其進步性質，已由生產力的巨大提高以及摧毀過時的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得到證明。」而這些論據並被寫進全委留洛杉磯委員所提的決議草案「中國人民公社」之中，構成該文件贊成公社的主要內容，它關於公社的「農業大增產」作如下描述：

「公社的經濟優越性，已有事實證明。一九五八年棉花、早稻爲一九五七年的一倍，麥增加百分之六十，新水利工程達六千九百萬畝灌溉面積，……上述成就皆由於公社新生產形式的好處所造成的。……」

該文件並且強調說：「對於歷史唯物主義者來說，經濟的里程碑就是進步的基本尺度」。是的：「對於歷史唯物主義者來說，經濟的里程碑就是進步的基本尺度」——但不幸的是，它在這裏所舉出的農業大增產的數字是與公社毫無關係，或極少關係的。

因爲公社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即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決議」公布之後）才開始在全國各地普遍建立的。但小麥已在六月中完成其收穫。就是早稻也在七月至八月間收穫了。即以棉花而說，它的種植是在夏天，等到公社普遍建立時，它已完全成熟了，公社不過將以前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種好的棉花加以採收而已。我很驚奇，「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連中國早稻、小麥和棉花收穫時間都弄不清楚，竟如此錯亂地把以前農業合作社的成果掛在公社的帳上！單憑這一點，就夠表明這文件的作者是如何的輕率了！

說到「新水利工程達六千九百萬畝灌溉面積」也是與事實不符的。關於這點，我在前面根據蘇達同志的報導已經指出過：中共在一九五三至五八年春之間所建立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耕地灌溉，其中百分之三十是遠在公社化之前完成的，把公社化之前所完成的「水利」當作公社本身的「成就」，是同樣令人驚奇的。

而且人們必須懂得，一九五八年中國農業生產的巨大增加，不但不是公社的成就，而且也不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本身所造就的「奇蹟」（在缺乏農業機械、電力供應、化學肥料及農藥等條件之下，是不能造成甚麼奇蹟的。）而是中共不顧一切地鞭策農民

「苦戰」，盡量增加他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結果。

自一九五七年冬季起，特別從一九五八年五月初中共在它的「第八屆全國第二次會議」上決定工農業大躍進的總路綫後，農民在「大躍進」口號的驅使之下，晝夜勞動，工作十二小時、十五小時、乃至十八小時，拼命挖深土地、興修水利、積肥、運肥、灌水、開闢新耕地等等——在這一切異常緊張的勞動下，才大大地增加了農業的生產。關於這點，擁護公社的蘇達同志也不得不承認：農業「增產有很大的成分是由於農民極度緊張的勞動（不分男女老幼，晝夜苦戰）所造成的」（論人民公社十五頁）。但這絕不是正常的農業發展。因為不但時間太長和太緊張的勞動是絕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即像那樣原始的收集肥料和開闢新耕地也是有限的 * 。

如果依照正常的耕種，在沒有機械化、電氣化和化學肥料普遍使用及獲得農民自願合作之時，即令土地改革了，農業集體化了，農業生產還是緩慢的。這從中國本身的經驗亦可證明。據周恩來本年四月十八日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國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八。其中工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農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姑且承認周的報告是符合事實的（實際上，中共官方報告總是誇大的，尤其是去年糧食增產一倍的報告，值得懷疑。因為今年糧

* 農民所收集的肥料，大部分是從陰溝和池塘裏挖出污泥，或從拆除舊屋的土牆等等。這有如土高爐搜集廢鐵一樣，是有限的。而開闢新耕地，多半是屋前屋後的空地，或河邊林間的閒地等等，同樣也是有限的。

食大恐慌便是相反的證據）。這裏表示出：工業生產率的增長，平均每年增百分之二十八，而農業生產率的增加每年平均僅百分之五。這就無可爭論地證明一九五八年以前五年間的農業在較為正常狀態發展下的緩慢性，同時也就表明一九五八年農業的巨大增加（據周的另一報告，一九五八年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不是正常的，而是異常地增加農民勞動強度的結果。

但僅僅鞭策農民拼命勞動，瘋狂地增加他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來提高生產率，增加生產，不但絕不能依照一九五八年的增產標準繼續增加（據一九五九年的農業生產指標，比一九五八年的要增加百分之四十），而且不可免地要招致相反的效果。這從公社化以來所表現的事實已逐步證明。公社化後，雖然農民被迫繼續「鼓足幹勁」，增加勞動強度，並且絕大部份婦女被投進與男子同等的勞動強度工作中。但此種完全不顧農民健康的過度緊張勞動，很快就在農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感和憤恨。以致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去年十二月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規定「睡覺八小時，休息和吃飯四小時。」即工作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事實上還是常常超過十二小時的）。

即以十二小時的工作來說，還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因為中國農業方面的工作，由於缺乏機械和畜力，差不多一切工作都得使用體力。農民用簡單的鋤頭掘土，彎着腰插秧或撒種子，用肩挑肥料和穀物，及以腳車水灌田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十分吃力的，他們簡直同負重的畜牲一樣，每天要做十二小時，如此不斷地做下去，就是牛馬也不能忍受的 * 。假如如此這樣地繼續緊張勞動下去，農民不僅愈來愈不滿，而且也不可免地要走到公開的反抗道路上去的，首先就是普遍的怠工。這反過來，必然

要降低生產率，損壞農作物，減少生產。關於這方面，已有不少事實表現出來，迫使中共官方不得不加以承認。例如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他的「虎門公社調查報告」中說：離工浪費以及有些群眾勞動積極性不高的現象是存在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群眾勞動積極性不高的現象」即群眾不能忍受過度勞動而發生反感，因而消極怠工抵抗，不僅虎門公社如此，這已成爲所有公社，至少絕大多數公社的普遍現象。因此，人民日報近半年多來常常指責某些公社的社員「出勤率和勞動效率太低」，號召建立「生產責任制」（所謂「包產定額」）和「必須的懲罰制」等等。

所謂生產責任制，即各生產隊必須負責完成一定的生產指標；所謂必須的懲罰制，即出勤不積極或曠工的，則必須給以懲罰（如陶鑄所提出的，曠工一日，即扣兩日工資）。但這種愈來愈嚴厲的強迫勞動制度和懲罰制度，不但不能提高生產，而且將更進一步引起農民群眾的消極抵抗與怠工。這種怠工現象早在去年公社剛成立時的秋收中已表現了它的嚴重性，致使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本年四月的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上不得不承認：「去年的豐產並沒有豐收」。即是說，去年秋收中，因爲農民的怠

* 「中國人民公社」草案裏說：「正如一切強制推行的事一樣，困難是免不了的！」，這種話，如果被中國農民聽到，即使不說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在爲中共官方辯護，也一定指責他們太不懂得中國農民過分勞動的情形，太忽視了他們在「苦戰」中，在每日十二小時，有時是更多時間的強度勞動中所受到的無可忍受的痛苦，遭到難以形容的健康損害了。

工，致使收穫遭受了很大的浪費和損失。據人民日報不久以前透露，這種因怠工發生的損失現象，在本年夏天的收穫中也同樣表現了出來。

正由於強迫的過度的勞動所產生的農民消極抵抗，已迫使中共官方不得不進一步承認：「要高產，……只靠人力、靠畜力是辦不到的，只靠農家的肥料是不行的。要這樣做，必須有拖拉機等機械設備，有大量的化學肥料，有效率高的農藥和近代化治蟲設備。目前中國還沒有具備上述的這些設備。因此，農業生產的生產量是很不穩定的，這一年可能豐收，下一年就不能豐收，甚至歉收。……今年有的地方有些人民公社的夏收作物單位提高得不少，……但因為播種的面積比去年減少較多，結果，總產量增加不多，或者沒有增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的人民日報）

看了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去年的「農業大增產」並不是公社化的「成就」；又看了中共官方自己的供詞：在缺乏現代農業設備之下，「只靠人力」（即只靠增加農民的勞動強度）「農業生產的生產量是很不穩定的」。今年的農業「總產量增加不多，或者沒有增加。」試問：「中國人民公社」的作者對此作何感想呢？

對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尤其是對人民公社這種最大規模的而未經過考驗的形式，不但絕不應將它成立以前的生產增加作為它本身的成就，而且必須冷靜地深入地分析此種形式（公社）所包含的增產可能性及其矛盾，然後才作出結論或判斷。只有這樣，人們所作出的結論或判斷，才能經得起批評，經得起事變的考驗。也只有這樣，才算是歷史唯物論者處理重大問題的嚴肅態度。否則，所謂「經濟的里程碑」不過是一種諷刺而已。

「中國人民公社」這個草案又寫道：「這種合作化的好處是……使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這句話並含有下面的兩種說明：一，「公社已剷除了過時的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的硬殼」；二，「它們已加速婦女從家務勞役中解放出來，開啓文化發展的新道路，使城鄉之間長年累月所造成的文化差別日漸減少。」前一種解釋顯然是婦女從宗法的或封建的家庭關係束縛中解脫出來而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後一種解釋則是指她們從「家庭奴役」中解放出來，踏上「文化發展的新道路」。

中國婦女從宗法的或封建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獲得平等，尤其從家務奴役解放出來走上「新的文化大道」，無疑地是具有重大的、甚至劃時代的意義。但問題在於公社是否真正替婦女完成了這類的「解放」。

首先，讓我們從事實上來檢討這類的解放吧。中國婦女，在第三次革命以前，曾被法律承認過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如遺產繼承權、教育平等權、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及婚姻自由等。當然，這種法律上的平等離開實際上的平等還很遠，尤其是在農村方面。但不可否認，中國婦女在那時已從宗法的束縛中獲得了初步的解放，正由於有這初步的解放，才有大批的婦女參加了革命的活動。中共取得政權後，更進一步用法律確定婦女和男子的平等權利，如同工同酬、結婚與離婚的完全自由等。而且因為種種新的社會運動，如土地改革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等，中國婦女，尤其是深受宗法傳統束縛的農村婦女，確已打破了宗法制度的傳統習慣，而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這是中共掌權後給予婦女解放的一個重大貢獻。正如「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成果」那個草案所描寫的：「在家庭中摧毀了亞洲式的父權關係，並掃除了封建的

廢物。」但這是遠在公社成立前幾年所完成的事實，與公社沒有任何關係。「中國人民公社」的作者把這種「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當作公社的成就來加以贊揚，這與他把公社化以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業生產的大增加」（如早稻和麥子等）歸功於公社，是同樣弄錯了時間，顛倒了事實。

至於「婦女從家務奴役中解放出來」確是公社化帶來的一種新現象。因為公社已普遍地建立了公社食堂和幼兒園等，使婦女得以擺脫家務而從事社會生產勞動。但這是否等於將婦女真正從家務勞役解放出來而合理地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呢？要認真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從下面兩個條件來決定：一，公社的公共食堂與幼兒園是否比家裏飯食和育兒更好，或至少一樣；二，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是否比之家務奴役更好，對她們的身體和精神更有益些。

毫無疑義，婦女的真正解放或徹底解放，只有從家務奴役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因此，我們共產主義者都主張普遍地設立公共食堂和幼兒園，以為婦女徹底解放的先決條件。但要普遍地設立公共食堂和幼兒園，只有在高度發展的物質和文明條件下才是可思議的，這樣的「條件」不但現時的中國農村根本談不上，即先進的西歐各國也還沒有具備哩。

中共在物質和文化（寧可說沒有文化）如此可憐低下的農村裏，竟不顧一切地強迫實行公共食堂和幼兒園的集體生活來代替家庭生活，絕對不可避免地要給農民群眾帶來無數的不便和痛苦。關於這一點，擁護公社並贊成建立公共食堂和幼兒園代替家務，以此「將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讓她們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蘇達同志，不得不根據無可否認的事實，對公社的公共食堂作了如下的暴露：

「正如整個公社化運動一樣，這個躍進（指建立公共食堂來解放婦女——本文作者）太兇猛了，帶有很大強迫性質，而且有不少過火的胡作胡為的事情。例如，一下子叫人人都去公共食堂吃飯，把私人的爐灶都拆毀或集中起來，糧食柴火都不配給私人。可是，食堂的飯壞極了，而且吃不飽，有飯沒有熱水供應，老幼病人沒有特別照顧；名爲公共食堂其實沒有飯廳，要露天吃飯，或者冒風雨各自打飯回家去吃，……更糟的是，原來社幹部都有自己的小食堂！」（論人民公社一〇頁）

在上面這段話裏，蘇達同志還只是給了公共食堂一個素描，並沒有深入地去分析公共食堂的許多嚴重弊端和矛盾。然而這已夠證明公共食堂是如何地令人難於忍受了！我可以斷言，除了極少數的常陷於飢餓中的農民以外，絕大多數的農民群衆對於公共食堂是極爲反感，至少是極感不便的。

幼兒所的情形，不會比公共食堂好得多少。因爲許多孩子們擠在狹小的房子裏，沒有任何有關於養育孩子的設備，照顧他們的又多是毫無知識，甚至沒有任何衛生常識的失去勞動工作能力的老婦人。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麼能把孩子養育得令人滿意呢？所以那些母親們都是「身在田裏心在家」（即掛念着她們的孩子）！

婦女從家庭奴役解放出來，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實際情形又怎樣呢？支持這種「婦女解放」的蘇達同志也給了我們如下的描述和解釋：

「婦女參加生產後被要求在體力負擔上和男子『平等』起來，登山下水，晝夜苦戰，經期產後照常勞動，……幾千年的習慣和成見，本來不能一下子完全打破，群衆的覺悟程

度是參差不齊的，再加上新制度施行過程中的這些毛病，群眾中的懷疑和不滿，當然不少。六中全會之後，這些毛病被列為整頓公社的檢查對象。然而只有在公社和整個國家裏都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這些毛病才能徹底解決。」

（論人民公社一〇頁）

根據蘇達同志前面的描述和解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公社和整個國家裏」沒有「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之時，婦女雖從家庭解放出來參加了生產勞動，但她們從這種勞動中所受的痛苦（蘇達同志稱之為「毛病」）是不能「徹底解決的」。這裏的問題便還原到「公社和整個國家」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

單從蘇達同志的證詞中便已夠解答我在前面所提出的問題：一，「公共食堂的飯壞極了，而且也吃不飽，……」這就證明它比起家庭的飯來更不如了。幼兒所同公共食堂一樣，比之家裏壞得多；二，「婦女參加生產後被要求在體力負擔上和男子『平等』起來，晝夜苦戰，」當然比之家務奴役更為沉重，更有害於她們的身心。這便是中共強迫實施「集體化生活來代替家庭生活」的邏輯結果。因為中共這一政策的主要目標不是為了徹底解放婦女，而只是因為在實行農業生產的大躍進中感到勞動力的異常缺乏，於是它異想天開，用如此這般的「集體生活」，把全體農村的婦女一下子從家庭中拖出來，放進它所迫切需要的勞動隊伍中，放在同男子一樣強度勞動的行列中——這不過是從家務奴役拖出來放進「社會奴役」（公社的奴役）而已。

在這裏，我應重說一遍：要使全體人民，特別要使全體農村人口參加公共食堂，要使全體幼兒加入幼兒所，要使全體婦女從家務中解脫出來與男子一樣參加一切社會生產活動，這只有在社

會主義高度發展的條件下，首先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勝利為條件之下，才是可想像的。

即是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情形下，甚至在先進國家具有高度的特質和文化條件下，還不能採取強迫方式叫全體人民一下子加入公共食堂，全體孩子加入幼兒所。這樣做將是極愚蠢而荒謬的行為。首先應當多設立模範的公共食堂和幼兒所，辦得盡善盡美，讓人民感到公共食堂的飯食和幼兒所的育兒確比家庭更好，因而自願地去參加。那時，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才能名符其實地實現出來。

人們必須懂得，幾千年來遺留下來的家庭制度的完全打破，婦女完全擺脫家務和男子一樣參加一切社會活動，這不僅是婦女徹底解放或最後解放的標誌，而且是全人類踏上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理想社會的標誌。這絕對不是短期間所能達到的。即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勝利後，也還得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逐步地實現出來。「家庭」既然是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中逐漸地形成起來的，它也只能隨着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而逐漸地衰亡下去。

像中共和中國農村的物質和文化如此貧乏和低下的條件下，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的客觀形勢下，事前又沒有任何計劃和準備，竟於短短幾個月中，以無比的魯莽和專橫強迫全體農民一下子拋棄他們的家庭生活來參加「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這除了給公社，給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以極大的諷刺外，不可避免地要在農民群眾中引起對公社，對社會主義的懷疑與敵視，引起他們對城市無產階級的不信任與怨恨（因為後者並沒有實行公社化），因而大大地損壞了工農的聯盟。

此外，我還可以預言，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幼兒所是絕難繼續

維持下去的，在不遠的將來將被迫地大大改組，乃至大部分解散，從「集體生活」重新恢復到「家庭生活」，這樣便等於公社的完全破產。如果中共完全不顧農民的志願和反對，硬要這種公共食堂和幼兒所所代表的集體生活維持下去，以此證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公社政策的完全正確」，則公共食堂和幼兒所所代表的集體生活將成爲公社內最具爆炸性的爆炸物，與不能坦負的強迫勞動配合起來，終有一天要爆炸開來，而招致難以估計的災禍的。

公社是「自願的農民合作」並「由公社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命令管理的」嗎？

梁同志在他批評「中國人民公社草案」中寫道：

「在草案第七頁……我們支持公社，不是根據它們的進步性，而是依靠農民願意接受它們。但『農民願意接受它們』，這種『願意』怎樣並由誰來決定呢？我們可以回憶：我們曾以極大的堅持性支持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不管農民的抵抗。我們所反對的是斯大林政權強迫農民的那種粗暴和兇殘。在中國公社的場合裏，並沒有證據表明北京政府是採用大量的強迫，但有頗多的證據表明是自願的農民合作。

「事實是，公社是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的命令管理的。」（重點是本文作者所加）

梁同志在上面引文內所表示的意見，完全爲「中國的公社」的草案（洛城全國委員會委員所提出的）所採用，並爲史渥培所特別支持和辯護（見「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第五頁）。同時，這也是他們支持和美化公社的中心意見，因而特別值得加以檢討。

首先我應指出，梁同志肯定公社是「自願的農民合作」及「由公社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的命令管理的」，却沒有舉出任何「證據」，且不說「頗多的證據」和「事變」，單憑這點就夠表明他的判斷是缺乏根據的了。

我在前面已經引述蘇達同志關於這方面的證詞：「公社化運動帶有很大的強迫性，……群眾根本沒有機會充分討論這些問題，一切都是由簡單的命令來決定」。以及蘇達同志居住接近大陸，能從中文閱讀官方一切報刊和文件，並從英文參考外國記者對公社情形的報告，且經常得與大陸往來的人們接觸，再加上他根本是擁護公社的——所有這些條件配合起來，他的證詞應當是最可信的了，至少比之遠離中國，不能直接閱讀中文報刊，僅靠某些外國新聞記者的報導作根據的梁和史的判斷要可靠得多。現在姑且將蘇達同志的證詞放在一邊，讓我們從理論上和事實上來進一步加以檢討吧。

一、公社所包含的農民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達五億人。像如此廣大的農民群眾，竟能於短短三個月間「自願地」或不被強迫地參加公社，而且是加入「生活完全集體化的」，即全體婦女放棄家務，同男子一同工作，並到公共食堂去吃飯的公社，這是可能想像的事嗎？

如我在前面詳細地指出過的：列寧曾經重覆地強調地告訴我們，農民是保守的，實際的，「他們不相信空話」，「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公社是最好的東西。」因此，要「做到使全體農民個個都加入合作社——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要十年二十年的工夫，才能通過這一歷史時代。」而中共既沒有在事前向農民群眾「做出最具

體的例子來證明公社是最好的東西」，竟在短短幾個月間「不用強迫」能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農民參加公社，即把「在最好的情況下，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歷史時代」所能完成的任務，於短短幾個月內便完成！假如這真是事實，那麼，不僅列寧對農民問題的全部理論和戰略都被推翻，而且蘇聯近四十餘年及東歐各國十餘年來關於農業合作化或集體化的全部經驗也變得毫無意義了！！從這裏得出的唯一結論只能是：中國農民與全世界的農民完全不同，不是「實際主義者」，不是「務實的人」。他們是天生的共產主義者，或集體化的選民，不需要任何強迫，一聽到農業集體化的號召，一聽到建立公社的號召，便毫不猶疑的，自願地加入它們了！！請梁和史思索一下這個結論的可能性吧！

二、中國農民果真是「天生的共產主義者」，「集體化的選民」嗎？讓我們從官方刊物的報導中摘引幾段關於這方面的事實來看看吧：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報告杭州郊區建立公社過程的情形說：「貧農和中農考慮的問題，是害怕分配難合理，擔心搞不好生產。上中農思想普遍動搖，害怕社大人多搞不好。」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報告四川省農民對公社的表示：「辛辛苦苦鬧騰了兩三年，好容易積累一些錢，眼看歸公社實在心痛。」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廣州南方日報報告中共廣東合浦縣委第一書記李潤華，合浦縣合作社部長何文里的報告中指出：「農村中的上中農，包括黨員和上中農出身的低級幹部，資本主義思想行為很突出，他們對辦人民公社是抵觸的，反對的，少數人還表現了生產工作消極，暗中大吃大喝，疏散

家存糧食，挖取自留地青苗和宰殺家禽家畜行爲。」

一九五八年北京出版的政治學習第十期指出：「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不少農民還想繼續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對於最後消滅私有制殘餘的公社不是表示歡迎，而是表示反對。甚至一部分黨員幹部也因為本位主義，反對消滅私有制殘餘。這樣，就使他們成爲人民公社的建立和鞏固的障礙。」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北京大公報透露：「河南省實行公社化後，對糧、棉、烟、麻等的收打、採摘、調運、入庫等方面，丟失現象極普遍。甚至有十數包棉花丟在大路上四五天無人過問。」

一九五八年紅旗十二期指出：「幹部當中對於人民公社來得如此快，如此大，如此公，思想準備也不是很快的。他們對於『共產主義能不能充分發揮勞動積極性』，也很擔心。群眾中的兩條路綫的思想鬥爭，同樣反映在幹部隊伍中，……部分鄉村幹部也產生嚴重的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有些社瞞產就是幹部帶頭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廣州出版的羊城晚報報導，粵省農民爲逃避公社化，最近已洶湧流入城市，中共當局認爲「這種現象，不僅使城市的戶口，社會治安增加了許多困難，而且影响公社的鞏固與農民生產情緒。」

上面這些消息是官方報紙不經意地或另有作用地透露出來的。當然，對於農民對公社的真實反應，既不詳細，更沒有系統，且有不少歪曲。但由此已足夠證明：中國農民並不是天生的共產主義者或集體主義的選民。他們同全世界的農民一樣，至少本質上一樣，不僅是「實際主義者」，而且具有「資本主義的思想行

爲」，害怕「消滅私有制殘餘」，因而對「公社不是表示歡迎，而是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的方式，一般是怠工，即「生產工作不積極」，「損壞農產物」，「宰殺家禽家畜」，「逃開農村」等等。而且這些思想和行爲還反映在中共的幹部中。

「生產工作消極」降低了農業生產率；「損壞農作物」致使「去年的豐產沒有得到豐收」（如副總理鄧子恢所公開承認的）。至於「宰殺家禽家畜」則引起了普遍的副食品慌，使得城市極難獲得肉類，甚至官方的人民日報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情形的嚴重性，大聲疾呼要求農民大量養家禽和豬等，以增加肉類，解決副食品的恐慌，但結果副食品恐慌還是繼續着。

說到這裏便發生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即：中國農民，至少一部分農民，對「公社」既「不是表示歡迎，而是反對的」，爲什麼中共不採取斯大林那種「粗暴和橫蠻的方法」，而能於短短幾個月間使得五億農民加入公社呢？要解答這個問題，須從幾方面來說：

一、農民中有一部分貧農，他們因人口多勞力少，在生產合作社按勞分配的制度下，他們的收入確不夠維持最低生活，致常常挨餓，當他們聽到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當然舉起雙手來贊成建立公社的。

二、中共經過它的幹部，在農民群衆中盡力宣揚公社的「好處」，例如「公社是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最好形式，而且還包含着共產主義的萌芽。它逐步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殘餘，……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可以從家務中解放出來。實行工資制度，實行的辦法是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直接發給勞動者個人……」並且說：公社「對公社的全體人員的吃飯、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喪等生活部分均

由公社供給」（見一九五八年的紅旗第八期所載《人民公社有那些好處》一文）在對公社這樣的美麗宣傳下，有不少農民，尤其是年青人，很容易接受它們，因而天真地甚至熱烈地贊成公社。

三、中共自一九五七年秋天起，在農村中進行了廣泛反右派「社會主義宣傳運動」。在「反右派」的名義之下，不僅打擊了富農分子，而且凡不滿意於中共集體政策的中農也遭到打擊。尤其是敢於公開批評中共政策的左派分子所受打擊更重（如調送邊區或勞動集中營改造）。農民群眾經過這次「反右派」的嚴厲教訓之後，當然對中共建立公社的命令不敢公然起來反對和攻擊了。

四、中共有一千二百萬以上的黨員，又加上二千萬以上共青團員。這些黨員和團員的大部分都安置在農村中，掌握了農村一切經濟、財政、政治、軍事和警察的權力。這是每個農民都看得清楚的。如要堅決起來反對中共建立公社的命令，必然要遭到極嚴重的打擊的。

前面這些情形配合起來，農民在利誘（實際是欺騙）和威脅之下，不管心裏願不願意，不得不接受中共公社化的命令。他們至多只能表示怠工，「對生產工作不積極」，「砍掉果樹」，「宰殺家禽家畜」，暗中損壞農產物或逃離鄉村……以洩其胸中憤恨而已，蘇達同志對這方面曾給了如下的說明：

「中共關於公社的政策，雖然是強迫執行，正如在其他許多問題上對待農民群眾一樣，主要非依靠暴力來實現，而是靠組織力量來實現。即使經過一種形式的討論，中共還能強迫農民接受它的政策的。群眾既缺乏獨立的組織，也缺乏足以與中共對抗的政治參謀部來把他們的意見明朗化和系統化，所以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熱誠常常被中共歪曲，而他們反

對中共的政策常常不能生效。」

「中共對公社的政策，雖然是強迫執行的」，「主要非靠暴力，而是靠群眾組織力量」。這種解釋是客觀的，正確的。但「依靠組織力量來強迫執行公社政策」雖與斯大林政權強迫農民的粗暴與兇殘不同，但仍然是「強迫」，這正如列寧所說的：「要想用某種急速辦法，某種命令，從外面，從旁邊去改造這些農場（在中國是建立公社——本文作者），那是完全荒謬的。」

而且人們必須懂得，在實行農業合作化及公社化中，中共沒有採取斯大林的那種「粗暴兇殘」的方法，這是由於前者已從後者用暴力進行合作化所造成的無比悲劇中學到了一些教訓，因而盡量避免採取那樣的方法。就是戰後東歐各國的集體化的實行，也是「主要非依靠暴力，而是依靠組織力量」的。人們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說：「並沒有證據表明東歐各國政府是採取大量的強迫」呢？

由前面理論上的分析和事實上的證明，中共領導層之實行公社化，不是出於廣大農民群眾的自願接受，而是由於強迫，應當是無可爭論的了。在這種事實的光照之下，完全繼承了恩格斯和列寧所堅持的農民自願參加集體化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怎麼能對中共這種強迫農民參加公社的政策予以支持和贊美呢？！

「中國公社的草案」說：「我們支持農村人民公社必須以農民自願接受它們來決定」。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不僅根據恩格斯和列寧對農民自願參加集體化的傳統立場，而且是忠實地遵守了我們的「過渡綱領」中關於農業集體化的綱領。

但梁同志竟公然敢對這個綱領挑戰（如他之抨擊農民自願接受公社的主張），單憑這一點，就夠表明他在公社問題上已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很遠了。而且他甚至公然宣稱：「我們以極大

的堅持性支持蘇聯的集體化，不管農民的抵抗」。我要問：他這裏所謂的「我們」究竟指的是誰？托洛茨基主義者嗎？絕對不。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斯大林強迫農民群眾，即不顧「農民群眾的抵抗」而實行集體化時，都一致站在托洛茨基一起，嚴厲地批評了和堅決地反對了斯大林的集體化政策的。這不但有托洛茨基本人在那時所寫的不少文章為憑，而且他後來在「過渡綱領」裏以如下的公式確定下來：「如要在農民眼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的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官僚的利益。」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在那時，那些「以極大的堅持性，不管農民的抵抗」，而擁護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的人，絕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而是各國斯大林黨徒。

不錯，梁同志之擁護公社，是根據它的「本質上的進步性」。在他看來，「農民抵抗」與否，與公社的「進步性」並無關係。換句話說，他為了擁護公社的「本質上的進步性」，是不管農民的「抵抗」的。但這正是根本修正了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實施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因為他們雖然十分重視「農業集體化本質上的進步性」，但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實行農業集體化時，他們却堅持主張必須看農民是否自願接受這樣的集體化來決定。關於這點，我在前面已經詳細地引證過了。假如梁和史兩同志要否認恩格斯和列寧所堅持的這個「農民自願接受」的原則，便必須公開地說出來。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未實行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場時，他是公開地表明：恩格斯對農民的「過分謹慎的政策」是不適合俄國的。

而且，假如梁和史兩同志要堅持他們的立場，便必須進一步公開提出修正我們的「過渡綱領」中關於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

化的綱領。因為我們的「過渡綱領」是如此毫不含糊地寫着：「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如依照梁同志等的主張，則我們的「綱領」中的「應……除掉」應該修改為「不應……除掉」。假如梁同志等是忠實於他們自己的思想邏輯的話，便應公開地提出這樣的「修正」。

× × ×

梁同志說：「事實是，公社是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的命令管理的。」這便等於說，公社的管理及其內部生活完全是民主主義的了。但「事實」究竟怎樣呢？那種「委員會」是怎樣「管理公社」呢？這是關於實現民主制的最基本的問題。但梁同志等顯然對這些基本問題不感興趣，一聽到公社有「選舉的委員會」，便認為它們已實現民主制，再沒有「官僚的命令」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讓我們來檢查一下吧。當公社化開始推行時，一切公社都是所謂「上動下不動」，即把原有若干的生產合作社合併起來，與原有的地方「人民委員會」聯合成立公社管理委員會。一九五八年八月末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要實行政社合一，鄉黨委就是社黨委，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人民委員會」。這個決議到各公社實行時，就成為「鄉長就是社長，鄉黨委書記就是社黨委書記，鄉人民代表大會就是社員代表大會，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管理人民委員會。」這裏沒有舉行過任何選舉。隨後，當公社普遍地成立了時，某些公社會進行過選舉，選出了所謂「公社委員會」，執行了社內一切經濟、政治、軍事、警察及教育等任務。

至於這些「公社委員會」的選舉方式，與以前人民代表會議的選舉完全一樣。由中共黨委提出候選名單，即指定黨委會的委

員們或可靠的幹部爲公社委員會的候選人，交給農民群衆去選舉。農民對於這一套，從過去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的經驗中，已很熟悉：這個候選名單只許贊成，不許反對的。所以當選舉進行時，他們只得依照那個候選名單投票或舉手了。所謂「公社委員會」便是如此這般的選舉出來的。

而所謂「政社合一」，實際就是「黨社合一」因爲公社的社長幾全是中共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公社委員會的委員也差不多都是黨委的委員或黨幹部。因此，公社的經濟（包括生產和分配）、財政、政治、軍事、警察、教育和福利等的管理權都完全由黨幹部操縱，特別操縱在黨委第一書記手中。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而公社內最流行的口號是「書記掛帥」或「書記升帳」。這意思就是說，一切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問題都得由「書記」去處理。這樣，黨書記便成了公社的獨裁者，正如毛澤東是中央政府的獨裁者一樣（毛現在雖不當人民政府主席，實際上還是該政府的獨裁者。）因而我們可以說，每一公社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縮影。

試問梁同志：像這樣選舉出來的「公社委員會」是合乎民主制的嗎？由這樣地「選舉的委員會」來管理公社，能代表群衆的願望和利益，而不是出於「官僚的命令」，代表官僚的利益嗎？或者如史所說：「這看來更像是合理的民主形式」！（見他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第五頁。）

假如梁和史真是這樣想和這樣斷定，那不僅包含五億農民的人民公社已實現了民主制，就是全中國，從中央的人民政府到各地方的政治機構都是民主制度的了。因爲從中央到各地方的人民代表會議，都是同公社的委員會一樣，是經過「人民選舉出來的」。這樣，中國便根本沒有官僚獨裁，而已是社會主義或無產階

級的民主政制了。這不但根本推翻了我們對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的判斷，而且首先便否認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五五年通過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發展」那個決議（這個決議也為梁、史等所贊同的）。因為那個決議肯定中共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官僚獨裁，因而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還不止於此。依照梁和史的判斷的邏輯，則蘇聯及所有東歐諸國及北韓和北越都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或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國家了！因為蘇聯的「蘇維埃」及所有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代表會議」，都和中國的人民代表會議一樣，是經過「人民投票選舉」或「普選」所產生的。你看一個錯誤的判斷或觀念，按其邏輯發展下去，其最後的結論是如何地可驚啊！正如中國諺語所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托洛茨基曾告訴我們：「蘇聯官僚以希特勒戈培爾式的普選權的虛構，來代替蘇維埃這個階級的機關。」（過渡綱領）假使梁和史沒有忘記這句話中所指的「普選權」的含意，他們就應該懂得現時中國公社中「選舉的委員會」是甚麼東西。實際上，公社的「委員會」就是「人民代表會議」的再版。而中國的「人民代表會議」則是直接從東歐國家翻印過來的。至於東歐國家的「人民代表會議」，不過是斯大林的「蘇維埃」的變種而已。所有這些「蘇維埃」和「人民代表會議」，都是在「普選」的掩飾之下製造出來，因而成爲官僚獨裁的裝飾品。

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必須有一定的條件。首先要讓工人和農民群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級選舉實行不記名投票。最後，而且最重要的，要承認基於社會主義原則而組織的各工人政黨的合法存在和活動。但在今天的中國，同在蘇聯和東歐各國一樣，恰好缺乏這些條件。因而公社絕對

不能單獨地實現真正的民主管理，它們的「委員會」，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不會與以前的鄉村或市鎮的「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委員會」有甚麼不同，公社的管理只能由「官僚的命令」來進行。這從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事實，如任意增加農民的勞動時間（從十二小時、十五小時直到十八小時）和勞動強度，強迫婦女負擔與男子同等強度勞動，強迫農民拆毀他們的爐灶到公共食堂去吃飯等——所有這些還不夠證明「官僚主義的命令」的橫暴嗎？！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

還是中共搾取和控制農民的有力工具？

我在前面會引用過梁同志的話：「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形式，其進步性質，已由生產力的巨大提高……得到證明」，這句話當中的「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形式」又被「中國人民公社」的草案所採用，並給以如下的說明：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一種優越形式，超過在農業國過去所曾經試行過的任何形式。合作勞動的大規模運用以及農業產品的剩餘，能加快中國工業化所迫切需要的資本積累。在這方面，公社能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提供一個非凡的貢獻。」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這是一種社會學上的評價。但要判斷一個社會經濟是否為「優越類型」，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便必須分析它的內部結構，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是否矛盾，它的各種生產部門之間是否協調等。

就現時的人民公社說，它是被規定為「農、林、副、牧、漁

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全面結合的社會基層組織」（見一九五八年「紅旗」第八期），這是將每一公社當作一種自給自足的無所不包的社會單位。它裏面不但包含了極大的烏托邦主義成分，而且是充滿了矛盾——人工造成的矛盾。例如，以各生產部門來說，公社既包含有「農、林、副、牧、漁和工業」，不管它的規模如何大（平均每社不過五千戶，最大也不過三萬戶，要進行如此衆多的生產部門，便絕不能有合理的分工與合作及各部門的專業化，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於混亂和落後或原始的狀態，這反過來一定降低農業生產，妨礙對農業的注意和工作，這首先便大大地分散了公社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公社要舉辦各種工業，甚至鋼鐵業（如土高爐）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不僅搞亂國家的工業計劃，而且遠遠超過它的能力。因為辦工業必須具有現代化的設備，才能與公社以外的工業競爭而維持其存在和發展，這種現代化的工業設備恰是公社無法辦到的。因而只能舉辦一些手工業工場（這些手工業工場多是從手工業合作社接受過來的）。這便表明公社所能經營的工業在生產技術和方式上都是過時的，落後的，與現代工業相矛盾的。從這方面所表現的生產方式，公社不但不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反而成了落後的或保守的類型了。

公社的烏托邦主義表現在它的工農業並舉，企圖以此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工人與農民的差別；以及通過公共食堂等，企圖以配給制來代替按勞給酬制等這些幻想之中。

像這樣的公社，在它的經濟結構方面充滿着混亂和矛盾，以及烏托邦主義的成分，在未經過相當時期的實驗之後，即斷定它是一個「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假如不是輕率和武斷，至少是為時太早的。

如果把公社當作「農業合作社的更高形式」（實際上，它真正的生產基礎是農業）看來，由於它的規模大和它所包含的農民勞動力多，它有可能進行大規模利用合作勞動增加農業生產，加速中國工業化所急需的資本積累。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具有下列的條件：

一、農民參加公社必須是自願的。加入公社後，他們的生活必須獲得逐步的改善。只有這樣，農民才能積極勞動，提高生產。

二、公社的管理必須實現真正的民主，即：公社的管理委員會必須由全體社員不記名投票選舉，且隨時撤換不稱職的委員。制定生產和分配等主要計劃時，必須根據農民群眾的實際利益，事先讓全體社員自由討論，並由他們投票表決。

三、政府對公社的徵稅必須合理，收購公社的農產品必須規定合理的價格，並以同樣合理價格盡可能地把工業品供給農民。

四、政府必須盡可能地幫助農民改革農業生產技術，盡可能地大量投資興辦農業機械廠（如拖拉機製造廠），化學肥料製造廠，電力站及運輸工具製造廠（如卡車製造廠）等等。以此逐步供給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設備，減輕農民沉重的體力負擔，並穩定地提高生產力。

沒有上面這些條件，單憑公社的規模大和勞動力多，不但很難提高生產，而且會引起農民群眾的不滿，以致降低生產。關於這點，波蘭的事實曾給了我們以最新鮮的證明。據哥穆爾卡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八次全國會議上的報告稱，波蘭經過六年農業集體化之後，其農業生產的情形是：每一公頃（HECTARE）土地生產產品的價值，由個體農戶耕種者為六二

一·二茲羅提，農業合作社經營者為五一七·三茲羅提。這就是說，規模大勞動力多的集體農場的生產率，反而比個體農戶的低百分之十六·七。這證明，農業生產的增加，單靠規模大勞動力多是不夠的。

現時中共所推行的公社化，恰好與前面所指出的條件相反。我已經說過，大部分農民是被強迫或被欺騙加入公社的。除極少數外，大多數的農民生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變壞了。首先就是大大地增加了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而且絕大多數的婦女也被迫參加了與男子同等勞動強度的工作。但公共食堂所供給他們的飯食，既不夠飽，更談不到口味和營養。所謂工資部分，不但數目極小，且常是拖延不發的。在這種情形下，農民的健康愈來愈壞，疾病愈來愈多，但醫藥却異常缺乏。單就這些條件來說，農民的生產情緒已經大大地被挫折了。

公社內部的管理，已如我在前面指出過，完全是違反民主的，一切都由「官僚命令」來強迫農民執行。這當然要使得農民更趨於消極。

政府對於公社的徵稅又遠超過了以前農業合作社的時期。農業合作社的農業稅規定為佔總收入百分之十五，至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而公社成立後，政府對它的徵稅並不加以明文的規定，讓各公社自行決定，實際上就是叫公社盡量多納。以致公社的農業稅往往超過了百分之三十。例如河南省的睢縣紅星人民公社規定上繳農業稅為公社總收入百分三十二。

政府收購公社農產物（公社的農產品除自己消費外，幾全部為政府所收購）也沒有規定一定的價格，常由當地收購人員和公社幹部決定。這些收購官僚和公社幹部為了討好上級，總是把公社農產品的價格定得很低。但政府配給公社的工業品，不僅數量

少，品質壞，而其價格又往往超過市價。

更壞的是，中共爲使每一公社自給自足，盡量發展農、工、林、副、牧、漁各業，負擔行政、軍事和教育等一切費用。因而公社的積累（所謂公積金）和開銷往往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十左右。例如黑龍江省江南公社的行政管理費和公積金即佔了全社收入百分之四十八，而有些甚至達到百分之六十。這樣，公社除了要繳納農業稅和公積金及行政開銷外，所剩下來的不過佔總收入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已。在這種情形下，公社怎能維持社員的最低生活呢？！

關於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革，中共雖然大肆宣傳，但實際上是極爲漠視的。這只須舉出中央人民政府對一九五九年度農業投資的預算就夠表明了。據財政部長李先念在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五九年農業方面的投資爲十億元，僅佔本年總預算三百七十分之十。像這樣少的數目，對如此龐大的中國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革能發生多少作用？在中共看來，中國農業技術的改革是農民自己的事，是公社自身的任務。所以中共官方報紙拼命鼓吹公社改造製造農具，積肥及挖深土地等等。

中共對於農民的基本政策，在農業合作社時期已經是盡量加強農民的勞動強度來增加生產，通過徵收農業稅、收購農產品及配給工業品等手段來榨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以此應付它的龐大官僚機構的開銷和「加速中國工業化所急需的資本積累」了。

但農業合作社不但規模小，而且太過分散，不容易控制。所以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初視察河南省幾個試辦的公社後，立即宣稱：「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這裏所謂「便於領導」，顯然是指「便於」官僚任意榨取和控制農民群衆。事實正是如此。

因爲公社把許多農業合作社合併起來，便集中了廣大的農民勞動力，並藉助於公共食堂普遍的舉辦，把全體婦女從「家務奴隸」中解放出來，便更擴大了勞動力。這樣，便能夠實行「大規模使用的合作勞動」和提高「農業剩餘產品」，從此，通過公社便容易徵收更高的農業稅及以更低的價格收購農業品和高價配給工業品等等。這還不夠表明：公社已成爲中共榨取農民剩餘價值的最便利的工具嗎？！

要盡量加強農民的勞動強度和榨取農民的剩餘價值，勢必引起農民的不滿和反抗。因而嚴密的組織、監督和控制是絕對必須的。這便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的秘密所在。中共爲了貫徹這種「三化」政策，故於公社運動開始時即特別推行民兵組織的運動。關於這點，擁護公社的蘇達同志曾作了如下頗爲深刻的分析：

「在公社運動開始時的廣泛發展民兵組織的運動，其主要目的顯然是在於用軍事的組織和紀律去管理公社的生產和生活。在純粹軍事制度方面，中共的政策並不是逐漸用民兵制來代替脫離生產的正規軍，而只是用民兵來作爲正規軍的助手和後備兵員。民兵只有若干落後的武器，主要是由地方的工廠製造的。民兵中又分基幹民兵與普通民兵。共黨保持着對民兵的『絕對領導』，武器都掌握在被認爲『可靠』分子手裏。」（我們由經驗知道，凡是對官方政策有所批評的，都一律認爲不可靠分子，而左派的反對分子也被劃入「右派」的範疇。）

「毛澤東說：『民兵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組織，又是體育組織。』這話被奉爲民兵組織與指導的原則。按照這原則，社員不但在團、營、連等組織受軍事訓練和擔任某些軍

事訓練和担任某些軍事動員，而且在同一組織受同一軍事長官指揮着從事生產勞動，甚至過日常生活。配合當時大力推行的『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和『分配供給化』，民兵組織對於農民群眾說來，實際成爲用嚴酷的軍事紀律來絕對控制農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制度，完全消滅了任何個人的自由，其軍事意義反而成爲次要的了。」（見「論人民公社」。着重點係本文作者所加。）

不錯，中共「感受到群眾普遍不滿之後」（蘇達同志的話），在去年十二月的六中全會上宣佈：「民兵組織和生產組織領導機構應當是兩套」，決不允許借口組織軍事化，或者利用對付敵人的民兵制度，而使公社和民兵組織的民主生活受到絲毫的削弱。但這種官話並沒有改變「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的實質。因爲農民是被組織在生產隊裏，而生產隊則分成大隊、中隊和小隊的各級隊伍（約等於團、營、連等），每隊有隊長。隊長規定每天早上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點集合，排隊至工地。在工作時，隊長手拿着擴聲筒指揮、監督和催促隊員工作。放工時間由隊長隨意決定，假如他認爲必須延長期間，就得延長。放工後，一樣排隊到公共食堂進食。這還不是軍事化的勞動組織嗎？

此外，公社的社員除了在生產和分配及生活各方面聽命於社長和隊長的指揮之外，他們還得聽命於社長或生產隊長的任意調動，例如，被派至離家頗遠的地區，必須與妻子分居，不得違抗等。而且凡社員，不得社長的許可，絕對不能離開公社。事實上，社員沒有取得社長的許可證，到任何地方都不能獲得工作，找到住和食。這樣，公社的社員們就好像中世紀的農奴，完全被限制在公社的圈子內了。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當城市工廠需要勞動力時，必須通過公社，由社長指派。這種指派當然首先落在被認為積極分子的身上。因為到城市工作，在農民眼中已成爲一種幸運的工作。這樣，農民參加城市工業生產這點自由權完全被剝奪了。

前面所敘述這些「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及「生活集體化」的實際情形，在現代任何一種「社會經濟類型」中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某種勞動集中營裏才能發現出來。

因此，我可以說，現時的中國人民公社，不管它們所包含的進步性如何，但由於中共強加於它們的種種矛盾、混亂、強制和剝奪，不但很難談得上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反而成了中共榨取和控制農民的有力工具了。像這樣的公社，不但不能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提供一個非凡的貢獻，反而要引起農民群衆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和反感，因而大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正如列寧所說的：「農業公社是個很响亮的名稱，是與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有聯繫的。如果公社在實踐上表明自己是真正在進行認真改良農民經濟的工作，那才名符其實，那時就無疑地會提高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威信。但往往也有這樣的情形，公社只是激起農民對自己的反感，而『公社』這個名詞有時甚至變成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口號。」（見中文本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六五二頁）

當本文寫到這裏時，中國大陸發生了兩件極重要的事件，並爲各方面的報導所證實了的。這就是普遍的糧食恐慌和許多公社取消了公共食堂。前一種事實從反面證明，中共大肆宣傳去年糧食增加一倍是不可靠的。假如去年糧食果然增加了那麼多，怎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恐慌，以致公社每一個社員的配糧減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同時城市居民亦極難獲得足夠的糧食，這除了說明

去年糧食大增產是虛報外，很難找到另一種解釋。

公社所建立的兩大「原則」，即所謂「大」和「公」，公共食堂便是「公」的具體表現之一。現在許多公共食堂，至少是廣東省的許多公共食堂已被解散了。與之連帶被解散的還有托兒所。這樣，婦女們又從社會的生產勞動回到「家務奴役」，即回到家庭去做飯和帶孩子去了！關於這點，國務院副總理已公開承認「集體吃飯已告失敗」，「將來農村家務社會主義化必須以自願為原則」。這就表明建立公社的基本原則之一已在被放棄的過程中，公社已在「原則上」開始暴露其破產了。

糧食的普遍恐慌和一部分公共食堂被迫解散，這無疑反映了中共關於公社化的強迫政策所引起的嚴重危機。在這種危機面前，中共的領導已不得不籌謀對付。現在已有某些跡象表明，毛澤東等似乎正在會議討論公社問題。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像去年中共六中全會的決議一樣，中共再來一次對公社政策的「調整」。就是說，在農民群眾及全國人民愈來愈不滿的壓力之下，中共又對公社經驗主義地作某種改變，以此緩和農民及全國人民的不滿。但中共的領導層，特別是毛澤東，為了維護其公社政策的絕對正確或基本上正確，是絕對不會放棄他們榨取和控制農民的基本政策的，這樣，公社還將繼續維持下去，因而公社的危機將繼續發生。

「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將來看到中共對公社政策作某種改變時，也許會說，這是我們預見到的：

「其組織活動方式似乎將有進一步修改。不過，這類修正，甚至從現下狀態後退，決不會喪失公社的進步性質，好像波蘭從集體化後退所招致的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讓位給私有制與個體生產那樣。」

上面這段話裏，把「公社的進步性質」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割開來，當作評價公社的唯一標準，其錯誤，我在前面批評梁同志的觀點時已經提出過。這裏值得特別談談的是關於波蘭農業集體化的改變，是否「已否定了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

我在前面曾提到哥穆爾卡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波蘭工人統一黨第八屆全國會議上舉出波蘭的農業生產情形，集體農場的生產率較之個體農戶經營的要低百分之一六·七。哥穆爾卡從這個事實的經驗中體會到，集體農場生產的低落是由於強迫集體化政策的後果。所以當他掌握政權後，便將一些不夠條件的集體農場加以改組或解散，並停止強迫執行集體化的政策。但哥穆爾卡這樣做，並非已否定集體農場進步性質，讓位給私有制及個體生產。他只是認為農業集體化必須取得農民的同意並與機械化配合起來，才能順利地實現農業集體化和提高農業生產。這從他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二次中央委員會議上所作關於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波蘭農業的中心任務」的報告裏明白地表示了出來。

在這次報告中，哥穆爾卡強調發展農業計劃的重要性，在發展農業中「增加農業人口的實際工資和收入具有決定的意義」。因而「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的農業投資為一千三百億茲羅提，其中生產投資為九百億茲羅提」，這些生產投資即用於機械化，改良土壤及「在農村建立一百二十萬間住房及生產用的建築物」。他並特別強調，波蘭將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間製造一十一萬二千架拖拉機，以此幫助提高農業生產和促進農業集體化。這個報告的結論是：「黨堅持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綱領。同時，認為這個改造只有在建立大規模集體農業經濟，即生產合作化的情況下才能完成。但這個改造的目的首先是擴大農業生產。」

只有經過農民的同意才能建立集體農民經濟。」（着重點係本文作者所加）

從上面所引哥穆爾卡報告中所強調的主張和結論，可以充分證明，波蘭農業政策的「退却」，不是「已否定了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讓位給私有制與個體生產」，反而是注意了農民的實際利益和同意，即在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上，放棄了斯大林的強迫方法，回到了，至少接近了列寧的立場。但「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竟把一種接近列寧立場的農業集體化的政策描繪成爲「否定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這不僅與事實完全不符，而且表明該作者對中國公社所採取的錯誤立場又運用到批評波蘭所改變的農業政策上去了。對某一事物的錯誤觀點往往要反映到另一同樣事件的判斷中，這裏又一次獲得了證明。

我以爲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懂得哥穆爾卡執政後，在波蘭施行的農業政策，在原則上是正確的，是能夠注意農民的實際利益和自願原則的。不管哥穆爾卡在其他某些問題上還保持斯大林主義的觀點，但在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上，他是第一個拋棄斯大林的強迫方法而回到列寧立場的人。從這一點上說，他比之毛澤東是遠較正確的。

現時中國人民公社已暴露了它的種種矛盾和嚴重危機。爲了避免危機的繼續增長及其可能發生災禍後果，便必須接受波蘭的經驗，來一次勇敢的「退却」，即從極端的冒險主義回到列寧的立場，依照農民的實際利益和自願原則，對公社進行一次徹底的檢討和改變。關於這點，我將在下面「我們對公社的態度」中加以詳細而具體的說明。

關於梁和史兩同志再說幾句

關於梁和史兩同志支持公社的主要論據，我在上面已經分別地加以批評過了。這裏所要特別指出的僅是他們研究公社問題的態度和基本傾向。

就梁同志對「關於中國人民公社決議草案」的全部批評看來，他對公社的判斷既無任何理論或歷史經驗的根據，更缺乏事實的證明。例如他說「草案大部分重覆羅比特文章的罪惡和錯誤」，但羅比特文章中關於中國公社的「罪惡和錯誤」究竟何在，他沒有一句話交代。由此證明他對別人的意見是憑空武斷而一筆抹煞的。但在我看來，羅比特的文章的一般立場，尤其是他的結論，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它所引證的事實也是謹慎可靠，經得起批評的，至少比之梁同志所引證的事實要可靠得多。

梁同志之支持公社還有一個特別論據，那就是「資本主義的宣傳家們不斷的對公社作大肆宣傳的敵視攻擊，更加使我們需要採取一種明確立場，它主要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立場：擁護或者反對公社。」（着重點係原有）依照梁同志在這裏提出的「階級鬥爭立場」的公式，即是：凡「資產階級宣傳家們」所「敵視攻擊」的我們就得贊成，反之，我們就應反對。但這是一種極端機械的形式邏輯，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毫無共同之點。

大家總還記得，當一切「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不斷地猛烈地抨擊斯大林的官僚獨裁時，如果依照梁同志的「邏輯」，就必須支持後者。但托洛茨基不但沒有支持它，而且給它以更深刻的批評。所不同者則在於：「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之猛烈地批評斯大林的官僚獨裁制是把它當作布爾塞維克主義和社會主義財產制的派生物；而托洛茨基則認為這種官僚獨裁制恰好是背叛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後果，因而妨害了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合理發展。

最新鮮的例子是：當蘇聯的坦克車摧毀匈牙利的革命時，所有的「資產階級宣傳家們」更是瘋狂地攻擊了蘇聯，那時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因此停止了我們對這同一事件的嚴厲批評。所不同者，「資產階級批評家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來批評「蘇聯的帝國主義侵略」，而我們則站在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上批評了代表大斯拉夫主義的克里姆林宮的背叛行爲。在那時「採取一種明確立場」的，乃是後來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馬西 (MARC Y) 及其追隨者們。

今天「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之不斷地猛烈地批評公社，是因為他們認爲它消滅着他們認爲神聖的私有財產制的殘餘及與之相聯的神聖的家庭制度。而我們則認爲在物質和文化條件遠未具備之下，中共以強迫的方法於極短期間內實行公社化，企圖以此消滅私有制的殘餘及以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代替家庭生活，乃是一種違反農民意志的冒險主義，對於工農聯盟和社會主義事業都是極有害的。我們批評公社，在表面上好像與「資產階級宣傳家們」相同，但其實質，其代表的階級立場是相反的。這正如法國的諺語所說：「兩個人說着同樣的話，而其意義完全不同。」

史同志的文章，「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雖然以頗多的篇幅引用了幾個外國記者訪華後的報導（姑且不論這些報導的真實性如何）來證實他的立場。但不幸，他引的事實不是與公社毫無關係，便是其自身被宣告破產了的。例如，他說：

「一，由公社所設計的巨大工程計劃不是沒有意義的……**MONTREAL** 的報導者提到一個目睹的具體例子說：在北京附近有一個水壩和儲水庫，由四十萬人於驚人短促的一百六十天內築成。」

但這個「巨大的水壩和儲水庫」即是離北京很近的「東陵水

庫」，不但是在公社化以前的成就，而且是由中共中央動員了北京的廣大工人群眾和近郊的農民建立起來的。

「二，此外，經濟成就和文化進步還可以由小學生的增加表現出來，小學生由一九五七年的六千四百三十萬，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增到八千四百萬。」

這裏所指出的事實（姑且承認是事實吧！）恰好又是在公社化以前的成就。因為公社正是從一九五八年九月才開始普遍地建立的。

前面兩個例子便足夠表明史同志爲了辯護自己的立場，真不惜濫用與公社毫不相干的事實作爲「證據」來贊揚公社的優越性和成就。單憑這點，就夠表明他研究重要問題是如何地輕浮了！

史在他的文章後面花了不少篇幅敘述中國不斷革命的問題，除了暴露他對這個問題的錯誤了解外（可惜我在這裏沒有篇幅來批評他），竟沒有一句話提到中共所追求的「和平共存」的外交政策（周恩來與尼赫魯所簽訂的「五項原則」）。這種外交政策正是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現時毛澤東把它發展成爲「一國共產主義」）的違反不斷革命的極端反動的政策。毛澤東在國內政策上之時而極右時而極左的根源正在於此。因爲他不相信，也不懂得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特別是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對於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定作用。所以他爲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便始而向資產階級和地主盡量謀取妥協，企圖以此在幾十年內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即非社會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迨至遭到帝國主義的進攻（特別是美國向朝鮮的進攻）及國內資產階級地主反攻的壓力之下，才經驗主義地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冒險主義，即企圖盡力榨取工人和農民的剩餘價值來加速發展工業，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而他之

不顧一切地在極短時期內實行公社化，即是此種一國社會主義，甚或一國共產主義之登峰造極的冒險主義的表現。

此外，而且更爲重要的，在梁和史兩同志討論農村人民公社的文章中，竟沒有一句話提到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實行土地國有化及農業集體化必須獲得農民同意或自願的這個極爲重要的原則。這便表明他們在有關五億農民實際生活的公社問題上，如何地輕視馬克思主義對農民問題的傳統立場和我們的「過渡綱領」中對工農聯盟的綱領了！！

正由於梁和史同志們完全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對農民問題的傳統立場和我們的「過渡綱領」，所以他們對公社的立場便與修正主義者的巴布洛達到一致，至少極爲接近了。

巴布洛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的「國際季刊」內，以揚·保爾·馬丁的筆名發表了「中國的不斷革命」一文，在該文內，他除了宣揚「中國現時是處在不斷革命的狀態中」及它的工農生產如何獲得驚人的發展外，主要是論敘中國人民公社化後的偉大意義。例如他說：

「所有這些，都不單純是誇耀、僞善或幼稚，而是值得驕傲的——是中國面對二十世紀世界之磅礴氣概的表現。中國在它的機體內感覺到有一種無可限量的力量在覺醒。中國對世界的看法，與任何強國不同，或許夾雜着幼稚氣，這種幼稚氣，對一個昨天還沉睡在過去時代，而今天則帶着如此狂熱和衝動進入原子世紀和真正巨人時代的國度來說，倒是正常的。」

巴布洛除了上面這類抽象的贊揚外，他聲稱：「公社的管理委員會實際上就是有名的城市委員會——蘇維埃」，這個對公社的政治上的評價與梁和史同志的意見，即「公社是由選舉出來的

委員會管理的，不是由官僚命令來管理的」差不多是一致的。

巴布洛對公社這種評價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早已根據他的修正主義的觀點評斷中共及中共政權的性質。而他對人民公社這種評價不過是他的修正主義思想的邏輯發展而已。以前堅決反對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梁和史同志，今天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幾乎與後者達到了同樣的政治結論，這是值得他們反省的。

最後，我應當就便指出，在人民公社問題上，梁與史同志所表現的錯誤遠超過了蘇達同志。因為後者不但沒有過分美化公社，而且還根據事實對它作了頗為嚴肅的批評。他的錯誤僅在於太過重視了公社大生產的優越性，因而看輕了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所以他的錯誤不是原則性的，只是一種偏差，是容易改正的。而前者的錯誤則已走到原則的交叉點了，如果不及時退回，便將陷入修正主義泥坑中。

我們對公社的態度

一、我們一向主張並堅持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認為這是把分散的個體農民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可能的過渡形式。但同時我們堅持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實施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所指示的原則，即托洛茨基在我們「過渡綱領」中所規定的原則：「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這就是說，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必須說服農民，用實際的例子說服農民，使他們相信，農業集體化對於他們是真正有利的，因而讓他們自願參加。

因此，我們曾經同托洛茨基一起嚴厲地指責過斯大林的強迫農業集體化，認為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

益，而是爲着官僚的利益。

二、如果把農村公社看作更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根據農業集體化的一般原則，我們是贊成的。但認爲這樣大規模的集體化再加上全體農民生活的集體化（如以公共食堂及托兒所等的集體生活來代替家庭生活），這就更加要用說服農民，用實際的範例來說服農民，使他們自願參加。

而現在中共所實行的公社化政策，比它以前實行農業生產合作化的政策，帶有更大的強迫性，是一種更大的冒險主義。因而更不是爲了農民或工人的利益，而是爲了官僚的利益。

三、像這樣強迫地實行的農村公社化，強迫全體農民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及勞動強度的異常增加，不但給廣大的農民群衆帶來了無數的不便、痛苦和健康的損害，而且其中充滿着矛盾，不僅將使農業生產趨於低落（如城市工人及居民日常所必須的蔬菜及肉類等副食品，現時已臨到極恐慌的程度），而且將大大地妨碍工農的聯盟，最後將爆炸成爲農村混亂乃至叛亂的災害，障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四、面對着這樣極度嚴重的局勢，爲了絕大多數農民群衆的利益，爲了鞏固工農聯盟的利益，我們認爲現時的公社必須進行如下的根本處理：

(一) 現時公社普遍的建立，既缺乏客觀的條件，又完全違反絕大多數農民的志願和利益，便應當把公社是否存續的問題提到全體工人，特別是農民面前，進行一次毫無限制的民主討論，讓各方面表示意見。最後，讓每一公社的全體社員舉行不記名投票來表決。如果全體社員或絕大多數社員贊成公社繼續存在，公社當然可以繼續進行。如果絕大多數反對，公社便應當解散，重新分開建立較小規模的生產合作社。而

且不願加入合作社的農民，也應當分給土地和農具，讓他們獨自經營。

(二) 由公社社員大多數贊成繼續經營的公社，其管理委員會必須由全體社員用不記名投票選舉，且隨時撤換不稱職的委員。公社的生產、分配及其他重要的福利計劃，必須事先交給全體社員公開討論，徵取大多數的意見才能決定。尤其是公共食堂及托兒所等，應採取讓社員完全自由參加的原則。就是公社解散後所重新建立的生產合作社，也必須實行上述的同樣辦法。即那些從公社脫離出來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戶，也應予以適當的資助。

(三) 政府對於繼續存在的公社，或從公社分開出來的農業合作社，乃至個體經營的農戶，徵收農業稅必須予以合理的規定。至多不得超過他們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在收購公社或農業合作社等農產品方面必須規定合理的價格（即按照市場的一般價格），同時以合理的價格將各種工業品供給農民。

(四) 最後，政府應儘可能撥出大量資金發展機械、化學肥料、電氣站及治蟲農藥等，以此使農業逐步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並穩定地提高生產，節省勞動力。

五、爲要貫徹上面所指出的措施，不但必須徹底排除現時官方所宣傳的幾年或十幾年在農村實現共產主義的荒唐幻想，而且應公開宣佈：中國要實行真正的集體化，提高農業生產，保證五億農民生活的真正改善，與整個國家工業化一樣，只有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下，獲得先進國家工人階級的援助，才有可能。因此，「一國社會主義」或「一國共產主義」及與之相聯的「和平共處」等幻想，必須從根加以排斥。對外政策的主要目

標應當轉到援助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是援助日本和印度的無產階級革命。正如羅比特同志所說：「西歐和美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成功，將會帶頭制訂出世界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使中國能夠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的躍進……單只日本實現了社會主義，就會於晝夜間改變中國的遠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自然會連結在一起。日本將會給中國的農場大量生產電力抽水機、飛機、馬達、貨車、起重機和疏濬機……且使工農發展獲得應有的裝備。」

附 記

當本文寫完約三星期後，我收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報，其中登載有「國家統計局關於修訂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數字的公告」及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增產節約的決議」，現在將這兩個文件中說到與一九五八年的農業生產的增長及與人民公社有關的幾點摘錄下來，並給予簡略的批評，以作本文補敘。

「國家統計局關於修訂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數字的公報」說：

「一九五八年的農業生產獲得我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豐收。農業統計機關由於對這個空前豐收的產量估計缺乏經驗，在多數情況下估計得太高了；同時由於對秋季大豐收的勞動力安排得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進行得有些粗

糙，這就拋棄了一些，與估計數字有了距離。經過今年上半年反覆核實，過去公布的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數字，有幾項是偏高的。茲將修訂的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數字公布如下：糧食總產量五千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棉花總產量四千二百萬担，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八。……」

由上面這個「公布」的說明及其列出的農業統計數字（這些數字是否真實還是疑問）看來，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 一、原來中共所發表的關於工、農業的統計數字，不是在生產完成後，根據生產增加的實際數量統計起來的結果，而是出於事先的「估計」或推測。這是中共統計數字的秘密的第一次的自我洩露。這種洩露當然是在糧食普遍短缺，城鄉民衆極度不滿、指責和懷疑去年大豐收的強大壓力下逼迫出來的。但由此人們可了解中共一貫宣傳的工農業生產如何大增加的統計數字的虛偽性了。
- 二、「對秋季大豐收的勞動力安排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進行得有些粗糙，這就拋棄了一些，」爲什麼公社建立後的「秋季大豐收的勞動力安排不很好」，以致「拋棄了一些」農業作物呢？很明顯，因爲大多數農民是被強迫加入公社的，所以他們用怠工，用破壞農作物的收穫來洩憤。
- 三、去年糧食的總產量是五千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而不是增加一倍；棉花增加百分之二十八，而不是百分之六十。這與「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所根據的「農業生產大增加」相差是如何之遠啊！這尤其給了史瀋培同志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爲他曾經強調說：「這樣，對

中國幾億人口的食物問題已產生了革命的改變，一九五八年的穀物總生產量驚人地達到三億七千五百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的一億八千五百萬噸增加了一倍。今天，這樣龐大而擁擠的人口，已從營養不足和飢荒的舊日進到食物足夠的生活水平。被稱爲是糧食和人口權威的約翰·奧爾已確認到這點，他最近訪問中國回來宣稱：中國已解決了糧食問題。」（見「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根據中共自己新公布的糧食統計數字，不但證明史同志所極力贊美的糧食增加一倍是虛偽的，而且證明他所極力推崇的那位「糧食和人口權威」的約翰·奧爾的「確認」也是這樣不可靠的了！（因爲中國現在正鬧飢荒啊！）

四、 我在我的文章中曾說關於農業生產數字的增加「官方的報導總是誇大的」。「糧食普遍恐慌」的「事實從反面證明，中共會大肆宣傳去年糧食增加一倍是不可靠的，」是「虛偽的」。我這種對中共官方報導的不信任，只是根據於我們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的所言所行的一般不信任而來。現在中共自己公布的農業統計數字，不但證明我們對官方的「不信任」是完全正確的，而且遠超過我們想像。因爲它的前後報導竟相差百分之六十五！這對於那些單依靠官方報導來研究和評斷中國工農業發展情況的人們，尤其是對於迷信官方報導的史同志，是一個何等嚴厲的教訓啊！

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一九五九年八月二一十六日）「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決議」，其中值得特別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決議」說：「在整社中貫徹執行了分級管理，分級算帳，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按勞分配，多勞多得

的原則」，這就等於「在原則上」取消了「部分地按需分配的配給制」，也就是「從原則上」拋棄了公社原來擬定以「配給制」逐步地代替「按勞給酬制」以此走向「共產主義」的方針。這表明中共的烏托邦主義在事實的嚴厲教訓之下，又回到它的出發點。同時又反映出來一種傾向，即：中共企圖藉「多勞多得」這種物質利益的刺激，驅使一部分農民（即有強度勞動力的農民）拼命苦戰以達成其「大躍進」的目的。但這一企圖不可免地要產生兩種惡果：一方面損害農民的健康；另一方面促進公社內的農民的貧富兩極分化。

二、「……確定了在目前階段中公社的生產資料實行三級所有制，生產隊一級所有權是基本的，公社一級所有權是部分的，……生產小隊也應該有部分所有權。」公社內這種三級所有制中，從「生產隊的所有權是基本的」這點看來，公社在實際上已朝着以前的生產合作社倒退了。因為生產隊事實上相當於以前生產合作社的規模，並多半是依照以前的生產合作社的基礎改組而成的。關於這點，中共官方也承認：「在目前的人民公社中……大體上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的所有制是基本的。」（見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人民公社萬歲」重點係我所加）這樣，從生產和分配看來，特別從「所有制」看來，公社在實際上差不多已分解成為原來的生產合作社了。這是值得頌揚公社的「大生產優越性」的人們（如蘇達同志）或美之為「社會經濟組織優越類型」的人們（如梁同志等）加以反省的。

三、「農村公共食堂應當堅持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原則。食糧依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憑票吃飯，剩餘歸己。」我已經指出，強迫全體農民加入公共食堂這種粗暴措施「是絕

難繼續維持下去的，在不久的將來將被迫改組，乃至大部分解散……。」現在中共公開承認「公共食堂……自願參加的原則」，便等於在「原則上」承認它以前強迫農民參加公共食堂是錯誤的荒謬的。同時也就承認了婦女重新回到家庭燒飯的「原則」。這樣，婦女又要回到「家務奴隸」去了。這對於極力贊美公社把婦女從「家務奴隸」解放出來的梁同志等，不啻是一盆冷水！

四、「根據去年農業生產的核實情況……八屆八中全會建議國務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一九五九年的計劃提出適當的調整，……糧食的產量比去年核實的五千億斤增長百分之十左右。」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原來計劃定為一萬億斤，即比一九五八年未「核實」的七千五百億斤增加百分之四十。現在「調整」的計劃比原定的計劃差不多少了一半。由此表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官僚對於農業生產計劃之任意亂訂，其無知、魯莽、混亂、自相矛盾達到如此可驚的程度！

同時，從調整的計劃證明我們關於農業的增產，在缺乏現代化的機械與化學肥料等設備的條件之下，「還是緩慢」的判斷，是不可爭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判斷，在這裏又獲得一次小小的勝利。

五、「中共八屆八中全會號召全黨和全國各民族人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克服某些不堅定分子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情緒」。但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情緒」？那就是「懷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見周恩來八月二十六日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見八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報「反右傾……」的社論）。

從中共「反右傾機會主義情緒」的號召中，從人民日報的社論特別「反右傾」和高呼「人民公社萬歲」的聲浪中，反映出在廣大的工農群眾和中共黨員中批評和反對中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斥這種運動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是非常普遍而強有力的。周恩來公開承認說：「這種思想和情緒，近兩個月來已有發展」（見上引同一報告）。這便表明中國的工農群眾和下層共產黨員已從他們實際生活的經驗中體會到中共強迫實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冒險主義的惡果，因而掀起了廣大的憤慨和批評。

中共對這種群眾的憤慨和批評，一方面是用些改良的讓步（如這次決議中所表現的）來緩和群眾；另一方面則以「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名義去鎮壓他們。但在它的冒險主義政策，它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沒有根本改變之前，群眾的憤慨和批評還是要繼續發展的。因此我們有理由預言，公社是不穩定的，公社的危機還是要繼續發生的。要避免危機的爆發，只有實現我們所提供的主張（見「我們對公社的態度」）才能達到。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

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 ——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

（一九六〇年四月廿六日）

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

我在我的《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批評史渥培和梁恩等同志斷定「公社是由選舉出來的委員會，而非由官僚的命令所主持」時，曾按照他們的思想邏輯作了如下的推論：

假如梁和史真是這樣想和這樣斷定，那不僅包含五億農民的人民公社已實現了民主制，就是全中國，從中央的人民政府到各地的政治機構都是民主制度的了。因為從中央到各地方的人民代表會議，都是同公社的委員會一樣，是經過「人民選舉出來的」。這樣，中國便根本沒有官僚獨裁，而已是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的民主政制了。這不但根本推翻了我們對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的判斷，而且首先便否認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五五年通過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發展」那個決議（這個決議也為梁、史等所贊同的）。因為那個決議肯定中共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官僚獨裁，因而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見《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中文本第二部第十二頁）。

上面這個推論寫下來還不到四個月，史、梁兩同志又發表了他們的文章：「中國的第三次革命，其公社及其政制」。在該文中，他們果然依照他們的思想邏輯推到了最後的結論，公然要求

*

本文原先是為第四國際內部討論而寫出，在一九六一年用英文發表。從《當權的中國共產黨》譯出。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拋棄它的「現在的基本立場」，即放棄它在一九五五年通過的決議中所肯定的「中國共產黨是斯大林主義的政黨，而其政府的制度，則是必須以政治革命來推翻的官僚獨裁」這個基本立場，而採取他們自以為正確的新路綫，即：中共已不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不是官僚獨裁，因而「該一政治決議案的綱領和口號已在中國失效」。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一個民主要求的綱領」。（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三期第二十九頁。）假使這個「新路綫」被採用，不但從根推翻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現在的基本立場」，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改變我們對北韓、北越、南斯拉夫、波蘭，乃至對蘇聯的態度。這對於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蘇聯集團國家的戰略方針，將是一個劃時期的變化，因而對運動的前途會產生決定性的影响。這是值得每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加以嚴肅的思考，從理論和事實上作深入的探究，以便重新確定我們的立場。

中共的性質——

它不再是斯大林主義的政黨了嗎？

史和梁要求社會主義工人黨放棄其「現在的基本立場」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變化中的現實，特別是農業方面的「變化中的現實」——從互助組發展到「更高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公社——以此證明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五五年所決定的「基本立場」已經過了時，完全不符合於「那個變化中的現實」了。但實際上，他們所提出的「新路綫」並非根據於「變化中的現實」，而是基於他們對中共及其政權性質的重新評價。所謂「變化中的現實」不過是作為推翻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現在的基本立場」的

一種藉口而已。例如他們說：「當中共不顧斯大林與蔣介石合作的政策，以革命的手段從事於奪取政權的戰鬥時，一九四七——一九四九的反攻勝利了。由於此一行動，中共就脫離了爲一般人所適當了解的斯大林主義，並使其本身有了一個適於完成歷史任務的工具。」如果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則中共遠在一九四九年走上政權時便已不是斯大林主義的黨或「已拋棄了斯大林主義」，因而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五五年所通過的、並爲史渥培和梁恩所贊成的決議，不需要往後的「變化中的現實」來證明，在那時便根本上已是錯誤的了。爲甚麼史和梁不這樣坦白地提出問題呢？顯然爲的是藉「變化中的現實」來推卸他們以前曾經支持那個決議的責任。

現在就讓我們從史和梁所提出的中共的性質已經改變這一點來開始檢討吧。

說中共在一九四七——四九年從事政權的鬥爭時即已改變其斯大林主義的性質，這種判斷並不是甚麼新的。早在一九五一年格爾曼便已經提供了如下的意見：

「我們的運動會一向認定：在各國共產黨內部的嚴重分裂下，群眾將會超越了斯大林主義的頭的。南斯拉夫和中國的例子已經證明：在某種例外的情形下，一切共產黨都會修改其政治的路綫，越過了克里姆林宮的目標，領導群眾走上奪取政權的。在此一條件下，這些黨，將不復是典型的斯大林主義黨了。」（見「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關於斯大林主義的論題中，那些應該修訂，那些應該保持。」——發表於「國際資料公報」第五頁，着重點係我所加。）

格爾曼在上面表示的這個意見，乃是迎合當時巴布洛開始對斯大林主義的修正立場的一種「理論上」的辯護 * 。關於這

方面，我在我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中提供了頗為詳細的事實和分析，並着重地指出如下幾點：

「首先，自從中共於一九二八年自城市撤向鄉村以來，即已建立了一個相當鞏固的政權和軍隊（農民軍隊）。二十年來，該黨利用着這一政權和軍隊，控制着農民群眾（如我們所知，農民的落後和分散，是最容易受控制的），因而形成了一個頑強而執拗的官僚制度（尤其在它對待群眾的態度上）。甚至在國民黨地區內對待工人和學生們，也以一種命令主義和欺騙的方法去替代說服。……」

「其次，在思想上，中共在其對付一連串重要事件的態度上，例如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失敗，農民戰爭，以及抗日戰等等，尤其在對待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對他們觀念和政策的批評上，始終保持和加深着他們的斯大林主義的理論。」

「毛澤東之『體系化和教條化的新民主主義』，除了是斯大林主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之深刻化和結晶化的表現以外，別無其他意義。換句話說，這只是直接對不斷革命論挑戰而頑固地堅持其革命階段論的表現吧了。」

「第三，數十年來，中共的組織向為克里姆林宮所特別注意，因而同克里姆林宮的關係也特別密切。自從蘇聯佔領了東北，並以取自日本戰俘的武器重行武裝了中共以後，克里姆林宮對中共的控制，遂較前更為嚴厲。」（一九五二年

* 巴布洛在那時已開始發表他的修正主義的觀點。即：各斯大林黨在群眾的壓力下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領導群眾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

二月出版的「國際資料公報」第十八頁)

我的結論是：「中共過去所經歷的極重要的轉變，都是違反群眾意志，由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所造成的。甚至目前走上奪取政權的『轉變』，也不是違背克里姆林宮的意志而向群眾壓力讓步的產物，相反，倒是徵得了克里姆林宮的完全同意後，在蔣介石的致命壓力下所造成的。」(同上第十九頁) 正由於中共對蔣介石的妥協政策完全遭到後者的拒絕，並在他的致命的進攻壓迫之下，爲了自保，並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它才不得不進而反攻而走上奪取政權的鬥爭。所以中共並不因此脫離了斯大林主義而「終止其爲斯大林主義的黨」。我這個意見，無論是格爾曼或巴布洛，或其他任何人，都不會加以反駁。這證明它本身是站得住的。

時間已過去了八年(從一九五一一—一九五九年)史和梁又拾起了格爾曼的老意見——曾經替巴布洛的修正主義辯護過，並爲他們自己反對過的意見，(他們在一九五五年贊成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決議中對中共是斯大林黨的判斷，即證明他們那時是反對格爾曼和巴布洛的意見的。)拿它來作爲主要論據向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現在的基本立場」挑戰了。這表明人們反對一種錯誤的觀念或接受一個正確的立場，如沒有從理論上和事實上經過深入的思考和理解，是容易受環境的影響而變得反覆無常的。

爲要停止對中共性質這種反覆無常的評價，我覺得從理論上和事實上重新給它一番檢討是必要的。

首先讓我把甚麼是斯大林主義或甚麼是「明顯而唯一的斯大林主義的特點」(史梁語)這個問題提出來作一簡括的解釋。我們大家都知道，斯大林主義是從落後的和孤立的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墮落過程中形成起來的。它的社會基礎是小資產階級的官僚層。由於這個階層的特殊利益，它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保守的、

妥協的機會主義。但當它的機會主義政策遭到慘敗或為對方所拒絕時，又往往轉採另一極端的冒險主義或盲動主義的行為。而當此種冒險主義行為失敗後，又回到機會主義的原來立場。有時候是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雙管齊下的。它的機會主義的最高表現便是「一國社會主義」，並由此演繹成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平共存」的路綫，以此替代了國際主義的世界革命的方針。在組織方法上，斯大林主義是以絕對的官僚集中制代替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一直集中到一個全能的永無錯誤的首長，因而絞殺了黨內的一切民主，形成了任意發號施令的、唯我獨尊的、欣賞個人崇拜的獨裁者。此種組織方法運用到群眾運動上，便是以命令主義或哀的美頓主義；甚至以欺騙代替說服；運用到國家機構上便成爲警察的或格柏烏控制的極權政制；運用到對待革命的政敵方面便是造謠污蔑、肆行迫害（包括暗殺、羅織、屠殺等）。

這裏我無須重覆斯大林自他在蘇聯篡奪政權後，是如何在國內外實行了他自己的斯大林主義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政策，也不用說他奪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後，如何把各國共產黨實行斯大林主義化，使它們成爲執行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的工具。單就中共而論，在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過程中，它已深受斯大林的機會主義政策的毒害，而遭受了慘敗，隨即又以冒險主義葬送了殘餘的革命力量。此後，中共無論在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都完全斯大林主義化，而成爲斯大林的寵兒。在被迫地走上爲政權而鬥爭以前，中共是一個純粹的斯大林主義黨，連史和梁也是完全承認的。現在的問題僅在走上政權後，是否事實上證明它已離開了斯大林主義。

這裏讓我們概括地列舉一些主要的事實來看吧：

一、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特殊有利的條件下，以農

民武裝推翻了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但它仍繼續其機會主義的階級合作或四個階級聯合的政策，因而成立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並以法令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提倡「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爲了與地主和富農妥協，甚至拖延農民所迫切要求的土地改革。

二、另一方面，除了允許工人加入工會外，禁止他們進行任何獨立的組織，禁止任何罷工，甚至在私人資本家廠內爲改善生活的罷工也在被禁之列。它對農民，則只許鬥爭惡霸，減租減息，而禁止他們進行沒收地主土地和取消高利貸的鬥爭。

三、它的對外政策，不但完全追隨斯大林的「和平共處」路線，甚至對帝國主義的在華財產亦公然聲明保護。

四、對不同意中共政策的革命者，特別是對它的革命政敵托洛茨基主義者，則任意逮捕、監禁、乃至槍殺。

五、中共黨內不但實行絕對的官僚集中制，而且把毛澤東捧成爲「東方的太陽」，中國的斯大林。同斯大林一樣，他在中國是馬列主義的唯一解釋者和發揮者，黨和國家政策的唯一決定者。他的「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早已被黨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確定爲「中共……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和「黨員努力提高自己覺醒……的基礎」*。毛所決定的任何政策，乃至他所發表的任何言論，都只許黨員學習和遵守，絕對不容批評和反對的。

* 中共黨章總綱第二段：中共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個黨章的第二條又規定：「凡是黨員有下列的義務：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

以上這些便是中共走上政權直到朝鮮戰爭發生這一時期內所表現的絕對不可爭論的事實。這些事實，難道還不夠證明：中共不僅在為政權鬥爭當中沒有離開斯大林主義，即在取得政權後這一段時間內（一九四九—一五一年）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

也許史和梁起而爭辯說，至少在朝鮮戰爭發生後，特別是從一九五三年起，中共已脫離了斯大林主義。因為它不僅拿起武器來抵抗美帝國主義，鎮壓國內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的反攻（如「五反運動」）而且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而採取「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綫」（一九五三年初公佈），實行五年計劃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乃至公社化。

是的，在朝鮮戰爭發生後，在國外帝國主義進攻和國內資產階級及地主反攻的致命威脅之下，像以前在蔣介石的致命進攻之下一樣，中共又被迫前進了一大步，放棄了它的新民主主義的反動幻想，採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但這並不等於表明它已脫離了斯大林主義。這不過是在斯大林主義的基礎上經驗主義地向左跳躍而已。因為它對資產階級的財產雖已由保護改為逐步沒收（通過公私合營），但仍允許資本家拿「定息」，並且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還容許合法存在，並部份地參加政權。尤其是對外政策依舊是「和平共處」，並發揮成為周恩來和尼赫魯的「五項原則」；另一方面，對工農群眾的民主權利還是一樣的限制，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及其他的革命份子依舊鎮壓。中共黨內的官僚集中制和國家的極權政制且愈來愈發展。它的工業化的實施是依靠行政的鞭子，尤其是它的農業集體化和公社化更是用行政的命令強迫實行的，這就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冒險主義。我們不要忘記，斯大林也曾實行過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但並沒有因此離開了他自己的斯大林主義。因他實行這種政策時，是用

行政的命令，帶有很大的冒險主義；不是按照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而是在官僚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共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僅是從斯大林抄襲過來加以某種修改而已，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說到這裏，我必須特別指出：一個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義的黨，如果它要離開斯大林主義而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它的內部必須經過嚴厲的思想鬥爭，把一切有關現代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在黨內進行公開的無限制的爭論，在爭論過程中，把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一切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和官僚集中主義加以徹底的消除，並排除一些頑梗不化的斯大林主義者，才是可想像的。但中共黨內，無論在它奪取政權前或在為政權鬥爭的過程中，以及取得政權後轉向「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時，都沒有經過對斯大林主義思想的任何清算。

事實恰相反，當斯大林還活着的時候，中共曾下令所有黨員以及機關的幹部和學校教職員及學生等學習斯大林的思想，如在聯共第十九次大會以後中共所發動的「學習斯大林思想運動」；當斯大林剛死時，毛澤東在追悼他的演辭中說：「斯大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列主義的不朽文獻，他所著的『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史』以及最後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近百年來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綜合。」（毛這裏所指的斯大林的著作，正是斯大林主義的「精髓」，是他背叛馬列主義，偽造布爾塞維克黨史的「結晶」。）中共中央根據毛這個演辭的指示，立即發動了一個最大規模的普遍全國的「學習斯大林思想運動」，強迫所有的黨員、團員、學校教職員、學生、一切機關幹部及群眾組織的成員等都參加「學習斯大林的思想」，不斷聽報告和進行討論，歷時達數月之久。

最後，就是赫魯曉夫在聯共第二十次大會上清算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暴露其荒謬的錯誤和罪惡，中共除了被迫承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一些錯誤外，還是盡力為後者辯護，並推崇他在鞏固聯共，建設社會主義和發揮馬列主義思想上偉大的貢獻（中共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教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幹部的集會上並聲稱：「我們必須保護死的斯大林」，這就是說，必須保護斯大林的「榮譽」或「功績」及其思想。

從前面列舉的事實，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斷言，史和梁肯定「中共已脫離了為一般人所適當了解的斯大林主義」是沒有根據的。事實恰相反，由於幾次的「學習斯大林思想運動」，斯大林主義在中共內部，至少在其領導層中是更為加強和硬化了。

中共政權與蘇聯斯大林政權的對照

如果承認中共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則它的政權的性質也就自然地被決定了。但史和梁却堅持中共在為奪取政權的行動中已脫離了斯大林主義，因而斷定「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主義式的政制……」（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二十九期）他們為了辯護這種新意見，又引證了一大套理論和大批事實。這便迫着我不得不跟隨他們的理論和事實去作進一步的檢討。史和梁自己首先提出問題：「這個政制是否可以僅憑其在斯大林主義學校中的訓練，或由說明斯大林主義的特質不同於社會主義，因而就能得出確定的定義來呢？」接着他們自行答覆說：「此等敘述，對於嚴肅的研究，是沒有甚麼幫助的……我們應該仔細地把中國事變的發展，同蘇聯斯大林政制下的情形，就其相似點和其對照處加以分析。」（同上第二十二頁）他們把中共的「斯大林主義學校中的訓練」和「斯大林主義的特質不同於社會主義」

視爲無足輕重和「對於嚴肅的研究，是沒有甚麼幫助的。」根據這個理論，則社會民主黨的「在社會民主主義學校中的訓練，或社會民主主義的特質，不同於社會主義，也是對嚴肅的研究沒有甚麼幫助的了！」但他們忘記了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的極端重要的遺訓。這裏我暫且把這個理論和行動的關係，即理論決定行動的性質（包括政權的性質）的問題放在一邊，讓我們來看所謂「中國事變的發展與蘇聯斯大林政制下的情形之間的相似點和對照處」吧。關於這方面，史和梁告訴我們說：

「我們常把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興起，及其結晶成爲一個特殊階層，歸因於特殊的歷史時機。根本上說，這一制度的興起，乃是由於世界情勢，及其內部各種因素和各種勢力之特殊的互相結合而形成的。此處只須提到這個國家的經濟落後性，及其在敵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之孤立的情勢就夠了。」（同上）

是的，在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興起，及其結晶爲一個特權階層，係因特殊的歷史時機所致。根本上說，乃是由於……這個國家的經濟落後性，及其在敵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之孤立的情勢。」但史和梁根據「中國第三次革命」係在顯然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而展開，（同上第二十三頁）以此來證明中國不可能有「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興起及其結晶成爲特權階層」，這却完全是錯誤的。因爲他在這裏所作出的「相似點」和「對照處」是很機械的，如根據辯證法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幾個基本點：一，既然認定俄國的「經濟落後性」是「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興起，及其結晶爲特權階層」之最基本的客觀原因，則中國的「經濟」比之俄國更爲「落後」，這是史和梁也承認的

。例如他們說：「新中國的起步點，在經濟落後的程度上，較諸當時年青的蘇維埃聯邦，更為厲害」；「官僚主義的誕生，乃是由於必須分配一種貧乏的國民財富而引起的。革命中誕生的社會愈貧窮，則其官僚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愈危險。」（同上第二十七頁）這便等於說，中國比之俄國在客觀上更容易形成和發展「斯大林主義官僚，及其結晶成的特權階層」了。

二，要避免「斯大林主義的興起，及其結晶為特權階層」，只有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取得勝利的直接援助之下（包括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技術的援助），才有可能。但中國和當時的俄國一樣，並沒有獲得這樣的革命勝利的援助。

不錯，史和梁爭辯說：「在中國革命的發展中，已可以從目前已相當進步的蘇聯資源中獲得軍事和經濟的援助了。」（同上第二十三頁）但他們忘記了，蘇聯，不管它的「目前已相當進步的資源」，正是一個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的早已墮落了的工人國家。它對中國的「軍事的和經濟援助」，固然一方面可以幫助後者去抵抗帝國主義的侵入（如在朝鮮戰爭中），和建設一些社會主義性的工業；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共更依賴於克里姆林宮的官僚而受其控制，因而更加速發展了「中國的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及其結晶為特權階層」。最具體的事實是：隨着蘇聯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援助」而來的，是成千成萬的軍事顧問、政治顧問、經濟顧問和文化顧問及各種專家或技師等等——這些都是屬於蘇聯的官僚層的。他們把他們在蘇聯處理事務的官僚方法和特權享受的習慣，都帶到中國來了，並教導了中國整代的新官僚。

在「國際發展」方面，雖然中共所處的時代和條件與蘇聯當時所遭遇的大不相同。但有一個基本點是相類似的。那就是第二次大戰後，西方先進國家法意的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像第一次大戰

後德意的工人階級革命運動一樣，已遭受了挫折。雖然遠東、近東乃至北非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斷興起，但除了北韓和北越外，其餘國家的政權都落在土著資產階級手裏，成立了所謂民主的議會式的政權（如印度、錫蘭、緬甸、印尼等），或成爲軍事獨裁（如埃及和伊拉克等）。這些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權或軍事獨裁，不但對於鼓勵中國工人階級及抑制官僚主義的發展無所幫助，反而以中立的幌子大大加強了中國官僚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的欺騙性。此外，而且是重要的，東方唯一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完全落在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美帝利用日本爲基地，把南韓、台灣和南越連結起來，形成了對中國的封鎖綫或包圍網，不斷地威脅着它。

三、俄國布爾塞維克黨是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之下，經過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直接地舉行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但由於國家的落後和西方工人階級連遭挫折，而陷於孤立，致使原來最革命的黨墮落，國家的政權落入官僚手中。而中共自始即在斯大林主義者毛澤東領導下，他不但沒有去動員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羣衆，在城市舉行暴動來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反而盡量抑制工人羣衆的活動，單靠農民軍攻打城市，僅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特殊有利條件，才輕易地走上了政權。因而這個政權自始就是斯大林式的政權。

正由於蘇聯的政權，是工人階級在一個真正的革命黨領導下武裝暴動勝利後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所以當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篡奪這個政權而轉變爲官僚獨裁時，曾經掀起了暴風雨的反抗（如托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最後經過「特爾米多」，即：「它（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曾絞殺列寧主義的黨，並摧毀了曾經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引領革命走上勝利的整整一代人的生命

。」（史和梁的話，見同上第二十三頁）而中共的政權，因為自始就是「一個斯大林主義式的政制」，只須依照其邏輯往前發展，而不須經過「貶質」和「特爾米多」了。

上面所列舉的幾點的分析，已足夠證明史和梁企圖從「理論上」判斷中共政權與蘇聯斯大林的政權根本不同，或「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式的政制」是錯誤的。他們錯誤的根因，乃是以機械的「對照」代替了辯證法的分析。

托洛茨基解釋「官僚全能制的條件」時曾經寫道：「消費物資的缺乏和爭取這些物資的普遍鬥爭，產生了警察制度。這些警察擅自擔負起分配物資的責任。來自外部的敵視壓力，予這些警察以保衛國家的任務，賦給他們以國家的權力，並允許他們加倍地來掠奪這個國家。」（見「保衛馬克思主義」第七頁。）這個解釋可以完全適用於中共統治的中國。

固然，「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興起，及其結晶成爲特權階層，是不會在別的地方，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一成不變地重覆產生的。」但在某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條件之下，例如在蘇聯勢力所達到的地方或克里姆林宮所控制的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國家裏，「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興起，及其結晶成爲特權階層」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現的。東歐諸國的情形便是前者的具體表現，中國及北韓和北越則是後者的證明。

特權階層的形成，發展及其特權享受

我在我的「中國局勢的報告」裏已經指出：中共的「頑強而固執的官僚層」早在奪取政權之前，在它所佔據的農村區域裏已經形成了。自從取得政權後，這個「官僚層」很快就「凝結成一個特權階層」，因爲這個「官僚層」壟斷了國家一切政治的、軍

事的、經濟的及文化的機關和權力，隨着機關的擴大和權力的增加，這個新的「特權階層」把大量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的知識份子，一部份工人貴族（所謂勞動英雄或勞動模範，即史達漢諾夫份子），乃至一部份資產階級份子（通過它與他們的合作）吸入到它的隊伍中。這樣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這個階層的數量，比之斯大林統治的蘇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篇幅有限，我這裏不能分析中國官僚層內部的構成分子及其大概數目，但與蘇聯的情形是類似的。關於構成蘇聯官僚層的成分的分析，請參考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三五——一三九頁。）它同蘇聯的特權階層一樣，構成一個金字塔，其本身分成許多等級，壓在它底下的是廣大的工農群眾和一切勞苦人民，站在它的尖端的是毛澤東。這個金字塔的等級的嚴格劃分，從中國軍隊完全模仿蘇聯軍隊的官階制，即從尉官、校官、將軍到元帥的等級中清楚地反映出來。

這個特權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其結果自然是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和加深，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大工業群眾的生活水平的降低和特權階層的特權享受之與日俱增。

關於國內工農群眾生活水準的低下，似乎沒有任何人否認（即史和梁所極度推崇的鄧鏗，「客觀的觀察家」，在他所發表的「今天的紅色中國」裏面也是承認的）；成爲問題，引起爭論的只是中共統治下的官僚層是否享受特權和具有保護其特權的警察制度。關於這方面，史和梁作了如下的申辯：

一、「承認官僚傾向的存在，完全不能說明北京政權的特性，屬於我們所了解的特權階層的統治。那就是說：一個業已硬化的寄生性社會結構，站在人民的頭上，消耗了國民收入中超額的一部份，而不顧群眾的意志，僅知保護自己的

權力和特權的一種統治，目前並無此一認定的證明；也沒有辦法足以證明：爲保護此一等級制度所必需的無所不在的警察制度業已存在。」

二、「竇森在他那本四百頁厚的著作中也曾提到某種程度的社會分化，其唯一例子是：由政府供給伙食的幹部們有『大灶』與『小灶』之分。凡屬部長級或獨當一面相當於此一等級的幹部，都可享受『大灶』，他們的伙食較諸一般『小灶』的伙食可以有更多的肉量。* 但竇森接着說：『根據人們的傳說，我更設法去探尋那些生活放蕩的共產黨人，結果却碰不到一個堪當此一稱呼的人。』」

三、「在柯拉克的一本書中，也可以看到一點最爲新鮮的敘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的生活，是刻苦而幾近於僧院式的，他們領導着幾百萬的追隨者，正獻身於民族的建設。」（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第二十一卷第二期第二十八頁。）

史和梁在上面所提出的否認中國有特權階層存在的「論據」及其所徵引的「事實」，是特別重要的，因而值得特別加以檢討。因爲假使他們的論據是正確的，竇森和柯拉克所觀察的事實是可靠的，那末中國便與蘇聯完全不同，根本沒有特權官僚階層的存在，有的僅是爲工農群衆的利益和爲社會主義建設而服務的清廉的官吏而已。事實果真如此嗎？這裏讓我們儘可能從周鯨文關於這方面的報導中引證一些最具體的事實來與竇森和柯拉克的觀

* 譯者註：此處「大灶」和「小灶」的說明有錯誤。因爲據我們了解，「大灶」是低級幹部用的，「小灶」則是高級幹部享受。此處原文似乎把它顛倒了。現只據原文譯出。

察來對照一下吧。周鯨文是與中共合作的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他又是人民政府的政治和法制委員會的委員，（這個委員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和彭真任正副主席，其任務是製訂國家一切行政和司法機關的制度和規章。）和人民大會的代表。他參加中共的政權達八年之久（一九四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離開了中國大陸（據說是得到毛澤東的允許）到香港，寫了一本「風暴十年」的大書（近六百頁），底下便是該書對中共統治下的官僚的特權享受的描述：

「共產黨自詡說，共產黨人的品質是高貴的。斯大林且說共產黨是特種材料製成的。就我個人來說，在我未看過他們的生活和行爲時，在我腦裏，也曾有過一個時期，以爲革命政黨的成員一定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雖不同意他們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對他們有幾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來與他們相處，得以看到了他們的生活，我這點敬重之心也烟消雲散了。」（「風暴十年」一一二頁）

「寫共產黨人的生活花絮，本可成書，但這裏的篇幅是不允許這樣作的。我只能根據實情，描劃一個輪廓。同時我要請讀者注意，中國共產黨人是處在窮苦不堪的今日中國的社會裏，它不是物質豐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也不是號稱革命三十年已到社會主義階段的蘇聯，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內戰後瘡痍滿目的國家。人民住的是破房子，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平均每人佔二公尺房間的地位；吃的是雜糧，在窮苦地區，吃的是糟糠、樹葉、野菜；穿的是粗布，在窮苦地區的人民穿的襤褸不成樣子，……這是中國人民真實的生活。有了這個背景，在我們描述共產黨人的生活——一個以改善人民生活爲號召的革命黨人的生活，才能突出的驚人

。」（同上書一一二——一一三頁）

「人們的生活的大輪廓，在物質方面是衣、食、住、行和聲色（娛樂）。我們就以這個範圍介紹共產黨人的生活。在住的方面，一九四八年以前，黨的首腦在延安住窯洞，一九四九年後搬進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故宮），他的大小幹部進佔了北京、天津、上海……最好的樓房，他們和資本家換了班。原有的陳設看來已經很好，他們還要修整一新，添設更多更好的傢俱。地氈必求特製，沙發必求舒適，浴池面盆必要進口貨，花園必求精美，僕役上下奔走如雲。如果你訪問這個住居，關上大門，放眼一看，這決不是窮苦不堪的中國，而是紐約富豪的別墅。」（同上書一一四頁）

「但是原有的樓房到底有限，……於是從北京起，在全國各大城市大批修建要人的住宅，建築要新式的，設備要摩登的，這才合乎新貴族的口味，於是你每到一個城市，不管城級是大是小，凡是一片新建築的地方，就是新貴晏居之所。」（同上）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在北京西郊建造『王府』，今日稱之為別墅，等而下之的首長以及省市一級的首長都群起效尤。社會主義的建設首先就是共產黨首長的美輪美奐的住所。繼之是建造幹部宿舍大樓、禮堂、跳舞廳之類的獨佔享受推行到了全國。」（同上書三〇一頁）

「此外，在大小城市，除了原有的一級的旅館作為招待外賓和幹部的招待所，還一律建築一些新的大樓為貴賓和要人的來往居住。據我所看到的，只有上海因為外國人遺留下來的洋樓、旅館太多，故未建造新的，其餘地方都是場面一新。這些招待所，人民固然不能住，就是摩登式的大旅館，

人民縱然有錢也不許進去，如北京的北京飯店、和平賓館、六國飯店、前門飯店、西郊賓館、新僑飯店……，上海的錦江飯店、百老匯大廈……，天津原有的利順德飯店、泰來飯店……，這些新起的和舊有新修的大旅館，除了被招待的外賓、歸僑和幹部進住外，所有中國人只有資格遠遠站在牆外企足仰望一下而已。」（同上書一一四頁）

「其次，我們再談談新貴的食，……外邊人只知道中共的上中下三級幹部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別。小灶為高級幹部專有，中灶則為中級幹部的伙食，大灶是為一般幹部用的。這已粗略說出上中下的區別。但是等你走進幕後一看，上中級『首長』不但有富麗堂皇的『公館』，還享受吃不盡的山珍海味，至少我看見過的部長級的人們，全係如此。每家都有有名的廚師，過去侍候過王公大臣和軍政大員的廚師都侍奉這些新主人。在要人公館裏，我吃過溥儀（宣統皇帝）的御廚師所作的中菜西菜。此外，各大飯店的名廚師，也都調來各公館侍奉。我每在各首長家裏吃飯，他們必津津誇耀他們的廚師過去侍奉過那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飯店調來。從這大批廚師的徵調到『公館』，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吃的不是白米鹹菜，而是鷄鴨鵝魚、山珍海味了。那麼在中國不是限制買肉和食油嗎？這對權貴是例外。他們有特許的購肉購油券，市場開市，先有卡車或吉普車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們取用，剩下的輪到人民頭上的是些殘皮碎骨。『首長』們在家裏吃喝還不算，最熱鬧的幾乎是成年大擺筵席，一擺就是百桌以上。北京飯店、和平賓館、新僑飯店、懷仁堂……是這些宴會的中心。你幾乎每天可以看到晚飯的時候，北京飯店門前擺上六七百輛汽車，不到過北京的人難以想像，到過

北京的人就司空見慣。」（同上書一一六頁）

「統治階級享受特殊權益，肥鷄肥鴨由農場不經過市場先送到黨政首長的家裏，有專供黨政要人的農場菜圃，一般在市場買不到的東西，或是買到也是劣等物，而特權階級則是享用一等東西。以東北的蘋果論，上等蘋果是供給要人。……北京的水蜜桃……收穫季節一到，政府把一等貨色全都包下留為政要及貴賓之用。……新疆的哈蜜瓜一下來，政府就用飛機運了一批到北京，為毛主席及政要們嘗鮮。廣東的荔枝一下來先送到北京，……其他全國所有的上等貨，人民看不見，嘗不到的，北京的首長先嘗第一口。」（同上書三〇二頁）

「其次再說到『行』。這是交通工具問題。中國人民在鄉間多是步行或騎驢馬……，在大城市有電車和公共汽車，只有新貴才許乘汽車，而且高級首長特備專車。共產黨在分配車輛時特別着眼階級，官大的地位重要的坐頭等好車，次要者次之。就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一級的人物乘坐從蘇聯買來的吉士，部長級坐蘇聯的吉摩，部長以下乘坐美國的汽車，或是蘇聯的勝利牌，再次就是機關公用車，那是一些雜牌的舊車。……人民是無份乘坐汽車的。……所以在各大城市有個明顯的標記，乘坐汽車的必是要人或中上級幹部……。」

「新貴們的汽車本來是為『首長』代步辦公而用，但太太看戲坐汽車，少爺小姐上學坐汽車，每天晚上戲院影院門前是擺滿了汽車的長蛇陣。在炎熱的夏天，人民在街道上散步，權貴們的汽車飛過，塵土蔽天。在寒冷的冬天，汽車飛過，留給人民面上的，是冷風夾着灰塵。」（同書一一七一

——一八頁)

「現在用幾行字談談共產黨的衣的問題。共產黨穿着襤褸的衣服進了城時，城市的人都欽佩說：『看人家共產黨人的儉樸！』於是成了一種風氣，大家學共產黨人的儉樸，……

「在全國人民熱烈學習共產黨人的儉樸時，共產黨首腦人物，一進城就換了新衣。西洋毛料的制服，冬天是狐皮、貂皮外套、海龍皮領、水獺皮帽。於是共產黨由上級到中級實行這樣的打扮。……老爺如此打扮，太太也不能落後，於是也照樣的穿呢料、穿皮襖，小姐少爺也摩登式的打扮起來。……在百貨公司裏買穿戴的多是共產黨首長，出入大飯店衣帽整齊的多是共產黨人。」（同上書一一八——一一九頁）

「在紅色的中國最近幾年來，民間的娛樂只有電影、聽戲、聽大鼓，沒有了舞場，沒有了跳舞之所。可是各機關無論大小，每星期六或節日都有晚會，有時是演劇，多數是跳舞。中南海的懷仁堂和趙登禹路的政協禮堂，除了白天正式開會，晚間似專為晚會而設的。一有晚會，要人的汽車如流水一般蜂擁而至，動以千輛計。……

「值得一提的，在一九五六年春政協開會期間，會後……毛澤東順口提到了周信芳（上海著名戲子）的名字。陳毅副總理在場，他猜測一定『主席』想看周信芳的戲，當即打電話到上海把周信芳的全班人馬用專車急速送到北京，結果第三天我們在懷仁堂看到了這不遠千里而來的周的劇團的演出。

「共產黨機關活躍的是週末晚會，當人民無處尋求愉快

的場所時，共產黨各機關晚會却熱火朝天，而各機關最精彩的晚會，不是一般的各機關，而是中央首長要人的中南海紫光閣的跳舞晚會。這裏的音樂是一級的，設備是華麗的，服侍是周到的，女人是特邀漂亮的，飯食是豐富的，氣氛是溫柔醉人的，參與的人是中央高級首長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高級黨、政、軍首長，這一群統治中國的人物。」

（以上均見同引書一二二——一二三頁）

「共產黨人的休養消遣地點在北方是避暑山莊北戴河，海濱是青島和大連星個浦。在南方是廬山、黃山。這些地方過去便是避暑休養勝地，從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資本家出入之地，他們有別墅洋樓……現在這些樓房別墅的主人是共產黨。共產黨……論氣魄比過去資本家、政要、洋人還大，它又建築不少新樓房，佈置了新場面，出入其間的是毛澤東以下的一批大官。不過爲了點綴工人階級領導的門面，選一二所破樓，或建築一所貨倉式的磚樓，掛上工人休養所的招牌，於是在報上宣傳的不是高樓大廈的休養所，而是工人休養所的照片。

「這些要人一到休養之期（多是夏天）就紛紛去休養了。他們坐着專備火車，帶着廚子、看護、醫生、大批隨從，全家老老小小去休養了。於是北戴河、青島、大連、廬山等地，青山綠水間，談談笑笑的只有黨政要人，生活是舒適的，舉止是豪華的。這個新貴族獨佔一切，而供奉這個新貴族的普通人民是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以一副哭喪的臉孔注視着新貴族的享受。」（同上書三〇四——三〇五頁）

「這種奢侈腐化的生活首先由黨最高首長作起，漸次風靡到中級，就是黨的下層也有不同程度的在這一方面的滿足

。」（同上書二九九頁）

中共這個特權階層如此地奢侈享受，其費用的來源是怎樣規定的呢？周鯨文告訴我們說：「雖然近幾年來，一概改爲薪金制，但薪金之外，在公費下並不妨礙共產黨人的予取予求。」（同上書三〇〇頁）所謂「公費」就是由「國庫開支」。「就名正言順從國庫開支項下來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高級人物的生活享受是要甚麼有甚麼，不必來講。其他受有一定限制的特權階級份子，他們是黨員當然又是官員，黨員公費是由國庫開支，所以提到他們的開支不必分甚麼公私。中上級的官員享有官房、專車、僕從；出門不論爲公爲私都是公費開支，到甚麼地方，車船都是一等的。中下級待遇的程度就差些，但有一條是肯定的，一切開銷都是公費。就以一個解放軍的團長來說，他有足夠的薪金，有官房，有無線電收音機，有汽車可用。出門，旅費實報實銷，車船旅館都是一等的。有病住國家醫院也是二等病房以上。」（同上書三〇五——三〇六頁）

「共產黨這個政權，是歷史上空前的龐大機構，有千多萬黨員，二、三百萬軍隊，二千多萬機關人員，……。這個寄生階層由頂上層的窮奢極侈，到下層的吸精髓喝血，這種超生活所必須的物質基礎，就是這個無拘無束的經濟制度使然。」（同上書三〇六頁）

周鯨文在上面對中共特權階層的奢侈生活享受的描述，在中共官方的報刊上亦間或有所透露。例如當中共中央打擊某些不同意見的幹部官員時，常常指責他們生活如何奢侈享受和浪費等。尤其在一九五七年鳴放高潮中（四月——六月），各方面指出中共官僚享受特權和生活奢侈的無數事實，（這些事實的一部份會披露於人民日報，特別是大公報和光明日報。）這便從另一方面

證明周鯨文在上面的敘述是可靠的。周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他自稱社會主義者，贊成大產業國有化，但他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及其基本政策，同時他認定中共是代表馬列主義的黨。所以當他在理論上批評中共的政策時常常是錯誤的和反動的。但當他用事實來暴露中共的專橫和特權享受，以及描述工農群眾生活的低下和痛苦時，却是有根據的。因為他不僅參加了中共的政權達八年之久，而且由於他的參加政權的資格，得以與中共上中層官僚的生活接近，並幾次被派至各地，特別是農村訪問和調查，因而所得到的資料是第一手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周鯨文所提供的詳細而具體的事實，不但足夠推翻竇森和柯拉克的「觀察」，從反面證明柯拉克所報導的「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的生活是刻苦而幾近於僧院式的，他們領導着幾百萬的追隨者，獻身於民族的建設。」是完全虛構的神話；而且充分表明：「北京政權的特性屬於我們所了解的特權階層的統治。那就是說：一個業已硬化的寄生性社會結構，站在人民頭上，消耗了國民收入中超額的一部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現在留下的事實僅是：究竟有沒有「為保護此一等級制度所必需的無所不在的警察制度。」

關於「無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之証據」

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剛失敗後，中共便已開始了特務的組織。那時這種特務主要是為抵抗國民黨特務對黨部機關的破壞。隨後，當毛澤東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政府」時，此種特務組織亦輸入到那裏，成為地方的特務警察。當一九三五年毛澤東從江西轉到延安之後，特務組織繼續存在和發展，並有蘇聯的格柏烏

參加。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成立其人民政府後，特務警察網立刻普及全國，成爲正式的公安機關，並有大批的蘇聯格柏烏專家爲顧問，幫助中共製訂計劃，訓練特務人員，完成了這個公安警察的系統。現在讓我們看周鯨文的關於中共的「警察制度」的描述吧。

「共產黨利用鎮壓機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深入的爲警察機關。毛澤東的打手——特務頭子羅瑞卿是公安部長（羅現任參謀總長）。這個系統的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市、各縣和各區去領導鎮壓工作……共產黨的警犬是有高度能力的。他們生活在人民之中，圍繞着人民，人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管制和監視之中。」（「風暴十年」九八頁）

「共產黨的警察制度，高級的是中央公安部，省的是公安廳，縣市的是公安局，區的是公安分局，直到基層的公安派出所——這是一個直接管治百姓，監視人民的有效機構。公安派出所是分佈在居民區，每一派出所管轄一定的戶數，它管制人民的一切，試列舉一下，戶口由它管，凡人出門（指離開當地）先要到派出所聲明去處、任務、何時回來；遇有客人來訪問居留，三日內必須報戶口，說明來處、身份、來此何事。警察以調查戶口爲名，不管黑夜白日，隨時進入民宅，問東問西，目光四射，居民若買點私人的東西，必須由派出所蓋印登記，你如由別處寄點款來，也得寫入戶口簿上以憑察看。」（同上書九八——九九頁）

「警察的工作雖是深入民間，但這還是表面的，警察的後面還有街道委員會，它受派出所的指示，一切有關動員、捐獻、推廣運動、了解各家情況，統由街道委員會負責；或用開會的辦法，或派代表分家訪問，它的任務也是警察的任

務，它必須按時向派出所報告一切情況，防奸細，防特務……爲其重要的任務。在派出所、街道委員會之外，每個人，每一戶都有一種特派的使命，尤其是派出所認爲積極的份子更須擔當這個任務，那就是每個人都有責任監視其家中的其他成員，每一戶有責任監視鄰居，凡是認爲有可疑之處，隨時報告派出所。每人每戶的一舉一動，都在衆目的監視之下，都有被檢舉可能。在共產黨警察統治之下，一家人夫妻不能相信，父子不能相信，兄弟姊妹不能相信，親友間不能相信，鄰居不能相信，每個人每個戶都是其他人其他戶監視的對象，每個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共產黨製造了黑雲彌天，每個人都是疑惑其他人是自己的敵人，是派出所的密探。每個人都爲保護自己，作出最大的謹慎，同時又有些人爲共產黨指使陷害他可能陷害的人。」（同上九九——一〇〇頁）

「所以，我們說共產黨的政權是警察國家，這不單指這個警察機關，是應該把警察所佈置的這套警察網統統包括在內。在這個網裏，誰人不恐怖，不驚心，不低頭了？但於對付一般居民之外，在機關工廠、企業、學校等等範圍內，又有一套辦法。平時在機關工作的人，一言一行也都被監視，一句不得體話也會被人報告，或在檢討會裏被人提出批評。每個人的背後都有許多若隱若現的陰影，每個人都是另外人的監視者。這就搞得大家精神不安，守口如瓶，說起話來滿口馬列主義術語，行起事來小心翼翼。在機關裏每個人都是囚徒，機關也如同監獄一樣。」（同上書一〇〇頁）

周鯨文上面所描述的「警察制度」，我們本可以舉出許多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它的真實性，但由於篇幅有限，我這裏僅舉爲我

們托洛茨基主義者所親身經歷的兩個事實：

一，當中共取得政權後不到一年，經過它的嚴密的特務活動，把我們組織在各地的負責人、黨員、甚至同情者和朋友，都調查得清清楚楚。所以在一九五〇年秋上海、溫州和廣東等地的負責同志幾乎同時被捕、監禁，乃至槍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上海及各地的同志、同情者及親戚朋友，一律被捕入獄。

二，一九五五年春我們的焦同志旅行廣州時曾訪問一個朋友，當他到那個朋友家裏不到五分鐘，即有一個街道委員會的負有特務責任的人闖進來，監視他和他朋友間的談話。

單是上面這兩個事實，就已夠反映「這個北京政權之無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了。因此我可以說，中共統治下的警察制度，比之斯大林統治下的格柏烏制度假如不是更為嚴密，至少也是相等的。假使史和梁要否認周鯨文的報導和我們的判斷，讓他們提出具體的事實來加以反證吧。

全國人大選舉和全俄蘇維埃大會選舉相類似嗎？

史和梁爲了贊揚北京政權的民主制度，除了根本否認特權階層和警察制度的存在外，便是把產生人民政府的人民會議盡量加以美化。例如他們在「關於普選政府」的標題下寫道：

「據寶森說：這個機構（指「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彭註）後來爲人民代表大會替代了。……到一九五三年時，原先聯合陣綫的最高機構，已由鄉村、城市里弄以及其他選舉單位選舉人的投票選舉所替代，……產生了一個由民主集中制選出的政府。依照這個制度，先由低級選舉團體選出高一級的選舉代表；再由高一級的選舉代表，選出其直接的上

級代表。」

「寶森自描述了第一次在北京舉行的此一正常選舉後指稱：代表是直接從大工廠、大學和城市各區選出的。較小的單位可以聯合產生共同的代表。所有此等代表，都可以在選舉人的要求下被罷免。這同布爾塞維克時全俄蘇維埃大會的選舉是極相類似的。」（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二頁）

史和梁僅僅根據寶森對北京人民會議的簡單報導，絲毫沒有注意到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選舉所必須的條件和具體辦法，即行斷定「這個選舉同布爾塞維克革命時代的全俄蘇維埃大會的選舉極相類似」，這比之他們一聽到公社有「選舉出來的委員會」即行斷定「此等公社是自治團體」更為輕率荒唐。我在批評他們對公社的「選出的委員會」的錯誤判斷時曾經指出：

「為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必須具備某些特定的條件：工農群眾必須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等的充分自由；其次，選舉時各級都實施秘密投票；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乃是保證一切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合法存在。可是今天的中國，也同東歐各國一樣，此等條件是並不存在的。（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二頁。）

中國今天不但沒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所必須的條件，而且在極度嚴密的警察制度控制之下，人民會議和公社一樣，絕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選舉。可能實行的只是「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普選權利之幻象」，（見「過渡綱領」）那就是，所有的人民會議或公社委員會在進行選舉時，都由中共指定候選人名單交給各選區或選舉單位的群眾或代表們去投票或畫圈而已。這在中國

大陸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現在我們仍舊讓周鯨文來作見證。他是親身參加過一九五三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特別是參加了北京地區人民會議的選舉的。底下便是他對於各級人民會議的選舉及其產生行政機關的描述：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單是由中共一手包辦。各級政府的委員會委員候選人的名單也是由中共包辦。這是說，在鄉人民大會，出席的人由共產黨指定，大會選出的鄉行政人員也是由共產黨挑選出來的，指定的。所謂選舉是共產黨指定的人們，讓群眾或代表舉手或投票表示贊成。在縣一級的人民代表大會或縣政府委員會，以至省級和中央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委員會統統是如此作法。」

「代表候選人名單由黨內定，交給選舉單位將其選出。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千多名候選人是共產黨中央就中央和各地方挑選五六百人，然後令各省以選區名義爲之選出；其他一半由各省級黨委會就當地情形擬定一張人名單，請中央批准，然後同中央指定的候選人名單一併選出。省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候選人由省黨委決定一部份，和縣級黨委決定一部份，經省級黨委批准，一併交縣人民代表大會選出。至於各級政府行政人員一律由共產黨內定提名在大會一致通過。這些代表候選人在任何大會提出的，也都是通過的。同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候選人是和代表人數一致的，即是有多少代表，就有多少候選人，而不是候選人名單人數超過了代表人數，俾可由選舉者就候選人中有所選擇。簡而言之，就是交給你這些人，你就選這些指定的人；如果你不同意某人，只是在名單上某人名上不畫圈而已。但是你不喜歡的這個人還是會被選出，因爲大多數人一定是畫圈的。何況在選舉之前

，共產黨發動說服，希望把候選人名單一致通過。實際上各人民代表大會凡是遇有這種名單沒有不是絕對多數或一致通過的。」（以上均見「風暴十年」四一五——四一六頁）

從周鯨文上面所描述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政府行政委員會的選出，便充分證明：竇森報告的「一個由民主集中制選出的政府」是完全虛偽的了。實際上正是托洛茨基所說的：「希特勒和戈培爾式的普選權利之幻象」。我已經說過：「中國的人民議會是仿照東歐各國的人民議會一個公式的；而東歐各國的人民議會，則是斯大林式的社團。」（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二頁。）史和梁說：「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同布爾塞維克革命時代全俄蘇維埃大會的選舉極相類似」，便無異於說：「斯大林式社團的選舉，是與布爾塞維克革命時代全俄蘇維埃大會的選舉極相類似的」。

關於「布爾塞維克革命時代全俄蘇維埃大會」進行選舉時所具有的民主條件和民主方法，我們大家都知道，無須重覆。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布爾塞維克革命時期的蘇維埃是根本排除了一切剝削者的選舉權的，而中國的人民代表會議則在法律上承認資產階級份子及其政治代表（如民主同盟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之類）參加選舉，具有選舉和被選舉的全部權利。因此在過去兩次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中，各級人民代表會議都有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資本家當選，並被選為各級政府的行政機關的委員，這表明人民代表會議的階級內容與當時蘇維埃的是本質上不同的。而史和梁竟認定包含資產階級份子的人民會議與徹底排除了剝削者的蘇維埃「極相類似」，未免太令人驚奇了！

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與不斷革命論的被歪曲

史和榮在斷言中共已離開斯大林主義，中國沒有特權階層及保護其特權的審察制度，以及讚美全國人民會議的選舉之後，便進而對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全部進程加以描述和總結說：

「接着（指朝鮮戰爭發生後——彭註）中共領袖們遂提出了他們的社會主義過渡總路綫：凡屬前此曾受政府鼓勵，在政府控制下而圖發展的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現在都須受嚴格的限制而逐漸變化，以期逐漸廢除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一九五二年末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今天，工業化問題已成爲主要的目標了。」

「在農業方面，事變的進程，是從早期的互助組出發，向着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的方向進行，最後達成社會主義式的社會經濟組織——公社，與工業化的進行並步前進。這個有力的組合，既成爲一個全新的文化之動力，同時又爲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過程，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

「因此，不管中共領袖們的觀念如何錯誤，不管他們經驗主義式的隨機轉變，以及他們的機會主義，中國革命的不斷發展，總是清楚而決定地展示出來了。每一新的階段，都與前一階段緊密地銜接着；每一階段的社會水平，也在本質上較前一階段提高了一步。其趨向於社會主義的方向，是無可懷疑的。這就表示出：不斷革命或持續革命的理論，已經明顯地獲得肯定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五頁。）

斷定中共所領導的中國第三次革命「是不斷革命或持續革命的理論之明顯的肯定」，這是一個最高的評價。這差不多等於說

，中國第三次革命同俄國十月革命一樣，是落後國家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革命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一個典範。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麼我們對於中共的政策除了無條件的支持外，再不能有所批評了。但史和梁在上面所指出的「事實」與不斷革命的理論和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是不相符的。因為他們所注意到的只是屬於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範疇，完全忽視了構成不斷革命論的含有決定意義的政治因素。而且即以他們所指出的經濟改造——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來說，當中共實施這種改造時帶有很大的冒險主義。這正是違反了不斷革命論的產物。

由於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畸形發展，早在我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尤其對於不斷革命論發生了種種誤解和歪曲。因此，我覺得根據托洛茨基本人對不斷革命論的解釋和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來檢討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發展，是特別需要的。

托洛茨基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不斷革命論」俄文版的序言中寫道：

「爲着清除圍繞於不斷革命論所造成的混亂，必須解剖包括在這個理論中的三個思想：

「第一，包括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實際上，這就是這個理論的歷史起源……

「一九〇五年復活的不斷革命論，就向這個思想和情緒（指革命階段論的思想和情緒——彭註）宣佈了戰爭。不斷革命論指明：在我們的時代，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任務直接引導走向無產階級的專政，把社會主義的任務放進了議事日程。這便是不斷革命論的中心思想。如果傳統思想認爲：走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還得經過一個很長的民主時期

，而不斷革命論則主張：落後國家走到民主主義的道路得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民主主義的本身不能停留在數十年內成爲自足的政制，而只是直接到社會主義的序幕。它們是相互緊密聯繫着的。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的中間實含有革命發展的不斷性。」（着重點係我所加——彭註）

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復活起來的這個「不斷革命論的中心思想」是完全被十月革命所證實了的。那就是：布爾塞維克黨乘着二月革命以來的民主革命潮流，依靠無產階級，並通過它領導農民（穿軍服的農民）舉行暴動，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它宣佈土地歸農民和國內民族自決（這是當時俄國的民主任務）之後，隨即將社會主義的任務，沒收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放進了議事日程。這正是從民主革命不斷地發展至社會主義革命的典型。

但中共對這個「不斷革命的中心思想」採取甚麼態度呢？它依靠農民武裝力量攻打城市（而不是依靠無產階級並通過它去領導農民在城鄉舉行暴動）。推翻蔣介石政權後，不但沒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反而和民主或民族的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或「人民民主專政」；它不但沒有把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的社會主義任務放進了議事日程，反而是「鼓勵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在政府的管制下去謀發展」，提倡「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它甚至對急待解決的土地問題也延遲進行，對帝國主義在華的財產予以保護（土地問題和沒收外國財產都是中國的民主任務）。這便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政綱。這個政綱爲中共與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黨所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所正式通過，成爲「建國的共同綱領」。實現這個綱領的時期便是所謂「新民主主義階段」。這個階段究竟需時多久，中共雖沒有正式宣

佈，但認為是長期的。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曾說這個新民主主義時期將有二十年。這就是說，從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還有個「很長的時期」，新民主主義可以「停留在幾十年內（或如周恩來所說的二十年）成爲自足的政制」（毛澤東自稱之爲「新民主主義政制」），然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這還不是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論」之典型的體現嗎？

但階級鬥爭有它自己的邏輯，這正是不斷革命論的動力。早在朝鮮戰爭前夕，特別在這個戰爭爆發之後，未經土地改革的廣大地區的農民在地主富農的剝削和新政權的苛捐雜稅重壓之下已深懷憤激而蠢蠢欲動。另一方面，地主富農和城鄉工商業資本家乘着帝國主義的進攻而實行反攻（如對政府的訂貨偷工減料，製造黑市，擾亂市場，以賄賂腐化中共幹部等），同時蔣介石的殘餘勢力大肆活動。中共在美帝所領導的進攻和國內地主資產階級聯合反攻的雙重威脅之下，不得不經驗主義地修改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政綱，重新實行土地改革，打擊地主富農，進行「五反運動」打擊資產階級，以及嚴厲鎮壓反革命等；以此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緩和工人的不滿，而獲得他們的支持。跟着於一九五三年初，中共又公佈了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化。這一切表明中共在不可抵抗的階級鬥爭的壓力之下，才被迫地放棄了它的「革命階段論」的反動透頂的新民主主義，而採取適合於革命不斷發展的一些進步措施。

但當中共採取這種進步措施時，却又極力給它們以限制。因爲它既不宣佈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更沒有準備實行農業集體化。因而將「過渡時期的總路綫」放在幾十年或半世紀內去完成。這從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所通過的決議明顯地表示了出來。根據這個決議，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是在民族的範圍內經過幾十年或

半世紀建立自足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顯然又是根本違反不斷革命論另一基本觀念——國際主義的產物。

托洛茨基在上引的同一序言中寫道：

「社會主義的國際性構成不斷革命論的第三基點。這是從現代經濟狀況和人類社會結構中產生的。國際主義不是抽象的原則，而只是世界經濟、生產力的世界發展與階級鬥爭的世界規模之理論和政治的反映。社會主義固然開始於民族地盤之上，它不能在這個地盤上完結。縱令像蘇聯所指示的是比較長久的，但終究是臨時性的統治。然而在孤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內外的矛盾必然與其進步性同時增長，如果老是孤立下去；則最後，無產階級的國家將成爲這些矛盾的犧牲品。這種危機的唯一出路只有依靠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勝利。從這觀點出發，民族的革命不是自足的整體，它只是國際鎖鍊中的一環。國際革命雖然有臨時的高潮和退潮，其本身仍是不斷的進程。」（着重點爲我所加——彭註）

正由於「社會主義的國際性」的決定意義，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剛剛勝利後即宣佈這個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他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甚至說：「我們的落後會推使我們前進，但若我們不能支持到別些國家中暴動工人們之有力的支援，我們將會死亡。」所以那時布爾塞維克黨的第七次大會的決議案說：「大會認爲：社會主義的革命已在俄國贏得勝利，只有把這個革命轉變成國際工人的革命，才能使革命的鞏固，獲得最可靠的保證。」（上引文見托著「俄國革命史」英文本第三卷三九五頁）

爲着「轉變這個革命爲國際工人的革命」或將這個「世界革命的序幕」導演成爲世界革命，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便以全力進行建立世界革命領導機關——共產國際。那時

布爾塞維克黨的一切對外政策與活動都是以推動世界革命為中心任務。這正是不斷革命論的國際主義之具體表現。

自列寧逝世，斯大林篡奪了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後，他即發表了他的徹底背叛國際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將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論」在新的環境下加以進一步的發展。斯大林根據這個「理論」把布爾塞維克黨推動世界革命的方針轉變成為與資本主義世界謀取妥協的「和平共處」的路綫，以便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

在這個「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下，斯大林始則盡力與富農妥協，延緩工業化和農業化。迄至遭到富農的威脅時，則轉向另一極端，完全不顧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以行政的鞭子加速工業化和集體化。關於這方面，托洛茨基在一九三〇年替不斷革命論英文本所作的序言中寫道：

「以工業化和集體化之盡可能快速的步伐，來援助經濟獨立之迅速的成功——這便是過去兩年內民族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中所曾發生的變化。全部蝸步爬行的路綫，已為冒險主義所代替了，但兩者的理論基礎都是一樣的：一個民族社會主義的觀念。」（英文版「不斷革命」第十三頁）

中共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在過去兩年內（一九五三——五五年）經過一番「爬行」之後，於一九五五年來了一個轉變。在這個轉變中提出了農業集體化的綱領；差不多同時又宣佈一切私人資本的產業轉為「公私合營」。這是在互助組的農民迅速向兩極分化和私人資本的企業妨碍計劃經濟的壓力之下所促成的。這個「轉變」當然是一個大進步，是符合於革命不斷發展的規律的。但當中共施行集體化時，不是徵取農民的同意，而是以行政的命令強迫他們加入生產合作社，因而不到一年全體農民都

被迫集體化了；另一方面，在「公私合營」的名義之下，既保留私人資本家的財產權，拿取「定息」，並讓資本家繼續參加管理生產，而同時又鞭策工人加速生產，以便超額完成生產計劃。此種加速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推行，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口號之下，差不多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如「全民大煉鋼」（即土高爐煉鋼運動）和公社化運動便是最具體的表現，這正是「全部蝸步爬行的路綫已為冒險主義所替代了。但兩者的理論基礎都是一樣的：一個民族社會主義的觀念」。根據「民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觀念」來加速工業化和集體化，不但不是「不斷革命理論之明顯的肯定」，而且恰是這一「理論」的反面。

托洛茨基在上引的同一序言中會敘述當時左派反對派與斯大林派對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基本立場的分歧如下：

「工業化是整個嶄新文化的動力，也只有憑藉這一動力，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才是可想像的。在目前蘇維埃聯邦的社會條件之下，工業化的意義，首先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之社會基礎的加強。與此同時，工業化運動，也為農業的集體化運動創造了物質上和技術上的前提。兩者的步調是互相依存的。只有在新社會的創造過程中，能以最優良的方法保護這個新社會免於外來的危險，同時又能為改善勞苦大眾的物質生活創造豐富的源泉，工業化和集體化之最高度的進展，才能使無產階級感覺興趣。」

「可是能夠有所成就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它受着那個國家整個物質和文化水準的限制，也受着城鄉間相互間關係的限制，同時又受着群眾所最感迫切的需要所限制——群眾中為了明天的幸福而犧牲了今天的生活條件，是有其一定限度的，最良好和最有利速度，不僅能在特定的時間內，為

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化，造成最快的發展，同時還能為這個社會政制，獲取其必需的抵禦能力；換句話說，首先是加強工農之間的聯盟。只有這個聯盟的加強，才可能有進一步的成功。」

「從這個觀點出發，黨和國家的領導層藉以指導計劃經濟中之工業發展的一般性的歷史規範，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由此，可能產生兩種基本上不同的路綫：第一種是上述的路綫，先求一個國家中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的鞏固，藉以期待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之進一步的勝利，這也就是左派反對派的觀點；第二種路綫是，以儘可能短促的時間，建立一個孤立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目前官方的見解。」

「目前的社會主義思想，存有兩種判然不同、最後分析起來，也是正相反對的理論和觀念。從這些不同的觀念中，產生了根本不同的戰略和策略。」（「不斷革命」英文版二一一三頁。）

托洛茨基在上面所指出的關於蘇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兩個互相對立的基本立場，不但含有最深刻的理論價值和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最現實的政治意義，尤其對於今天的中國是如此。當時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所代表的立場，其出發點是不斷革命論的國際主義，而斯大林所代表的是革命階段論的民族主義。

斯大林從這個「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觀念」所得出的對內對外的「戰略和策略」便是：以極端的橫暴驅使農民集體化造成了空前的人力和物力的損失；以行政的鞭子加速工業化，造成了重工業與輕工業的不平衡，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工人勞動的緊張和生活水準的降低；以稀有的殘暴毀滅了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和革

命青年；以極端反動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葬送了中國、德國及西班牙等最有勝利希望的革命。這裏充分證明：違背不斷革命論的國際主義給無產階級國家帶來如何可怕的犧牲！

今天史和樂所極力讚揚的中國工業化和集體化的「總路綫」，在本質上僅是將斯大林的民族社會主義的路綫抄襲過來放在中國地盤上加以實踐和發揮而已。因而這個「總路綫」產生的「戰略和策略」便不可免地是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混合物。中共在加速生產和公社化（所謂大躍進）所表現出來的冒險主義和對外政策所表現的「五項原則」的「和平共處」的機會主義，便是不可爭論的證明。中共這種對內對外的「戰略和策略」所產生的損害已開始顯露（如生活必需品的異常缺乏，工人群眾勞動的極度緊張，生活水準的降低，尤其是農民群眾陷於半飢餓狀態，以及工農聯盟的被破壞等），但可怕的後果還在後面呢！

總而言之，在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進程中，中共所實行的基本政策不但不是「不斷或持續革命理論之明顯的肯定」，而是對這一理論之盡量歪曲。當客觀的革命的不斷發展的動力在國內外矛盾的壓力之下顯得不可抵抗時，中共便迫不得已經驗主義地來一個「轉變」，向前走進一步。這在客觀上說固然是反映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但它向前進所採取的步驟，不是用它的機會主義抑制革命不斷發展的自然趨勢使之成為半吊子式（如一九五三年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的轉變），便是以冒進主義使之向前冒進（如一九五六年的集體化及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的工業化和公社化），走入歧途。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進程中，不斷革命論確是顯示了它的威力，以致迫使中共爲了自保而不得不實行一系列的「轉變」來遷就它。但由於中共的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義（即革命階段論所包含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

義），在每一「轉變」中都是把革命的不斷發展歪曲了，以致弄得整個革命的過程變成畸形，因而對這個革命的不斷發展造成了許多混亂，這反過來又引起了對不斷革命論的混亂和歪曲。

巴布洛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已宣揚「毛澤東在中國實行了不斷革命論」（我是從接近他的人們聽到的）。一九五二年格爾曼在巴布洛指示下起草的「中國第三次革命」決議案中說：「……不是同蔣介石的聯盟，而是這個聯盟的破裂，開始了中國的第三次革命。這樣一來，二十五年來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運動所頑強保護着的不斷革命論，就在這一個基本問題上獲得證明。」我曾寫了關於中國第三次革命決議草案的幾次批評，對該草案關於不斷革命論的歪曲作了扼要的批評，但為巴布洛所壓制未被發表。

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中共第八屆大會第二次中委會的報告中說：中國革命一貫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不斷革命的精神下領導的。巴布洛在劉少奇這個啓示下以馬丁的筆名大作其「不中斷的中國革命」的文章（文章的標題），宣稱「中國現在是處於不斷的革命狀態之中」（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的「第四國際」）。實際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過去近三十年中一貫是以「革命階段論」對抗「不斷革命論」的。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突然宣佈中共一貫實行不斷革命論，僅是藉不斷革命論來辯護毛澤東那時正在猛力推行的「大躍進」加速工業化、準備公社化的冒險主義而已。這有如羅米納茨，斯大林的駐華代表，在革命失敗之後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突然提出：「中國革命正處於不斷革命狀態中」，以此辯護其不斷暴動的冒險主義政策，是一樣的。巴布洛贊揚中共實行不斷革命只是劉少奇的應聲蟲而已。史和梁讚美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不斷革命理論之明顯的肯定」，又只是跟在巴

布洛後面，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任意加以歪曲來替中共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冒險主義政策進行辯護罷了。我在批評格爾曼的「中國第三次革命」的草案時曾經說：

「無須說明，我們決不應該從不斷革命的標準出發，否認由毛黨開始的第三次革命的意義；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因為毛黨勝利的客觀意義而貶低了不斷革命論的價值，進而以不斷革命論的名義，來適應或曲解這一勝利。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一方面，承認毛黨勝利的客觀事實，及其各種不同的過程；同時，應以不斷革命的觀點，來分析這一勝利如何蒙受「革命階段論」的歪曲，如何造成今天的變相狀態，和因此變相而產生的障礙，及其可能發展的前途等。我們的基本任務是：站在不斷革命論的綱領立場上，保衛、推進和完成這一革命，直至最後的勝利為止。」

我八年前寫下來的上面這個意見，我認為今天還是正確而有效的。這裏我只附加一點：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中共從新民主主義的政策轉向社會主義的政策，特別是對它所施行的工業化和集體化，仍然必須站在不斷革命的立場上來評斷它們。我們對於今天中國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基本立場，與上面所引證的當時蘇聯左派反對派的立場本質上是一致的。

政治革命，或是民主改良？

根據前面對中共及其政權的斯大林主義性的分析，以及根據事實所證明的中共統治下的特權階層及保護其特權的警察制度之存在，則其邏輯的結論只能是政治革命。因此，我可以說，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五五年所通過的決議，「第三次中國革命及其餘波」，無論從那時以後的「現實」如何「改變了」，但它的

「基本立場」——政治革命，仍是正確而有效的。它的正確性不僅在於理論上的分析和預測，而且已由一九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所暴露的事實和傾向反映出來。

在聯共二十次大會清算斯大林個人崇拜後，特別在匈牙利革命發生後，中共在群眾極度不滿的壓力之下，以及在黨內外的革命份子對匈牙利革命同情的威脅之下 * ，曾被迫地發動了「鳴放運動」，邀請各黨派及人民發表意見，批評它自身所包含的「三害」——「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幫助它「整風」，企圖以此改良自己，避免匈牙利事變的爆發。但在這次「鳴放運動」接近高潮時（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月），各方面的群眾，尤其是學生青年及革命的智識份子（包括中共的黨員及青年團員）廣泛而深刻地暴露了中共官僚主義的專橫及其特權享受的無數事實 ** 。這一運動中的革命傾向，由當時學生運

* 在發動「鳴放運動」前，毛澤東曾說：「匈牙利事件發生之後，我國有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反對人民政府」（見毛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這便證明中共已感到本國革命份子同情匈牙利革命的威脅了。

** 在「鳴放運動」上升時，劉少奇，中共第二號領袖，曾在錫蘭 LSSP 訪華團面前公開承認：「有嚴重的官僚主義」，「群眾批評廣佈在中國每一角落。包括有工廠、學校及其他組織在內。批評的對象則是領導層。」（劉少奇在錫蘭訪華團的招待會上的演說——見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動的領袖，青年團員林希翎和新華社的記者，共產黨員戴煌所發表的意見中反映出來。前者認為：「中國現在的上層建築和公有財產制並不相適應。」因為「黨和國家機關已變成一套統治人民沒有民主的官僚機關」。所以她宣稱「不贊成改良，而要徹底的變革」。後者則主張建立新黨，「實現民主自由，消滅特權階級」。

從這次「鳴放運動」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一革命傾向：「不贊成改良，而要徹底的變革」，「實現民主自由，消滅特權階級」，還不是意味着消滅特權階層的官僚獨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革命」嗎？

正由於「鳴放運動」所反映出來的反官僚獨裁的革命傾向威脅到了中共的統治，它便立刻停止了「鳴放」（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向一切批評者兇猛地進行反攻，在「反右派」的名義之下，把一切革命的左派分子都殘暴地鎮壓下去了！成千成萬的人民被迫悔過，被撤職，被監視，甚至被捕和送至勞動集中營。成千成萬的黨員和共青團員被開除黨籍和團籍，被撤職，被開除學籍，被監視或被逮捕等等。於是曾經被邀請來批評中共的人們，現在變成了「批評」的犧牲者！這又一次證明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及其獨裁政權，由於它所代表的官僚特權利益的本性使然，是無法實行自我改良的。

但史和梁却堅持說：

「針對官僚主義的答案，不是推翻現下北平政權的號召——這將會被群眾認作反對革命的——而是以民主要求的政綱，在國民生活的各方面，通過空前廣泛的干預和管制，來制止官僚的專斷。」（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九頁。）

「我們之支持這些革命事變的發展，必須具有對一切官僚表現的批判性，並着重於要求採取各種特別的民主措施。沒有這些民主措施，社會主義的成功，是無法保證的，此等措施，應包括黨內全體黨員能有充分的機會，以批評和控制政策及其領導的自由的黨內民主制度。同樣，在一切政府的機構中，包括各級地方政府以至全國的政府在內，其民主的程度，必須使全部控制的權力，握在人民的手裏。在經濟的領域中，由從事工作的群眾，來控制各級生產和分配的計劃乃是得以依照實際經驗、及時檢查成果的基本要素所在；同時也是減少經濟不平等至最低程度的必要手段。非常清楚地，我們的立場應該含有這樣一個觀念：在中國，此等民主措施，是可以經由改良的手段達到的。」（同上第三十頁）

史和梁上面所提出的「民主要求的政綱」或「要求採取特別的民主措施」，是漂亮而動人的，假使能夠實行的話，是值得贊許的。但他們完全忘記了，或者根本沒有注意到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所暴露出來的事實和教訓。這些事實和教訓便是：

一、那時主張「推翻現在的北京政權」的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而正是在群眾運動中代表群眾利益及反映群眾意識的革命份子，甚至是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如林希翎、戴煌等。

二、那時凡是表示「批評和控制政策及其領導」的「份子」，都遭到了開除黨籍或團籍以及撤消一切職務，乃至被捕、監禁的殘酷處罰。

三、凡是要求「在一切政府機構中，包括各級地方政府，以至全國政府在內，其民主的程度，必須使全部控制的權力，握在人民的手裏」的人們，都遭到了各種各式的懲罰（包括被迫悔過、撤職、監視，乃至逮捕、監禁及送至勞動集中營改造等等。）

四、而「在經濟領域中，由從事工作的群眾，來控制各級生產和分配的國家計劃」，便根本成爲不可能了。

在上述這些由歷史事實所得出來的教訓的光照之下，讓我們問史和梁：你們的「觀念，在中國，此等民主措施」，怎樣「能夠經過改良的手段達到」呢？請求中共的「領導層」去實現你們的「觀念」嗎？它在「鳴放運動」中從反面答覆了這個問題。宣傳和鼓動共產黨員和工農去實行你們的「觀念」嗎？那就無異於號召他們起來反對中共，進行政治革命。親愛的同志們，你們的「民主改良」的「觀念」在「現實」面前碰壁了。

我們以前（至少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對中共統治的中國，和有一個時期（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時期）對斯大林控制蘇聯一樣，是曾經希望通過民主的方法去改良它的。因爲那時我們尚認爲有可能藉民主的改良手段而達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但今天的中國已同蘇聯、東歐各國及北韓、北越一樣，民主改良已沒有可能了。所留下的唯一正確而可行的道路只有政治革命。底下應當是我們主張政治革命的綱領。

一、取消官僚的特權，打到新貴族（包括「勞動英雄」或「勞動模範」）及其等級。給一切勞動形式以更大的平等工資，嚴格規定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盡可能提高一切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

二、爭取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的自由，爭取集會權利和出版的自由。

三、根據農民的利益和意志徹底改組公社。（詳見「我們對公社的態度」，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第三十二——三十三頁。）

四、取消資本家的「定息」，根據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

從上至下修正計劃經濟。工廠委員會有管理生產的權利。一切國有商店、地方商店或消費合作社均由民主的方式組織委員會監督生產品質和價格。

五、組織工農兵蘇維埃代替「人民會議」。蘇維埃不但必須排除資產階級份子，而且排除官僚貴族，只有工人、農民和士兵才能在蘇維埃中取得代表的位置。

六、取消一切資產階級的黨派。凡是接受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必須獲得合法存在和活動。

七、取消基於「五項原則」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而代之以推動世界革命的方針。

八、與蘇聯集團內工農群眾團結起來推翻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制度，恢復或創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

在為上敘的政治革命的政綱而奮鬥的同時，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與群眾站在一道，堅定不移地、無條件地保衛已經達到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和計劃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的，特別是美帝所領導的對中國的任何干涉和侵犯。

社會主義的民主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史和梁往那裏走？

我在討論公社問題時曾經指出：史和梁同志的錯誤，是與原則問題交叉在一起的，若不及時退回頭，就會使他們走入修正主義的泥沼。（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第三十二頁。）從這時以後，史和梁不但沒有及時認識到他們的錯誤，在他們最近發表的文章中反而把原來的錯誤加以

更進一步的發展，完全陷進修正主義的泥沼中。他們的修正主義的明顯表現是：在農業集體化問題上，他們完全背棄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傳統立場，因而修正了我們「過渡綱領」中關於「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在判斷中共的性質問題上，他們完全不顧「斯大林主義學校中的訓練」和「斯大林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品質」，而只抓住在某一時期內被迫所採取的行動或轉變，便斷定它已離開了斯大林主義。在對中共政權的性質上，他們完全忽視了這個政權所實行的全部政策所包含的斯大林主義的實質，僅憑選舉的形式或「選舉權利」便斷定它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權。對於不斷革命論，他們任意加以歪曲，並忽視了這一理論中含有決定意義的國際主義。由於這一系列的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修正，所以他們在中國問題上便走到與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同流合污了。

但甚麼是推動史和梁走到修正主義的客觀原因呢？主要是由於中共在一九五八年以來所誇示的生產「大躍進」的影響，特別是「公社化成功」的影響。他們在遠離中國的一般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對人民公社的理想化的影響之下，便不自覺地離開了他們原來的立場。這從他們的立場恰好跟着公社化運動的進展而改變而進展——這一事實清楚地反映了出來。例如他們開始聽到公社有「選舉出來的委員會」，便斷定公社是「自治的政經單位」，隨後則根據他們的邏輯推斷：「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主義式的政制」。而且他們的文章的標題：「公社政制」，及在這一標題下對公社的美麗描寫，亦明顯地反映了他們對中共及其政權性質的重新評價是與他們對公社的評價緊相聯系的。換句話說，他們對中共及其政權性質的重新評價是從他們的「公社是自治的」公式中演繹出來的。假如巴布洛在戰後的斯大林主義勢力膨脹的壓

力之下，特別是在中共勝利的驚炫之下離開托洛茨基主義而走到修正主義，則史和梁便是在中國工業化的「大躍進」，特別是公社化的「大躍進」的炫耀之下而陷入修正主義的泥沼之中。

史和梁陷進修正主義的另一原因是他們研究問題的方法論。雖然他們強調：「一九五五年決議案的立場，只有犧牲了唯物主義的原則和辯證的方法才能維持。」（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第二十一卷第二期第二十六頁。）但實際上，他們正是「犧牲唯物主義的原則和辯證的方法」，運用形式邏輯的機械論，甚至唯心論來處理問題，建立和辯護他們的新立場的。例如：

一、他們完全不顧中國現有的物質技術和文化等條件的極度低下，一聽到中共宣傳公社化，「農業生產增加一倍」，公共食堂普遍成立，「婦女已從家庭解放出來」，便相信：「中國正在解決其糧食問題」（見社工黨「黨內生活」第二〇卷十三期第三頁。）並斷定公社「已加速了婦女家庭奴役地位的解放，開啓了文化發展的新道路，並正在縮小多少年來城鄉之間的文化距離。」（同上第八期第四〇頁。）這顯然是「犧牲唯物論原則」的一種唯心論的武斷。

二、他們看到中國工業化和公社化的「大躍進」，完全不注意到此種「大躍進」所包含的冒險主義及其對工農群眾的嚴重損害，而無批評地加以讚美和支持，這正是犧牲辯證法的機械論的體現。

三、他們聽到公社有「選舉出來的委員會」時，完全不問這種「委員會」究竟是怎樣被「選舉的」及其具體內容，便形式邏輯地斷定：「公社是自治的政經單位」。他們對於「人民會議」，也同樣從選舉的形式上判斷它們。

四、當梁看到「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之不斷敵視而猛烈批評」時，他認為這「使我們無可含糊地必須對贊成或反對公社這一本質上是階級鬥爭的問題，採取一種明晰的立場。」像這樣地提出問題完全是出於「絕對機械的形式邏輯」。關於這點，我在討論公社的文章中已給它提出過了。（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第二〇卷第二期第三〇頁）

五、他們強調自己「必須成爲中國革命之一支真正的別動隊，並無條件地支持其積極的成就。」（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內生活」第廿一卷第二期第三〇頁）因而對批評中共政策的人們，他們都機械地詆之爲「別具用心的批判的評論家。」（同上第一五頁）他們不了解，要「成爲中國革命之一支真正的別動隊」，只有堅定地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站在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綱領上去嚴肅地批評中共的斯大林主義的政策，盡可能喚起群眾去認識這種政策的錯誤，以便最後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改變它，才有可能。這正是把「支持」和「評論」或「批判」聯系起來的辯證法的活的運用。

史和梁之所以犧牲「唯物主義的原則和辯證的方法」，最後分析起來還是他們本身所具有的印象主義。這從他們底下的一段話表現出來：

「這裏有少數基本問題，必須予以考慮，特別是關於我們自己方法論上的問題。假使我們承認現實總在變化，而且常常是具體地表現着的，那末，我們的思想就必須反映這些現實的某些特性，並應同樣具體和可變，因爲只有採用這一方法，才能保證合理的正確立場。」（同上第二八頁。）

上面這段話，表面看來似乎是不可非難的。但如果深入地給它檢查一下，它裏面所包含的正是印象主義的根源。因爲他們在

這裏完全沒有提到根據甚麼原則或規律去考察「現實」及其「變化」，只是強調「現實總在變化，而且常常是具體地表現着的。……思想必須反映這些現實的某些特性……。」一切印象主義都輕視原則，特別注意每一「變化的現實」，把它當作「具體」或新的印象加以「反映」或接受。但當這種「變化中的現實」再「變化」時，他又被另一「具體」的或「新」的印象抓住了。因此，印象主義者永遠跟著現實的改變而改變，結果便沒有自己固定的原則立場。以前的夏克曼和巴布洛是如此，現在我們的史和梁也沒有例外。

夏克曼在第二次大戰發生前夕看到「蘇德協定」的簽訂，及跟着看到蘇聯軍隊攻擊波蘭等的「具體事變」時，便認為蘇聯的性質隨之改變，不值得無條件去擁護它了。巴布洛看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斯大林主義勢力的膨脹及中共的勝利等「新現實」，便斷定斯大林黨可以自我改良，蘇聯可以不需要政治革命。史和梁看到中共工業化和集體化，特別是公社化的「變化中的現實」，則斷言中共已離開了斯大林主義，「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式的政制」，政治革命已過了時。這一連串的事例證明：凡是輕視理論，不能堅持原則，只顧「具體事變」或「新現實」或「變化中的現實」的印象主義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離開原則的立場，而陷進各種各式的修正主義的泥沼中的。

現在史和梁對中國問題的修正主義的立場已達到了終點。如果他們按照他們的思想邏輯再往前發展，便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修正托洛茨基對蘇聯的根本立場的。但我希望他們在同志們的批評的光照之下，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我相信他們主觀上仍是忠實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憑着他們多年來對於我們運動的服務的忠誠，根據批評者對他們所提供的方法、理論和事實，經過認真的

自我檢討，是可能恢復他們原來的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立場的。

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

中國近期的事變，例如彭真被革除重要的黨內職位，①是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十年前已開始的黨內鬥爭的結果。爲了明白現在發生的情形，我們必須檢視鬥爭的整個演變和鄧拓所領導的反對派。

我們應該從五七年左右開始，當時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呼籲知識份子和人民說出心裏話，批評黨內「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幫助「整頓」和改革黨。在很短時間內，運動就發展到很大規模，公開提出了許多關於領導層的深刻批評。

大多數最重要的批評登載于黨機關報「人民日報」之類的報紙，當時該報主編鄧拓鼓勵人民提出批評，他本人也寫了一些尖銳批評。

在「大鳴大放」運動的高潮（五七年四月到六月），從各個角落（尤其是年青學生和革命知識份子）指責關於中共官僚層的專橫和享受特權的事實。中共本身的黨員和青年團也作出反應。到六月運動發展到的程度，似乎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可以移植到中國土壤上來了。（例如漢陽一間高中學校超過三千名學生造反了。）

* 本文從英文《當權的中國共產黨》譯出是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方達(DAVID FENDER)在歐洲訪問的紀錄。由其本人以文章形式寫出經著者改過的。

面對這個可能性，領導層驚怕了，立即在六月中終止運動，並對批評者作出激烈反攻，左傾革命份子被通通打成「右派」，被無情鎮壓了，千萬計的人被迫公開認錯，被革職、被監管，甚至被捕和送去勞改營。許多黨團成員除了被開除外，更被革職或退學，受監管或拘禁，鄧拓被撤去「人民日報」主編職位。

反對派被指由右派分子、資產階級代表、大地主等率領，這類罪名今日同樣是加于被中共清算的人身上，可是，如果小心檢視自那時到今逐漸流傳出來的一些事實，就可看到這些指責在許多情況下都似乎不能成立。舉例來說，中共理論機關報「紅旗」報導說鄧拓「積極支持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極右份子林希翎，是他最親密的朋友。」^②但是，林希翎是一名學生運動領袖和團員，她的文章反映了這個運動的革命傾向，林希翎在五七年被清算，她曾寫道：「中國今日的上層建築與公有財產制度並不相應」，因為「黨和國家機器已成為一套官僚架構，不民主地統治着人民。」因此，她主張「不是改革而是徹底的改變。」

「紅旗」關於林希翎的說話，同時使我們能了解鄧拓的政治思想。由於她被認為與鄧拓如此親密，我們可以估計他們的政治立場相異不大。當她談及鄧拓時，她說他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換句話說，鄧拓並不同意毛澤東的永不犯錯的一切言論，或者說，鄧拓不是一個毛派馬克思主義者。

「北京周報」六月一日一期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在中國正統馬克思主義是什麼：

「誰要反對毛主席，誰要反對毛澤東思想，誰要反對黨中央，誰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誰要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職位多麼高，資格多麼老，都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他們得到的結果，只能是身敗名裂。」^③

在五八年，鎮壓「大鳴大放」運動後，中共採取了一個冒險主義政策，以便令它對所謂右派反對派的強力鎮壓得到辯解。

約五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採納「大躍進」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之下，發動了在細小後園砌高爐煉鋼的計劃。為實行這個計劃，動員了約一億人，差不多所有學生、教授、工人、農民甚至家庭婦女也要煉鋼。這個計劃持續了約一年，從五八年六月到五九年七月。

稍後，在五八年八月，毛澤東下令所有農民必須儘快加入「人民公社」。三個月後，百分之九十九農民加入了「人民公社」。中共命令自留地、儲糧和牲畜等全都歸公社，所有農民吃大鍋飯，兒童由公社幼兒園照顧等。這個政策旨在五年內將所有農民共產主義化。

農民在此事中全無選擇，他們被迫加入和向公社交出所有財物。這點導致農民廣泛不滿，最低限度一半農民（當時共約有五億農民）反對這些措施，並積極地反對公社，他們採取破壞行動，例如屠宰牲畜、砍伐果樹，毀壞穀物等。這些促使了非主要食糧的嚴重缺乏，局勢到五九年夏天變得非常危急。同時，後園煉鋼計劃的慘敗已明顯化——三百萬噸鋼煉成了，但很少能符合最低的品質標準。

這兩個由毛和中共最高領導層官僚主義地強迫施行的政策的破產，是人盡知曉的，群眾的日增的不滿也很明顯。他們指毛及其政策為「小資產階級狂熱」。這個不滿侵入到黨幹部之間。中央委員會、軍隊和政府行政機構許多高層領袖也同情群眾，而其中表達其不滿的是國防部長彭德懷。

早在五九年春天，彭已經批評黨的政策，亦即批評毛澤東。這加速了黨內危機。中委會與毛便在五九年八月召開中全會以應

付這危機。這就是廬山會議。

會議上，最高領袖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雖然從來沒有透露實際的會議過程，但黨通過了兩個重要決定：(一)彭德懷與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的免職，中委會許多成員也消失了；(二)通過了一項決議，向農民作出某些讓步，亦即要整頓「人民公社」。

會議之後不久，鄧拓就成立了一個小組，組內他最密切的合作者是吳晗——著名歷史學家和北京市副市長。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會議召開之前，他曾撰文《海瑞罵皇帝》。海瑞是明朝大臣；皇帝昏庸，民怨載道，海瑞於是上書批評皇帝。吳晗借古喻今，亦即「彭德懷罵毛澤東」。

廬山會議之後，吳晗寫了劇本「海瑞罷官」；海瑞為官時實行了一些改革，其中包括要大地主退還強佔的農田給農民；大地主激憤，向皇帝告狀，海瑞于是被罷官。人民對此非常憤怒。海瑞很受人民歡迎，被稱為清官。吳晗于此同樣是借古諷今：「彭德懷罷官」。

該劇本在六一年一月公開發表于北京的報紙，後來在北京上演，受到人民特別熱烈的反應，許多評論家高度讚揚它。

由鄧拓秘密組織的小組另一密切合作者是廖沫沙，北京市黨委統一戰線工作部負責人，從六一年到六二年尾，鄧拓、吳晗和廖沫沙寫了許多文章，發表于《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和《前線》。《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是北京市委的日報，都在鄧拓控制之下，由於鄧是北京市委的書記處書記，他便有權控制和指揮該市所有文化機構的報紙。

這些文章有些以《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專欄發表，後來以同樣名字出版成書。各作者通過寓言、歷史比喻、諷刺等手法，批評領導層，其綱領及當時局勢。

舉例來說，鄧拓寫了一篇文章，裏面有一首據說是小孩子編寫的詩：

老天是我們的父親，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
太陽是我們的裸姆，
東風是我們的恩人，
西風是我們的敵人。

鄧拓指這首詩只是說「偉大的空話」，這是間接批評毛澤東的名句「東風壓倒西風」。

在《智謀是可靠的嗎？》一文，鄧拓說：「人的智慧決不是無限制的。要想任何東西都知道，擁有無盡的智慧，那不過是愚夫的妄想而已。……有的人常常喜歡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看不起群眾，不管什麼事情總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圖出奇制勝，而不接受下面群眾的好意見。有這種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覺悟，不改正這種毛病，終久會有一天要吃大虧。」這段文字暗指毛，即如果毛愚昧地自以為永遠正確並以官僚主義手法維持政權，不加以改正，終會被挫敗。

在另一篇題為《專治『健忘症』》的文章裏，鄧指責黨領導層患了「健忘症」，因為他們「見過的東西很快都忘了，說過的話很快也忘了，做過的事更記不得了。因此，這種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他提出治療的方法是「患這種病……必須趕緊完全休息，什麼話都不要說，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勉強說話做事，就會出大亂子。」

在《偉大的空話》一文中，他說空話「越說越多，反而越糟糕」。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文中，他指責領導層浪費人民的時間和勞動力——「我們應該……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

勞動力」。這兩篇文都是間接地談及「大躍進」這個失敗、糟糕和浪費的計劃。

在《鄭板橋和『板橋體』》一文，鄧引這位有名的畫家說：「人們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就是說，人民必須控制革命領袖，而不是做毛派官僚層的僕人或奴才。

鄧拓及其週圍的小組寫了約一百五十篇這類文章，全都間接地批評毛澤東及最高領導層頒行的政策。這些文章也反映了來自群眾的批評。在六一至六二年，中國的經濟局勢變得嚴重：食物短缺，只六二年夏天就有超過十萬人逃亡香港。

到六二年年底，經濟局勢開始某程度改進，所以領導層感覺較穩定，就採取了更強的措施來控制農民，同時也採取措施控制知識分子和學生，許多被送下鄉受「再教育」。

面對中共領導層日益強硬的進攻政策，包括阻撓他們發表文章，鄧拓及其小組開始退讓。

在六五年十一月，在《文匯報》以及《人民日報》及其他許多報刊上刊載了中共首次對吳晗「海瑞罷官」的公開批評。^④

之後，對吳晗「海瑞罷官」開展的批評運動蔓延全國。《人民日報》特別是《解放軍報》及全國其他許多報紙每日都載文評吳晗。

但是，從六五年十一月到六六年四月，主要在北京和上海有幾名作家撰文維護吳晗。吳晗也寫了一篇文章，一方面承認劇中犯了一些錯誤，但另一方面為自己及作品辯護。

可是，自四月開始，形勢在許多方面急劇改變了：(一)直到那時為止，吳晗只被責為犯了一些錯誤和思想有修正主義，現在他被指責反社會主義、反黨、甚至是反革命，支持資產階級和意圖復辟資本主義。* (二)各報刊停止刊登吳晗及其支持者的文章。(三)

越來越多人受攻擊，鄧拓成爲中心目標。結果是，《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有部份轉載于《人民日報》，附上評語以証明鄧拓的反革命目的。⑤由鄧拓及其小組編輯和控制的報刊受到其他報刊的攻擊，它們包括《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前線》，和從五月開始，《北京文藝》、《貴州日報》和《雲南日報》。⑥高層黨領導人如北京市長彭真成爲被攻擊目標。

自從六〇年左右開始中蘇論爭以後，中共不但批評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而且批評赫在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上譴責斯大林。自此以後，他們一直進行有系統的運動，要建立全球性的類似斯大林崇拜的毛澤東崇拜。自六五年十一月開始，這個運動大大升級。舉例來說，六版紙的《人民日報》，平均每日用四版專注此事。每日，頭版都刊登口號，例如「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人民必須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或「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人民的革命明燈」；換句話說，毛澤東思想已成爲萬應靈藥，他的著作成爲《聖經》。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的文章，報導了上海一次音樂會，同時有一篇文章形容毛澤東思想如何影響了音樂會。⑦

同類文章有一篇由一名廚子撰寫，他說，當一位顧客滿意地問他爲什麼煮菜煮得那麼好時，他坐下，寫了一篇文章解釋他成功的秘訣——他運用了毛澤東的方法。

在北京大學，一名英文教師對學生說，要學好英文，就必須用毛澤東的方法。（毛澤東不懂外語，只懂幾個英文字。）這類

* 據《紐約時報》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報導，《紅旗》問它們（即北京的報紙）爲甚麼從來不提及吳教授甘作美國奴才，爲反動的國民黨搞陰謀，出主意？

的事不是偶然的例子，而是一般性的。*

與目前的清算聯繫着的，是建立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企圖。由于毛澤東犯了許多錯誤，他在知識分子心目中地位不高。由此可了解爲何知識份子反對將毛神聖化，而主張理智地，有效地討論繼續阻撓中國發展的困難。

毛澤東外交政策的日增的困難和失敗，也無疑在現今的大清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不談它的時間性和激烈性。

莫斯科的機會主義所起的災難性作用是無可懷疑的。可是，北京採取了極其宗派主義的立場，拒絕與蘇聯聯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尤其在越南戰爭問題上），就不但削弱了反擊帝國主義的鬥爭，而且增加了中國自己受到入侵危險和核戰的可能性。

這個宗派主義立場也導致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日增的孤立。許多在論爭初期傾向於中國的工人國家如北朝鮮和越南，現在正日益靠向莫斯科。此外，殖民地革命蒙受的挫敗和中國「第三世界」外交的失敗，都導致中國日益孤立和全球的北京追隨者的消沉。

印尼共產黨在簡直不經一戰的情形下被粉碎，是中國一次最大的挫敗的悲劇。 ** 艾地的政策大致相同於赫魯曉夫主義的政策，他曾多次在中國演說，著作被譯成中文，並受到中共領導層的高度讚揚；中共將印尼共產黨捧爲模範黨，主張全球其他共產黨加以仿效。換句話說，印尼共產黨和艾地領導層的悲劇

*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新華》一篇文章談及學習毛澤東《論矛盾》如何幫助西瓜增加銷路。

** 印尼共產黨是資本主義世界裏最大的共產黨。它有三百萬黨員和超過一千萬有組織的同情者。從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有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人被屠殺。

，直接要由中共特別是毛澤東負責。

由于這些事變，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對於毛澤東的領導提出一個更大的問號。例如鄧拓等已經表示懷疑的知識分子的反對，基于三個主要問題：(一)他們反對官僚階級及其專斷，要求更多言論和批評等自由。換句話說，他們要求例如「百花齊放」的政策成爲常規。(二)他們反對中共的冒險主義，例如「大躍進」等政策，大量浪費人民的勞動力在後園煉鋼等事上，將農民強迫集體化加入「人民公社」，他們認爲這些政策不但不成功，而且造成禍害。(三)他們反對毛澤東是全知全能和永遠正確的說法，反對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

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反對他的政權，是不能容忍，且必須終止的。現在的情況使毛及領導層想起五六年匈牙利革命，因爲他們談及「匈牙利事件就是裴多菲俱樂部一批修正主義的人扮演了打先鋒的角色。山雨欲來風滿樓。」^⑦

但毛澤東不想風吹，更不想「風滿樓」。他不但攻擊那些認爲這陣微風是新鮮清風的知識分子和黨領袖，連那些容忍這陣風的人也攻擊。

在五月初，中共領導層提出了總口號：「在思想領域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以便消滅「資產階級」和「封建分子」的「大毒草」，亦即要消滅所有分歧的傾向和分子。但是，毛澤東主要是用軍隊來進行清算，因爲即使是黨也不能太信任，北京市黨委的情況說明了這點。

在六六年三月，國防部長林彪向軍隊訓令，要採取堅決立場反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傾向。軍隊幹部被動員起來進行運動，自此，對反對派最惡毒的攻擊便來自《解放軍報》，它甚至提出要在肉體上消滅反對派。

運動一直進行，以製造恐怖空氣來窒息來自知識分子的批評和保證對群眾能維持控制。他們不斷提醒人們那些敢于在「百花齊放」運動中批評黨的人的遭遇。「你們的命運不會好過你們的前輩和犯罪兄弟！」「你們時日不多了。」

這些威脅不只指向北京或高層的知識分子，而是涉及所有領域的知識分子和全國各級的黨政幹部。（我們大可以假設每一個被攻擊的重要人物都代表較大的一批人。*不過，從各方面看來，他們的組織似乎只是很鬆散的，不充分的。）最初，只是在報刊上加以誣蔑攻擊以及革職，但很可能遲些會加以拘捕和長期監禁，甚至情況會更壞。

黨對敢於懷疑毛澤東的永遠正確性及批評黨領導政策的人進行的猛烈攻擊的氣候，也造成了中國著名作家郭沫若作自我批評以自保。

以鄧拓和吳晗為代表的反對派被清算，反映了中共內部嚴重的矛盾，這個矛盾自「大鳴大放」運動被鎮壓開始便一直發展，毛澤東鎮壓進步知識分子等，或者可以暫時將反對情緒壓下去，但他不能鎮壓最初產生反對情緒的客觀條件。而在將來，它無疑將會再次向官僚層挑戰，正如鄧拓所說：「有的人常常喜歡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看不起群眾……企圖出奇制勝，而不接受下面

* 彭述之提及了另外兩位被攻擊的知名人士，而我在本篇是未有談及的。一位是著名劇作家田漢，全國戲劇協會的主席。他寫的《謝瑤環》在二月同樣受攻擊。另一位是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他曾在上海許多大學任教，也曾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其他本文未提及的被攻擊或被清算者包括：周信芳，著名演員和上海劇團團長。

群眾的好意見。這種人……終於會有一天要吃大虧」。

然而，勝利將不會由反動者或親資本主義者取得，而這些人無疑是存在于行政架構之內，而且在高位。勝利將會由基于革命成果並尋求無產階級民主的人取得。這個勝利將會鞏固革命成果，保證中國不只在國內而且是在國際上真正地大躍進。

註 釋

- ① 彭真是高層中共領導人，自五一年起為北京市長，他自六六年三月底開始不再有公開政治活動。在六月三日，報導稱他被撤去北京黨委第一書記之職。
- ② 「紅旗」六六年第七期「對《前綫》和《人民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的批評」。
- ③ 《人民日報》六六年六月四日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轉載于《紅旗》六六年六月十日。
- ④ 姚文元這篇「評新歷史劇《海瑞罷官》」載于上海《文匯報》十一月十日，一般被視為文革的響砲。當時毛澤東與北京大部分黨中央領導人不和，到了上海爭取支持和大力鼓吹這篇文章。毛死後，姚文元在七六年十月作為「四人幫」分子被捕；兩年後，戲劇《海瑞罷官》被平反，在北京重新演出。

- ⑤ 攻擊鄧拓及其小組的兩篇主要文章是姚文元寫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六六年五月十日，及林杰、馬澤民、閻長貴、周英、滕文生，靳殿良等寫的「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材料]」，見《光明日報》六六年五月八日。
- ⑥ 見《北京周報》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 ⑦ 「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人民日報》六六年六月二日（裴多菲俱樂部在一九五六年初在布達佩斯成立，組織者是希望進行改革的共產黨知識分子和青年。裴多菲1822-1849），是匈牙利詩人和愛國者，在一八四九年革命中犧牲。）這個組織開始時只是一個自由論壇，但逐漸提出日益深遠改革的要求，在匈牙利工人中有深刻的回響。十月二十三日晚上由裴多菲俱樂部召集的學生示威，觸發了匈牙利革命。軍隊被召鎮壓示威，但軍隊却倒向示威者，導致納吉政府的成立。革命在五六年十一月三至四日晚上被蘇聯軍隊粉碎。

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問：近兩個星期來，有許多新聞報導北京事件和上海事件，尤其是南京事件，因此有許多人推測中國可能已處於內戰邊緣。你認為內戰有可能嗎？

答：近幾個星期來（按：即一九六七年一月左右），親毛派和反毛派這兩個主要派系之間的鬥爭，已經達到異常嚴重的階段。例如最近，北京、上海、廣東和其他許多地方發生工人罷工；尤其是南京的激烈衝突，據說有五十多人喪生，數百人受傷。這都十分清楚證明兩派衝突的嚴重性。

如果這些新聞屬實的話，那末可以確定地說，黨內鬥爭已變得更加嚴重，並且正在黨外的勞動群眾中蔓延開來。如果這種形勢再繼續下去，結果當然可能會引起內戰。不過，要談論內戰的可能性，需要觀察一下過去幾個月裏毛澤東的所謂文化革命的發展。

問：你可以對這一發展的某些重要方面，加以概括的敘述嗎？

答：爲了解釋最近局勢的發展，需要提到你去年六月間訪問我時的談話。在那次訪問中，我曾經解釋中共黨內在「大躍進」

* 這一篇訪問記是安東尼奧·法利安（ANTONIO FARIEN）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在巴黎訪問彭述之後寫成，原刊於巴黎出版的《世界展望》。現由英文本譯出。

政策失敗時，現時這般的分裂已在開展，那時，許多知識分子，甚至一些黨內高級領導分子，已公開表示不滿，並批評許多由毛澤東專橫製訂的國內外政策；他們甚至更進一步，居然對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加以懷疑。那時候，已產生多多少少像現在那樣的派別。

中國的外交政策出了問題——整個外交上陷於孤立，特別是在印尼的失敗——亦似乎加速了和加深了現在的危機。

剛剛在印尼政變之後，中共高級官員召開過一次會議。據說，在那次會議上彭真說過這樣的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毛主席犯了某些錯誤，他也應該受批評。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似乎受到挫折。

那次會議之後不久，毛澤東便離開北京去上海——一九六五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上海立即開始秘密組織「文化革命」。

毛澤東在上海的時候（大約六個月），便沒有公開露面。就是在那個時候，新聞界便開始猜測他生病。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他活動的基地，大概他認為上海的黨官們會效忠於他。

毛澤東在開始時，攻擊許多文化界領導人物，尤其是作家，如吳晗和鄧拓。鄧拓曾經寫過許多不利於毛澤東及其過去政策的文章。毛澤東所發動的攻擊越來越猛烈，最後清算到彭真和整個北京市委，改組市委會。此後，接着清算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和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其他在國家和黨文化方面的高級幹部，也一起受到清算。

毛澤東下令所有大學和中學停課，許多著名的教育家，如北京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南京大學校長等等，都遭

清算。

這樣大規模的清算，牽涉到許多最高級領導分子，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牽涉到許多地方領導分子，在各種不同的傾向中，造成新的對立。

毛澤東是靠林彪的軍隊來實行他的清算行動的。例如，一九六六年四月底，爲了除去彭真和其他領導分子，林彪就派軍隊去佔領北京市委會的辦公廳。

在這種情形下，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分子覺得局勢十分嚴重，便開始聯合起來，反對毛澤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

問：有甚麼具體事實可以證明某些高級領導分子開始組織反對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的行動？

答：有的。不過爲了明白了解起見，我需要解釋一下關於中共黨領導的機構。中共黨的決策機構是中央政治局。在中央政治局之外，有六個地方局，即華北局、中南局、華東局、東北局、西北局和西南局。每個局都管轄幾個省份或行政區，權力很大，它們指揮黨、地方政府以及該地區的軍隊。

六個局中，有兩個局的第一書記，如華北局的李雪峰和西北局的劉瀾濤，過去都會和劉少奇有很密切的合作。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和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則與鄧小平關係很深。

毛澤東靠着軍隊的幫助，撤去彭真的職位，使得這些地方局的領導分子以及劉少奇和鄧小平，深感恐懼，擔心會遭到同樣命運，所以他們開始聯合他們的力量，反對毛澤東。尤其是西北局和西南局的領導分子，對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都採取消極態度，甚至時時積極地抵制它。例如，去年六月初彭真被免職時，毛澤東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由他以前的私人秘書陳伯達擔任組長，由他的妻子江青擔任副組長。這個小組派代表到各省去組織「文化革命」。但是許多代表都受到省級領導的抵制，特別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四個局。去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就曾對此加以攻擊。

可是最重要的事件發生於去年六七月間，那時，毛澤東正離開北京到南方去。當他不在的時候，中共黨第一副主席劉少奇準備召開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要重新修訂「文化革命」政策，給毛澤東施以壓力，還可能要解除他在黨內的領導，大約在同一時期，彭真就被派去西北局和西南局去與各該局領導分子商談關於當前局勢和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的事。大概在七月十日左右，彭真偕同各該局的中央委員返北京參加緊急會議，緊急會議的日期已經由中央政治局定為七月廿一日。毛澤東當時仍在南方，致書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們將緊急會議延期召開，以便他可以參加。就在那個時候，林彪率領許多軍隊包圍北京，在這種威脅下，劉少奇和鄧小平讓步，將中央委員會改為八月一日召開，中央委員會召開的時候，林彪的軍隊仍駐在北京城外。在會議中，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又決定組織「紅衛兵」，改組政治局常委會。經過那次改組，毛澤東選了三位他「最親密」的支持者參加常委會，以便確立他的控制權。這三位最親密的支持者，就是陶鑄、陳伯達和康生。毛澤東與林彪一起，公開猛烈攻擊劉少奇，撤去他的黨副主席的職位，由林彪接替黨第一副主席。

那次會議，使「文化大革命」的進行雷厲風行，並擬訂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即反對並摧毀「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

問：爲甚麼毛澤東不經過黨和青年團來進行清算，而要組織紅衛兵？

答：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應該特別加以注意，並給予清楚的解釋。中國共產黨組織龐大，它的黨團員，差不多相等於法國全部人口。黨員約有二千萬人，團員有三千萬人，總共約有五千萬人。如果真的像毛澤東所說，黨內的確存在着親資本主義傾向，而如果毛澤東又真的完全對黨員群眾具有信心的話，那末，他可以組織黨內民主討論，這樣的討論似乎很容易把問題解決。

但是實際情形正正相反，黨內並沒有親資本主義傾向存在。中共這些領導分子，曾爲反資本主義而從事數十年鬥爭，現在，於取得政權之後，反要復辟資本主義，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實際的情形，是被毛澤東指責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都是認爲毛澤東在許多國內外問題上所專橫採取的許多政策，已經危害到社會主義的前途，所以起而反對他。

中共許多幹部，如鄧拓和吳晗，就是很好的例子，反映了中共絕大部份黨團員的意見。他們覺得，毛澤東已造成某些錯誤，絕對需要加以糾正，以便中國能繼續向社會主義發展。

如果毛澤東組織黨內討論，他將會使自己處於很大危險的境地，因此，他便設法壓制一切批評。這就是毛澤東爲甚麼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動用軍隊的理由。

八月會議的決定，僅僅是一種手續而已。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通過這些決定，是因爲他官僚地控制了黨的最高機構。

但是實際上，他已完全避開黨，他已運用紅衛兵去進行清算，或者，像他所說的，去進行「文化革命」。

問：紅衛兵的活動有甚麼結果？

答：我們首先應該了解紅衛兵是些甚麼人。他們主要是青年。大約有百分之六十是十三歲到十六歲的初中學生，百分之三十是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高中學生。大學生約只有百分之十。因為絕大多數紅衛兵（尤其是初中學生）這麼年輕，他們不會有政治經驗，對政治也不會有太多的認識。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甚麼這些分子會被組織起來支持運動，去建立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產生許多粗野和可笑的行動，甚至襲擊地方黨部和官員。

起初，有許多大學生跟着進行「文化革命」，但是發展下去，因為他們的政治認識比較高，他們之中便開始分化。

紅衛兵的最初活動是破「四舊」，立「四新」。稍後，又砸佛像，除西服，改街名……。雖然，某些紅衛兵曾提出一些進步的口號和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廢除給資本家的定息。但是這些進步口號沒有被實行。九月初，紅衛兵的活動改變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卅一日，林彪在北京紅衛兵大會上代毛澤東發表演說，強調「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孤立並清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紅衛兵便在大字報上開始指名攻擊許多省級領導分子。

爲了報復這樣攻擊，有些省級分子開始組織黨的官員和幹部，甚至組織一些工農群眾，成立他們自己的紅衛兵。不久，就與毛澤東的紅衛兵發生衝突。……

九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三次紅衛兵大會上檢閱，林彪代表毛澤東講話。他對紅衛兵所講的話，事實上就是要

他們攻擊任何抵制毛澤東思想的官員，叫他們不要怕，因為軍隊正在支持他們。那次演說之後，紅衛兵更大胆，更不受約束了。北京的大字報上，指名攻擊黨的領導分子，指控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他又曾接替彭真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就是受攻擊的三個例子。

同時，國務院大員也開始受攻擊。外交部部長陳毅、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尤其是工業交通辦公室主任薄一波，就是一些例子。最後，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也受到攻擊。

十月下旬，召開一次很重要的特別會議，會議開了十七天。在會議中，劉少奇和鄧小平在許多參加會議者的嚴厲攻擊下，被迫作出自我批評，就是在這次會議後，彭真和陸定一即遭到逮捕。

毛澤東似乎認定他已打倒反對派了。十二月廿六日，紅衛兵在北京舉行祝捷大會。「紅旗」宣稱「文化革命」已經勝利。在祝捷聲中，首次透露劉、鄧的自我批評。然而，從今年一月頭兩個星期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反對派還未被打垮。

問：如果認為有內戰的可能性，那末，檢討兩派在黨和軍隊裏的力量，似乎是很重要的了。

答：是的，尤其在軍隊方面。現在，我們就黨內的兩派力量加以對比，作一簡單的觀察。我上面已經說過，西北局、西南局和華東局的領導分子，可以說是很堅決站在反對陣營方面。華北局的領導分子，一般說，似乎是支持反對派的。但是有些領導分子則支持毛澤東。中南局已經被認為是毛、林的強

固堡壘，不過現在，我們應該根據新任中宣部部長陶鑄（按：跟着即遭免職）受攻擊的事實來考慮形勢。陶鑄在擔任中宣部部長新職之前，是中南局多年的第一書記，他在中南區仍有很大影響力。中南局新任第一書記王任重也受到攻擊，這證明毛、林未能完全控制這個地區。至於華東局，南京和上海事件表明，毛、林在華東的控制，甚至比中南局更弱。由此可以說，黨內絕大多數是支持反對派或同情反對派的。

軍隊中的兩派關係，更難判斷。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軍隊的某些歷史淵源，形勢就容易判斷得多了。

解放軍起初分為七個部份。得勢之後，蔣介石撤守台灣，解放軍各部隊由它們的司令員帶到各不相同的地區。林彪的軍隊，由東北調到現在中南局所屬地區。彭德懷的軍隊，調到現在西北局的地區，劉伯誠將他的軍隊開進現在西南局的地區。

當林彪離開東北的時候，他把游擊隊留在東北，這支隊伍現在歸東北局管轄。陳毅的軍隊佔據現在整個華東區。華北局的軍隊，是由許多地方軍合併而成，受華北局直接領導。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每個地方局的領導都各自握有軍隊，因此，我們可以說，兩派在軍隊裏的勢力，大致和他們在黨裏的關係相同。當然，某些地方的軍隊領導分子，有可能不同意該地區地方局的領導。

但是就軍隊而言，另外有些因素是必須考慮的。有些人，如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九月間當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如一九五九年起當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尤其是與整個軍隊具有歷史關係的領袖朱德，以及另一位與軍隊有歷史關係的領袖賀龍，他們在軍隊中都具有異常巨大的影響力。

所有這些人物，都受毛林派攻擊（朱德和賀龍最近受攻擊），這表示這些領袖都與毛林派有分歧。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判斷，毛澤東在整個軍隊中的地位，不是很有利的。正因為他有這個弱點，毛澤東才企圖在軍隊中成立「文化革命小組」，來改組軍隊。這個小組還派代表到各軍隊中去，其用意有二：第一，去了解究竟反對派在軍隊中有多少實力，有那些軍隊毛澤東可以信賴；第二，用答應升級以賄賂某些領導分子等辦法，企圖爭取軍隊中某些分子倒向自己方面來。

在我看來，這種辦法，對局勢不能有多大改變，也不會有利於毛澤東。當然，代表們被接見了，進行了形式上的接觸，他們表示熱烈同意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央委員會所通過的十六條綱領。但是在實際上，其中有許多人正在伺機（或許在準備）在將來與毛澤東來一次攤牌。

另外一個因素也是重要的，這就是公開和秘密的公安部隊。這個部隊，是中共取得政權後，在蘇聯許多格柏烏（GPU，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專家幫助下立即由羅瑞卿建立起來的。羅瑞卿於一九五九年因為要當總參謀長，辭去公安部隊職位，由謝富治接替，成為公安部長和秘密警察的首腦。謝富治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了差不多二十年之久。現在羅瑞卿和謝富治都受紅衛兵攻擊，羅瑞卿甚至已被毛林派逮捕，這似乎是因為整個警察力量，或者至少絕大部份的警察力量，是受反對派所影響之故。最近，謝富治大概受到很大壓力，特別是受到林彪軍隊包圍北京的壓力，向毛林派妥協，這可以由江青的聲明，叫紅衛兵不要再攻擊謝富治，得到解釋。

我要說幾句關於周恩來的話，在兩相對峙的派別之間，周恩來像是代表第三個大派。這一派力量非常脆弱，它沒有群眾基礎，實際上也不能爭權。但它的力量在於它控制了政府各部。要了解這個集團的地位，需要明白這個集團的領袖周恩來。在政治上，周恩來是很軟弱的，凡黨內發生鬥爭的時候，他一生一世總是依靠在較強的一邊。但是在組織上，他很能幹，全黨的人都稱讚他在這方面的才能。現在，由於林彪軍隊包圍北京和他的國務院，他已與毛澤東妥協，正企圖扮演調人的角色。如果反對派開始顯示力量，他無疑會相應改變他的態度。

將來究竟鹿死誰手，還要受許多因素——國內和國外的因素——而決定。整個說來，我們現在可以作這樣的判斷，毛澤東的力量居於少數，除非他們要進行冒險，或者被迫出此，否則，毛、林不會在這個時候開啓內戰。

問：毛澤東指控他的反對者是復辟資本主義，是修正主義等等。但是誰都不能確實知道反毛派的綱領如何，你可以闡明反對派的性質嗎？

答：中共黨有些地方與蘇聯的共產黨相同。黨內沒有民主討論，一切決定由上層交下來，幹部和黨員一定要服從和執行。即使在最高機構，如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一般也很少討論。只有在極嚴重的問題，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在印尼的失敗，才在最高機構裏舉行真正討論。在過去，凡產生反對派，企圖批評毛澤東及其政綱的，都被開除出去。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了解現在反對派的明確政綱如何。但是從中共自己批評反對派所公佈的文件中，可以對反對派的一般態度，獲得一個概念。他們與毛派的主要分歧如下：

一、他們認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如「大躍進」，尤其是成立人民公社，是冒進的行動。

二、在文學和藝術方面，他們覺得毛澤東的觀念太嚴厲，使得任何創作，都受到拘束，等等。

三、差不多所有教育家、教授、教師和大學生，都反對毛澤東的教育政策，因為這些政策妨礙了學術自由。他們覺得，派他們落鄉下廠，是浪費時間。他們認為毛澤東的整個政策，是瓦解教育制度的。

四、反對派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因為材料很少，很難確定。不過，他們一般都同意羅瑞卿在關於美國如果進攻中國、中國應如何防禦這個問題上的意見……羅瑞卿認為必須承認今日的戰爭方式之重要性，尤其是核武器作用的重要性。因此他覺得，與蘇聯政府決裂，足以危害中國在軍事上防禦帝國主義進攻的能力。

五、最後一點，他們表現得很清楚的，就是普遍嫌惡毛澤東的全權作風。他們要求在重大問題上，黨內應多加討論。

上述五點，使我們對反對派的意見和觀念，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我們無法詳細解釋他們的政綱。我不相信他們有一個正式和有系統的政綱……

問：那末，反對派代表一種民主勢力嗎？許多人認為主要的反毛派是赫魯曉夫主義，你覺得如何？

答：反對派不是清一色的，而是由許多種傾向所形成。我們可以分辨出三種主要傾向：第一種可以在最高領導分子中發現，如劉少奇、鄧小平和政治局中的許多領導分子。這種傾向，一般說來，是代表黨內官僚集團（**BUREAUCRATIC**

GROUP)，它控制着絕大部份黨的機構。這個集團，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傳統，都是斯大林主義的。

第二種傾向可以稱為「自由化」(LIBERALIZING)傾向，它是由中共黨第二級幹部或中層幹部構成的，鄧拓和吳晗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第三種傾向很難確定，因為它似乎沒有一位領袖，或任何知名幹部作為代表。但是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的說，這一集團，如果不是代表一種革命傾向，那末也是代表一種準革命(QUASI-REVOLUTIONARY)傾向，這種傾向主要是由中共黨內下層黨員構成……

在最高領導層裏，毛澤東是不能容忍不同意見的，每一個反對派都要被開除。不過高層領導分子們，由於過去在群眾中工作的經驗，又由於他們和中層黨員有聯繫，所以他們之中某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群眾運動。當中層黨員代表黨內改良傾向的時候，可以這樣設想，那些高層領導分子，雖然較保守，雖然想保持對黨的嚴格控制，也會認識到有改良的必要。

關於赫魯曉夫主義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了解赫魯曉夫主義的意義，特別要了解毛澤東所說的赫魯曉夫主義的意義。

赫魯曉夫主義有兩個不同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修正主義，這是反動的；另一方面是非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這是進步的。毛澤東沒有對這兩方面加以區別。他把兩者混成一團，統稱為修正主義。在他看來，兩方面都是反動的，他還說赫魯曉夫政策已經在蘇聯恢復了資本主義。

就赫魯曉夫政治上的修正主義而論，毛澤東自己的政策，在實踐中，並沒有表明在本質上同赫魯曉夫有甚麼不同，印尼事件就是很好的證明。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主要的是反對其「非斯大林化」。據我所知，沒有事實足以證明，反對派曾經不同意官方批揭赫魯曉夫政治上修正主義的政策。因此，起碼在非斯大林化問題上，反對派的立場是比較進步的。一般說來，反對派是要逐漸減弱毛澤東主義的專制傾向，而加強較為改良的傾向。

問：依你之見，這場鬥爭最後的結果會如何？

答：根據我上面所述雙方力量關係看來，優勢並不在毛澤東方面，尤其是工農群眾如果繼續組織起來和動員起來，像我們在最近事變中所見的那樣的話。

如果毛澤東真的勝利了，我認為將會發生一場足以與三十年代蘇聯相比、甚至比蘇聯更大的大清算，而保衛中國的革命則更加困難。若是反對派勝利的話，結果，可能會作出一些自由化的讓步，而且會擺脫毛澤東所採取的極端左傾教條主義的立場。

如果反對派勝利，還有一個可能的前途。如果群眾已經進入行動，官僚就不容易中止他們，也不容易將他們牽住留在預定的限度內。在這種情形下，有可能開啓一場為工人民主而作的群眾鬥爭。

給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公開信 *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親愛的同志們：

從去年五月初起，你們的黨主席毛澤東，通過解放軍報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從八月起，他組織紅衛兵來推行此種文化大革命後，中國整個大陸都被投進於暴風雨的漩渦中，荒唐的事件不斷發生，已使我感到十分驚異。尤其是你們黨和政府的高級領袖彭真、陸定一和羅瑞卿等，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而被撤職、被遞捕、被監禁，甚至被紅衛兵拖着遊街示衆，被迫試圖自殺；大批文化和教育界的高級領導人，如周揚、田漢、夏衍、吳晗、鄧拓、陽翰笙、李達、陸平、匡亞明、彭康等之被清算；你們黨的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你們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之被紅衛兵公開抨擊，被迫作自我批評；最近，你們的毛主席甚至下令軍隊干涉黨內鬥爭，利用軍事力量和紅衛兵搶奪了山西、黑龍江、貴州等省的黨部和政府機關，迫害當地的黨政領袖，所有這一切，不但表明你們的黨已陷於最最嚴重的危機，發生了公開的破裂，並在日益走近內戰的邊緣。這種極度險惡的情形，如不及時加以阻止，極可能造成巨大災禍，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帶到毀滅的深淵。爲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爲了工農群眾的基本利益，爲了你們黨內和黨外千百萬戰士的命運，我深深地感到再也不能緘默了。因此，我特別寫這封信給你們以表示我對於你們黨內危機的看法，以及怎樣解決危機的方針。

* 這封公開信當時會以油印方式散發。

首先，我要請你們注意，前面所列舉的你們黨內的這些高級領袖和文教領導人，都是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之下，被清算、被迫害或被迫悔過的。更壞的是，他們都被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復辟資本主義」。但人們不得不問，他們被控告「反對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這種滔天大罪的證據在那裏？沒有，絕對沒有。這顯然是一種「莫須有」的誣陷。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用「人民公敵」的罪名來整肅他的一切反對者，大興冤獄，是同樣荒唐的罪惡行爲。

就我個人說，對於你們黨內現時被清算的領袖們，我並不同意他們的基本政治立場和組織觀點，但我覺得他們絕對不至於在中國已經踏上社會主義道路後，會「反對社會主義」，會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或圖謀「資本主義復辟」。

就我個人知道得最清楚，並在一個時期內（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和他一個黨內合作過的劉少奇來說，他自一九二〇年秋加入共產主義運動後，即以全力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雖然我和他在政治上已分道揚鑣（他繼續擁護斯大林的立場，我則已轉到托洛茨基的觀點），但仍舊認為他是一個革命家。如果對你們的黨來說，劉少奇的貢獻是很大的。他在一個長時期內，在蔣介石的白色恐怖統治下，進行艱苦而危險的地下工作，爲的是推翻蔣介石的資產階級政權，把中國推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像這樣的人，說他在你們黨取得政權後的十七年，他自己又作了國家的首領，反而「反對社會主義」，企圖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像這種絕對荒唐的指控，怎麼能令人想像呢？！

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及其他許多文教工作領導人，他們的情形是或多或少和劉少奇類似的，現在把「反社會主義」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加在他們頭上，除了說這是荒唐的誣陷外，再不能有別的說法。所有這些，和斯大林當年誣陷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們的支持者，說他們企圖在俄國恢復資本主義，是「人民的公敵」，這不是同樣的荒唐和卑劣嗎？！像這樣絕頂荒唐和卑劣的誣陷事件，怎麼會在你們黨內發生？這便是今天擺在你們面前，必須加以徹底探討和解決的中心問題！

你們的黨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並把民主集中制寫在你們的黨章上。但實際上，如你們自己所親身經歷的，你們的黨絕對沒有民主，只有官僚的集中，一直集中到你們的黨主席毛澤東一人的身上，一切重大問題都由他獨自決定，而且他的決定都被認為永無錯誤；凡是不同意或批評他的人們，都被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或「反革命右派」，一定要遭到整肅。你們黨內現時所爆發的致命危機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假如你們的黨真是依照民主集中制進行，那絕對不致於發生現時這種卑劣的誣陷事件。依照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黨內一切重大問題，必須提出於全體黨員群眾之前，讓每個黨員獨立思考，自由發表意見，互相討論批評，包括批評任何高級領袖在內，然後經過黨大會作最後決定；大會決定後，當然在行動上必須統一，少數服從多數，但少數派還有權利保留自己的意見，遇必要時還可以請求黨再行考慮，絕不會因此遭到懲罰。這就是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所一貫執行的民主集中制。

在列寧領導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時期，俄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總是按年舉行的。遇到特別重大問題發生時，還可召開臨時的黨大會。只有這樣，才能反映黨員群眾的意見，黨內的民主集中制

才能名符其實地體現出來。所以在列寧領導時期，凡是重大的問題，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約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等，都是經過黨內的充分民主討論，才作最後的決定的。甚至決定後，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派，如布哈林等對布列斯特和約的反對意見，仍舊讓他們保留，只要求他們在行動上一致，布哈林等非但沒有因此受到任何懲罰，而且保證了他們原來在黨和政府中的職位，這便是布爾塞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表現。

自從列寧逝世後，斯大林篡奪了黨的領導權，把布爾塞維克的民主集中制，改變為沒有民主的官僚集中制，一直集中到斯大林的個人獨裁，凡是有關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都由他獨自決定，再不需要黨內的民主討論，因而也就不需要按期舉行黨大會了（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前的二十三年中，蘇共只召開過三次大會，便是明證）。凡是不同意見或批評他的人們，都在「反黨」、「人民公敵」的罪名之下被整肅了，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和無數的革命青年，都在斯大林的個人獨裁制下被毀滅了！

你們的黨自一九四九年走上政權後，一切重大問題，從來沒有經過黨內的民主討論和黨大會的決定。例如，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政策，特別是有關五億農民生活的人民公社，以及這次的「文化革命」，不但沒有經過黨內的任何民主討論和黨大會的決定，甚至沒有經過你們黨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的討論和決定。所有這些重大問題，都由你們的黨主席毛澤東獨自下令，命令全體黨員奉行。你們的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只是在毛澤東發出命令後，召開會議來認可或批准罷了。例如，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初下令建立人民公社，你們的中央政治局到八月末才召開一次擴大會議來認可它。同樣你們的毛主席於去年五月初發動了「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你們的中央委員會直到八月才舉行全會來通過他製訂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所以你們的黨在取得政權後的十七年當中，只開過一次黨大會（即一九五六年舉行的第八屆黨大會）。這種情形，和斯大林統治蘇聯的時期如出一轍，也可以說，這是從斯大林那里抄襲來的。這樣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整肅一切反對者的大悲劇，不可免地要在你們黨內重演出來。現時的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其他幾十個文教工作的高級幹部之被整肅，不過是大悲劇的序幕。

更嚴重而危險的是，你們的毛主席甚至動員軍隊干涉黨內鬥爭，利用林彪系的軍隊與紅衛兵奪取了反對派手中的某些省市的黨政機關，企圖以此逐步地攫取全國範圍內的黨政大權，形成他的拿破崙式的軍事獨裁。像這種肆無忌憚地破壞法紀（即你們的黨和政府所製定的法紀）和極端橫暴的行爲，已遠遠地超過了斯大林，如不及時加以遏止，那就不可免地導致一場大規模的內戰，至少是長期的混亂。

你們知道得十分清楚，毛林派所能控制的幹部和黨員，在你們黨內居於微小的少數派地位，真正是「一小撮人」，他們現時所控制的地方，只有首都北京、上海和山西、黑龍江等省的幾個城市（就是這些地方也是靠軍隊和紅衛兵搶過來的），其他的廣大地區都在反對派或中立派手里。假如毛澤東堅持要搶奪反對派或中立派掌握中的黨權和政權，那就不可免地要迫使各地區的，特別是西北、西南和內蒙古等地區的反對派聯合起來抵抗，那時，一場大規模的內戰便要爆發出來。在這樣的內戰威脅下，全國的經濟遭受何等破壞，人民將受到怎樣的災禍，有多少人命被犧牲，我們此時無法推測，但有一點是可預見的，就是：經過這樣的災禍，中國將倒退若干年，整個國家的力量將大大被削弱，社

會主義的事業將遭到嚴重的摧殘，而且大有可能招致美帝國主義的乘機進犯，那時中國的命運便不堪設想了！

親愛的同志們，當前極度嚴重的局勢已清楚地指出：不僅是你們的黨，而且是整個社會主義的中國，已處於緊急的危機狀態中。這是你們奮起鬥爭的時候了！

據說，你們的黨擁有二千萬黨員，你們的青年團的團員近三千萬，這是一個無比巨大的有組織的群體。假使將它的革命潛力發揮出來，任何艱險局勢都可能被克服的。我並且相信，你們當中，除少數腐化和墮落的官僚，追逐利祿的投機份子，頑固不化的斯大林主義者或毛澤東主義者外，大多數都是戰士，是忠實於社會主義的事業，願替廣大的工農群眾的利益服務，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前途是十分關切的。因此，我向你們提出如下的建議：

第一、你們必須立刻向你們全黨呼籲，號召全體黨員和團員行動起來，實行干涉目前的危險局勢，遏阻內戰的爆發。爲着達成這一目標，你們必須首先向你們的主席毛澤東提出下面的要求：

- 一、立刻停止利用軍事暴力搶奪各地區的黨權和政權，各地方黨的領導，應經過黨員群眾的民主投票來解決。立刻在全國各地成立工農兵委員會，以社會主義的民主投票方式，解決當前正在爭執中的地方和中央的政權問題。
- 二、解散紅衛兵，因爲它的大多數已被陳伯達和江青的文化革命小組所把持，已成爲片面攻擊和迫害一切反對派的御用工具。它起的作用是完全違反社會主義的民主，因而是反動的。

- 三、釋放近來被逮捕、被監禁的一切反對派的領袖和幹部，恢復他們的職位，並釋放以前被監禁的一切政治犯，包括托洛茨基主義者，讓他們自由發表意見，從事政治活動。
- 四、你們黨的機關報，和其他刊物，以及一切廣播電台，立刻停止對反對派的片面污蔑（如「反黨、反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等）和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荒謬宣傳，而代之以發表各派的政治主張，進行公開辯論。
- 五、由你們黨內各派推舉代表，成立一個協商委員會，負責籌備你們的黨大會，將已經引起分歧的重大問題，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的失敗和教訓，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聯合行動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戰爭的迫切問題，等等，由各派提出自己的主張，以供黨員群眾的討論和你們黨大會的參考和決定。

以上各點是避免國內戰爭，謀取和平解決的合理而可能的辦法。問題在於毛澤東能否接受它。

第二、假如你們的毛主席拒絕上述避免內戰、謀取和平的合理要求，那就證明他完全不顧你們黨員群眾的意見，決心依靠林彪系的一部份軍隊和紅衛兵來搶奪黨權，準備摧毀一切反對派，建立他的拿破崙式的軍事獨裁，不惜掀起大規模的內戰，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引向死巷。這樣你們便有充分的理由和權利同他公開破裂，直接向工農兵群眾呼籲，號召他們起來，為革命的成果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聯合而進行生死鬥爭，把你們黨內現時的派系鬥爭，轉變為工農群眾反官僚獨裁者的革命鬥爭。為了保證這個鬥

爭的勝利，我向你們及一切革命者貢獻如下的政治綱領：

- 一、絕對保衛革命的成果和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堅決打擊一切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殘餘份子和腐化官僚乘機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停付資本家的定息，排除資產階級份子在工廠、礦山和交通機關中所佔據的管理職權。
- 二、建立廣泛的各社會主義集團的聯合戰綫，終止一黨或一派系的官僚獨裁。現在你們的黨既已分成爲兩個不可調和的派系——親毛派與反毛派，事實上已分成爲兩個黨，而且反對派中包含有不少政見不同的派系。在你們黨外，更有無數的革命份子，包括鳴放運動被鎮壓後，被你們黨整肅的成千成萬的左派份子，他們應當有權組織獨立政黨或政治集團。凡是宣佈爲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政黨，都有權存在和從事政治活動，用政綱去爭取工農群眾的支持。在這樣的情勢下，只有建立各種社會主義政治集團的聯合戰綫，才能把一切革命力量團結和集中起來，戰勝當前違反社會主義民主的毛林派的猖狂迫害和進攻，阻遏拿破崙式軍事獨裁的出現和蘇聯三十年代大悲劇的重演，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權。
- 三、爲了創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權，你們必須和其他一切政治集團的革命份子，到工農群眾中號召他們起來鬥爭，首先鼓動他們成立工農委員會（代表由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並號召兵士組織兵士委員會，和工農的委員會聯合起來成立各級政府，以代替現時由虛偽選舉製造的人民代表會議所產生的政權。工農兵委員會不但是現時

動員城鄉一切勞動群衆起來戰鬥的最廣大而強有力的組織，而且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制的唯一形式。

四、將現有的民兵普遍擴大和改組，民兵的指揮員由參加的成員自由選舉，以民兵代替現時的公安警察維持社會秩序，必要時，則派往前綫打擊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

五、在一切工廠和礦場，以民主方式選舉工人委員會，和技術專家合作管理生產。在一切人民公社，以同樣的民主方式選舉公社管理委員會，處理生產和分配。至於公社的根本改造問題，應由全體農民自行討論和解決。

六、由於工農群衆生活長期都處於十分困苦狀態中，他們的生活必須立刻加以改善，如增加工人的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增加農民的收入，減輕他們的過份辛勞。毛澤東只強調「增加生產」，完全不顧工農生活的痛苦，這種官僚主義的橫暴的政策，必須堅決加以排斥。要真正提高生產，只有改善工農的物質生活，發揮他們的民主和創意精神，才有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動員工農群衆積極起來鬥爭。現時毛林派把改善工農群衆的物質生活詆之為「經濟主義」，恰好反映了享受特權的（包括奢侈的物質生活的）上層官僚奴役工農的心理。

七、少數民族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曾引起了許多次的內戰。因此，合理地解決國內少數民族問題，已成為謀取國家統一和穩定社會的最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二年起，即已根據列寧關於民族自決的原則，承認國內少數民族自決權，包括成立它們的獨立政府。

你們黨取得政權後，並沒有根據列寧的原則解決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雖然你們的黨，在名義上建立了少數民族自治區，但實際上，對這些少數民族仍舊保持大漢族統治的傳統。這便包藏了這些民族對漢族的不滿和敵視，因而埋伏了內戰的危機。在你們黨內現時的嚴重衝突中，這種危機便開始探出頭來了。

爲了避免國內民族間的流血衝突，謀取國家的統一，必須重新承認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包括成立它們獨立的黨和獨立的政府。只有這樣，才能在民族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蘇維埃聯盟的中國，完成社會主義的國家統一。

八、必須從印度尼西亞的大悲劇中吸收教訓，重新建立對外的革命政策。你們大家知道，印尼共產黨領袖艾地曾多次訪問中國。每次都和你們的毛主席懇談、交換意見。他並公開發表了他擁護蘇加諾的反動透頂的納沙貢政策。你們的人民日報發表了艾地的演說，不但沒有給他以任何批評，反而大肆讚揚：「印尼共產黨是偉大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黨」，「艾地是偉大的革命領袖」。這表明了你們的毛主席爲了拉攏蘇加諾，不惜鼓勵印尼共產黨支持他們的納沙貢；爲了拉攏艾地反對赫魯曉夫，不惜鼓勵前者去實行後者的修正主義政策。結果造成了十月的空前悲劇，幾十萬共產黨人和工農戰士淹沒於血泊之中，並連帶地使那裏的幾百萬華僑陷於極度悲慘的境地。這反過來又給了你們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以最沉重的打擊。

印尼共產黨的悲劇，乃是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第二次革命悲劇的重演；毛澤東鼓勵印尼共黨擁護蘇加諾的納沙貢政策，正是承襲了斯大林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迫使中共擁護蔣介石和他所繼承的三民主義的那種政策，只是前者較之後者更為荒謬，因而其結果也就更為悲慘。由此得出的主要教訓是：階級合作的政策，即由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合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後，再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這種革命階段論的政策，註定要造成大災禍的。這個教訓應當大書特書在中國對外政策的綱領上，以為今後援助世界革命，特別是落後國家革命的指南。

九、現時，你們的毛主席指責反對他的人為赫魯曉夫主義者，或現代修正主義者。這便在你們黨內引起了很大的混亂。毛澤東甚至宣稱，同現代的修正主義者談不到任何聯合，實際上，他是企圖和蘇聯斷絕關係。因而把赫魯曉夫主義的問題加以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來說，赫魯曉夫主義含有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修正主義，即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以及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當然，這是右傾的機會主義，必須加以排斥和暴露；另一方面是非斯大林主義化，即部分地暴露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獨裁、和他的一部份可怕的罪惡。雖然這種非斯大林主義化遠不徹底，但是進步的，值得有條件地加以支持。

但毛澤東把兩種不同混合起來，當作「修正主義」加以攻擊；他甚至走得這樣遠，說蘇聯在赫魯曉夫的領

導下已變成資本主義國家。這是絕頂荒謬的。人們必須在社會主義的財產關係和官僚獨裁之間加以區別，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保衛前者而反對後者。

就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來說，必須指出思想的鬥爭絕不能干涉或妨礙國家方面的關係，如商業和軍事的援助等等，儘管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仍然必須進行。

十、自美帝國主義在越南有計劃地實行升級的戰爭和瘋狂的轟炸越南人民共和國後，它已給了越南人民以極大的痛苦，這不但危害着越南的抗戰，而且中國本身亦受到直接的威脅，並有可能導致核子戰的大災禍。但你們的毛主席藉口反對修正主義，拒絕參加任何聯合陣綫，這種極端教派主義的立場，在客觀上只是幫助美帝國主義而已。

毫無疑義，蘇聯官僚，由於他的和平共處路綫，是沒有決心幫助越南人民贏得對美戰爭的勝利的。但另一方面，由於蘇聯人民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壓力，蘇聯官僚不得不採取某些步驟以援助越南人民，甚至不得不同意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聯合陣綫來援助越南抗戰。在這種情勢下，你們必須接受聯合陣綫的建議，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行動以反對美帝國主義。假如蘇聯官僚在聯合陣綫中表示怠工或破壞行爲，那麼你們有權利和責任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他們。這種暴露的威脅性，可能迫使蘇聯官僚不能隨便怠工。由於這些理由，你們必須反對毛澤東的最有害的教派主義政策，而參加聯合陣綫。這樣，越南人民才有可能贏得他們的反美鬥爭。

上面所敘述的綱領，可以簡約為如下的幾個口號：

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為保衛社會主義的財產制而鬥爭！

打倒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

推進世界革命，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策代替階級合作政策！

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和進步勢力聯合起來，保衛越南人民的革命戰爭！

致

革命的敬禮！

彭述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和分歧 *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問：自前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訪問過你之後，親毛派和反毛派之間的鬥爭更加熾烈，中國事變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嚴重了。一方面，毛澤東公開呼籲軍隊介入鬥爭，幫助紅衛兵奪權；因此，毛派份子已佔據了上海的黨政大權，以及山西、黑龍江、貴州、福建、江西及廣東各省的黨政大權。權力鬥爭已擴展到全國各地。河南與四川的形勢最嚴重；照法國時報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的報導，四川在六月七日至八日發生了一場大武鬥，三百餘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同樣的衝突似乎也在河南發生，重要的權位被反對派奪取了。河南電台報導說，反對派公開支持劉少奇的立場。這些事件顯示，兩個派系之間的鬥爭，有可能引致一場全國性內戰。而實際上，現今的衝突已經是地方性內戰了。

在另一方面，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的「紅旗」登載了戚本禹的文章，立即引起了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紅衛兵的大規模反劉少奇示威，公開斥責他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埋葬劉少奇家族的黑色王朝！」等口號。毛派盡可能推廣這些口號，北京電台甚至廣播將劉少奇點名批評

* 本文是安東尼奧·法利安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訪問彭述之的談話全文。

的報刊文章，亦報導所有批鬥劉少奇的示威和集會。從這些事件看來，毛澤東似乎已決定準備輿論來撤除劉少奇、鄧小平及其他反對派領袖的職位。事件的這種發展當然不出奇，因為它是早些時候發展的延續。但是，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很多難以了解這兩派為什麼和怎樣發展到今日如此不可調和的地步。換句話說，人們很難了解是什麼基本的政治分歧令到這兩派勢成水火，令到毛劉之間不可能達成妥協。你能否解釋這些分歧和它們發展的經過？

答：中國共產黨因為有斯大林主義的傳統，慣於將一切基本分歧保守秘密，所以黨外人很難了解這些歧見。但是，由於近期大字報和許多紅衛兵報公開攻擊劉少奇，我們對毛劉之間的基本分歧，能夠看得較清楚。例如，有一篇文章題為「看劉少奇的醜態嘴臉」，刊於紅衛兵報「井岡山」，另有一篇是「劉少奇的罪狀」，發表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二日「首都紅衛兵」報。這些文章，不管它們怎樣惡意攻擊劉少奇及其過去的活動，畢竟透露出一些重要事實，可以用來判斷毛劉之間歷史性的基本分歧。①

不過在了解毛劉現在的分歧之前，應先了解一下他們的過去，也就是說，他們兩人過去在黨內外所負的不同的職責，所進行的不同的活動，以及他們兩人彼此之間的過去關係。

問：一般來說，毛澤東過去的職位和活動都頗為人們知曉。但劉少奇的歷史仍較少人知道和十分不清楚。至於毛劉過去的關係，就更模糊了。因此，請你描述和解釋毛澤東，特別是劉少奇過去的歷史，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答：毛澤東在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之後，給派到湖南去當省委書記，在那裏工作了大約兩年。一九二三年，在第三次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委，指定擔任組織部部長。這個

時期，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國民黨，同國民黨合作，於是毛澤東奉委為國民黨上海市委會委員，他就全力以赴，不再兼顧中共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秋，毛澤東重返湖南，參加農民運動，此後，他去了廣州，開始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部裏工作，擔任宣傳部秘書，主編國民黨雜誌《政治週刊》。一九二六年底，他重返湖南，就在這個時期，他搜集資料，寫他論農民運動的著名文章。

一九二七年春，毛澤東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直至一九二七年七月革命失敗，中共黨員在武漢被清除出國民黨為止。

劉少奇在上述這段時期的工作，則非常不同。他於一九二二年夏天自莫斯科返中國，一直從事工人運動。最初在安源煤礦工人中活動，同李立三一起在安源領導大罷工，組織了幾個工會，劉少奇成爲重要領袖之一。

一九二五年夏，他到上海，參加五卅運動，並協助組織工會。同年稍後，黨派他赴天津，在那裏幫助組織工人運動。

一九二六年春，劉少奇赴廣州，同李立三、鄧中夏一起籌備「第三次全國職工聯合會」大會。他被選爲大會書記和全國職工聯合會執行委員。自此之後，劉少奇便聲名大振，成爲工會運動中一位重要領袖。

一九二六年年底，劉少奇以全國職工聯合會代表身份去武漢，領導工人運動，他留在武漢直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國民黨清黨爲止。

從以上簡短的敘述中可以見到，迄一九二七年年中爲止，一般來說，毛澤東的主要工作範圍在國民黨和農民運動方面，而劉少奇則完全在工人運動方面。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期，毛劉之間並無直接的工作關係。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第三國際的政策由機會主義轉到盲動主義，在這一轉變中，毛澤東將農民組成游擊隊，進行「秋收暴動」，因此在實行黨路線方面，開始起着重要作用。「暴動」失敗後，以迄一九三四年，他成為游擊隊和江西蘇維埃運動的極重要領袖之一。不過，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仍然在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等中共中央思想領袖的領導之下。瞿李王等對毛的批評很嚴厲，尤其是王明派，自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遷到江西蘇區之後，他們對毛澤東大施抨擊。實際上，毛澤東的一切權力，都給他們奪去，只保留「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名義，而副主席項英差不多大權獨攬。

直到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形勢始有所改變。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取得了黨的領導權，但是，他仍不能控制整個黨和軍隊，因為王明派份子仍佔據許多領導職位。而留在江西、安徽和浙江的軍隊，仍由項英管轄；項英是王明的人，拒不接受毛澤東領導。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大會，毛澤東纔完全取得全黨最高的領導地位。

同在這段期間（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劉少奇的情形大不相同。一九二八年以後，劉的工作主要在黨內，大約到一九三一年為止，他一直都在北京和東北工作；一九三二年，他奉派赴江西蘇區，負責從事工運。② 他赴蘇區之時，正是毛澤東完全失勢的時期。

一九三四年秋，劉給調派赴北方，重新在北京幹黨的工作，擔任北方局書記。在這段時間，他策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抗日運動；也就在這次運動中，他同彭真③等爭取到許多新的年青有為的人入黨，如劉瀾濤、蔣南翔、陸平、鄧拓等。

一九三八年初，劉赴延安參加中委會和政治局，這是他同毛

澤東密切合作的第一次。

一九三八年，劉担任新成立的華中局書記，以中委會特別代表的身份，派到新四軍盤踞的地區。這枝軍隊是由南方許多游擊小隊組合而成，沒有參加長征，司令為葉挺，副司令兼政治委員為項英。④

當時毛澤東和王明，對國民黨合作問題發生爭論，因為項英同意王明的意見，所以劉少奇被派去設法削弱王明份子在新四軍的影響。

一九四一年一月，蔣介石的軍隊襲擊新四軍，葉挺被俘入獄，項英在戰鬥中陣亡。自此之後，陳毅任司令員，劉少奇接替項英的政委職務。劉繼而解散東南局（項英曾為該局書記），將該局管轄權歸併於華中局（劉為華中局書記）。於是劉便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和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區裏中共最重要的領導者。在這個時期，他大大地擴張中共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同時擴大新四軍，摧毀王明派的勢力。換言之，他使整個新四軍接受毛澤東領導；在此以前，新四軍在王明派影響下，常常不服從毛澤東的指示。這對加強毛澤東地位是極大的貢獻。從此之後，毛劉便親密合作。

一九四二年秋，劉少奇重返延安，在政治局工作，成為黨第二號領袖，僅次於毛澤東。

此後幾年，劉少奇幫助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裏壓制王明和王明派份子，又幫助毛起草一些文件，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四五年四月第六屆中全會第七次會議通過）和「中國共產黨新黨章」（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第七次大會通過）。

第一個文件，將中共過去的一切失敗，都歸罪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尤其是王明及其集團。⑤ 這個文件將毛澤

東的工作說成是永遠正確的，而且讚揚劉少奇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的立場。第二個文件可能是劉少奇寫的，由他在第七次大會上作報告。黨章的總綱中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劉少奇的整個報告，就是本着這種精神，歌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思想。

大會終於選舉毛澤東為中共黨的最高領袖，劉少奇為高級領導人之一；所有王明派份子，不是被排除於中委會之外，就是給降為候補委員。 ⑥

七大之後，毛劉在反蔣的鬥爭中很親密地合作。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利時，毛澤東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為副主席，他們之間的親密合作，是眾所週知的。

問：毛劉之間的分歧何時發生，在那些問題上發生？

答：在我剛才談述的時期，兩人顯然沒有重大分歧。據最近的消息看來，主要的分歧開始明顯化，是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問題上。例如，「首都紅衛兵」報導說，自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劉少奇明目張膽的破壞合作化運動。一九五五年支持鄧子恢 ⑦，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當然，這種指控很不夠具體，但是這已足夠證明毛劉之間在一九五五年就有重大分歧了。

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提出農業合作化計劃，堅持要在極短期內完成。他的計劃，號召在一九五五年年底之前完成八十五萬個農業合作社。劉少奇和鄧子恢等大概顧慮到蘇聯過去農業集體化的教訓，同時也多少了解到列寧對農業集體化的意見 ⑧，主張實行穩步集體化的長期政策，建議在一九六七年才完成合作化，他們的計劃在政治局裏獲得多數支持。

毛澤東反對這個決定，繞過了政治局，召開「省、市委書記和區黨委書記會議」，決定農業集體化應於一九五七年完成。

這就是毛劉之間第一次重大分歧，它顯然同後來關於「人民公社」的分歧有密切關係。

問：上次我訪問你時，你說主要的分歧是關於非斯大林主義化。你說對於非斯大林主義化，毛澤東大加反對，而劉少奇似乎贊成。這有什麼事實根據？

答：是的，這是毛劉之間最嚴重的分歧。毛派曾公開稱呼劉少奇為「中國赫魯曉夫」。這個稱呼的由來正是關於非斯大林主義化問題。紅衛兵報「井岡山」最近發表一篇文章，即上述「看劉少奇的醜惡嘴臉」，其中說，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第八次大會上，修改了黨章，將前面所引的黨章總綱中那句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改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於是，一切有關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詞句都刪去了。「井岡山」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這就是劉少奇惡意反對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證明。

中共第八次大會不僅修改了黨章，刪除了有關毛澤東的詞句，且強調必須禁止任何個人崇拜。這可從鄧小平 ⑨ 「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看得很清楚。他說：「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廿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巨大影響。」「蘇聯共產黨第廿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個人崇拜是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定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

這是很明白的，在蘇共二十次大會及其非斯大林主義化的衝擊下，中中共委會的多數，接受了這種反對個人崇拜的思想，因而在黨章中刪除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詞句，禁止個人崇拜。

這裏必須指出，鄧小平所說個人崇拜正在中國社會和中共黨內存在這段話，是十分嚴重的，因為這是直接指毛澤東本人。自一九四五年七大以來，尤其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毛澤東一直搞個人崇拜，將自己捧為「東方的太陽」和「中國的斯大林」。例如「東方紅」這首歌的歌詞就這麼說：「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九五〇年毛澤東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之後，又編了一首新歌，說：「毛澤東和斯大林像天上照耀着的太陽」。這兩首歌又給編成管弦樂，凡在重要集會開始的時候，特別當毛澤東參觀的時候，就演奏其中的一首或兩首，每個人都立正，然後高呼「毛主席萬歲！」這簡直成爲一種宗教儀式。但是自從非斯大林主義化運動在蘇聯開始之後，這種儀式在中國便中止了。

毫無疑義，非斯大林主義化在中國，對毛澤東個人是一記沉重的打擊，在當時的壓力下，毛澤東被迫作了某些讓步，暫時忍受這些改變，等待有利的時機，重新恢復個人崇拜 ⑩。

如果我們比較中共七大和八大的情形，明顯可見毛澤東聲望的低落。七大時，毛澤東做政治報告，劉少奇則協助將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裏，如此造成他的個人崇拜。但是八大的政治報告却由劉少奇來做，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給刪去，黨並且採取步驟禁止他的個人崇拜。這表示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主義化的效果多大，怪不得毛澤東要這樣憎恨赫魯曉夫和劉鄧。

問：上面你說毛劉對農業合作化的分歧同他們對「人民公社

」的分歧有密切聯繫，你可否說說他們關於「人民公社」的分歧？

答：直到最近，人們還認為劉少奇支持毛澤東所發動的「人民公社」政策。但是，近來的事實透露，這是不確實的。「劉少奇的罪狀」這篇文章說：「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中央召開的七十八人的大會上，（劉少奇）作了一個修正主義的報告，他大肆攻擊三面紅旗，⑪ 竭力誇大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認為暫時的經濟困難是由於工作中的錯誤造成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攻擊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過火了，反右傾本身就是錯誤的，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他誣蔑黨內缺乏民主，黨的生活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從這許多對劉少奇的攻擊中，可以歸結到以下幾點：

（一）劉反對「三面紅旗」政策，也就是說反對由毛澤東所發動的「人民公社」。這自然是他反對毛澤東合作化運動的邏輯推演。

（二）劉認為經濟困難主要是人為的結果；換言之，他覺得一九六〇年至六二年的經濟困難，是「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政策的結果。

（三）劉認為黨在一九五九年反右鬥爭中是錯誤的；清算彭德懷、⑫ 黃克誠等是錯誤的，這就是說，他覺得彭黃等對「人民公社」的批評是正確的，所以應該平反。

（四）劉指責中共缺乏民主，黨生活是「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正表示劉覺得毛清算彭德懷等是很危險的徵兆。

這四點顯示當時毛劉之間存在極嚴重的分歧。

「人民公社」失敗之後，經濟陷於困境，毛澤東讓劉少奇接管黨權，解決嚴重的困難。劉少奇同鄧小平一起，進行許多改革，

如恢復自留地、自由市場、自養牲畜，取消大部份公眾食堂和公眾托兒所等。所有這些改革，在絕大多數人民中獲得很好的反應，得到人民的尊敬和支持，同時也得到許多黨幹部的尊敬和支持。

問：毛劉之間關於文學、藝術和教育方面有什麼分歧？

答：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是存在的，在你訪問陳碧蘭「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時，已解釋了毛澤東與整個反對派的一些分歧。事實上，周揚是反對派在文化方面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受劉少奇的影响。我們可以從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題為「粉碎反革命的和平演變綱領」一文中獲得證明。這篇文章說，一九五三年三月，劉少奇叫周揚等同他討論作家問題。在討論中，據說，劉少奇曾主張作家應該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允許他們自由寫作，不要干涉他們的創作自由。

同樣的觀念，也表現在劉少奇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向八大提出的政治報告裏，八大的決議是根據劉少奇的報告作成的。該決議說：「爲了繁榮我國的科學和藝術，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的領導，而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這表示劉少奇在這些問題上的觀念同毛澤東大不相同。

劉少奇接管了黨的權力時（一九六〇年），他在文學、藝術和教育方面，實行了溫和得多的政策，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較多的自由。結果，在劉少奇爲首的黨領導之下，文藝方面的工作有了某些程度的改善。這些措施，再加上他在經濟方面的改善，使許多文化工作者和黨幹部都團聚在他的周圍。彭真所領導的北京市委，就是一個好例子。這些情形使得毛澤東越來越孤立，覺得自己的領導地位大成問題。

問：毛澤東對這種局勢有什麼反應呢？

答：他明白在黨內進行鬥爭已經無望，所以轉而依靠軍隊。一九六〇年之後，他通過林彪、羅榮桓和蕭華，以「糾正彭黃錯誤路綫」為藉口，在人民解放軍裏普遍發動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

林彪向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了「正確處理軍隊政治工作領域中的四個關係問題」。在這個文件中，林彪特別強調思想、政治和人的作用的重要性。不久，軍事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決議」。這個決議列舉軍中政治工作十四條，第一條就是：「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從前的口號是「政治掛帥」，現在則公開說要毛澤東思想掛帥。

這個決議通過後，林彪號召「每個人都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一九六六年元旦，「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甚至這樣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凡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堅決擁護，堅決去做；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堅決抵制，堅決反對。」這個聲明背後的理由很清楚：如果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委員會不符合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就不要再聽他的命令。

同時，毛澤東也嘗試在黨內清算劉少奇的支持者。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澤東提出一個文件，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廿三條」）。這個文件在政治局裏不通過，但是它在全黨流傳。後來，這個文件成爲「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基礎。「四清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清除掉支持劉少奇的幹部，但是這個運動遭到強烈抵制，在許多地方受到破壞；除了清除「人民公社」和地方黨委的一些低級幹部外，沒有多大效果。因此

，毛澤東更加要依賴軍隊，提出在黨外進行鬥爭的一套理論。這套理論的基本思想，就是說無產階級在勝利之後，階級鬥爭仍舊繼續，並且會反映到黨裏來。

在一九六二年的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這次中全會在毛澤東堅持下，發表了一份公報，說：「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整個過渡時期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這個鬥爭在黨內表現出來，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爭取時間，我們要堅決與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派別鬥爭。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舉行的八中全會，是粉碎了右傾份子的大勝利，即粉碎修正主義份子的進攻。」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直接攻擊劉少奇對彭德懷的袒護，攻擊劉少奇要平反被清算者的建議。

一九六三至六四年，中中共委會發表了九篇文章，攻擊蘇共。第九篇題為「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說，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領導下，蘇聯已從社會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當然，這就暗示中國本身必須發動黨內反修正主義鬥爭，否則中國也會「變色」。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的全國文聯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嚴重警告說：「過去十五年來，這些協會和它們大部份刊物大都不能執行黨的路綫……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些話是直接警告受劉少奇領導影響的文化界工作幹部。

毛澤東所有的論調，如以上所引的，都是為即將進行的清算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好準備。

最近，紅旗和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偉大的歷史文件」（紅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其中說：「列寧看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被打敗的資產階級甚至比無產階級還要強大，時時企圖復辟……因此要對付這些反革命威脅，並且戰勝它，必須在長時期裏強化無產階級專政，捨此沒有第二條路。但因列寧逝世過早，沒來得及在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實際上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

這些說話不但顯示毛澤東現正嘗試以列寧的理論，來為他清算以劉鄧為首的反對派的行動辯護，同時亦為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製造的著名審訊冤案遭到清算而辯護。由此可見毛澤東正打算怎樣對付劉、鄧及其他反對派領袖了。

問：毛劉之間對於外交政策有沒有分歧？

答：上次你訪問我時，我已指出，我們更難確知反對派在外交政策問題上的立場，因為這方面資料更少；直到現在，我還未能找到什麼新的資料。不過，劉少奇對於外交政策的立場，是不同於毛澤東極端宗派主義的態度的。外交政策差不多永遠都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因此，我認為，中國極端宗派主義的外交政策，毛澤東要負責，這與他的極端宗派主義的國內政策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劉少奇可能是提倡較溫和的外交政策，符合於他的國內政策的。由於羅瑞卿被攻擊為劉少奇的死硬支持者，因此我們差不多可以肯定說，在有關蘇聯及有關與各社會主義國家在越戰問題上組成聯合陣綫的態度上，劉少奇與羅瑞卿是一致的。

問：你剛才解說了中共七大如何將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內，

八大如何將這句子刪去，以及軍隊內如何推行運動，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現在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突出成爲最重要的特徵。除了個人崇拜這點外，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麼？請你簡略談談這個問題。

答：廣泛來說，毛澤東思想無非是斯大林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實際運用。斯大林主義的要點，包括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分階段革命，一國社會主義和官僚集中主義；官僚集中主義最顯著的形式，就是個人獨裁。所有這些要點，不僅可以在毛澤東理論著作中見到，也可以在他的行動中見之。在這裏我只舉幾個例子。

在前面我談到中全會在一九四五年四月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份文件裏，毛澤東將過去所有失敗都歸咎於陳獨秀、瞿秋白和李立三。毛澤東從來沒有分析甚至指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時期及其後中共的機會主義或盲動主義路線，這些路線都是斯大林強令中共執行的。這就等於毛澤東接受斯大林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作用及政策，視之爲正確的。

毛澤東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新民主主義論」。中共一九四五年的七大通過新黨章，確定毛澤東思想爲黨一切工作的指針，當時黨大會的根據就是毛澤東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寫的這本論著。在七大上，當時政治局重要的成員林伯渠說：「『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結合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最卓越表現。這個理論是中國人民在爭取勝利的鬥爭中擁有的最犀利武器。」周恩來說：「我們依靠着我黨領袖和同志毛澤東的卓越領導。他在『新民主主義』中給我們指引了方向。」新民主主義受到這些嘉許，我們應該研究一下它的內容。

毛澤東認爲，俄國十月革命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在這個革

命中，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革命階級，因而必須進行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陣綫」——四個階級聯盟——，來消滅帝國主義力量和封建力量，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亦即是說，毛澤東主張建立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經濟」。

「新民主主義經濟」，即只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它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

上述論點不解自明，亦清楚表現了毛澤東的機會主義。毛澤東的階段革命論，在以下幾句話中明確表現了：「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的長。」^⑬

這裏也無需加以評論。在印尼，毛澤東應用了階段革命論，做成印尼革命遭遇到慘重挫敗，更甚於斯大林以同一理論應用於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這裏應該指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今天仍被視爲毛澤東思想的中心。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決議，將「新民主主義論」提爲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第一部著作。《解放軍報》也刊登了若干文章，解釋「新民主主義論」的內容，鼓勵軍隊和黨內所有幹部學習這本著作。

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毛澤東作講話，題目爲「改造我們的學習」，他說：「『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典型。」^⑭ 如衆所週知，「蘇聯共產

黨歷史簡要讀本」是斯大林主義「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因為它替斯大林的階段革命論和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作理論上的辯護，同時亦替斯大林的第三時期冒險主義的集體化政策、工業化政策和外交政策作辯護，替他在三十年代清算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布哈林派及其他反對派等作辯護，替他搞的個人崇拜和他的個人獨裁作辯護。

毛澤東在手法上，與斯大林運用的實在無分別。毛澤東從來都是將他的意見強加於黨之上，現在的「文化大革命」是最佳例子，說明毛澤東採取怎樣官僚的手法，來對付黨的絕大多數，以維持他的個人獨裁。

問：你個人同毛劉的關係如何，你對他們兩人有什麼評價？

答：因為我在黨裏的工作和地位同毛澤東不同，所以跟他沒有太多工作關係。不過，我同他有過私人接觸，這裏只舉出兩事。

一九二六年五月，即蔣介石三月二十日政變之後，我以中委會代表的身份到廣州去同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討論問題。我在廣州的時候，毛澤東來見過我兩次。第一次請我去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講。另一次，他拿來一篇他寫的論農民各階層的文章，要求我表示意見。他在文章裏，根據農民所擁有的土地多寡，將農民分成許多階層。我對他說，按照列寧的意見，農民主要分為三類，即富農、中農和貧農——根據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多寡和維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情形而定。毛澤東沒有反對我的批評，似乎接受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在武漢最後一次見到毛。那時他對革命非常失望，但他沒有同我討論怎樣將革命從當時危險的局勢中解救出來。他只關心要替他的家庭找個安全之所，他問我的妻子陳碧蘭可否幫助他。

我跟劉少奇的接觸就有些不同。一九二〇年，我在上海同劉少奇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學習俄文，我們的關係頗為親近。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我們一起在莫斯科學習，就在那個時候，我介紹他入了黨。

一九二四年八月，從莫斯科返回上海之後，我的全部工作是在黨內，特別在政治局，當宣傳部部長。因此，我同劉少奇沒有實際工作關係，但我在廣州的時候見過他好幾次，後來又在一九二七年夏在武漢見過他。我最後一次見劉少奇，是在一九二九年夏天。當時，陳獨秀和我已開始成立左派反對派。劉少奇當然了解我同黨之間的關係，但他仍然到我家裏來看我。這次會見，我們討論了黨的政策，我批評當時黨的政策是盲動主義，組織上的領導方法是官僚作風。我又指出，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工農運動高漲時，黨應該組織蘇維埃，準備奪取政權。對這些批評，劉少奇都表示同意，但不能使他參加左派反對派，向黨領導進行鬥爭。那時候，劉少奇被認為是黨中央的「調和派份子」。

就我個人對毛劉兩人的評價而論，從政治觀點來說，我認為他們兩人都是斯大林主義者。第二次中國革命失敗後，他們兩人都沒有接受失敗的教訓，仍留在斯大林化的中共黨裏，在一切基本問題上跟着斯大林走。但從個人經驗和性格來說，他們兩人非常不同。雖然他們兩人的意志都很堅強，但毛澤東非常專斷，而劉少奇則較能接受別人的意見。

毛澤東由於在國民黨裏工作，尤其是他從事組織農民運動和游擊隊的任務，所以他的專橫性格愈增。到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便無視多數人的意見和福利，處心積慮地搞個人崇拜，實行個人獨裁。農業合作化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現在的「文化革命」以及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宗派主義，都是毛澤東

專橫的結果。

然而劉少奇的畢生工作，主要在工人群眾和黨內，而且數度處於極端困難的環境下；例如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他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時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這種環境，基本上加強了他的思考性，因為他不得不聽取黨和工人運動中其他幹部的意見，這些幹部也多少反映了群眾的意見和願望。因此，他對人處事，比較能作出週詳的決定。這就是他個人不同意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政策的根源。

問：照你看來，中國的前途，毛澤東領導下將會怎樣？在劉少奇領導下又會怎樣？

答：從以上對毛劉兩人的分析中，已經很清楚，毛澤東代表斯大林主義更死硬更極端的方式。他不顧環境及群眾的願望，要實行他那冒險主義的、宗派主義的國內政策。而另一方面，劉少奇則代表黨內相當溫和和改良主義的傾向。他曾設法在某種程度上糾正毛澤東的極端政策，以避免大災禍的惡果。

據我的意見，這一分析同樣適用於毛劉兩人之間目前的鬥爭。毛澤東得勝，他將會犧牲所有左派革命份子，孤注一擲的將中國拖到大動亂之途，使中國革命處於極危險的境地。但如果劉少奇勝利，中國的內政將會同他領導黨時的情形相似，而外交政策，將會更少宗派性，可能會同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建立聯合戰綫，幫助越南人民的鬥爭。

若劉少奇能夠領導中國，斯大林官僚主義的全部問題不會解決，但黨和社會，會享有較多自由。無論如何，劉少奇如果勝利，將會開啓社會主義民主鬥爭進程的第一階段。

註 釋

- ① 這裏需要指出一點，就是紅衛兵報刊中透露的事實，有些以前在黨領導層外是不知道的；因此，很明顯地，這些文章若非由接近毛澤東的、指揮「文化大革命」的高級官員陳伯達、江青、康生等親自執筆，也是在他們指導下寫成的。
- ② 事實上，劉少奇沒工作可做，因為蘇區根本沒有工人運動。
- ③ 彭真，於一九六六年六月被毛澤東清算時是北京市長；在一九三五年這段時期，他是北方局委員，負責黨在北京的學生運動。
- ④ 北方的軍隊是新八路軍。
- ⑤ 中共將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的失敗，歸咎於陳獨秀；盲動主義時期的失敗，歸咎於瞿秋白和李立三；紅軍在江西的失敗——跟着便是長征——歸咎於王明。共產國際則從未被提出來予以指責。
- ⑥ 新的中委會共有四十四位委員和十九位候補委員。
- ⑦ 鄧子恢是黨農業部負責人。
- ⑧ 《首都紅衛兵》報導說，劉少奇曾在一九五二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有些同志，依靠農村互助組、合作化代耕隊實現工業化，實行農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空想的農村社會主義，是錯誤的。農村要實行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工業的發展，不實現工業化，農村根本不可能實現集體化。」這些話顯示劉少奇可能會讀過列寧關於集體化和工業化的一些著作。

- ⑨ 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成爲黨的總書記。文革時他與劉同被批評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⑩ 毛澤東在八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蘇共不久之前召開了第二十次黨大會，決定了一些正確的方針，批評了一些現存的缺點。可以說，他們的工作對將來會有重大的影響……我們的經驗有不夠的地方，因此我們必須盡量研究我們的前驅即蘇共的經驗。」這說明了毛澤東這個時候不能反對反個人崇拜的氣候，而他容忍黨採取的反個人崇拜的行動是違反他個人意願的。
- ⑪ 三面紅旗是：一、總路線，二、大躍進，三、人民公社。
- ⑫ 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直至一九五九年，因領導反對派反對「大躍進」，特別是反對「人民公社」，而受到清算。
- ⑬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十七、十八、和二十三頁（一九四九年四月香港版）。
- ⑭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七六〇至七六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北京版）

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 *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五四運動」——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劃時期的偉大運動，已臨到它的五十周年。明報月刊擬出「五四專號」來紀念它，這是一件令人興奮而富有意義的事，因為這個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直到今天，它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和評價，反而被人們，特別是中共的歷史家們，任意歪曲、篡改和阉割得面貌全非，令人不可認識①。明報月刊的「五四專刊」，如果趁着五四運動五十周年的機會，給它提供真實的史料，予以認真的分析和客觀的評價，「還它一個本來面目」，這對於中國近代史，將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明報月刊約我寫點關於五四運動的回憶，我當然樂於接受，不過在我看來，對這個運動寫些個人的回憶，雖然不無意義，但闡明它在中國文化思想發展史上的意義和貢獻，讓青年一代人認識「它的本來面目」，獲得真正的歷史知識，從中吸取教訓，更有意義得多。

五四運動，就它的實質說，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個啓蒙運動，換句話說，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運動，如果把它和近三年來大陸所推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加以對照，更顯得前者對中國文化的偉大貢獻，後者對文化的無比摧殘及其可悲的後果。因此，我把原來準備寫的個人回憶，改為「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或者較為有益些。

* 本文是彭述之一九六九年應香港《明報月刊》的「五四專號」而寫。

關於五四運動，我在二十三年前，曾寫過一篇題爲「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的文章（刊登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求真》雜誌），我當時根據「新青年」（這是在思想上從頭到尾領導五四運動的「司令部」）的重要文獻，特別是陳獨秀、胡適之和李大釗的文章，盡可能給以詳細的敘述和分析，指出了五四運動在中國文化思想發展史上的意義和貢獻。因此，在本文裏，我不擬重覆它們，只須把它的主要點和結論摘錄下來，以示我當時對這個偉大運動的看法和評價。我那篇文章開頭寫道：

「五四運動，就它的直接意義說來，是對外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內反對安福系專制政府賣國的一個政治運動……北京學生群衆，在這個運動中自動地勇敢地行動了起來，遊行示威，直接向賣國官僚的巢穴（趙家樓）進攻，以自己的手來懲罰賣國賊（如燒毀曹汝霖的住宅，毆打章宗祥），引起了全國的同情和響應，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及抵制日貨等，以致迫使頑強反動的安福系政府，也不得不罷免幾個賣國專家（曹、陸、章），宣佈了拒簽凡爾賽的分贓條約，……這一切，都是值得大書特書而富有意義的歷史事實。然而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意義，却還不在乎此，反而在於它對文化思想方面的貢獻，換句話說，五四運動之真正劃時代的意義，乃在於它勇敢地完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並在這個運動的進程中，替另一個新的階級的啓蒙運動，準備了一個基礎。

「以西方急進的民主主義思想，徹底地否認了中國一切封建的傳統（陳獨秀）；以平民的白話，堅決地代替了貴族的文言（胡適之）；最後，則以認真的態度，將西方文化最高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介紹到中國來（李大釗）；——這三

點綜合起來，便形成了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的具體表現。」

我的文章的結論是：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真正劃時代的運動；它把二千餘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全部舊倫理（如禮教、名教或綱常等），都給了猛烈的批評，徹底的否定；尤其是它以絕大的勇氣和決心，摧毀了孔教，粉碎了那個『大成至聖』、『萬世師表』的偶像，這差不多等於在歐洲粉碎了那個耶穌基督的偶像一樣；它同時以同樣的勇敢和決心，廢棄了二千餘年來被『士大夫』視為『正宗』、居為『奇貨』的文言文，而以『鄙言俗語』來頂替了它，這和『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各國以各自的俗語去代替拉丁文，很相類似；最後，則以最認真最嚴肅的態度將西方文化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世界觀——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輸入到中國來，並立刻運用這主義的哲學方法（唯物史觀）來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特別是解釋『五四時代』思想變動的本身——這一切劃時代的具體表現，是我們以前的啓蒙運動家，不會做過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啓蒙運動，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啓蒙運動的典型，我們的五四運動便是東方落後國家的啓蒙運動的模範……

「因為我們有了『五四運動』的貢獻，我們這一代人的頭腦，從孔子學說的一切銬鎖下解脫出來了，我們從此才有可能自由思想、自由信仰和自由批評；我們的筆從文言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我們才有可能抒寫我們自己的情感，發表自己的意見，創造自己的文藝；我們得到科學社會主義的

方法和觀點，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地科學地研究全人類的歷史發展，考察整個世界的內在關係，預測這個世界的可能前途，探究改造這個世界的方案和步驟；尤其是『五四時代』對舊傳統、舊思想的那種大無畏的批判精神；對新思想，新學說的那種認真研究的精神；對任何真理的那種熱烈追求的精神；——這些都是一個時代往上飛躍的精神的反映，是一份最可寶貴的遺產，是值得我們後一代人繼承下來的。」

在「五四時代精神」的鼓舞下，民主思想和白話文相結合所產生的新文藝：白話的小說、詩歌、戲劇和散文，以及用白話文翻譯的西方第一流的文學著作，隨着新興的文藝作家們，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在中國文壇上湧現了出來，替中國的文藝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另一方面，各種思想的介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論戰，科學與玄學的辯論，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俄國革命的介紹和研究，特別是青年人對社會問題的探索討論和爭辯，不但在新成立的各種小團體內舉行，並反映到各種各式的新雜誌和報章副刊上，匯成一股思想的洪流，在全國瀰漫着。差不多同時，抱着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青年們，很快地便集合到陳獨秀和李大釗所發起的共產主義小組的周圍，於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給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準備了一架發動機。以上這些便是五四運動在文化思想方面的總成果。

在「五四」過去了四十七年後，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②的口號（這個口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正式提出的），發動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把整個大陸投入暴風雨的漩渦中，到現在差不多將近三年，它對文化方面的影響及其後果，已異常清楚地展示在每個人面前，因此，我們有可能來檢討它、判斷它、評價它、從它取得「反面教師」的教訓。

毛的「文化大革命」，就它的真正目標說，乃在於「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從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奪取黨政機關的領導權，並連帶地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鬥到永世不能翻身」。以致在全國各地方不斷發生「武鬥」，流血衝突，地方性的內戰，犧牲了幾十萬的青年學生和工農的性命。但它在文化方面也確實造成了「偉大的成績」（毛派所自誇的），這個「成績」的主要記錄是：

一、中共及其政府的一切負責文化工作的幹部，從中央文化部部长、副部长、教育部長，各部門的文教領導人，各省市和地方的文教負責者和工作人員，各大學、專科學校及高中絕大多數的校長、教授和教員，差不多所有的文學家、藝術家（畫家、音樂家、戲劇和電影的作家、導演、乃至演員），以及有各種專門學問的大多數學者或研究員，都給清算了，其中有些甚至被逼得自殺了（如老舍和傅雷等）。

二、全國文學、藝術和學術的刊物，一切文藝的作品，包括翻譯的文藝著作乃至教科書都給停版了，或被禁止了，更不用說有什麼新的文藝作品出版；國家全部的印刷機和紙張都用來出版毛澤東的「選集」和「語錄」，因而連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全集也被停印了，人們企圖以毛的選集和語錄來代替它們。

三、全國的大學、專門學校、高中和初中，已停學了將近三年，最近雖然宣佈開學了，不但未曾恢復正常的教學，反而派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跟隨着軍隊，進駐每一所學校（並宣稱永久留駐學校），進行「鬥、批、改」的鬥爭，在各學校內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和恐怖狀態，數以百萬計的大中學生和教師，被迫「下放」到農村、工廠、礦山和邊疆區域工作，接受「勞動改造」。此外，還要實行「教育革命」，它的具體辦法雖

尚未公佈，但從人民日報的文章中已可看出；除了理工科外，其他課程將被取消或減少，而代之以教授《毛澤東選集》——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實有類於歐洲中世紀的教會學校，所不同者，不過以《毛選》代替《聖經》，以「毛澤東思想」代替「神學」吧了。

四、「毛澤東思想」現時在中國大陸已成為無上的、絕對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指導思想（所謂毛澤東思想掛帥）。毛本人成了塵世的上帝，新的「大成至聖」、「萬世師表」，他的《選集》已被視為《萬有文庫》，他的「語錄」被奉為《聖經》，「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人人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依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於是，毛澤東一身兼任中世紀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和中國古代皇帝（秦始皇一世）的雙重聖職，可謂「懿歟盛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前面所敘述的紀錄便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幅簡略畫圖，一個驚心動魄的縮影。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的「記錄」和五四運動的「成果」對照一下，人們便不難看出：它們之間是如何的相反了：五四運動摧毀了那個「大成至聖」的「萬世師表」偶像——孔子，「文化大革命」却製造出一個新的偶像——「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五四運動創造了全新的文藝，培植了成千上萬的文藝作家和科學家，「文化大革命」却停止了一切文藝作品的出版，並給整代的文藝工作者和文化人以毀滅性的打擊；五四運動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作為革命的學說，任人們自由研究、自由信仰，「文化大革命」却以「毛澤東思想」（一種中國化的斯大林主義思想）代替馬克思主義，當作宗教的教條，強迫人們去學習它，迷信它（「人人要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依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企圖把全體中國人變成中世紀羅馬教會的無知封建君主壓榨下的順從臣僕；凡是對「毛澤東思想」表示不同意或懷疑的人們，都當作中世紀的「異教徒」一樣，遭到各種各式的迫害。

從前面的分析和對照中，人們不可免地會提出一個問題：像「文化大革命」這種異乎尋常的荒唐舉動，這種違反常識的倒行逆施，怎麼會在一個曾經經過一次革命，並已踏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裏發生呢？難道是主持「文化大革命」的人完全失去了頭腦，陷於歇斯底里情況下所幹出來的事情嗎？或者如紐約時報評論家亞梭夫·約瑟夫所說的，文化革命的指揮者是一個「神經病人」？不，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文化大革命」的瘋狂行爲，在現存社會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上，有它的極其深遠的根源，換句話說，它是中國現存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政治結構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一種尖銳的、痙攣的、曲折的反映，因而在事和人方面，都表現出瘋狂的性質。

中國大陸自一九五六年實行「公私合營」，一切生產資料國有化之後，就社會的經濟基礎說，它已踏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快速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前提條件。但必須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來適應它，社會才能得到和諧的發展。但異常不幸，盤踞在這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的，乃是一個不受任何約束的極權的官僚專政，而站在這個專政頭頂上的又是一個任意發號施令、唯我獨尊的獨裁者。這就在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埋伏了絕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這種矛盾，在國內外不斷發生的事變的刺激和壓力之下，不可避免地要加銳和加深起來而接近爆炸點。一九五六年蘇共廿次大會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和獨裁的清算；同年波蘭和匈牙利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的革命運動；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的暴露

和鎮壓；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冒進政策所造成的大災禍——這一切配合起來便給了中共的官僚專政，特別是給了毛的個人崇拜和獨裁以最沉重的打擊，迫使他不得不暫時退居幕後，讓劉少奇「當權」以緩和局勢。劉在廣大工農和知識分子群眾極度不滿和要求改革現狀的壓力之下，對經濟和文化方面施行了一些溫和的改良措施，一時扭轉了極度危險的局勢。但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的改良措施及其成就對於他的個人崇拜和獨裁，不啻是一種更為嚴重的損害和威脅；爲了恢復個人崇拜和鞏固個人獨裁，必須首先打倒「當權派」，這便是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現在，毛澤東已用「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劉鄧當權派，正在北京召開他的中共九屆代表大會來鞏固他的勝利，重新建黨來加強他的獨裁。不管「九大」的結果如何，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他以前藉以實行獨裁的那個「堅如磐石的中共」，已被「文化大革命」打成粉碎了，重建的黨絕不可能得到團結和穩定，因爲它包藏的矛盾太多：軍人與黨幹部間的矛盾，軍隊本身的矛盾，新黨員和幹部與舊黨員和幹部間的矛盾，基層黨員與頂層領袖間的矛盾——這些矛盾註定要隨着新的事變的發展而加劇起來；另一方面，數以千萬計的被下放到農村、廠礦和邊區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黨團員或下層幹部，一定會在廣大的工農群眾中散佈他們的不滿情緒和叛逆思想，和工農群眾中原有的不滿和憤慨結合起來，將最後匯合成爲排山倒海的怒潮，在全國範圍內泛濫開來，掃蕩整個的官僚層，結束那個高踞在人民頭上的任意胡爲的獨裁者——這是一個政治革命，這個革命將在保存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基礎上，建立最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只有這樣的民主政制才能給一切工農群眾、城市貧民和不反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

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權利。也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廣大群眾的創意力和積極精神，儘快地增加工農業生產，提高人民大眾的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把中國社會推向和諧發展的道路前進。

五四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五四時代的精神」還是生動而有力的。中國的文化思想，經過中共統治十九年的壓抑後，早已奄奄一息；再加上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摧殘，更是支離破碎，殘缺不堪。因此，「五四時代的精神」——要求民主、自由、平等、自由討論、自由研究的精神，特別是那種大無畏的批判精神——對於拯救和振興中國的文化思想，將是絕不可缺少的動力。根據歷史的經驗：黑暗的極點，往往是接近光明的降臨，因而人們有理由相信：

「五四時代的精神」，在不遠的將來，將會在中國大陸上昂起頭來向「毛澤東思想」及其專政，進行批評和清算的。

註 釋

- ① 例如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談到五四運動時，只推崇李大釗和魯迅，甚至沒有提到陳獨秀和胡適之的名字。何幹之的《現代革命史》，雖然說到「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曾是民主主義的文化戰士」，但他們各人在「民主主義的文化」方面所貢獻是甚麼，却隻字不提；當他談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時，也沒有將胡適之的名字和它聯起來。由此，可見中共的歷史家對五四運動的歪曲和閹割了。
- ② 這是假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名，以實行「奪權」和摧殘文化之實，好「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領域。」這和假無產階級專政之名以實行個人獨裁之實，是同樣的詭計。

林彪的倒台 *

(一九七二年一月)

問：「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是甚麼？

答：你應該問：毛澤東為何需要文化大革命？事實是：有一個時期，毛在政治局裏佔少數。從一九五七到六〇年，毛澤東完全以個人獨裁的方法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他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正如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時的做法。結果是，不但農民有大規模反抗，其他人口的廣泛層份（工人、學生、知識分子）也很不滿。

在一九五七年，反抗開始明顯，中共領導層被迫開展「大鳴大放」運動。這個自由化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期間相若。但運動日益發展為反抗整個黨官僚層的性質。例如在武漢就發展了一個大型的反對派。毛澤東迫於要鎮壓所有反對派。

這個左派反對派照常被形容為「右傾偏差」。數以十萬計的人從青年運動中失踪，但不滿情緒繼續存在，尤其是在

* 本文是哥尼力臣訪問彭述之的記錄摘要，最早刊載於阿姆斯特丹《自由荷蘭》週刊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 and 廿九日，後來譯成英文刊載於《洲際通訊》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和十二日。本譯文是該訪問稿有關文化大革命和國防部長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失踪的部份。該訪問其他部份談及的是中共早年的情形。

知識分子中間。

毛澤東很清楚知道他要採取措施去穩定農民。在五八年，他開展了另一個大運動——所謂「人民公社」運動。一切小型的私有地都被消滅，自由市場被取締。毛澤東同時推行「大躍進」，以百萬計人民被迫在後院煉鋼。運動是一個可怕的失敗。

結果是，毛地位進一步下降。現在，不只農民反對他，黨領導（起碼大多數）也反對他。在五九年七、八月間，毛迫於要召開黨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會議一開始時就猛烈攻擊毛澤東，軍隊總參謀長和中委會其他一些成員都支持他。

然而，會議結果是彭德懷及其親信被撤職。可是，在幕後，黨副主席劉少奇以及朱德元帥都曾支持彭。毛的地位也因五六年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秘密演說而被削弱。劉少奇和黨總書記鄧小平同意赫魯曉夫，起碼在評斯大林方面。在另一方面，毛並不同意赫氏但當時不能作公開表示。

這些因素一起決定了那幾年間黨內的形勢。

毛被迫退讓一步。在五九年，他將國家主席讓位給劉少奇。在教育、公社幾方面作出了許多讓步，人民也獲得了較多表達自由。反毛情況繼續存在，甚至有人傳散小冊子要求他辭職。在六五年十一月，當林彪在軍隊報紙上就這問題撰文時，文革就開始了。

需要記着的是，林彪早些時曾支持毛，當時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走到前頭。林彪認為這點威脅到他作為毛繼承人的地位。毛澤東清楚知道，差不多整個知識界支持劉鄧，而劉

鄧又控制了黨機器。在地方層面，在廣州、新疆、東北、上海和許多省，黨都反對毛。

根據黨章程，當時毛應該展開討論和召開大會。但他知道這就表示他的下台。因此，毛要利用軍隊，但他不能依賴所有單位的忠心。於是，他訴諸利用中學大學學生（作為紅衛兵）。事實上，政權從黨甚至政府手裏被奪走。

雖然許多黨領袖受到攻擊，但他們仍保存了職位。於是，毛便命令軍隊支持紅衛兵。隨之而來的衝突在某些地區類似一場內戰。在廣西省，幾百可能幾千人被殺，許多房屋被毀。當紅衛兵在六七年七月也攻擊一些軍隊司令員時（例如在武漢，該地軍官內部有分裂），形勢危險地急轉直下。那時，「文化革命小組」——其核心為毛秘書陳伯達、毛妻江青、政治局委員康生和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王力——覺得軍隊危害了文化革命的目的，想向軍隊領導層發動攻擊。可是林彪仍維持他對軍隊指揮部的忠誠。

在此之後，毛澤東迫於向軍隊領袖作出讓步。他清算了「極左分子」如王力、作家戚本禹和軍隊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等。這部份文革小組的人被清算，是在軍方指揮部的壓力下進行的。

這些都顯示了林彪和毛澤東之間有着多麼大的矛盾。面對着軍隊領袖的壓力，主要是毛澤東作出讓步。在六七年以後的時期，差不多全國各地都建立起「革命委員會」，控制權在軍方手裏。①黨軍之間這個衝突成爲持久性的，而經過毛的文革，黨也遭到嚴重破壞。國家政權現在無疑地握在軍隊手裏。在這個形勢下，在七〇年八月，陳伯達被清算，無人知道他是被誰清算、怎樣清算的。

林彪及其軍隊控制了整個黨。在六八年初，林彪以廣州的黃永勝取代楊成武將軍的副總參謀長的位置。黃一上任後，就開始將其親信安置於重要職位，例如吳法憲成爲空軍部長以及政治局成員。海軍和後勤部門的情形也一樣。黃永勝的部屬在各處都取得了重要職位。

問：林彪後來發生了甚麼事？

答：我們不知道他人身發生了甚麼事，但在政治上他已經死去。黃永勝及其部屬全都已經失踪。多個月來，我每日都從北京電台聽到他的消息，因爲我很留心電台。但自從九月中以來，我就聽不到他任何消息了。自那時到今天已經過許多月。不用說，黨員和軍隊都想知道現在究竟發生甚麼事，但甚麼也沒有披露或解釋。一個大發展被保密着。②

照我看來，林彪集團被清算，意味毛澤東本人的地位也被大大削弱。林彪曾是毛澤東的繼承人，這點甚至在黨章裏鄭重列明。在黨的最高機關——現今的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仍然只有周恩來的支持。其他成員陳伯達、林彪和康生都或已死或已被清算。

毛澤東是怎樣打敗林彪的？我以爲，是他得到周恩來的支持。他們共同的利益，是保護黨以便能控制軍隊。當然，周恩來在軍隊中並沒有群眾支持，但他熟識足夠的司令員，所以有影響。在這個關係上，重要的一點是周恩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任黨軍事委員會的首長。

在我看來，軍隊中（或者可以說在全中國）最重要的人現在是葉劍英元帥（自四五年以來中委會成員，四五至四七年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六七年以來政治局成員）。在實際上，葉劍英正代任國防部長之職。假如你概觀整個形勢，可

以看到：在林彪集團被清算後，軍隊已被削弱。葉劍英在軍隊中的勢力不如朱德（四六至五四年的總司令）、林彪或陳毅（最近逝世了）。軍隊可能會分解為許多派別，也有可能分裂。

同樣的情形在黨發生，沒有人有權威。黨員又怎能有信心？人們都不信任別人。我認為軍隊和黨許多幹部士氣低沉。因此，我認為一個軍事上危險的局勢已出現。我認為中國現在的趨勢是走向政治革命，其他出路是沒有的。

註 釋

- ①：「革命委員會」在六七年成立，是地方和省府機關，由毛派和軍隊控制，以取代街道委員會、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市、省平面的行政機構。毛死四人幫被清算後，它們被解散。
- ②：在七二年七月，即本訪問之後六個月，阿爾及爾的中國領事館宣佈林彪已死，但這事件在中國國內沒有報導，而詳情也不知道。到了七三年八月的第十次黨大會，林彪才首次被點名抨擊。當時，政府官方關於林彪之死的說法，是通過透露給西方報刊才公開的。據稱，林彪曾試圖在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行刺毛澤東和發動政變。又說，當政變企圖失敗時，林彪與妻子及幾名高級軍隊司令試圖逃亡到蘇聯，在蒙古飛機失事而身亡。

論「批林批孔」運動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問：從一九七四年開始，歐洲和美國的新聞界都曾報導中國的「批林批孔」運動。這個直接反對兩個相隔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人物的運動有什麼意義呢？

答：這運動是複雜和不易了解的。新聞界要解釋這個運動的企圖只會增加混亂。不但西方人感到它有矛盾，就是中國人自己也陷於五里霧中。為了解釋這個運動，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毛林衝突的起源。這研究一定要從文化革命運動的結果開始。在一份阿姆斯特丹週刊VRIJ NEDERLAND 一九七二年一月號的一篇訪問記裏，我曾一般地描述這一衝突的起源。在這篇訪問裏，我指出了毛林的衝突是很激烈的，是從所謂「文化革命」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林用他控制下的軍隊介入文化革命。軍隊差不多操縱了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權力。

由於林的地位，他在黨、軍和政府都贏得很大的威權。例如在軍隊的架構裏，國防部、總參謀長、海軍空軍司令員都由林或他那一系的人控制。即使在高層的決策機構，如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林的派系也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在省、自治區和地方政府內，權力也差不多被林影響下的軍人所操縱。這是由於文化大革命後期，全部地方的政府機關都被革命委員會取代了，這些委員會多數由當地的軍事指揮人員所操縱。

* 本文是《洲際通訊》記者一九七五年向彭述之所作的訪問記，刊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該週刊上。

同時，林彪是黨的副主席。這種情形便威脅到毛的個人獨裁。爲了克服這個不利的形勢，毛與周恩來聯合起來，決定毀滅林的派系和鞏固他的個人獨裁。毛提出了一個口號：「黨指揮槍（軍隊），而不是槍指揮黨。」林的派系爲了保持它的權力，便被追反攻，甚至預備政變來推倒毛。林的政變失敗了。謠傳林的女兒爲了拯救她丈夫的生命，把林的陰謀告訴毛派。由於她揭露了這一陰謀，使林和他的隨從企圖用飛機逃亡蘇聯。根據報導，該架飛機在外蒙古被打下來。他們也喪失了生命。

如果說毛和林的衝突已經達到了毛要殺林和林的追隨者這一程度，那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林所控制的軍隊就已經支持毛。從林在一九五九年擔任國防部長時起，就已在軍隊中宣傳「毛澤東思想」。

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林已在軍隊內建立起對毛的個人崇拜。同時，毛派提出了「人民要向解放軍學習」的口號，正如他們較早時期的口號：「槍桿子出政權」一樣。他們利用這些口號來提高軍隊的地位，因此軍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民被規定要向軍隊學習，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先，紅衛兵在林的軍隊幫助下，擊毀了劉少奇派，替毛、林派在黨和政府中爭取到支配地位；其後，紅衛兵激進起來，分裂成兩個主要派系，其中有些是反對毛和周的，他們在很多地區互相打鬥，已至內戰的程度。到這個時候，毛和周決定停止紅衛兵運動。但這幾百萬的青年人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制止的。結果在廣東、廣西、四川等地方發生血戰。以前，毛利用紅衛兵來打擊劉少奇派，現在他又利用軍隊來打擊紅衛兵和停止文化大革命，建立由軍人領導的革命委員會。

由於毛利用軍隊來制止紅衛兵，把他們幾乎全部送往農村去

，權力便集中在革命委員會的身上，但革命委員會多是由林派所控制。毛又再次被一個派系所威脅，正如以前被劉少奇派及隨後被紅衛兵所威脅一樣。

問：林的死亡會不會令他的派系被摧毀呢？

答：雖然林和他的一些追隨者已被殺，林派中尚生存的人在黨、軍隊和政府的各組織裏還有很大的潛力。林的派系還繼續有影響力和成爲對毛的可能威脅的理由是：很多年來，林都被認爲是毛的「親密戰友」和他的合法繼承人。在一九六九年的黨第九次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裏這樣地寫着：「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如果林彪真是受到這麼高度的讚許和那麼一貫地「高舉偉大紅旗」，是毛的合法繼承人，他怎會背叛毛和企圖用政變來反對毛呢？

如果林真是一個這樣壞的人，一個壞蛋，爲什麼毛不能從開始便明白到這點，反而要把林提升爲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呢？毛是不能解答這些問題的。因此，林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死後很久，他從沒有嘗試解釋這一事件。被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報紙也沒有這樣做過。爲什麼要保持緘默呢？正是因爲毛沒有解釋，他也不能解釋。

曾經有一段時間，報紙間接攻擊林，用「劉少奇一類騙子」這句話來提到他。當時，這是十分抽象的。從來林的罪名都沒有被提及，也沒有把事件的真相公開。曾經有一些報告，特別是從台灣來的，說林企圖發起一次政變來反對毛。這個計劃叫做「五七一工程紀要」。這個秘密計劃是首先在台灣發表的。從台灣來

的報告是難以相信的，因為它多會是來自蔣介石的特務。我起初不敢相信，但毛的報紙後來加以證實，在他們對林的攻擊中，引用了這份文件。

在那時候，毛對林的攻擊還是很小心，因為他還難於解釋他過去對林的高度讚揚。毛派怎能對下層份子解釋僅次於毛的林已變成一個反革命份子呢？跟着被提出的問題將會是毛是否也一樣呢？

問：「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內容是什麼呢？

答：我手頭上沒有這份文件。可是，在人民日報中，攻擊林彪的文件透露了這個文件的內容。

例如，人民日報反復地攻擊林，因為他涉嫌說「五七幹校」是變相的失業。據說林曾攻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據說他曾把文化大革命形容為一次失敗。

香港出版的《十月評論》在一九七四年八月號裏，摘錄了林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兩段：

「……現在他（按指毛澤東）濫用中國人民給予的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為當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這些對毛的攻擊不單表示了林及其追隨者的意見，它還反映了大多數人民的不滿、厭惡和憎恨。

在毛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不單只黨和它的青年團，還有工會、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從中學到大學）以及文化和教育機關都陷入極度的混亂狀態。血腥的衝突在全國各地發生。數以千計的在黨內和政府機關工作的幹部受到紅衛兵的攻擊。他們大多數被清除出黨或失去了職位和工作。很多在坐牢。最後，數以百萬

計的紅衛兵被遣送上山下鄉。全國人民都受到這些事變的影響。他們感到他們好像在恐怖氣氛中生活。他們自然不滿意毛，厭惡和憎恨他。因此，林彪及其支持者才把毛稱為「當代的秦始皇」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明顯地，在基層和在運動中合作了數十年的老同志中，毛都是很孤立的。甚至，他的最親密戰友，林彪和陳伯達都離開了他，根據政府報導，他們還企圖危害他的生命呢。

必須指出，自從一九二八年在井崗山開展游擊戰以來，在中共領導層內，林是唯一忠於和一貫地支持毛的人。從一九三〇年代後期起，陳伯達已成為毛的私人秘書，幫助毛起草很多文件和文章來建立他的個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作為中共文革小組的組長也曾幫助毛。但林和陳兩人都成了毛針鋒相對的敵人。他們控告毛是暴君。這是毛自從林倒台後面對的危險情況。

問：既然，林的派系還有影響力，毛怎能打破這個僵局呢？

答：只有一人能幫助毛，他就是周恩來。人民對周有比較好的印象，他們認為他比毛好些。看來，周比較溫和，較富人情味。一般公眾認為周是官僚中最好的。周不同於毛，他在黨幹部中，政府官員中，或軍隊中沒有助長一種對自己的憎恨。他甚至受到歡迎，因為在越來越壞的環境裏，如果他負起責任，他的溫和穩健聲譽，會令人產生一種改善的希望。

人民對周有好的印象，而且，對於那些被毛在文化革命中清算了的老領袖們，他是有很大的影響力。差不多全部的領導人，從中央到各省，都為毛領導的紅衛兵所攻擊，後來被清算。因此，這些年老的領袖對毛不滿和憎恨他。可是，周却時常替他們向毛說情，有時候在毛的攻擊下，周還保護他們。因此，差不多全部被毛清算的領導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周身上。

雖然，這些老領袖已被清算和解除了職位，但在中層和下層幹部間，他們還有相當的影響力。對於毛，這也是危險的。受這些被清算了的領導份子影響的人也是反對毛的。

在這些人中間，只有周恩來是毛的唯一希望。只有他還在各軍區的高級司令員間保持影響力和與他們有聯繫。

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走上政權之前，周曾在很長一段時期擔任黨的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他是這個委員會的真正領導者。後來，毛佔取了這個職位。在中國共產黨走上政權後，周還與軍人領袖保持聯繫和影響。*

在文化革命結束時，毛沒有這種支持，他是孤立的。在黨、政府或軍隊裏，他差不多完全缺乏可靠的支持者。爲了打破這種孤立，毛利用周來對付黨和軍人幹部，因爲他還有影響力。

毛、周的新結合的結果是決定把黨的幹部集合起來，討論形勢。這就是一九七三年八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大會所做的。

問：爲什麼毛只有那麼少忠於他的黨幹部呢？

答：當毛發起文化革命來反對劉少奇派時，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機構都被劉派所操縱。但毛的紅衛兵和後來林的軍隊事實上攻擊和清除了地方的全部領導份子，使毛失去了幹部。其後，支持

* 編者按：一九七二年一月，在亞姆斯特丹一份週報刊載的訪問記中，彭述之對周恩來作過如下的評價：

「他更時常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在一九二五年從德國回來，參加了中共的第四次黨大會，我和他有很多接觸，特別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兵變之後（在這次兵變中，蔣介石在廣州奪取了權力，共黨被迫採取守勢。）

他的個性與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很友善和講道理。每個人都喜歡他，他從沒有與人衝突。但在政治上，他跳來跳去，從圍牆

紅衛兵的少數官員也因「極左主義」而被清除。毛用這罪名來針對一些跟紅衛兵太接近的支持者。當紅衛兵開始針對毛的下屬追隨者時，這些毛的「極左派」支持者甚至繼續鼓吹紅衛兵運動。那些紅衛兵達到結論，認為毛派與劉派是同樣的官僚主義，正如曾遭受紅衛兵攻擊的毛的對頭人一樣，他們也是應被解除職務的。

要明白，差不多全部的政府幹部都是黨員。當這些幹部被清算時，各省的地方統治機關也一樣被清算。清算結束後，革命委員會成立，它們只包括林派的成員和一些「中立份子」。後來，當林反對毛時，受林影响的很多幹部都受到攻擊或被清算了。

文化革命期間，劉少奇的支持者都從文化、教育和宣傳部中被清除出來。那時，陳伯達利用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以「極左主義」藉口清除了一些人，包括王力、戚本禹、關鋒和林杰。可是，沒有一個「左」翼的高層領導在那時被清算。因此，陳伯達和江青（毛的妻子）都保留了他們的正式職位。

在這鬥爭中，毛先後清除了「右派」和「左派」。他先後摧毀了劉和林的派系。就在這一過程中，他使自己孤立起來，失去了忠心的幹部。

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毛被迫作一些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向老一輩的領袖們讓步。在大會上，這形勢是非常清楚的。周

的一邊跳到另一邊，他從不採取清楚、肯定的立場。例如，當我和鮑羅廷在廣州討論，提議退出國民黨時，周恩來說：「兩方面的爭論都有大量需權衡輕重的真實性。」這簡括地代表了周恩來。而這也是他一貫的作風。但在另一方面，他是很能幹的，尤其是在組織和管理方面。當時我們極需要他，他在法國和德國住了很多年，了解歐洲的情況。他從感覺上認識它，但他實在明白它。周恩來很樂於知道別人的意見。他隨時準備傾聽別人的意見。

恩來代表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

周的政治報告富有啓發性，在報告的第一部份，他列舉林彪的一連串「罪行」：林是一名「資產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他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要把中國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法西斯黨」，把「地主資產階級」再扶起來，實行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在國際上，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合帝、修、反，反華、反共、反革命」，是「兩面派、叛徒、賣國賊」。

當然，這不過是誹謗，在這一篇難以置信的報告裏，周替毛來說話。周的報告還誹謗了陳伯達，說陳是林彪的反黨集團的合作者。（在其他地方，陳還被指責為一名反共的國民黨份子、托派、叛徒、間諜、和修正主義者。）

第十次大會通過了周的政治報告，並毫無意義地宣佈把死後的林開除出黨；一切提及林的字句，如「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都從黨章中刪去。新的修正了的黨章通過了，輕而易舉！陳伯達被開除出黨，他在黨外的一切職務被解除了。這就是周為毛作的報告，按毛的意旨作的。同時，一些曾被清算了的老一輩領導人復出了，其中包括前黨總書記鄧小平以及譚震林和烏蘭夫。這三人在文化革命之前都是政治局成員。其他還有一些重要的和有權力的將領，例如南京軍區的許世友，東北的陳錫嶸和在福建軍區的韓先楚。他們保持了全部的職位，繼續擔任各該地區的黨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的首長。許世友是南京軍區的司令員，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個地區包括了上海。東北是另一個重要地區，因為它高度地工業化和接近蘇聯。福建也很重要，因為它面向台灣；金門和馬祖接近福建，它們都被蔣軍佔據。因此，這一地區的軍事力量比其他地方更為重要。

還有其他較次要的軍區司令員也復出了。當然，對於毛來說，他已作了一次很大的讓步。

問：這些人是不是全都在文化革命時受到攻擊呢？

答：是的，但有程度上的不同。一九六七年在南京，由毛中央文革小組所領導的紅衛兵和另一些支持軍隊和黨的紅衛兵之間會有過衝突。許世友那時候受到攻擊。但周恩來和江青插手才使形勢緩和下來，事情沒有武漢和廣東那麼嚴重。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清算了，這事沒有擴大到別處，廣東軍區司令黃永勝是林的部下。他不單沒有被清算，他還被提升到北京擔任總參謀長，在黃永勝遭受到攻擊後，林彪提升了他。

毛除了粉碎那些反對他的派系和恢復一些被清算的老一輩的領導人之外，還提升了一個新人，王洪文。王向第十次大會負責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然後，他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成員，排名第三，僅次於毛和周。在文化革命時期，毛利用王和上海市長張春橋來控制上海的工人。王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中一個年輕人，四十歲左右，在毛把他提升之前，他並不是政府或黨的領導人物。

問：王和張在上海為毛做了些什麼呢？

答：當時，上海的工人會受老一輩的領袖影響，如黨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這些領導人同情劉少奇，後來被清除了。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工會、黨、和政府內的老一輩領導人曾組織了一次龐大的罷工運動，這次罷工是反對文化革命的，雖然並沒有公開反對。工人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黨和政府內的老一輩領導人曾向他們作出一些讓步。毛調派許多人，特別是紅衛兵在林領導的軍隊的保護下來到上海，於是，那裏的老一輩領導人差不多全部被清除了。革命委員

會首次成立，權力交還給毛的支持者。除了王之外，張春橋也是反對老一輩領袖的，他為毛組織了一群人，同時，相似的罷工運動也在南京爆發。

毛利用王和張來反對工人，破壞罷工。毛通過王來攻擊受到工人支持的老一輩領導人。毛把王提升到黨的領導層，作為酬報王對他的服務。

第十次黨大會的主要特點是：第一，林彪領導的派系被粉碎了；第二，一部份曾被清除了的老一輩領導人復出；第三，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例如王，被提升到領導層裏。

問：在中共第十次黨大會上，周恩來既令林彪這樣名譽掃地，為什麼毛還繼續一個反對林和孔子的全國運動呢？

答：在大會上，林受到了譏辱，但還有相當的影響力存在，特別是在一些重要地區如南京、東北、福建的在職軍事司令之間。老一輩的領袖也復出了。一股力量仍然存在；對毛來說，這種情況不但不滿意，且是對他的極大威脅。應明白，雖然周幫助毛來譏辱林，周却成了所有反對毛的幹部的吸引中心。在這情況下；毛一定要繼續鬥爭，壓抑反對者來恢復他的個人獨裁。首先是把有權力的軍官調離他們的原駐地。為了這個目的，毛便準備一個新的運動，一個批林批孔運動。

這個運動的第一個目標是調動軍區司令的駐地。事情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發生。例如，許世友被調往廣東，陳錫聯調到北京，韓先楚被調到蘭州。雖然他們在新的地方還是軍區司令，但他們不再兼任黨的第一書記或革命委員會主任了。

問：為什麼毛容許這些司令員在軍隊裏保持他們的職位呢？

答：如果毛解除他們的軍官地位，便會引起軍隊中的幹部不滿。這些司令員又沒有犯任何罪行或嚴重錯誤。毛是逐步地對付

他們，首先不再委派他們出任全部過去的職位。當然，他希望以後能把全部老一輩的指揮員清除，用一些比較新的、較柔順和較聽話的人來取代他們。但毛的問題是他沒有新的支持者來取代年老的官員。因此毛派才極力宣揚黨要控制軍隊。即是說，軍官們一定要絕對服從黨領導，而黨領導則要絕對服從毛主席。可是，在軍區司令互調後一年，毛的領導地位却大大地下降了。

毛派盡力擴充城市的民兵。特別是上海和北京，數以百萬計、大多數是工人的民兵，是由毛派組織起來和受毛派訓練的。毛派企圖用民兵來與軍隊抗衡，強迫各軍隊的司令不再反對毛。當然，這個計劃並不容易實現，但並非不可能。無論如何，這個計劃本身並不足以替毛達成他的目標。因此我們就看到批林批孔運動繼續進行。

問：那麼批林批孔運動的真正目的和意義是什麼呢？

答：它的主要和中心任務是反駁林對毛的控告，說他是新秦始皇、中國歷史上的大暴君，而要「證明」毛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進步和最偉大的革命領袖。

有了這個目標，毛派首先一定要「證明」秦始皇不是一個暴君，而是在中國歷史上最偉大和最進步的帝王，因為他推翻了「奴隸社會」，建立起「封建社會」。但是，事實上秦始皇並沒有這樣做。秦始皇所推翻的不是奴隸社會，而是典型的封建社會。

這是中國歷史發展中偉大的進步。秦始皇的行動足可與十六至十八世紀資本主義上升時幾個歐洲君王的作為相比美。他們摧毀了地方封建主的權力，確立了絕對君主制。在世界範圍內，最有名的例子便是英國和法國。

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統治階級是世襲的地主貴族，他們以長子承繼權的制度把財產傳給最大的兒子。那時有七個互相敵對的

獨立王國。每一王國有自己的行政、軍隊、關稅、賦稅和文字。那時，帝王擁有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農民耕種土地，要向封建地主納稅。這個封建制度是基於季節性的勞役，而不是把人當為奴隸般買賣。

當秦始皇併吞了各王國，把中國統一為集中的君主制後，他採取的第一步是把全部貴族調離他們原來的王國。秦不讓任何舊制度的遺跡存在。

把六國統一了之後，秦便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所有的國界都消除了，全部官員都由中央政府指派和革免。

秦建立了共通的文字、通貨和度量衡制度。這是消除經濟貿易障礙的必須步驟。

很明顯，在這過程中，秦和他的支持者是代表了與封建地主鬥爭的新興商人和地主階級。他建立的新社會利用金錢關係來代替封建的枷鎖。這個新制度創造了經濟發展的經濟和政治條件。

關於「批孔」運動，毛派認為孔子代表「奴隸社會」，全部孔子信徒都企圖恢復已被秦始皇摧毀了的奴隸制度，因此，一切孔子信徒都是極之反動的。他們評定林彪扮演着相似的角色，作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代表，他企圖恢復「奴隸社會」。在這兩方面，毛派都歪曲了歷史。

問：毛派稱林為「孔子的信徒」。他們有什麼證據來證明他是一個這樣的反動派呢？

答：毛派宣稱他們找到了一句說話——林把一句孔子的格言寫在他臥房牆上。那句話是：「克己復禮」。字面的意思是：「克制自己以便恢復禮制。」「禮制」是孔子所說的禮，它是指倫理、道德和政治的理性化。毛派利用這一句話來「證明」林企圖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很可能林彪確曾寫了這一句話，把它掛在

牆上。這可能是表示他希望回復到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早期的較少危險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九年他們走上政權後不久。他畢竟曾親自看到了大多數與毛在革命中並肩作戰的年老領袖、幹部都受到清算，往往被監禁，甚至被殺害。

無論如何，單憑這一句話是難於證明林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這反而是毛派誹謗反對者的另一個例證，認為任何一個不同意毛的人都要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就用這個辦法迫害他們的反對者。過去林彪會幫助毛這樣做，現在這方法恰用來毀滅他和他的追隨者，這真是諷刺。

必須指出，「批林批孔」運動是很廣泛的。在一九七四年後期，毛派在報章和雜誌上發表了無數文章。他們在黨組織、軍隊、工廠、學校和其他機構裏舉行龐大的集會。這些文章和集會的主題都是相同的：儒家都是反動份子，因為他們要復辟「奴隸社會」。法家（替秦始皇製訂改革方法的學者）是進步的，因為他們幫助秦始皇摧毀「奴隸制度」。

問：毛派強調儒家極為反動，而法家則是進步的。這兩種傾向的真正分歧是什麼呢？

答：儒家和法家的基本分別在於怎樣統一中國，停止七國的首領間不停的戰爭狀態。孔子的追隨者接納了和發展了他的思想，他們嚮往西周時代，那時沒有戰爭，很多的封建主都服從中央君主。

西周首相周公發表了一套基於封建制度的倫理、道德和政治觀念。孔子以它作為典型。他的格言：克己復禮，提議恢復西周的作法。

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是封建主義的改良者，只不過他嚮往較早的，純樸的時期。在這一點上，他是空想主義的，又是反

動的。

孔子以後，有兩個著名的儒者：孟子和荀子，前者發揮孔子的復古思想，後者則跟孔子復古觀念決裂，就當時的現實提出改革封建制度的主張。因此荀子的門徒，如韓非和李斯，成了法家學者。韓非是法家最偉大的理論家，而李斯成了秦始皇的首相。李創議的一系列政策轉變，消除了封建主義，使小地主階級生長起來，建立了秦始皇統治下的集中君主制。

儒家反對秦始皇的改革，在這鬥爭中，法家扮演了一個進步的角色，而儒家則扮演了一個反動的角色。

但僅列舉這兩個派系的作用是不夠的。秦和法家所用的暴力方法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空前的殘暴和專橫的惡名，不僅由於秦焚書坑儒，更重要的是秦和法家對待農民是非常殘暴的，所達到的殘暴程度，竟使政府在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十五年後，便被有記載的歷史上第一次農民暴動推翻。漢朝代之而起。絕非意外地，漢朝利用儒家學者來取代秦朝的法家作為謀士。可是，儒家並沒有恢復舊的財產關係，他們沒有恢復長子繼承制度，沒有恢復土地貴族，也沒有取消土地的自由買賣。

這表明，從漢朝（公元前二百零六年至公元二百二十年）起，沒有人能指出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學派是代表着對立的社會階級。相反地，他們的分別只在於他們對由於秦始皇改革而興起的地主——商人階級的不同支持方法。從這個時代開始，法家並不比儒家較為進步。它們的差異已縮小相近於零，例如，今天美國的「法律與秩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別。前者較多依靠赤裸裸的鎮壓，而自由派則較多依賴幻想和狡計。特別是對於農民，法家繼續採取嚴厲的手段。儒家提倡保守道德來維持中國社會秩序，這是衆所週知的，只需指出它所給予婦女的落後地位（在家從父

· 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就已經足夠了。

當然是由於法家的殘暴名聲而使毛被稱為第二個秦始皇，現代的儒家就像劉少奇等，他們反對毛的一些比較殘暴的政策。

問：那末，孔子不是代表奴隸社會，秦建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是封建主義，而是一個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政權。你能否解釋這種發展呢？

答：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同於歐洲的模式。正如馬克思說的，歐洲從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經過中世紀的封建社會，直接發展到資本主義。

從有記載的歷史，我們知道商朝（公元前一七八七至一一三四年）標誌着部落公社到封建社會的過渡。商朝之後是周朝（公元前一一三四年至二百五十六年）——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秦始皇摧毀了這個社會。由秦開始的過渡政制差不多維持了二千年，從公元前三世紀到資本主義入侵中國的十九世紀中葉為止。從這時開始，中國便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即是說，小商品關係的舊經濟形式逐漸崩潰。手工業不能與帝國主義輸入中國的現代商品和機器競爭。

這些商品的出現帶來了鐵路、工廠、礦場等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商人擔任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買辦），成為新的階級，資產階級。

中國逐步從古老的小商品經濟進化到新型資本主義。通過這些階段，中國的經濟生活便與世界帝國主義連結一起。

問：既然秦摧毀了封建社會，基於新的社會關係建立了君主制，為什麼中國不能在較早期間發展資本主義？

答：這是一個非常有趣而複雜的理論問題。人們可問，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古羅馬出現，而要等待到十八世紀在英國興起

。這個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共產黨宣言中解釋過。

「美洲的發現，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這即是說，資本主義只能在世界範圍上組織起來，正如宣言說的：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

沒有世界市場，工業資本主義是不能興起的。

在中國，當秦消滅了封建制度時，圍繞着中國的國家或民族都是十分落後的。因此，秦統一了中國，其市場還是非常狹窄的。當然，這些環境不能產生資本主義，雖然，手工業和商業有限度地發展起來，與東南亞和日本發生有限度的貿易關係，但商業的範圍仍然是狹窄的。因此，中國停滯了一段長時間——大約二千年。

問：毛派推行了一個強而有力的批林批孔運動已有一年多了。這個運動的結果如何？

答：從一九七五年一月舉行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大的結果，便可以看到這個運動的後果。爲了明白大會的結果，我們一定要研究大會的一些最重要決議。

大會首先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了一項新憲法，「國家主席」的名字被除去，加進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統率全國武裝力量」。這意思是全國武裝力量正式置於毛的操縱之下。最低限度在紙面上，全部軍官和士兵都要服從毛的命令。

可是，大會的另一個重要決定表示了毛對軍隊的控制是如何虛假，他受到重大的挫折。例如，新憲法加上了「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牧區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

畜。」這一條，是在老幹部包括劉少奇的支持者的壓力下，對農民的重大讓步。在人民公社失敗後，劉推行的這個步驟，後來毛派在文化大革命時極力反對和阻止實行這個步驟。

其次，大會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常設機關，又是對毛的另一打擊。朱德再次獲選為委員會的委員長。朱德是一個重要和著名的年老領袖。他參與和領導了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暴動。而且，在中國共產黨走上政權之前的一段長時期，他是軍隊的領袖。他與毛會有不同意見，有時候是公開的，像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在文化大革命時，他被毛派猛烈攻擊。

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有二十二個副委員長。它包括了數名被毛派攻擊和清算的人，如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聶榮臻和陳雲。

我曾說過，譚震林和烏蘭夫是復出的前黨政治局成員。李井泉、聶榮臻和陳雲也曾在文化大革命時受到攻擊和被解除職務。李井泉是西南局的第一書記和中國共產黨政治局成員。聶榮臻是科技部門領導人，他掌管原子能的研究和生產。

中央政府執行機關即國務院的領導成員是：周恩來重選為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為鄧小平，國防部長為葉劍英。葉是人民解放軍中最老的人物之一。他參加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起義，曾是朱德領導下第八路軍的參謀長，是周恩來的支持者。

鄧小平是與毛不和的另一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年老領袖。

他參加過長征，從紅軍中崛起，擔任黨的總書記。一九六六年，他遭受紅衛兵攻擊，被認為是僅次於劉少奇的要被清除的人物。七年來，他都沒有工作，現在周恩來恢復了他的地位和工作。

毛憎恨鄧。當鄧在文化革命中被清算的時候，毛在演講中指鄧長期以來拒絕向他報告由鄧操縱下的黨中央的工作。現在，這個人的地位竟僅次於周恩來！

有了這些職位，周和他的支持者掌握了中央政府機關和軍隊。因此，目前周成了最有權力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領導人。

另一方面，毛的最重要支持者只得到一個較重要的職位，他是張春橋，現在是第三副總理和人民解放軍的政治部主任。毛的其他支持者，如王洪文、姚文元和江青得不到任何重要的職位。

當然，毛擔任全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但這純粹是虛有其名的職位。真正的權力是在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的手裏，他們是周恩來的人。

因此，從第四屆全國人大會的結果，可以看到儘管批林批孔是這樣熱烈，毛派並沒有真正的收穫。相反地，他們在年老的領袖和幹部間更加孤立，其勢力比運動開始時為弱。毛派還能牢牢保持的陣地便是報章。他們的反對者容許他們說話，以避免在官僚層內招惹更多的破壞性鬥爭，但這裏並不是作出重要決定的地方。

毛派的孤立是毛沒有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原因之一。他知道大會的結果是不會對他有利的。

問：在未來的時期，你認為毛會做什麼呢？

答：在斯大林主義的制度裏是有一種爭奪權力的邏輯，加上毛一貫的性格和方法，我們可以說，毛和他的追隨者將力圖在黨內恢復他們過去的權力。長期以來，官僚層已利用毛作為權力的象徵，因此不願冒與他公開分裂的危險。這個條件使他的追隨者有超於他們實際力量所容許的機會來玩弄手段。（這是毛能打敗

劉少奇的重要因素。)

在大會結束後，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雜誌繼續刊登批林批孔的文章。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特別在一九七五年三月發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呼籲。這篇文章引用了毛的說話：

「列寧爲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接着，紅旗的編輯部主張：

「全國億萬人民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各級黨委一定要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抓緊抓好，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政策，進一步搞好批林批孔運動！」

接着他們的提議，編輯們繼而詳細地摘引馬克思和列寧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文句。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號召，顯然是一個新運動，其目的是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作爲煙幕，作爲毛澤東個人獨裁的代號，證明過去對他的反對者的清算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爲他們被斷定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同時也警告各級黨委：如果他們不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即毛的個人專政）的學習抓緊抓好，和「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由毛制訂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政策」，他們將會遭受嚴厲的懲罰或清算。

傳說是毛女婿的姚文元，跟着上述的路綫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它在同期（一九七五年三月）的紅旗刊登出來。在列舉林的「罪狀」，如攻擊五七幹校和稱毛是「當代秦始皇」後，姚提出了林的派系的社會基礎的分析。

他總括說：「林彪反黨集團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復辟的願望，而且代表了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產生的資產階級份子篡權的願望」。

從這些字句，人們可以明白毛派對待林的追隨者和一切其他反對者的態度。每一種政治分歧都認為是從敵對階級中來的。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

一九七五年四月的紅旗又刊登了張春橋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張春橋引述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話：「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

在他的文章裏，張春橋主張目前中國不僅需要無產階級專政，還需要全面地對「資產階級」專政，包括思想的領域，才能消除「一批跟着一批」興起的新資產階級。否則，新資產階級便會把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張接着論證說，這正是蘇聯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統治下所發生的情形，劉少奇和林彪曾經用同樣的方法，試圖追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蘇聯的道路。

從紅旗刊登的文章，我們很容易明白毛派的下一步。我們應記得，在斯大林獨裁下，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整肅經驗。在中國，自從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走上政權後，已有四次大規模的整肅。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和中共東北局的第一書記高崗與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以及數十老幹部在一九五四年被毛澤東、劉少奇及周恩來所清算。他們在經濟政策和黨政的人事問題上發生分歧。後來，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和

幾個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被毛清算，因為他們不同意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冒險主義政策。再後來正如舉世週知的，劉少奇的派系，然後是林彪的集團也被清算了。

因此，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毛派肯定會繼續他們的鬥爭，清除他們全部的反對者，以恢復毛的個人獨裁。只要毛有生一日，他們便要這樣做。問題是毛派有沒有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以我的看法，他們不單不會成功，還會越來越孤立。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派系有了過去內部鬥爭的經驗，將會作出準備，安排力量以對抗毛派的攻擊。

最後，中國共產黨內的無休止鬥爭和整肅，將使群眾認識到，由群眾發動政治革命是必需的。只有通過政治革命，才能推翻官僚獨裁，並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無產階級政制。只有這樣才能開展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天安門示威的意義 *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

問：全世界都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群眾示威。雖然新聞界報導了這一事件，但其重要性還未明朗。你能否描述天安門廣場的示威和解釋其意義？

答：爲了要解釋天安門廣場的事件，我必須首先敘述先于它的事件，即是，自二月初以來毛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今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之死，令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機構失去平衡，因此毛在周死後立即發動反右運動。

在一九七五年一月舉行的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上，與周恩來和鄧小平結合的派系取得了對政府各部門——包括軍隊的控制權。毛十分不安於這種狀況，但當時他沒有力量向周的派系挑戰。人大以後，毛打算以自己的方法繼續派系鬥爭，我已在洲際通訊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刊登的一篇訪問記中簡述了它的背景。

周恩來之死令周鄧派失去了一個能超越毛的派系而保持權力的領袖。因此，毛迅速地利用周的死亡來發動一個消滅其派系的運動。

必須指出，大量中國群眾都哀悼周的死亡。僅在北京就有數以百萬的人參加周的追悼會。青年工人、士兵和學生顯明地表示

* 本文是彭述之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接受《洲際通訊》記者的訪問記。譯自該刊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一期。

他們的憂傷，根據中國和外國記者報導，很多還嚎啕痛哭，這顯示中國大多數人民對周恩來都十分尊敬。

另一方面，群眾的反應顯示憂慮和恐懼周的死亡會影響政府。明顯地，情況是對毛有危險的，他便迅速進行恢復他對黨和政府的個人獨裁。

問：誰是「復職的右派」？

答：這是在文化革命中被整肅和在一九七三年八月舉行的第十次黨大會上被復職的老領袖和幹部。差不多全部在文化革命中被整肅的黨委會第一書記和頭頭都是周鄧派的支持者，都在周鄧派的壓力下在大會上被復職，這造成了對毛派十分危險的形勢。周去世以後，毛攻擊鄧要對復職「右派」負責，以此打擊周鄧派。毛利用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主席的職位，指派華國鋒做代總理。

問：在這一鬥爭中反對鄧的政治論據是什麼？

答：毛派說鄧放棄階級鬥爭，企圖復辟資本主義，他們把鄧當作「走資派」的代表。在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題為「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文章中，指責「走資派」以「三項指示」為綱，反對階級鬥爭，指責鄧拒絕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事實上，在文化革命後，毛自己提出三項指示——安定團結、發展國民經濟、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當前這一鬥爭之前，這三項指示都一般地被認為正確。現在爲了指鄧爲走資派，便把這三項指示與階級鬥爭理論對立起來。

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理論機關報紅旗刊登一篇題為《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的文章。這篇文章攻擊「四個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是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提出來作為使中國克服落後性，在未

來二十五年內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方法。

這四個步驟一般地是正確的，但要克服中國的落後性，不單是經濟問題。如果官僚專政繼續下去，經濟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可是，群眾却不明白周恩來路線的弱點。

正如我以前說過，毛派在四屆人大上無力反對周派。他們從未公開批評過四個現代化；却在周剛死後，在整個二月和三月，所有毛派控制的報章和雜誌，反復地攻擊鄧小平，正如他們以前攻擊林彪爲孔子信徒和資本主義復辟份子一樣。他們宣稱四個現代化會粉碎無產階級專政而建立資產階級專政。

人民看到傳播媒介這樣猛烈攻擊，當然迷惑和恐懼。天安門事件是群眾表達他們對政治局勢的意見和憂慮的企圖。

問：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實際發生了什麼事？

答：在中國，四月初有一個傳統的習俗稱爲清明節——人們對先人表示尊敬的日子。北京人民利用這個機會，送花圈到人民英雄紀念碑表示對周恩來的尊敬。

第一個花圈是由三個機器工廠的工人送去的。然後，兵士送來花圈。在四月二日、三日和四日，人民繼續送花圈和周恩來的照片。在四月四日，有四萬至五萬人來到天安門廣場，以這一方式表示他們的敬意。

有很多花圈貼上口號和詩詞，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例如，有一句口號是：「尊敬的周恩來總理，我們會永遠懷念你。」另一句是：「我們尊敬的周總理不朽，我們要保衛你的英雄事業，我們會完成你提出的計劃。」另一句說：「提防黨內的陰謀家，打倒周恩來的叛徒。」

所有這些口號不單表露了對周恩來的支持，還採取了反對毛的立場。另一些口號例如「打倒慈禧太后」和「打倒甘地夫人」

，是反對毛的妻子江青的口號，她是反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真正領袖。

這些活動令毛憂慮和憤怒，他命令警察和民兵把紀念碑前的所有花圈搬走。這種不聰明的行動的消息很快傳遍北京，激發起人民的怒火和義憤。

四月五日清晨，群眾湧到天安門廣場。他們抗議搬走花園，並送來更多的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到中午時，已有十萬人以上在廣場聚集，這數字已為人民日報所承認。

人群要求送回花圈，他們的要求在某種情況下轉化成暴動。例如：

- 當一輛宣傳車駛近廣場時，立即被包圍，車上的人被趕出來，車被推翻。

- 一輛被幹部駕駛的汽車被截停和燃燒。

- 在下午三時，三輛由秘密警察駕駛的汽車內的人被趕出來，汽車被燒毀。

- 有些群眾以為花圈可能被搬進由數百兵士、民兵、警察守衛的人民大會堂內。當他們要求進入這座建築物時，衝突隨即爆發。

- 另一部分群眾以為在廣場附近某座建築物外的一些軍裝官員會下令搬走花圈。人群便衝進這座建築物，帶走書籍和文件，破壞傢俬，最後放火燒毀這座建築物。

在下午六時至七時間，群眾疲倦和肚餓了，和由於他們的示威沒有被鎮壓而感到勝利，他們歡騰地高唱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這是最後的鬥爭。」

最後，人們送上一個花圈，上面有一首詩，通過以下的幾行詩句，表達了他們對毛的挑戰：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信仰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爲了真正的馬列主義，
我們不怕拋頭洒血，
四個現代化日，
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這首詩意味着人民再不願接受毛黨的獨裁統治，他們認爲這是秦皇式的封建獨裁。它呼籲信奉真正的馬列主義而反對被閹割了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四個現代化的提及，顯示對周恩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綱的支持，而反對毛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即毛的個人獨裁。

當然毛派注視着整天的事變，最後命令民兵、警察甚至士兵出動到廣場去。

大約下午十時，大多數人群都已散去，只有三千左右的最堅決和勇敢的青年人留下。就在那時，有一萬以上的警察、民兵和士兵從廣場各方面圍攻群眾，民兵用長木棍向示威者進攻。

官方沒有公佈傷亡數字，據一些觀察者說，有數百示威者被殺或受傷，很多人被捕。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的示威和抗議運動被血腥鎮壓下去了。

這次毛的官僚政權的鎮壓行動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二十六年來對人民的第一次公開攻擊。這次示威及其後果，乃是反官僚獨裁的政治革命的前奏曲，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情形相似，當時匈

牙利人民反抗該國的新大林主義官僚獨裁。

人民日報在四月十日刊登一篇文章聲明這次反抗只涉及一小撮鄧小平幕後指揮的反動者和反革命份子。鄧被指為中國的納吉。

這種講法完全是毛的謊言，他們承認有十萬人在廣場聚集。從各方面報導看，示威顯然是自發的。

可是，人民日報的這句話却是真實的——鄧小平是中國的納吉。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領袖，而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和妥協者。他在示威中客觀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他是促發整個天安門事件的毛的反右運動的焦點。

問：全國人民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如何？其後毛派採取了什麼措施？

答：有關該事件的新聞報導大多遭到政府的嚴格檢查。可是，看到幾個城市（例如南京和河南省的鄭州、雲南省的昆明）群眾示威的外國和中國遊客透露了一些事實，當然，這些示威行動比北京的規模較小，和缺乏詳情。

對於天安門事件後毛派採取的措施，我們可以指出兩點：第一，鄧小平被正式地解除了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第二，毛派動員了警察，民兵和甚至街坊委員會來搜索參加過天安門示威的人，特別是青年人。

有不知其數的戰士被捕。他們的命運如何沒有被透露，但人民日報一則新聞報導，一項所謂公開審判曾於五月中在北京舉行。在這次審判中，據說有五個人被人民信以為真地判決，兩個被判死刑，其他三個被判三十年苦工。

問：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毛對已故總理周恩來採取什麼態度？毛有沒有繼續反對周鄧派的「右傾翻案」運動？

答：毛派清楚地明白人民尊敬周恩來和支持他的政策而反對毛的。他們恐懼激發起更大的反毛情緒，因而不敢公開地批評周。另一方面，毛派將會設法批評周恩來以澄清他們的路綫和解釋他們對天安門示威的鎮壓。

他們這個矛盾使他們只能抽象地批評四個現代化和等待一個把周恩來作為批評對象的更好的機會。

當然，毛派會繼續反對鄧小平和「右傾翻案」的運動。自從天安門事件後，有很多攻擊他們的文章，和舉行過許多公開會議。直至現在，並沒有任何反對這些所謂「右派」的行動。唯一特別點名的還是鄧小平。

在一些地方，例如湖南省，毛派會公開批評黨的第一書記，但他們沒有採取步驟把他撤職。

毛派對於軍隊的態度，特別是對邊境地區的司令，是小心的。這些人大多數是被周恩來復職並支持他的意見的。沒有一個司令被撤職，雖然有些被調動。這顯示毛派目前沒有足以取代這些人的幹部，和會等待未來更好的機會。

問：歐美新聞界稱毛派「激進」和周派「溫和」。毛派稱周鄧派為「復職右派」和「走資派」。很多人認為激進的意思即是「進步」和甚至「革命」，另一方面，「溫和」意思是「保守」和甚至「反動」。這些稱號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呢？

答：中國共產黨內的所有派系都可稱為斯大林主義的，因為他們全部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支持斯大林主義。可是，在實踐上，他們之間是存在某些分歧。毛的對內政策可從他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看出。

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和前總參謀長黃克誠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出面反對毛的冒險主義政策。他們被毛清算和被指為「右派」。

另一例子是六十年代初，劉少奇和鄧小平爲了要糾正毛的冒險主義政策，在工業、農業、和文化領域，採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某些對農民和知識份子的讓步，毛便指責劉和鄧是「右派」和「修正主義者」。他發動文化革命來清除他們。

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大會發動非斯大林主義化，劉和鄧加以支持，並打算把它作爲在中國實行的例子。在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劉和鄧刪去了黨章內的以下字句：「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再者，鄧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個人崇拜是一種陳舊與反歷史的現象。它在一定程度內反映在我黨與我國社會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勝利地持久地決心實行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以反對個人優越與個人突出。」

鄧在第八次大會上表示要取消對毛的個人崇拜，是目前這個反對他的運動之主要原因。

毛的外交政策更能暴露其「激進」派系。在一九六〇年代中，他呼籲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可是，從一九七〇年代初起，他却採取了相反的立場。他邀請尼克遜到中國，簽訂了所謂上海公報，肯定了帝國主義的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原則。毛派不但不呼籲被壓迫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而且相反地，呼籲帝國主義團結起來打倒蘇聯。

基於以上例子，可以看到毛和周鄧派系間的分歧。如果我們要以真名呼實物，毛的派系應被稱爲死硬的斯大林主義派，周鄧派系則是溫和斯大林主義派。

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表示對溫和派的同情而反對死硬派。這是十分相似於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同情納吉而反對拉可斯

（匈牙利的毛澤東）。

可肯定的是，參加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戰士們，會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革命從那次鬥爭中總結出教訓。他們必須把自己組成一個新的派別——一個革命黨——來進行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獨裁統治並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只有在一個革命黨的領導下，群眾才能動員起來達成「四個現代化」，在中國創造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嫡派倒台的背後 *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

問：根據中國和各國報紙的報導，在十月六日，中國共產黨內最接近毛澤東的四名主要領袖被捕了。他們是毛的遺妻江青、副總理和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和毛澤東思想的主要鼓吹者姚文元。他們都是黨的政治局成員。北京市長吳德在十月廿四日的天安門廣場集會上指四人幫為企圖「篡黨奪權」的反黨集團。假如華國鋒反對毛的門徒親信，那毛自己為什麼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裏將華提升為政府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呢？

答：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毛派的四名領袖與華國鋒總理之間所產生的衝突。最近的報紙報導，揭露出對於誰接任總理職位和毛死後的黨主席職位存有歧見。四人幫被指會提議由江青任黨主席，張春橋任總理。

華當然不會同意上述提名，因為這會使他失去其新取得的職位。華遂宣稱掌有江青及其支持者正準備一場政變的證據，轉向那所謂溫和派的老年領導人。而這些領袖，特別是國防部長葉劍英，企圖用華來打倒極端的毛派。根據華的情報，他們立即拘捕了「四人幫」。

* 本文是彭述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接受露絲·康娜莉 (ROSE CONNOLLY) 的訪問談話。譯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洲際通訊》第十五卷第一期。

至於爲什麼毛會委派華任高層職位，我們必須明白，就像斯大林一樣，毛是以自己的利益爲依歸的，他提拔忠心和服從他的人。毛從不關心革命的利益。

例如：毛在黨內提拔林彪爲其繼承人，因爲林個人對他忠心和服從。當林還是國防部長時，他在軍隊中宣揚毛思想，建立毛的崇拜，號召每一個人都「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利用軍隊幫助紅衛兵打倒劉少奇派。但同時，林却建立起自己的派系，而毛將這看成是對其個人獨裁的威脅。在一場據說由林發動的失敗了的政變後，毛然後清除了林彪及其追隨者。

至於華國鋒，他在第三次中國革命之前或革命時期未曾扮演過任何重要角色。毛將他從一個地方幹部提拔爲國務院副總理和公安部長，是因爲他的忠順。一九五五年，當時華是毛誕生地湘潭縣縣委書記，他就執行毛的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冒進政策。他將毛的故居改建爲遊覽勝地，甚至計劃建築一條連結城市的鐵路來運載訪客。毛由此獲得印象，將華從湘潭的縣委書記提升爲湖南省委副書記。

文化大革命期間，華協助紅衛兵摧毀了劉少奇派。此後，他升到湖南省黨委會第一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的職位。他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中獲選爲中共中委。

當毛在一九七四年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時，華協助粉碎了林派在湖南省的殘餘力量，這使他升任政府的副總理和公安部長——政治警察首腦——的職位。周恩來一九七六年一月死後，毛委任華爲代總理和黨的副主席，因而等於指定華爲其繼承人。

問：據報紙報導，毛的親信在上海和北京擁有有力的基礎。

他們控制了上海黨政的領導權，並且有一支超過百萬人的民兵。在北京，江青集團亦控制了民兵和五萬名作為毛的衛隊的士兵——一八三四一部隊，它由毛的忠心支持者汪東興指揮；「四人幫」亦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新聞媒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和新華通訊社）和文化部、教育部、清華北京兩所大學。這看來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為什麼在「四人幫」被拘捕後，這些毛派的堅強據點却沒有反抗呢？華又怎能在上海和北京發起反四人幫的龐大示威呢？

答：中國國內及國外很多人士都對這一事變感到驚奇，但這是不難理解的。首先，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派依靠毛的聲望和以林彪軍隊的支持佔據和控制了上海。毛派從未取得真正群眾的支持；相反，群眾憎恨他們，因他們從不改善群眾生活水準，而又壓制一切言論自由。

對於任何工人群眾增加工資的要求，毛派總是拒絕，指它是一項「物質刺激」的要求。他們要求群眾應「以苦為樂」（毛語）。這自然令工人不滿，結果，當「四人幫」被捕時，上海的群眾立即組織支持這場清算的大示威。

第二，民兵在形式上受毛派控制，但只是在上層而言。下層民兵與群眾一樣對毛派不滿。這就是為什麼當王洪文要求民兵支援時却無反應。

第三，駐在上海的軍官幾乎全部都是舊司令員許世友的部屬，許在文革中被毛派打擊，其後又從南京軍區（上海）調往廣東。當「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傳至上海時，軍官和兵士不但不去阻止示威，反而在背後組織示威。

第四，大部份在文革時期被清算的舊領導和幹部仍居留在上海。他們熱烈地歡迎這場清算，並且鼓勵打擊「四人幫」。

此外，在文革結束時，幾十萬名上海紅衛兵被毛派送往鄉間，禁止回去。這些青年激進份子的父母親屬都憎恨這一強迫措施，憎恨毛派，甚至憎恨毛澤東。他們歡迎這場清算，希望不久他們的兒女回來。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爲什麼沒有人反對清算「四人幫」。相反，上海的人民舉行了三天具有節日氣氛的示威，表示歡迎這場清算。

在北京，對拘捕的反應是更戲劇化的。首先，那被稱爲八三四一秘密警察的部隊在清算時支持華，主要是它的司令員汪東興遭受到軍隊裏（特別是北京部隊）強大的反對毛派的壓力。汪完全放棄了他對毛的忠順，轉向華，在權力鬥爭中保護自己的地位。這是一個祇以個人利益，而不以革命原則爲基礎的派別鬥爭底邏輯的發展。

當毛仍在生時，他的派別的支持者得到黨和政府的職位作爲獎勵。但隨着這個獨裁者的逝世，這些人就必須尋找新的方法去保留他們的特權地位。因此，毛派的很多成員現已遺棄其領袖，公開投降或倒向另一方了。

北京民兵指揮倪志福，就是在軍隊的壓力下，背叛毛派的一名較著名人物，他爲了要取得一個好的職位而支持清算，他被派到上海，取代王洪文，作爲黨市委第二書記和革委會副主任。

毛派表面上控制着的媒介亦已全部在它的主編被除掉後改變了其效忠。文化部長教育部長被撤職。曾控制清華北大的幹部都被拘捕。

毛的嫡系在北京和上海的勢力大致上已被摧毀。因此，我們可以說，毛的嫡系作爲中共內的一個死硬的斯大林主義集團已不再存在了。

事前已有跡象顯出這事將要發生，① 自文革起，毛派已在黨和軍中幹部和老領導人裏完全孤立。毛只有很少忠心可靠的幹部，這使他的派系的倒台無可避免。他的逝世只不過加速了事變而已。

問：自從江青及其他的政治局成員被捕後，他們就被新的領導層指為資本主義復辟分子、破壞者、馬列主義叛徒等等。爲什麼這些罪名不用來反對毛澤東呢？爲什麼華國鋒及其支持者仍維護毛的聲望和保證執行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呢？

答：中共的領導人過去是、現在仍是斯大林主義者。各個不同派系的思想和方法是相同的。因此，毛的聲望有助於華的派系，正如曾經有助於毛的派系一樣。

華國鋒在黨、政、軍都沒有自己的聲望和基礎。他是由毛一手提拔到高領導職位的，所以必須繼續利用毛的權威來作爲他的政治資本。

缺少周恩來和鄧小平，其他的老一輩領袖——那些所謂溫和派——既無大志亦無能力在不利用毛的權威下建立一個獨立領導層。他們真的想摧毀毛的派系，從而熱烈地支持和鼓勵這場清算。

說「四人幫」是修正主義份子和資本主義復辟分子的指控，只不過是用來醜化和摧毀他們的影響。「四人幫」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過去曾用同樣的指控對付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毛選定的繼承人用毛的方法去摧毀毛的派系，當然是十分諷刺的。

指「四人幫」背叛毛的思想和違背毛的指示，只不過是華國鋒和新領袖們爲了逃避清算責任的一項借口而已。歷史事實不可爭辯地證明，這四人終毛的一生都是忠心和服從於毛的。

華國鋒現正玩弄手段將毛與其追隨者分開，從而能夠繼續利

用毛的威望，作為欺騙和控制群眾的工具。但群眾已看過和經歷過過去十年的很多次清算，是不容易被騙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民目睹對幾乎每一個黨政文教幹部和領袖的攻擊。在毛指揮的紅衛兵的攻擊下，數以千計的人被清算或撤職。很多人被送去勞改，例如送去五七幹校。然後，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和「知青」被送上山下鄉。

這就是爲什麼遍佈全國千千萬萬的人都憎恨「四人幫」，並且參加示威，歡呼清算「四人幫」的原故。群眾並且慶賀毛的逝世及其嫡系的倒台。

問：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你的預測如何？

答：毛澤東的死是個人獨裁統治的終結。對毛的強硬路線的斯大林派系的清算，就是那所謂溫和的斯大林主義者的勝利。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形勢將會有某種改變。

首先，中共的新領導層必須重組自己。黨的最高決策機構是政治局，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時選出廿一名成員。但從那時起，五名已逝世：周恩來、朱德、毛澤東、董必武、康生。「四人幫」被清算掉。（鄧小平亦在七六年四月被除掉，但他在七三年八月十八日「復出」時，因爲不宜太快再將他選進政治局裏，所以他只被選爲中委。）

這樣一來，政治局只留下十二人，他們全部都不夠力，在黨內缺少聲望和地位。只有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和許世友在軍隊和政府裏有影響力。這意味着黨的領導層必須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或至少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來重組。

看來華國鋒並不想召開一次代表大會或中委會會議，因爲怕這會削弱其現在擁有的權位——黨主席、國務院總理，軍委會主

席和公安部長。毛本人在生時亦只擁有上述職位中的兩個。

華大概會以拉攏、玩弄手段、以及與年老的領袖妥協等來建立一個暫時領導。

假如這樣重新分配職位，北京的領導層就會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但他們仍面對一些難題。第一，他們必須處理那些在文革期間被清算的舊領袖和老幹部。這些人包括前北京市長彭真；前黨宣傳部長陸定一；前政府文化部長周揚；前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前上海市黨委第一書記陳丕顯；② 前上海市長曹荻秋；和前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等等。

此外，還有數千在黨和文化機關中工作的幹部，在文革時在毛的指示和「四人幫」的幫助下被清算。由於四人幫現被控犯了「修正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邏輯的結論就應讓所有被四人幫清算的幹部復職。

最近，關於被毛親自清算的鄧小平底復職問題，變成突出的難題。鄧是僅次於周恩來的溫和派重要領袖，在目前的領導裏，他比任何人都具有更多的經驗和影響力。雖然華必須儘速解決鄧在新形勢裏的角色，但鄧的復職對華的地位來說，將構成嚴重的威脅。

第二個可能變化的領域是自文革以來逐漸惡化的經濟。雖然，一些官員將經濟的惡化形勢歸罪於「四人幫」的陰謀，政府仍須設法加以改善。他們已經保證實行由周恩來提出來的「四個現代化」，但問題是在找到必須的資金和技術。

可能改變的第三方面是自文革以來已變得不能忍受的生活水平。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都被凍結。這就是為什麼工人於一九七五年七月在浙江省會杭州發動大罷工的主要原因。

第四：中國的教育制度被文革完全破壞了。幾乎所有的大學

和中學的校長都被清掉。很多教授和教師被解職，大部份被送下鄉改造。毛的擁護者實行「教育革命」，以代替正常的上課。幾乎所有學校都被所謂毛澤東思想工作隊所控制，對教師和學生發動長年累月的「鬥、批、改」。

由文革至今，學校都處於大混亂裏，結果是，絕不可能為社會主義的利益——即是使中國脫離落後狀態、邁向現代世界——來教育新一代。

在所有文化領域內，情況亦一樣。毛實行一種類似四十年代斯大林治下的「日丹諾夫政策」。作家、藝術家、演員、畫家、音樂家——全都被迫放下工作，或者被開除。這就是為什麼自從文革以來，中國竟無法產生任何有價值的小說、戲劇或詩歌的原因。有幾個由江青搞出來用作宣傳的所謂現代戲劇，却沒有任何藝術上的重要性。一句話，今天中國的文化領域是一幅荒地。因而，教育和文化的復興和發展，對新領袖們來說是迫切的問題。

新領導層亦必須解決估計數達一千萬名下放和仍留在農村的城市知青。③ 自然，這些人之不滿和痛恨被迫的下放，形成一個爆炸性的局勢。他們極希望返回城市和家庭，繼續讀書，找尋職業和會見親友。很多人已非法地返回城市，增加了他們父母的負擔，亦使當局增加麻煩。估計近年來已有三四萬人，冒生命的危險，逃去香港。

最後，中蘇關係自六十年代已開始逐漸惡化。蘇聯的官僚們在綿延數千里的兩國邊境陳兵百萬。毛也派軍隊去。這種軍隊的對峙至今已有數年，曾發生過幾次武裝衝突。假如中國的新領袖不改善這種危險的局面，就有可能爆發一場戰爭。

上面指出的問題，是導源於毛的領導，所以新領袖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方法予以解決，因為它們都是由斯大林主義的邏輯所造

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拋掉毛所使用的方法和思想。

面對這些迫切的難題，中國的新領袖却集中力量繼續在反「四人幫」的運動上，指責他們迫害老幹部，特別是文化界的幹部。四人幫的個人生活的貪污奢侈被揭露出來，特別指責江青像一名娼妓。用這種對個人的攻擊，新領導層企圖證明這場清算是必須和正確的，並且也滿足了人民對四人幫的仇恨。

但明顯的問題仍然存在：誰授權「四人幫」去迫害老幹部呢？誰容許他們能夠過這種腐化和放縱的生活呢？那不是中共的主席嗎？那不是毛自己發動文革，並且命令四人幫去清算其他的黨幹部嗎？

人民知道，江青作為毛的妻子與毛一起生活已差不多四十年了。假如她的個人生活真的如此醜惡和腐化，這指出毛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華不自覺地暗示群眾提出來這些問題。這等於他直接地打擊「四人幫」，來間接地打擊他們的首領——毛澤東。華正為未來的非毛澤東化打開了大門。

新領袖看來正被迫準備向知識份子作某些讓步，會容許某些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以及容許被禁的文藝作品和電影復出。一些老幹部和領導人，可能從監獄和勞改營被釋放出來。

而另一方面，領導層亦正準備以「物質刺激」——即多勞多得——的方法來提高工人的生產力。領導層對中國的工業，會從國外輸入更多的機器和技術，但問題是缺乏資金。

北京看來願意為減輕與蘇聯的緊張關係而採取一些步驟，但基本的爭執仍不能消除，因為兩個國家都是被以「一國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官僚集團所統治。北京政權繼續攻擊蘇聯已復辟了資本主義而且是「社會帝國主義」，這就表明中蘇的衝突將繼續發展。

新領導無意讓下放的知青從農村回來，從人民日報一篇報導華國鋒十分高興其親生女兒下放農村的文章中，已清楚表明這一點。

簡單地說，新的領導層並不能解決上面所討論的問題。他們只能以一些微小的讓步，短暫地安慰群眾；但這只會造成不滿的工農和革命知識份子更堅決地提出他們要結束目前的不能忍受狀況的要求而已。

即使在「四人幫」被清算之後，新領導內仍存有衝突；無疑地，新的派系紛爭將會出現。華已組織起自己的派系，並且展開其個人崇拜來加強自己的地位，以及確定自己是毛的接班人。但老一輩的領袖——周鄧派的餘黨——及他人並不信服華。特別是各省的地方幹部並不以為華比他們更有資格在黨、政、軍中擔任如此高的職位。

在這種情況下，一場反對華的運動有可能已在幕後展開。假如真的如此，這就意味着不久將來中共內部會有一場十分嚴重的鬥爭。

另一方面，群眾正期望，在毛死後的新領導下，他們的生活水平會有所改善，而他們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有所增大。由於已在新集團解決其自己的派系衝突的過程中看穿了它的弱點，群眾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願意採取群眾運動來對新領導層施加壓力。

去年四月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給予中國人民如何去準備那場已拖延太久的必然的政治革命一個例範。因天安門事件而聞名的詩句指出了前進的道路：

我們信仰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見鬼去吧！

爲了真正的馬列主義

我們不怕拋頭洒血……

這些詩句，清楚地號召打倒中國官僚專制。

註 釋

- ① 見《中共的派系鬥爭在進行中》談『批林批孔』運動，載於《十月評論》一九七六年三月號。
- ② 陳丕顯在文革前應爲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及華東局書記。而據今年二月十九日外電引述湖南省電台報導，陳最近已任職爲雲南省黨委書記（第一書記爲安平生）——譯者。
- ③ 這是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所作的保守的估計數字。

毛澤東政治生涯的評價 *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問：自去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後，全世界的政論家皆譽他為偉大的領袖和和平使者。你對他的成就有什麼意見？

答：分析毛澤東的成就，需要從他一生的言行去檢視，就如托洛茨基所說：要以「真名稱呼實物」。

毛在一九二〇年秋參與共產主義運動，於翌年七月參加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及後他被派到湖南，成為當地支部書記。

他在湖南的兩年很活躍，對當地的學生、工人運動有一定的貢獻；及後，由他負責迫走兩位領導同志，賀民範和李達^①，却顯示了他的專橫和官僚傾向。

問：毛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扮演過什麼角色？

答：一九二三年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毛不僅支持這種機會主義政策，還嘗試以理論去替它辯護。在他一篇題為「北京政變與商人」的文章中，毛寫道：「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這個革命是國民全體的任務，……商人在國民革命中應該負責的工作，……尤為迫切而重要。」^②

* 本文是彭述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接受露絲·康娜莉的訪問記。原刊於《洲際通訊》第十五卷第三十七至四十期。註釋為該刊所加。

毛又寫道：「上海商人起來了而且開始行動了，我們希望上海以外的商人都一齊起來一致行動。……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③（重點是我加的）。

毛將他的門雪維克觀點付諸實行，並以全力替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工作了好幾年。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毛被選為中委，並擔任中委會組織局書記，但他沒有履行任務，却積極在國民黨上海總部工作。一九二四年秋天，毛放棄了在中共的職務遷移到湖南，嘗試幹農民運動，但以失敗告終。他隨後轉到廣東，在汪精衛之下，擔任國民黨宣傳工作，並主編政治周報，通過該刊物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中共幹部壓力下，毛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稍為糾正他的右派觀點；他承認「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但又把資產階級分成「左」、「右」二翼，「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④，因此，他認為國共合作的政策應該無限期地實行。

這篇文章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國農民」發表後不久，由蔣介石所領導的資產階級「左派」，發動了「三月二十日的政變」，將共產黨——包括毛澤東——驅逐出國民黨總部之外。毛轉到上海，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派他領導農民運動的工作。

他在湖南活動，並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該報告隨後被毛派稱為中共領導農民運動的「經典著作」⑤，某些外國學者，如施瓦茲（BENJAMIN SCHWARTZ），譽該報告為毛崛起的起點。⑥

該報告對諸如領導者應當如何解決農民運動中的沒收和分配

土地的問題，沒有提出解決辦法，他只描述了農民的行動，為農民受指責的過火行動辯護。毛唯一的建議是「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但在當時的「革命當局」是蔣介石、汪精衛和唐生智。

離開湖南後，毛到達了武漢，參與了由國民黨領導的一個土地改革委員會，又成為全國農民協會的幹事。但他從沒有向該會或中共領導層提出任何土改的方案，相反地，在武漢局勢日益險惡時，他遵行了斯大林的機會主義路線。

在蘇聯，托洛茨基提出立即終止國共合作，中共必須領導獨立的工人、農民和軍隊運動，建立蘇維埃及奪取政權。斯大林反對這個意見；最後以汪精衛為首，被稱為「革命的武漢當局」，將中共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並取締所有群眾組織——包括了全國農民協會。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國第二次革命便悲慘地失敗了。

問：毛那時經年處身在國民黨中，他何時開始，以共產黨人姿態活動？

答：隨着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斯大林從極端機會主義的政策轉為左傾冒險主義，指令中共展開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為了貫徹新政策，由瞿秋白為首的領導層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開了緊急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將斯大林對二七年革命失敗中所應負的責任一併推到陳獨秀身上去，毛在當時完全支持這種欺騙。

會議又同時通過一項在兩湖進行「秋收暴動」的決議案，毛被派到湖南領導暴動，時為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至十七日，參與暴動的約有三千人，數百人被國民黨軍隊殺死或重傷，暴動徹底失敗，毛率領殘餘的人員在同年十月抵達井崗山。

毛陷於完全孤立無援的狀態，等候中共中央的指令，有兩股聲稱投誠共產主義的土匪與他匯合，一為袁文才所率領，另一支是王佐，毛離開井崗山後，兩頭領相繼恢復他們原有的活動，最後被農民消滅。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江西省會南昌亦有約三萬人的暴動，在瞿秋白的領導下，由中共的賀龍、葉挺和朱德率領；暴動瞬即失敗，後三人被逼逃至廣東省汕頭。除朱德保留一部份力量外，賀葉的部隊都潰散了！

同年十二月，由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也悲慘地失敗了，損失了五千餘人；斯大林的武裝鬥爭政策在中國以鮮血證明破產。

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在莫斯科召開了六次大會，重估中國的局勢，但這個大會並未從悲慘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反而通過了繼續武裝鬥爭的決議：

「……現時，黨應到處宣傳蘇維埃、工農專政、和隨即來臨的群眾武裝鬥爭的觀念……必須堅持不懈地貫徹奪取政權、以蘇維埃口號為中心的暴動路線……在中國為準備未來的革命發展，黨必須把武裝鬥爭視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推翻國民黨的唯一道路。」⑦

該決議案在一九二八年秋傳達到在井崗山的毛澤東。朱德已和他的軍隊從汕頭到來，與毛一起同彭德懷統領的軍隊匯合，正式組織成為「紅軍」。

這支新的「紅軍」在一九二九年開始，以井崗山為根據地，一路擴大中共的轄土，他們佔領了江西西部和湖南東南部一些地方，軍隊隨即擴大，建立了「蘇維埃」，及在所到之處進行土改。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中共在江西召開了第一次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了「蘇維埃政府」，毛被選為主席，朱德則為紅

軍總司令。

一九三一年，蔣介石進行了三次圍剿蘇區的行動，損失了以千計的軍隊和武器；一九三三年四月，蔣展開了第四次進攻，但招致了更慘重的失敗，共損失了兩師的軍隊，而兩師的師長亦成爲紅軍的階下囚。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位莫斯科的代表抵達上海，重組當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由王明取代了李立三的領導。

與此同時，大批共黨黨員和幹部被捕，其中一些因爲不投降而受處決；故此，在一九三三年，以王明爲首的中共中央遷移到蘇區，毛所有的實權爲王明派所選出的副主席項英取代，毛只有蘇維埃主席的空名。

在江西和福建的蘇區受到過百萬的蔣軍重重包圍和封鎖，因此，毛和朱德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在他們離開江西後，上百萬的農民被蔣軍所殺或活活餓死。⑧

長征期間，中共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毛被選爲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和恢復對紅軍的領導權。

紅軍在一九三五年十月抵達陝西省時，人數從原來的三十萬人減少至不到三萬人⑨。此外，自中共展開武裝鬥爭，國民黨大舉鎮壓了在大城市如上海、武漢、北京、天津等市的中共黨部，使過萬的中共黨員幹部，及它的青年團員受到殘殺或被逼投降；工人組織被完全摧毀。由斯大林、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袖鼓吹的武裝奪取政權的冒險路線，以巨大的人命損失的代價失敗了。

紅軍的殘餘部隊到達陝西後，毛號召所有政黨和團體——包括國民黨——建立民族陣綫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正是共產國際「以人民陣綫對抗法西斯主義」的翻版。⑩蔣不僅漠視毛的建議，並派遣張學良軍隊到陝西，企圖殲滅紅軍；可是，張學良的部下

因爲不滿蔣容忍日軍佔據他們的家鄉滿洲，而把蔣拘捕。

這些人本來要處死蔣介石，但斯大林發急電給中共，指使它與蔣談判；毛即派周恩來往說服蔣，領導抗日戰爭，蔣同意了。中共隨即取消「蘇區」，停止土改，將「紅軍」編進由蔣管轄的國民革命軍內；因而，在毛的極力支持下，國共進行了第二次合作。

問：這次所謂與蔣的談判，似乎是毛在各方面讓步而得以達成的階級調和協議？

答：實際的確是這樣。在十年戰鬥之後，中共完全向國民黨投降。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關於國共協議的「國共合作宣言」（節錄）如下：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發，擔任抗日前綫之職責。」^①

本來蔣是受到群眾猛烈批評不組織抗日行動，在他的部屬中也有人起背叛之心，可是，中共的宣言却使蔣起死回生，同時亦使到中共的下層幹部大混亂。

問：中共內部有人反對這次合作宣言嗎？

答：能夠明白宣言含義的黨員都很憤激，毛被逼而寫了數篇文章來闡釋他的新機會主義。一篇題爲「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文章中，毛解釋道：「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曾經成爲「革命的旗幟」，「……兩黨重新合作……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⑫

毛對國民黨的幻想也顯見於「論新階段」^⑬一文中：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以國共兩黨爲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爲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只要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綫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

「爲此目的，……務使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響，務使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日益親密起來。……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也能夠且必須是長期的。……

「……戰爭中的合作决定着戰爭後的合作，……那時的國內國際條件將更有利於合作，」（引自中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刊印之《毛澤東選集》第六卷一九八、二〇八、二二三及二二四頁，重點是我加的）

毛最重要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由中共在一九四五年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爲基本綱領，又運用於四九年革命成功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綱領中。在該文內，毛指出自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展開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組成的聯合陣綫——四階級聯盟，摧毀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期建立一「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亦即與資產階級攜手建立聯合政府。他又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國有化僅限於「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

「……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⑭

毛進一步論述階段革命論說：「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⑮

爲了維護他們的機會主義政策，毛和中共向托派——工人運動內唯一有組織地反對他們的政策的反對派，展開了猛烈和兇惡的攻擊，在上面提及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文章內，毛說：「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和對日抗戰的每一個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今後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後成分努力做宣傳鼓動和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和堅決的鬥爭。」

^⑯

托派，尤其是陳獨秀和彭述之，被中共及其影响的報章雜誌

污蔑爲漢奸，而不管托派事實上是主張支持由蔣領導的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

由於托派堅持應有批評蔣及其政府的權利，反托的運動越益瘋狂。托派號召群眾武裝起來，並提出集會、結社、出版和言論自由、八小時工作制和罷工權利的鬥爭綱領；托派主張「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代替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儘管受到毛的吹捧，蔣還是公開地準備摧毀中共的力量。一九四一年一月，蔣在安徽省成功地襲擊中共的新四軍，俘擄了軍司令葉挺，政委項英被殺。同一時間內，由國民黨胡宗南率領的大軍包圍延安，凡此種種都預示出未來的發展。

問：毛在當時和斯大林的關係怎樣？

答：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適值斯大林六十歲生辰，毛演說：「慶祝斯大林，這就是說，擁護他，擁護他的事業，擁護社會主義的勝利，擁護他給人類指示的方向，擁護自己的親切的朋友。因爲現在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受難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①7}

（重點是我加的）

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的幹部會議上，毛發表了提爲「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說，他說：「『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典型。」^{①8}實際上，這本書表明了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階段革命論，「一國社會主義」。它包括了斯大林在集體化、工業化上的冒險政策，對外政策的所謂「第三時期」，以及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度結合」——有名的三十年代對老布爾雪維克和其他革命者的大清洗，建立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①9}

問：毛怎樣解釋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和後來由斯大林路線帶來的其他失敗？

答：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委會全會所通過的一份決議案中，毛把第二次革命的失敗歸咎於陳獨秀，把其後進行武裝鬥爭和組織蘇維埃歸咎於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決議聲言只有毛在共產主義運動裏一貫正確，最後又說：「……過去二十四年中國革命的實踐已經證明，且將繼續證明，黨和廣大群眾的鬥爭路線，以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今天，我們全黨以前所未有的一致確認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並以前所未有的覺悟團集在他的旗幟之下。」^{②①}

決議案一句不提斯大林在第二次革命中的極端機會主義政策。反之，毛還引用斯大林自己的話來證明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完全正確。因為這種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政策，正是毛所一貫擁護和實行的。

緊隨着四月的全體會議，毛向第七次黨大會提交一篇題為「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強調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政黨聯盟的絕對需要性，即，四階級聯合的政府，但國民黨對這項建議沒有反應。

大會同時通過的一項新黨章，包含了如下句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②②}

由此，緊跟着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由大會正式確立了，從此以後，毛被認為是中共的唯一偉大領袖，是中國的斯大林，是「東方的紅太陽」，是「中國人民的救星」。

有名的「東方紅」歌，有如下的段落：「東方紅，太陽升，東方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重點是我加的)

問：日本向中國投降後發生了甚麼？

答：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向美國投降後，毛即到國民黨政府的臨時首府重慶，停留了個半月，與蔣秘密會談如何繼續合作和建立臨時政府；談判結果在同年十月十日公佈，聯合公報包括了國共保持和平關係的條款。^②

在一個公開集會上，毛激動地高呼：國民黨領袖蔣委員長萬歲。但在不久後，兩黨之間發生了衝突；蔣的軍隊突襲好些由中共游擊隊佔領的市鎮。爲了遏止瀕臨爆發的內戰，杜魯門派遣特使馬歇爾將軍到中國，進行國共和談。

蔣介石利用和平談判的時間調動軍隊，在美國飛機和戰艦的援助下，從中國內陸調到各大城市和收復區的戰略基地，鞏固了他的陣地，他鎮壓了所有新興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

一九四六年末，當蔣已佈置妥當好向中共的武力進攻，便公開關閉了所有和平談判的門戶，通過他自己召開的「國民大會」組織一個「立憲政府」，拒與中共聯合，隨即展開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包括把張家口和江蘇省的小城鎮佔據了。

甚至在這個時候，中共仍不放棄和談的努力，中共代表仍停留在上海和南京，試圖通過所謂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作媒介，與國民黨進行和談。

直到蔣的勢力已佔領中共的首府與根據地延安，即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中共才醒悟到妥協的無望，才號召軍事抵抗。但中共這時仍不敢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也沒有提出以土地改革來動員農民群眾的綱領。

最後，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蔣發出捉拿毛澤東的逮捕令，和在七月四日宣佈「戡亂方案」，看來是在等候莫斯科指

示而經過了數個月的躊躇，中共在十月十日才以「人民解放軍」的名義號召推翻蔣介石，建立「新中國」②③。

問：有些人說中共是從機會主義的立場轉變到違抗克里姆林宮的立場去推翻蔣政權，你同意嗎？

答：中共與克里姆林宮是行動一致的，他們是受到戰後美帝國主義，特別是馬歇爾計劃的壓力而轉變路線的。在西歐，共產黨員被驅出資產階級政府，斯大林認為必須以土地改革，將資產階級財產國有化，和建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以鞏固東歐的政府。我認為，斯大林是以同樣的理由，在理解到與蔣介石妥協已無望後，才決定推翻他的。

問：經過多年的機會主義政策後，中共如何能夠打敗蔣的軍隊？

答：這是由於日本侵略中國，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造成的特殊條件，使中共獲得勝利的。在抗日時期，蔣政權的腐朽，如非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實在是無能力抵抗日軍的；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美軍的厭戰，使美帝不能繼續以軍事援助蔣。

日本在佔據東北時留下的新式武器，在戰爭結束時由蘇軍接收並轉送中共軍隊，主要是轉送給林彪所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

倘若沒有這些特殊的歷史條件的配合，毛便不可能戰勝蔣。如果蔣當時是控制了東北這片中國最工業化的土地，他便可能切斷蘇聯對中共的經援與軍援；同樣地，如果美軍繼續留駐，則中共勝利的可能性也較微；只要我們回憶一下一九三〇年至三四年間，江西省農民軍隊慘敗，就能明白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對蔣的意義有多大的了。

問：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有沒有放棄了機會主義而成爲一

個革命馬克思主義黨？

答：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的政策曾經三番四次的更改，往往由機會主義，一下子跳到了冒險主義，隨後又回到機會主義，但始終沒有把中共改變為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說政府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各代表組成。但政府官員的產生沒有經過選舉，而是由包括共產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和一些其他組織所組成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指派的。

政府的政策是基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他們並沒有提出沒收資產階級（甚至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反過來還保護它們。在「新民主主義」的名義底下，爲了與地主及富農取得妥協，政府不惜把農民所急切需要的土地改革延遲下來。毛希望新民主主義時期能維持幾個年代，如周恩來所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會在二十年內完成。

然而，隨着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客觀局勢很快地改變了。美帝國主義在支持南朝鮮的藉口下，向北朝鮮進攻，直接威脅着中國。這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援助北朝鮮，第一步就是沒收了帝國主義在華的資產。

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們也趁着美國的進攻，乘機大舉進行反革命活動。毛澤東爲了使政府取得農民的支持，才實行了土地改革，並發動五反運動，打擊資產階級。

一九五二年的土地改革並沒有把土地收歸國有。土地買賣還是通過市場公開進行。這造成了農民的進一步分化——貧農被迫把土地賣給富農以維持生活，而富農更對貧農實行高利貸。而某些高利貸者竟還是共產黨員呢。

這種情形當時十分嚴重，遂迫使中共在一九五五年再次進行土地改革—農業集體化。在怎樣落實的問題上，毛與當時中共的其他領袖發生了意見分歧，毛的計劃是要在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完成集體化，而劉少奇和當時的農業部長鄧子恢爲首的另一方則提議一個比較慎重的政策，要在一九六七年才完成。

但毛澤東却越過政治局其他成員的頭，召開了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決定在一九五七年完成集體化。毛的專橫手段根本違反了恩格斯和列寧所主張的關於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反之，毛澤東的政策是直接從二十年代後期斯大林那裏學過來的，並在以後引起群眾大大的不滿。

一九五三年初，美帝國主義封鎖中國。中共於是提出了它的「過渡時期總路綫」，它包括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工業化。

一九五五年和五六年，面對着資本家對經濟計劃的抵制，新民主主義最後被「公私合營」的政策所取代，朝向逐步消滅資產階級財產和開始社會主義建設。

中共的政策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後至一九五五年這一段時期的發展，很相似於斯大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紅軍佔領下的東歐之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毛追隨斯大林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和平共存的路綫。周恩來和印度尼赫魯所同意的「五項原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個時候，毛的政府把蘇聯的斯大林政府作爲模範和導師。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澤東宣佈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爲「一面倒」，即倒向蘇聯。在這個政策宣佈後，毛在一九五〇年訪問莫斯科，和斯大林直接進行會談。會談的結果就是一連串中蘇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協議。

所有這些協議，都是對蘇聯比對中國更爲有利，因此毛在後

來不禁埋怨說：「我們和蘇聯的關係就像父與子的關係一樣。」

②4

在聯共第十九次大會之後，毛命令中共的黨員和幹部學習斯大林主義思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時，毛曾說道：「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朽文獻。他所著的《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及他最後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總合。」②5

在中國，當時所有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所有學校的教師和學生、所有群眾組織的幹部和所有的政府官員，全部都被迫學習斯大林主義。這個持續了幾個月的運動，事實上是要把中國斯大林主義化。

問：赫魯曉夫在演說中揭露了斯大林不少罪行，這對中國造成怎樣的影響？

答：諷刺的是，正當蘇共由於群眾的壓力，被迫要打擊對斯大林崇拜的時候，中共却在忙於推動建立斯大林威望的運動。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上公開抨擊斯大林搞的個人崇拜，並揭露了斯大林很多的錯誤和罪行。

這次揭露對全世界各共產黨特別是中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共的反應表現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第八次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一項決議案，在舊黨章中刪除了「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些話。

鄧小平在其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

「蘇共二十次大會對進行集體領導及揚棄個人崇拜的深刻意義，已有明確闡明，這一啓發性的教訓，不但蘇共而且全世界所

有國家的共產黨都受到重大的影响。在重大問題上由個人作出決定，顯然是違反服膺共產主義的政黨的建黨原則的，而且勢必造成錯誤。只有集體領導，與群眾密切結合，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能把發生錯誤的可能性減至最小。」^{②6}

這個報告代表了中共大多數領導人的意見。毛不敢反對黨章的修改，他甚至在大會宣稱：

「在不久以前召開的二十次大會上，蘇共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政策，批判了黨內的缺點。在這一成果之上，我們堅信將有很大的發展……我們的經驗很不足夠。所以我們必須好好地學習。我們必須好好地向我們的先行者——蘇聯——學習。……」^{②7}（重點是我加的）

毛澤東雖然作出以上聲明，但他已受到一次嚴重打擊。在第八次大會以後，他便計劃攻擊赫魯曉夫和消滅劉鄧派。

一九五六年秋天，匈牙利革命爆發了。它是蘇聯集團內第一次發生的政治革命。雖然群眾被蘇聯坦克無情地鎮壓下去。但匈牙利事件却對整個世界發生沖擊，並獲得世界各地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國，毛被迫宣佈：「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我國有些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去反對人民政府。」^{②8}

問：毛澤東怎樣防止中國爆發匈牙利式的革命？

答：毛希望通過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來緩和不滿的情緒，這個運動要求所有黨派和個人發表意見，批評三害——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毛希望藉著對人民作出少許讓步，給予他們表達意見的自由，來把不滿和對個人崇拜的反感平息下去。

在鳴放運動中（一九五七年四月至六月），對黨和政權的批評從

人民的各層份中如潮水般湧至，特別是來自學生和革命知識分子，包括中共自己的黨員和青年團的團員。他們批評政府的專橫和中共官僚的特權。劉少奇承認，「現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出現了……中國每一角落正在提出許多批評，包括工廠、農村、學校和其他組織。批評的矛頭指向領導。」^{②9}

群眾的意見主要以學生運動領袖青年團成員林希翎及身為黨員的新華社記者戴煌為代表。前者指出：「中國現存上層建築不符合公有財產制，因為黨和國家機關已變成沒有民主的統治人民的官僚機關。」因此，她宣稱：「必須實行徹底變革而非改良。」後者則提議建立一個新黨，「實行民主、自由，並消滅特權階級」^{③0}（重點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在漢口附近的漢陽，超過三千名學生舉行示威，搗毀公安局，佔據黨和市政府的辦公廳。這次造反是一次小規模的匈牙利革命。

毛立即作出反應，對在前些時候他邀請幫助改良黨及政府的人士展開反攻，這些人現在統統被指為「右派和反革命」，受到嚴厲的處分。超過五萬人被開除出黨和青年團。學校、工作單位和公共機關大量開除人們。不少人被捕入獄或解往勞改。

問：看情形毛不僅不能重建他的個人崇拜，事情還被他愈弄愈糟哩。

答：群眾把鳴放運動看作一個殘酷的圈套，是用來找出並消滅異己分子的。毛一時間對鳴放運動的結果頗感失望，但很快就提出另一個計劃——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中共中委會會議中，提出大躍進，希望在農業和工業上出現奇蹟。整個計劃的要旨就是所謂「土高爐大煉鋼」。

這次努力持續了大約一年，動員了一億人民。學生、教授、工人、農民，甚至家庭主婦，也在他們的後園煉起鋼來。在這種方式下提煉而成的鋼有三百萬噸以上，但卻沒有一磅是可供使用的！這次對勞動力和物資的巨大浪費，證明毛對科技知識全然無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初，毛在河南省視察完當地一個實驗中的人民公社之後，親自命令全國農民必須立即加入公社，中共政治局被迫下令所有私有土地公社化，包括自留地、儲糧、牲畜和果樹。目的是要「消滅私有制的一切殘餘」。

所有農民要在公共食堂吃飯，兒童要送往公共托兒所，這些措施使婦女能在田中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在短短的三個月內，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民被迫加入了公社。

這種強迫集體化的方法，完全違反了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③所訂定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

大多數農民用破壞行動來反對人民公社，例如屠宰牲口，砍斷果樹或破壞農作物，因而造成了糧食嚴重缺乏。到一九五九年夏天，情況趨於危急，同時，大煉鋼計劃的失敗也愈明顯了。全國怨聲載道，很多幹部和高層領袖，都提出反對人民公社，這些領袖包括黨副主席劉少奇，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國防部長彭德懷，參謀總長黃克誠以及中委會其他一些成員。

彭德懷公開批評人民公社的政策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他給毛澤東一封信，力陳大躍進過於急進，因而破壞了經濟建設一些合理比例，浪費了二十億人民幣（約相等於十二億美元），彭指出「人民公社成立得過早了，使得農業生產倒退」。

彭要求重新改組人民公社的意見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特別是

在軍隊中。毛於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召開了中委會會議。經過一場激烈辯論後，這次有名的廬山會議採納了一個主張整頓人民公社的決議案。決議案宣佈生產隊的所有權是基本的，這也就是回復到大躍進前的生產方式。

但毛澤東藉口改組政府，因此彭德懷被免去了國防部長的職位而由林彪取代，黃克誠也被免職，其他一些中委會成員也從政治舞台消失了。

爲了掩飾自己的錯誤，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位，把它讓給劉少奇。一九五九年四月，劉少奇正式被委任。於是挽救嚴重的經濟情況和平息人民不滿的責任便落在他肩上。

問：劉能否以他的新職位實行一些改良？

答：劉和鄧小平（當時黨的總書記），彭真（當時的北京市長）等展開了一個整頓運動，包括停止大煉鋼，恢復自留地和自養畜，在農村建立自由市場並取消大部份的公共食堂和公共托兒所等。大部份的人民，特別是農民，熱烈地歡迎這些改革。生產是增加了，蔬菜和肉食的嚴重缺乏也緩和了。一九六〇年至六一年由人民公社所引起的飢荒，到了一九六三年初基本上消除了，農業總產量已差不多回復到人民公社前的水平。

在文教領域中，劉容許了部份言論自由和工作上的獨立性。這立即爲報紙和雜誌帶來了不少作品，以及一些新的戲劇創作。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明顯地是指清算彭德懷。這劇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北京日報上刊登，並在北京公開演出。無論政治內容和藝術技巧，都獲得人民大眾和文藝批評家的好評。

鄧拓（北京市委書記）、吳晗和廖沫沙（統戰工作在北京的

負責人)，在北京的報刊上發表了很多文章，集合印成兩部小冊子——《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用成語典故、寓言諷喻等批評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在大連召開的會議上，中國各地的作家表示他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毛的文藝政策不滿。有的說：「農民的生活愈來愈壞。」文化部副部長周揚說：「人民公社是唯心主義的表現，大躍進代表了主觀的空想主義。」從這些批評可見到文藝界的深刻不滿。

教育改革始於「高等教育改革六十條」，是中央教育部擬出的。這些改革旨在鼓勵學生研究有興趣的科目，並給予他們必需的時間去學習，這是他們在大躍進時期所沒有的。

劉少奇的改革，贏得了人民，尤其是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尊敬和擁護。這情勢對毛澤東非常不利。

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廿二日中委會會議上，劉少奇說：「暫時的經濟困難是由於工作中的錯誤造成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攻擊彭德懷）過火了，反右傾本身就是錯誤的，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翻案。黨內缺乏民主，黨的生活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③②}

這講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刊登於「首都紅衛兵」上，本是用來批判劉少奇的，但反而替他向人民宣佈了他的意見，表示劉少奇主張改革黨的生活、並替彭德懷等人翻案的一個嘗試。

與此同時，毛正準備重搞個人崇拜和向反對者報復。首先，他利用新委任為國防部長的林彪，在軍隊中宣揚毛澤東思想與建立個人崇拜。在六〇年代初期，林彪向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強調在政治思想上個人所起的作用。當決議通過時，林彪宣佈：「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

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中委會一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同一會議發表了一份公報，說：「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還存在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綫的鬥爭。這鬥爭不可避免地反映在黨內……我們要及時警覺到。要堅持反對各種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委會第八次會議，意義就在於對右派的重大勝利，即打垮修正主義者的攻擊。」

這些文字，就是在警告劉少奇及其反對派，假如他們繼續他們的「修正主義」傾向，就會像彭德懷一樣被打垮。從那時開始，「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帽子，就常被用來扣在任何黨內反對毛的人頭上。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舉行的全國文聯會議上，毛澤東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果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③

這是毛澤東向文藝界中受劉少奇影響的人們提出警告。至于提及匈牙利革命者的說話，則是「文化大革命」正要來臨的徵兆。

問：爲什麼毛要發起文化大革命？

答：一九六五年十月印尼的悲劇事件促成了文革在中國的爆發。印尼共產黨原是資本主義世界裏規模最大的共黨，擁有三百萬黨員和一千萬同情者。自一九六〇年初中蘇論戰開始，毛已經致力於拉攏印尼共黨了。

毛多次邀請印共領袖艾地（D. N. AIDIT）到北京會談

，建議印共按照中共和國民黨在第二次革命時的合作模式，和蘇加諾政府合作。印共接受了這條機會主義路線，因而引致一九六五年十月印尼政變，二十五萬到五十萬的共產黨員和戰士被殘殺，艾地亦被殺害。

這次悲劇震驚了全世界，使中共和毛的信譽大受打擊。中共內部很多領導人對毛的政策不滿，毛迫於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到十月召開中共內部的特別會議；會議上，一些領導人將印尼共的失敗歸咎于中共的影響。彭真甚至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若是犯了錯誤，也該受批評。」

經過這次挫折後，毛離開北京，到上海重整他的勢力，他的手下包括上海文化部負責人張春橋，文匯報編輯姚文元，後者在毛的指示下，在文匯報上寫了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可算是打響文革的第一炮。

在林彪的指示下，《解放軍報》更進一步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運動，推行一些宣傳口號，如「學習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毛澤東思想是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明燈」。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該報的社論說：「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理……我們要堅決支持和執行一切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物，堅決抵抗和反對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這是針對劉少奇和中央委員會的權力而發的。

在北京和上海，仍有一些作家維護吳晗，直至林彪利用解放軍報全力展開打擊「反黨」傾向的運動，甚至提出以行動消滅異己者；軍人幹部也動員起來。

在吳晗及其支持者停止了寫作後，毛仍然繼續指責他們是「反社會主義」「反黨」「反革命」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活動份子，使吳晗完全被貶黜。

四月，姚文元再寫了一篇譴責《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文章；不久，鄧拓和其他作者被逐出黨。

四月底，林彪派軍進佔北京市委會，毛隨即從南部返回北京，正式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並成立了由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副組長的「文革小組」。原來的北京市長彭真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被解除職務；黨宣傳部的領導人陸定一、副文化部長周揚及其他文化機關的高級幹部也被撤職，羅瑞卿被捕。六月中旬，所有學校（包括大、中、小學）在文革的名義下關閉了。差不多所有中學、大學的校長和負責人，以及很多教師、教授，都受到文革小組所指使的學生攻擊。

劉少奇和鄧小平爲了扭轉局勢，準備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但毛拒絕出席會議，因他要清除劉和鄧的計劃還未完成！

毛抵北京後，就命令林彪的軍隊包圍全市。然後在八月上旬，毛召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要點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重組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劉少奇的黨（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亦由林彪取代了。

會議同時號召全國學生組織紅衛兵，首先的行動是「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而「立四新」。在八月底一次群眾集會上，林彪指示紅衛兵「要孤立和清算黨內的走資派」。攻擊地方領導的示威和大字報越來越激烈了。

一些地方領導亦組織自己的紅衛兵，以對抗毛的勢力，結果引起全國幾個地區發生激烈的武鬥。

九月十五日，林彪代表毛澤東在一次紅衛兵的大集會上，向他們承諾，軍隊會支持他們採取行動，攻擊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領導人。這次演講解除了紅衛兵的束縛，一場激烈的大字報運

動在北京展開了，他們點名批判地方的高層領導，如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和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國家官員也同樣受到批判；最後，鬥爭升級到指向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總書記鄧小平。

十月底，在一次長達十七天的特別會議中，劉少奇和鄧小平被迫作了自我批評。會後，彭真和陸定一也被拘捕了。

問：這是否表示毛已經粉碎了他的反對者？

答：毛以為是這樣。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的紅衛兵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勝利慶典，而紅旗等報刊則宣佈文化大革命勝利了。事變的往後發展證明反對勢力還遠未被粉碎。

一九六六年秋天，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勢力龐大的紅衛兵組織，準備向上海的黨政機關發動進攻。當時由曹荻秋和陳丕顯掌握的上海黨政機關便對工人們作了一些讓步，企圖拉攏工人。一九六七年一月第一個星期，日益嚴重的衝突終於導致總罷工的爆發。毛認為這是一次反對紅衛兵和文化大革命的罷工，便命令黨中央指示上海「左派」（即張春橋等所組成的）紅衛兵進行奪權。

林彪所控制的軍隊也同時對罷工實行鎮壓。接着，毛便清算了上海整個黨政機關、工廠、工會和文教組織的領導幹部。工人們在前一時期所爭取得來的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等成果也被取消了，而全市的經濟則陷於癱瘓。

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建議在上海成立一個由軍人、紅衛兵和一些原上海行政人員以三結合方式組成的革命委員會。這就是取代舊政府組織的第一個「革命委員會」。

上海的黨和政府機關，都緊握在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最近被指為四人幫的其中三個）的手裏，直到去年秋天被華國鋒

清算以前，上海一直是毛派的根據地。

那時候，南京紅衛兵的敵對派系發生了激烈的武鬥。大約五十人死亡和超過一百人受傷。毛澤東當時不能利用軍隊支持自己的紅衛兵，因為敵對的派系有著整個南京市委和軍區司令許世友作撐腰。周恩來再次介入，達成妥協。

在河南，一個自稱為「二、七公社」的紅衛兵組織企圖學上海的例子，宣佈奪權。但地方當權派在軍隊的支撐下以南京為例，實行反抗。這次權力鬥爭由一九六七年二月持續到六月，傷亡很大。結果「二、七公社」奪權失敗，一些軍官也被清算，但權力仍掌握在原來的當權派手裏。

最富戲劇性的是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的紅衛兵，在北京文革小組的支持下，企圖奪權。當地的當權派便組織了一個號稱為「百萬雄師」的對抗勢力，他們得到地方軍區司令陳再道的支持。

毛派的紅衛兵便要求北京援助，中央文革小組派了公安部長謝富治和宣傳部長王力到武漢。他們在七月十四日抵達武漢時，指責軍隊支持「保守派」，立即便被軍隊逮捕。在軍艦的支援下，林彪對武漢發出最後通牒，提出立即放人，否則進行軍事介入。武漢當局被迫投降，跟着很多黨政機關的領導人被革職，包括陳再道在內。「百萬雄師」也被解散。

毛似乎又一次勝利，但事實上局勢還未穩定。

問：到底紅衛兵們有沒有聯合起來對抗政府，還是只顧自己進行武鬥？

答：「武漢兵變」之後，在江青和陳伯達的指示之下，穆欣和王力在紅旗發表文章，號召紅衛兵「揪軍內一小撮」，並進行搶槍。這迫使軍方進行反擊，他們和地方機關結合，組織自己派

系的紅衛兵。

在給第四國際一九六九年世界大會的報告中，陳碧蘭敘述了這些事件：

「自從一九六七年一月毛組織紅衛兵進行奪權以來，中國到處都發生敵對派系之間的大規模和殘酷武鬥。就是這些衝突，標誌了文革的新階段。武鬥的最高峰是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七月間，主要是在廣東、廣西、雲南、西藏、新疆和福建。事實上，這些衝突可說是局部的內戰。

「例如在廣西，紅衛兵分爲兩派。一方自稱爲『四二二革命造反大軍』，骨幹包括學生、一些工人和一些軍隊單位，受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另一方面則自稱爲『廣西地區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骨幹主要是工、農、軍隊、黨委和學生。後者是由廣西第一書記韋國清和一些高層軍區司令在幕後組織和控制。

「兩派之間的衝突五月間在梧州最爲激烈。雙方都使用到最新型的武器——先進的步槍、機關槍、重型的大炮、坦克——結果兩方面都有數千人傷亡。根據四二二革命造反大軍出版的『西江怒潮』的報導，他們方面有幾千人傷亡，超過三千人被俘，其中三百一十七人被處決。此外，超過二千家房屋被毀。同樣的武鬥在廣西其他城市，如南寧、柳州和桂林，和在前面提過的省份發生；例如在雲南，昆明部隊司令譚輔仁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給毛的私人報告中，指出單在雲南便有三萬人被殺。毛回答說他估計有八萬之衆。毛說：「當地的報紙說有十六萬人被殺。這大概誇大了。我估計最少有八萬人被殺。」(《人民日報》)

「由於上述的嚴重情況，毛被迫作出一些穩定自己地位的決策。他首先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發表了一項緊急命令，然後在同月二十四日再發表緊急呼籲，號召各派紅衛兵和工人組織停止

武鬥。同時，北京的軍隊被遣往廣西、雲南、福建和新疆等地，制止武鬥。只有這樣，毛才能遏止地方的內戰局勢進一步惡化。毛同時要求在剩下的五個省份——廣西、雲南、西藏、福建和新疆以及在主要城市成立革命委員會。」³⁴

應注意的，就是組成革委會的「三結合」，主要是由軍隊控制，因為革委會的主席多是由當地的軍區司令兼任。

紅衛兵被強制返回學校或工作崗位。很多被遣上山下鄉。據官方數字，有一千萬青年在這情況下被下放。

問：當時紅衛兵事實上是毛的有力工具。

答：對。但是，事情進展卻不如毛所料。例如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當上海奪權成功並清算了整個領導層之後，一些中共老幹部——如農林部長譚震林、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葉劍英、科技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和計劃委員會的李富春——所有這些政治局成員，公開地批評文革小組煽動批鬥。毛派把這些具有影響力的批評稱之為「二月逆流」。

由於周恩來介入，才使毛澤東和其他老幹部結束了僵持狀態，雙方達成妥協。雖然農林部長譚震林被免職，但老幹部已獲得一次小勝利。

另一事件是關於由戚本禹、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五·一六兵團」。這些紅衛兵企圖發起運動，反對一些中央首長，代之以毛澤東的支持者。周恩來強硬對抗這一陰謀，並直接與江青、陳伯達發生衝突。毛被迫退讓，撤去王力、戚本禹及其他一手提拔的人的中央文革小組組員職。

一九六七年夏天，湖南的一個勢力龐大的紅衛兵組織「省無聯」，攻擊當地政府並向軍隊搶槍。他們甚至佔領了一些工廠和金融機關。在江青和陳伯達的支持下，他們起草了一份聲明——

《中國往何處去？》，指責「革命委員會」為官僚架構，周恩來為「新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要求在中國建立真正的「人民公社」，作為國家的唯一革命代表機關。

雖然他們思想上混亂和模糊，這些紅衛兵也反映了群眾的革命傾向。因此，江青和陳伯達便放棄了他們。毛派遣了政治局常委會一個代表康生去解散省無聯，指他們為反革命，並由湖南當局（包括華國鋒）向他們實行鎮壓。

一九六八年八月，發生了第四件超越毛的控制的事件。在廣州，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紅衛兵和由廣東當權派軍區司令黃永勝撐腰的紅衛兵發生武鬥。由於黃永勝是林彪的人，所以未受中央文革小組的直接攻擊。事實上，他更被升為總參謀長。

問：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動員，能否稱得上是一次反對官僚的革命運動呢？

答：這個問題在過去十年內一直引起激進份子甚至托派內的爭論。答案在於紅衛兵如何組織和他們怎樣去對抗官僚。以下的文章摘錄（由佐治·勞域和約瑟·韓生所寫）提供了一些資料：

「數以百萬計的青年由於學校關閉而擺脫了拘束。他們並獲得就算在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也令人嚮往的優待，那就是利用政府的支助往北京串連（事實上，是到中國任何地方串連）。這些新組織的成員，大都獲得免費的交通、住所和食物。

「這個政策就是把這些青年連結在其中一個派別內，引誘他們接受這個派別的政綱，而不告訴他們這個派別的企圖，也沒有給予敵對派別在公平辯論之下表白自己意見的機會。事實上，一開始對方就被打為不忠甚至反革命的及牛鬼蛇神之類……。

「被清算的幹部們，真正的『罪行』並非搞資本主義復辟，而只不過是他們的意見和毛、林一派有分歧而已。他們的意見在

群眾面前被歪曲，他們在政治上（即使不是肉體上）被毀滅。

「毛澤東和他那伙人從斯大林那裏學得來的這些辯論術，首先是用來對付托派，跟着是對付赫魯曉夫派及其同黨，現在則是用來對付自己的老戰友。除了一些使用方法不同外，這些花樣很少有甚麼創新。」（見《中國「文化大革命」之背後》，47-48，52頁，彭述之、皮艾爾·法蘭克、約瑟·韓生和佐治·勞域等著）

我只打算補充：毛組織紅衛兵是用來消滅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一派。當這一派被打垮後，毛便立即在林彪軍隊幫助下解散紅衛兵。而林彪本人跟着就成了毛的下一個目標。

問：那麼文化大革命的總後果是什麼呢？

答：就好像經歷了一場極大破壞性的戰爭之後，中國社會陷入極度的混亂。中共和它的青年團被瓦解了。毛澤東的指示和語錄取代了黨章和國家憲法。中央政府雖然還保持着外貌，但政府各部門都已改組。新組成的革命委員會使軍隊控制了國家的權力（除了一些個別的城市如北京及上海之外）。

差不多所有在中國第三次革命當時和以前和毛並肩作戰的老幹部，都被出賣，受到紅衛兵的猛烈攻擊，大部份被清算，有些被勞改或監禁。

國家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生活都受到徹底的破壞。數以千計的教育家、藝術家和作家被清算出黨，被迫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甚至被監禁和暗殺。

數百萬的紅衛兵被遣上山下鄉。

經濟陷於癱瘓，生產力大大下降。那些曾參與文革，或是和被清算者有關的工人、農民、技術人員和幹部也被清算。

毛的外交政策變得極之宗派主義，表現在他拒絕和其他的工人國家成立保衛越南對付美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綫。另一方面，他

又容許北京的紅衛兵搗毀英國和蘇聯的大使館。

文化大革命之後，在世界的眼中，中國變得極度孤立。這種孤立加上愈來愈深刻的內部危機，就是中共第九次大會的背景。

問：九大有什麼發生？

答：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共黨第九次大會，有一千五百一十二名由地方革委會派出的，並非由黨員選出的代表參加。會議一開始就被從文革中露頭角的份子操縱着。會議上，林彪代表中委會作了一個政治報告，當時的中委會大部份委員已被清算。報告並無新意，既未指出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亦無任何重建國家經濟和人民信心的建議。有的只是一連串歌頌毛澤東的發動文革和軍隊的推進文革；全篇充滿空洞的口號：

「抓革命，促生產……

「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

「埋葬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

林在報告中提出，過去犯了錯誤的幹部只要承認錯誤，就可恢復原來的黨內或國家職務；此舉顯然是毛林企圖重組他們的派系，但卻沒有很多幹部響應號召。

毛、林從大會得到的「最大收穫」，就是在黨章上確定了在上一次大會被刪去的「毛澤東思想」的地位：

「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

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大會選出了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員會成員，其中約百分之三十為軍人；二十一名政治局成員中有九名是軍人。新政府中軍人佔了大多數，其中如國防部長、陸軍參謀長、空軍司令員、海軍政委，都是林彪的親信，林同時也操縱着領導革委會的軍人。

問：促成毛林衝突的導因是什麼？

答：九大後，毛對國家機器掌握在林彪手中，感到很大的威脅，於是提出新的口號：「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林彪對毛這種態度轉變的反應，便是組織自己的派系。

毛再次清洗他的新反對者，始於一九七〇年八月對陳伯達的清算。陳的文革小組長和政治局的常務委員的職務被革除了；在當時，陳伯達在公衆活動中消失的原因還未明朗，及後至第十次黨大會，周恩來才宣告陳是林彪反黨集團成員之一。

陳伯達被清算後，林彪被迫準備了他的反毛計劃；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寫着：

「他（毛澤東）濫用中國人民給予的信任和地位，……實際上他已成為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對毛這種猛烈指責，顯示林企圖策動政變，但計劃被他的女兒揭發了。中共後來宣稱林彪及其同伙本擬逃往蘇聯，但他們的座機在外蒙古被擊落，全無生還者。

毛利用各種手段除去了這麼多黨領袖之後，自己也處於完全

孤立的地位，他沒有可能公開解釋和林彪的衝突；因此，毛需要周恩來的幫助。

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次黨大會中，毛周聯盟意圖消除四周的疑惑。周以中委會名義做了報告，指林彪為「資產階級野心家」和「發動政變以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陰謀家」。林同時被譴責企圖使中共「變為修正主義的法西斯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合帝、修、反，反華反共反革命。」

「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幾十年」。

周的報告大部份是誹謗，但它底目的是要為林之背叛毛澤東樹立理由；一切與林彪有關的文句都從黨章中刪去。

一些老幹部，如鄧小平、譚震林和烏蘭夫等紛紛復出。一些軍隊負責人如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亦相繼恢復名譽。王洪文則被提升為黨副主席。

一九七三年秋至七四年底，發動了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林彪的餘黨在這次運動中被打擊清算，一些軍區司令員也被調離自己的勢力範圍：許世友由南京調往廣東，陳錫聯由東北調往北京，韓先楚則由福建調至蘭州。

毛以為這些改變大可再次保障他的個人獨裁，然而另一個新的、有力的人物卻對他構成阻礙——他就是周恩來。

問：周恩來有沒有他自己的派系？

答：自從消滅了劉少奇和林彪的派系之後，周成了所有不滿的領袖和幹部底中心。周的得勢可從一九七五年一月舉行的四屆人大看出來——會議一致通過了他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

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 提議。新選出的常委大部份是周的人，包括主席朱德——他是毛的眼中釘之一。

周再次被選為總理，鄧小平則成了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和總參謀長，葉劍英任國防部長。毛的派系只有張春橋獲得排名第三的副總理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位置。總的來說，周恩來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領袖，而毛則僅為掛名首腦而已。

會議之後，毛針對周派發動了一個新的運動。一九七五年三月的《紅旗雜誌》「編者按」指出：

「全國億萬人民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各級黨委一定要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習抓緊抓好，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政策，進一步搞好批林批孔運動，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毛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作為煙幕，以建立自己的個人專政，並說過去的清黨是保衛馬克思主義原則所必須的。毛又警告「各級黨委」如果他們不「掌握」毛的個人獨裁，奉行毛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政策」時，他們也會被嚴厲處分或清算。

毛派寫了一連串的文章，間接指責周是叛徒。他們把周比喻為水滸的宋江——後者成了叛徒。

除了公開的攻擊之外，毛派便加強對臥病中的周恩來進行肉體傷害，希望加速其死亡。他們把周的私人醫生調出北京，使他不能照顧周的健康。當周恩來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時候，王洪文更強迫周接聽毛澤東的電話。周的親密支持者——教育部長周榮鑫——在公開批判的壓力下被迫自殺。這只不過是對垂死的周恩來進行迫害的一些例子。

問：毛會否公開攻擊周恩來？

答：沒有，當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後，毛便集中力量對付周恩來的合法繼承人鄧小平，指他為「右傾翻案」及「走資派」。周的四個現代化也同時被攻擊。

毛在周逝世後的行動，導引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示威。示威者的暴力行動，包括燒毀公安部的宣傳車和廣場警衛的宿舍樓，是對以毛為首的中央政權的直接挑戰。第一次，毛澤東思想被公開指責為「閹割了的馬列主義」。當參與示威者聲明「我們不怕拋頭、灑血」時，正預示了革命運動要推翻官僚的統治。

匈牙利革命之後，毛曾指出有一些人「希望同類的事件會在中國發生」。一九七六年四月，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恰恰幹出了毛所恐懼的事——示威反對政府。

雖然毛殘酷地鎮壓了示威者，他們底大胆和堅決的精神會成為徘徊在中國的幽靈，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歡迎的「在歐洲徘徊」的「幽靈」一樣。事實上，毛在目睹這個幽靈之後，他便死去，走到那歷史特別為獨裁者和暴君而設的「地獄」去了。

問：毛澤東的死是否帶來其派別的死亡？

答：毛的個人獨裁很合適地完結：他的親密追隨者——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全部被毛一手提拔的承繼者華國鋒所親手清算。劇情的發展就像當年的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清算馬倫可夫和貝利亞一樣。

要正確地評論毛的政治生涯，必須指出他的基本思想——階級合作、階段革命論、一國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和平共存，是直接承受自斯大林的。毛的一生，都忠實地和有系統地宣傳斯大林的思想：由機會主義的國共合作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冒險主義的武裝鬥爭。毛跟着斯大林在二十至四十年

代清算整代老布爾雪維克和青年革命家的榜樣，在中國建立了他的個人崇拜和獨裁。

毛是全球最大的斯大林主義者。毛成了一個真正的中國斯大林，他的性格和方法差不多相同於他的俄國主角。毛對於任何懷疑他的政策或在群眾中享有威望的左右手（例如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和周恩來），他都要在政治上（如果不是在肉體上的話）消滅他們。

事實上，毛確是現代的秦始皇，中國的尼祿（羅馬最大的暴君）。托洛茨基在他寫的「斯大林」傳中的如下的文字，恰好可應用於毛：「尼祿也是他那時代的產物。但他死後，他的雕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所有的地方被刪除。歷史的報復比最大權力的總書記（或主席——後按）的報復更爲厲害。這點令人稍感快慰。」

問：爲什麼毛死後同樣得到資產階級政客和激進份子的讚揚？

答：資產階級政治家——如福特及聯合國秘書長華爾海——都稱讚毛澤東，因爲他爲了要和資本主義和平共存，已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他指責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並號召資本主義世界推翻十月革命的成果。無需說，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高興毛對社會主義的背叛，也不難稱他爲「偉大領袖」及「和平使者」。

有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誤解了毛的政治歷史，因而說他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他們稱他爲「官僚中派」，因爲他搖擺於革命和反革命的路綫之間，最後進行土地改革，更把資產階級的財產國有化。然而，斯大林在東歐也實施了同樣的措施，但斯大林依然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

托洛茨基主義者一直都認爲：斯大林雖然在東歐推翻了資

本主義的財產關係，但他仍然是反革命者，因為他在這些國家建立的極權官僚獨裁制，與社會主義的基礎是矛盾衝突的。這個獨裁阻礙了東歐和世界革命的發展。

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曾談到蘇聯佔領的波蘭會推翻私有財產的一段話，可以用來評論毛澤東的中國：我們的主要政治標準，不是改變此處或別處的財產關係（雖然這本身可能很重要），而是改變世界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提高他們保衛以前的戰果和贏取新成果的能力。從這個（而且是唯一的）決定性的立場，可以看到莫斯科的政策，整個來說，完全保留它的反動性質，而繼續成爲走向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重點是我加的）。

註 釋

- ① 賀是湖南省共產主義小組的創立人之一，李是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的創立人之一，在脫離共產黨之後，兩人仍繼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賀在故鄉邵陽協助建立農會，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後，他被捕入獄多年。李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並在擔任大學教授時，影響了許多學生，後來出任武漢大學校長。文革時被撤校長職，由於遭受毛派紅衛兵凌辱，不准他就醫，終在一九六六年去世。
- ② 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黨機關報响導上發表，見《毛澤東選集》（十卷集）第一卷八十七至八十八頁轉載。
- ③ 同上書八十九頁。
- ④ 同上書一七一、一七三頁，所載的「主力」和「可以把他當做」，却在中共後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八至九頁中，被改成「領導力量」和「可能是」。

- ⑤ 見胡喬木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九頁。
- ⑥ 見本杰明·施瓦茨著《中國共產主義及毛澤東的崛起》（紐約：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第七十三至七十八頁。
- ⑦ 見國際通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版第一六七〇頁，一六七二頁。
- ⑧ 見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紐約花都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第一七一頁。
- ⑨ 見《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 ⑩ 出處同上。
- ⑪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黨史稿》第三編一一四頁。
- ⑫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三八、二三九頁。
- ⑬ 這是一九三九年的一本小冊子，但毛後來不再讓它公開發行，由於其內容使他感到麻煩。
- ⑭ 毛著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三八，六三九頁。
- ⑮ 同上書六四四頁。
- ⑯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三七頁。
- ⑰ 同上書第二卷六一八頁。
- ⑱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七六一頁。
- ⑲ 見彭述之陳碧蘭著《中國革命》（紐約：社會主義工人黨，一九七二年版）第三部份第五十三頁。
- ⑳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第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我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毛澤東選集的附錄出版（紐約：國際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卷第一七一頁至二一八頁（引文見二一七至二一八頁）。這個決議在後來出版的英文版毛著中刪去。

了。

- ⑳ 引自新憲法總論，見布蘭特等著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四一九頁。
- ㉑ 見「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第六十六頁。
- ㉒ 見彭述之《中國革命》「關於中國局勢報告」第一部份第二十一頁。
- ㉓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 ㉔ 《最偉大的友誼》，見SCHRAM著之《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 第二九五頁。
- ㉕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大會》，北京外文社（一九五六）第一卷第一九二頁。
- ㉖ 《人民的中國》一九五六年十月，第六頁。
- ㉗ 毛澤東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北京外文社（一九六〇）第十三頁，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 ㉘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載，歡迎錫蘭新社會平等黨代表的招待會演辭。
- ㉙ 光明日報。
- ㉚ 見《中國革命》第二部，第三頁，「對擁護公社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
- ㉛ 見《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一卷第二五六頁——譯者註。
- ㉜ 指「裴多菲集團」，一群促使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反官僚革命的知識分子。此名是紀念匈牙利詩人裴多菲，他的詩歌振奮匈牙利資產階級革命的戰士。裴多菲於一九四九年革命中犧牲了。
- ㉝ 《內部資料文集》第八期，一九六九年五月（紐約：社會主義工人黨出版）第九頁。

中國今日的異議運動 *

(一九八〇年六月)

問： 一九七八年底以來，歐洲和美國新聞界報導了中國各大城市許多年青知識份子和工人的活動；他們貼大字報和出版刊物，要求民主，攻擊中國的官僚領導層。運動一直蓬勃發展，直至北京反官僚民刊《探索》主編魏京生被審為止。魏京生在七九年四月被捕，同年十月被判十五年監禁。

此後，異議運動似乎沉寂了下來。究竟今日中國異議者的處境怎樣？這個運動的政治方向如何？它為何被鎮壓下去？

答： 我們有必要回顧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清算以來中國的發展，因為它替異議運動舖好基礎。

以華國鋒為首的新領導層，為了爭奪中共黨的控制權，於是譴責「四人幫」及其「反革命」罪行。華的支持者包括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和紀登奎。

可是，華的權威受到一批有力的地方舊領導人的挑戰，他們支持鄧小平的平反。

華、鄧兩派的鬥爭，持續了幾個月。鄧的支持者有許世友、韋國清及其他政治局、軍事委員會的舊成員。他們要求鄧返回舊日的黨、政、軍領導職位，而利用日益上升的異議運動來推進他們的目標，鼓勵用民主牆攻擊華派領導成員。

在這個壓力下，華派被迫讓步。在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

*

本文是彭述之一九八〇年六月接受《洲際通訊》記者的訪問記。譯自該週刊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五日的一期。

次代表大會上，鄧獲平反，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成員、黨的第三副主席、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恢復他失去的每一職位。這次代大標誌了鄧正式重掌權力。

華仍佔據最重要的職位：中共黨主席、總理、軍委會主席、秘密警察首長——比毛澤東的官職還多！

華派成員仍能保持中國政治中心的關鍵性權位，包括北京市長、北京軍區司令和八三四一部隊（可恨的秘密警察）的指揮權。中委會的鬥爭持續了一年以上。

鄧繼續在地方培植勢力。他派人到四川、安徽、廣西和廣東任地方領袖，鄧以政治局成員的身份佈置這些行動。

同時，他幫助許多其他在文革中被毛清算的領導人和幹部平反，其中包括前政治局重要成員如陳雲、彭真。鄧派令這些人重新掌權，反過來更急劇加強鄧派的勢力。

由於華國鋒、尤其是汪東興自命是毛澤東的真正繼承人，因此他們盡量阻撓任何打擊毛威望的行動。他們堅持毛的一切指示必須遵從，毛的一切決定必須執行。

鄧小平也不能帶頭對已故「偉大舵手」進行徹底攻擊。多年以前，鄧曾先與劉少奇、後與周恩來聯手，企圖在黨內清洗毛澤東主義最壞的弊端。一九五六年，即斯大林死後三年，赫魯曉夫向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終止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在蘇聯「非斯大林化」的影響下，同年召開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多數贊成劉鄧的建議，貶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刪去「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唯一指針的條文。

鄧小平為了贏取群眾的支持，在七八年繼續進行這類措施；可是，這些不過是官僚改良的措施，不是公開的革命改變；它們不能唯物地解釋以毛為首的特權官僚層架構內，毛

犯的「錯誤」的原因。

但是，在文革時被毛清算的多名領袖被平反，本身含有批毛的意義。鄧小平害怕公開沖突，只能官式地繼續對毛的崇拜，不過盡量改善它最壞的方面。

鄧以間接的方法開始對毛進行批判，先是提出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口號，以實踐來檢驗毛澤東的主張，審查他的錯誤行爲。最先提出這個批判方法的，是七八年五月由黨控制的《光明日報》。

缺口由此打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許多報刊繼續發揮這個意見。報紙的公開討論，引起了全黨的討論。由汪東興控制的《紅旗》以不屑加入批評來表示不滿。

在勢力日增的鄧派和正興起的異議運動的壓力下，華國鋒緊緊依靠着汪東興及其他擁毛派的支持，因為他的威望完全來自毛。毛的「錯誤」被揭破，就日益削弱華本人的合法根據。

華國鋒的權力根基自此已受到限制。在七六年毛提拔華爲新總理代替周恩來時，華在中國政治上仍未知名。在毛安排下，華迅速由地方行政人員一躍而爲秘密警察頭子，繼而在毛下面任總理。

可是，大字報攻擊前政權錯誤的負責人，影響是如此深遠和透徹，致令鄧成功地除去華的三個主要支持者——汪東興、陳錫聯和吳德。他們保留黨籍和政治局位置，但失去了軍事指揮權，所保留的職位不過是空頭銜。

鄧小平清除了這些障礙後，得以在七八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衡量他的勢力，超過一千名地方幹部參加了是次會議。基於這次會議的建議的力量，北京市委會宣佈「平反」天

安門事件。十一月會議的所有決議，都在十二月三中全會上通過。三中全會正式承認文革時犯了嚴重的、甚至災難性的錯誤。

問： 這些宣佈對於異議運動有何影響？

答： 華派高層領導人——汪東興、吳德和陳錫聯，要正式負起殘酷鎮壓天安門示威者的責任（他們乃奉毛指示行事）。群眾已在大字報中表達了他們對政權鎮壓性行動的憎恨。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鼓勵了人們更多以大字報發洩憤怒。

鄧當然由此取得政治資本。他公開保衛天安門事件，說是革命運動的一部份，鼓勵人們更多地批評毛的繼承人。於是，以百計的大字報貼上去，異議運動蓬勃開展。

問： 這樣的張貼大字報是否首次在中國應用？

答：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字報已成為有力的武器，自此，張貼大字報的權利多次被重新肯定。毛澤東的紅衛兵用它來反對毛的敵對者，毛本人在六六年八月大會的會議廳裏也首先張貼大字報攻擊劉少奇。在七三年第十次代大上，憲法新加入一項條文，人民有公開張貼大字報的權利。

「四人幫」被清算後，鄧小平的支持者也是通過大字報要求給鄧平反。同一手法被用來清算華國鋒的得力助手。鄧小平取得權力後，卻又轉過來成為大字報攻擊的對象。每一次新的官僚層鬥爭，都是以大字報為攻擊敵對派系的手段。

問： 異議者是否最近才用公開聲明來攻擊官僚政權？

答： 在七四年，廣州一批異議者以「李一哲」名義撰寫了一

張長大字報，批評林彪，要求民主。由於林已下台，所以這是對毛澤東的含蓄的攻擊。

但「李一哲」不僅攻擊一個官僚；他們的攻擊對象是整個官僚制度。他們也因此被捕被囚，「四人幫」被清算後才獲釋。「李一哲」事件全球皆知，該大字報也譯成幾國文字發表。

問： 在這個時期以前，中國有沒有出現批判官僚層的刊物？當大字報在憲法中取得合法地位，而華鄧派系鬥爭時期建立了較自由的空氣的時候，異議刊物是否也取得合法化？

答： 大字報的合法化地位並不惠及刊物，因此後者要秘密出版。官僚層的內部分歧，令刊物在一個時期內受到容忍存在。自七八年十一月開始，數十份獨立刊物出版，單在北京就不只十份，其他在天津、青島、上海、武漢、貴陽都有。

在長沙有兩份民刊，在廣州有四份。這是自四九年革命以來異議刊物首次在全國各大城市出現。即使是五七年百花齊放時期也沒有這個現象。

在文革時，也有這這類刊物，但它們僅是支持毛澤東在派系鬥爭中打擊劉少奇。近期刊物的性質與前大大不同；它們打擊整個官僚層，而不是其中一個派系。

問： 刊物之間是否有正式連繫？它們是否表現共同的政治路線？

答： 表達這些年青激進工人和知青的思想的，首先是大字報，其後是民刊。作者的矛頭，都是直指官僚層的特權，要求民主權利：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這個共同的政治

治紅綫，貫穿各個刊物，但它們之間並沒有組織性連繫。

每個刊物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撰稿者。以人數計算，最大的組織是圍繞着《這一代》，這是一份十三間大學學生（包括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搞的，幾千大學學生協助該刊物的出版。可惜只出版了一期就給官僚層封禁了。

問：民刊除了針對中國無民主外，還有沒有針對其他問題？

答：所有民刊都猛烈批評官僚層，要求人民有民主權利；但它們也登載不少討論不同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文章。我現在集中談論三篇文章，由此可得知民刊討論題材的廣泛性。

鄧小平取得權力後，就攻擊他原來在打擊華派時會提倡的異議運動。他認識到運動有本身的生命力，對於整個官僚層來說是危險的。所以，他就撕下改良主義的面具，採取強硬路綫來反對異議者。

在七九年三月一次領導幹部會議上，鄧公開維護毛澤東，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說毛的缺點和錯誤並不重要，又批評年青人對毛批評過火了。

《探索》駁斥了這個批評。在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中，魏京生說今日中國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向民主前進，或是繼續毛澤東式獨裁。如果要走民主道路，毛澤東所犯的罪惡行爲必須加以檢討。魏說，鄧小平不會走這一步。

魏京生呼籲人民提防鄧小平的統治會演變成獨裁。魏說，鄧平反後初期，曾尊重人民，人民也歡迎他，期望他履行諾言。魏指出，天安門事件證明人民願意流血支持鄧。今日，鄧撕下了他的民主假面具，與人民的利益對立，已不再值

得人民信任或支持了。這就是魏京生表達的意見，爲此「罪行」，他被判十五年監禁。

在題爲《爲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刊於《人民之聲》七九年七月號）一文中，王希哲說，中國政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黨專政，它更發展爲自稱神的一個領袖的專政，這就容許了林彪和「四人幫」將對毛的個人崇拜發展爲新的宗教。王希哲誓言與新的迷信鬥爭。他認爲新的迷信必須由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取代，其基礎是民主選舉和撤換領導人的權力，即巴黎公社式的專政。

在另一篇題爲《時局和我們的認識》（刊於《四五論壇》七九年十一月號）的文章中，編輯部提出了官僚層起源的問題：

「直接或間接地掌握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管理人員，他們中間發生着官僚主義傾向。他們中間的官僚主義者正在組織成爲階層……」

「官僚主義是目前社會所患的嚴重病症，它是一種社會力量，只能以社會的力量才能對它進行有力的鬥爭。」

「一九五六年十月，波蘭和匈牙利先後出現了反對官僚專制統治的群眾運動。在匈牙利，事情升級爲起義，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寫下了特殊的一頁」。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成爲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具有對抗性的一次預演……我們還在準備革命……人民需要再認識，才能再實踐。」

這是在中國首次將匈牙利革命的性質給予正確的歷史評價。該文作者認識到，只有群眾革命才能摧毀官僚層。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發展。他們的分析非常接近托洛茨基主

義者的分析，雖然他們似乎從未讀到任何托派書籍。

問： 這些文章的作者是否政治舞台上的新人？

答： 關於這些作者的資料並不多，但已有足夠資料顯示其中一些已多年與官僚層對抗。舉例來說，王希哲是「李一哲」作者之一。他們都會被捕和拘禁。

王在獄中時，研讀了許多馬、恩、列著作，今日被視為異議運動的一個理論家。他是中共黨員，因此他的評論較謹慎和保留。最近，他在中山大學發言批評新官僚層份子，自此被停止工作，但他說他會繼續發表意見。

《探索》主編魏京生曾是紅衛兵。在文革之後，他對毛的幻想破滅，曾被囚幾年。

《北京之春》主編韓志雄是「四五」鬥爭英雄，曾因參與天安門示威而被囚和拷打。他以頑強對抗官僚層（甚至在獄中）而聞名。正是這類叛逆性強的年青人，構成了民刊的編撰者。

問： 異議者似乎與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無關，但為什麼他們的意見卻如此接近托洛茨基主義觀點？

答： 異議者的意見主要源於客觀局勢的急劇轉變。毛澤東逝世後的事態發展，震撼了全中國人民。「四人幫」和忠毛份子被粉碎，毛澤東思想顯然完全破產。人民，尤其是年青的工人和知識份子，從崇毛的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許多人走向馬克思主義，即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分析和評價事變。這就是為什麼異議者表達的意見是如此接近托洛茨基主義者，後者繼續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要義。

托洛茨基主義者早已得出結論說：共產黨控制的政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官僚專政，只需群眾政治革命就可將之改變。現在，異議者正得出同樣的結論。

問： 官僚層採取了什麼措施來阻止異議刊物的出版？

答： 官僚層首先拘捕了民刊編輯，後來更正式禁止民刊的銷售和沒收民刊。

問： 民刊寫作者定必很難保衛自己。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情況下，他們不會有力量抗衡鎮壓。他們是否能夠組織積極的支持？

答： 自去年初以來，當大字報浪潮高漲時，異議者在北京民主牆、天安門廣場和在上海舉行了多次示威和集會。

最重要的一次集會在七九年九月十三日在天安門舉行，超過二千人參加。其中一名發言人的說話代表了與會者的情緒：「四人幫是被毛澤東直接提升到高位的，毛澤東必須要對他們的行為負責。」

另一個人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是不合理的，因為它是官僚和特權的制度。特權層的一部份享受奢華生活，而窮人則過着悲慘的生活。」

魏京生被判罪後，《四五論壇》的編輯印發了魏審判案的錄音稿，在民主牆前出售，令以千計的人(包括外國記者)知道審訊的過程。發售錄音稿的人被秘密警察逮捕。

異議者抗議拘捕行動，指責審訊是虛偽的。許多民刊登載聲明，抗議這次審訊，而外國刊物也批評這次程序。即使在香港，幾份一般來說支持鄧派的雜誌，也在這個問題上與

官僚層意見分歧。這是對官僚層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這些抗議公然反抗新的鄧派獨裁。

民刊作家繼續他們爭取出版自由的鬥爭，這是憲法所規定了的權利。三份廣州民刊《生活》、《人民之路》和《浪花》的編輯，向全國其他刊物發公開信，呼籲所有異議民刊聯合起來。作為宣傳運動的一部份，他們建議向政府註冊刊物。

問： 在中國，「四人幫」被清算以後，出現了許多小說、戲劇和詩歌。這些文學的政治性質如何？

答： 許多文學作品在過去兩年來出版了，它們差不多全都是暴露官僚的貪污、無能和專橫的。這裏不能介紹它們所有的內容，所以只集中談論一個全國皆知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人妖之間》是第一個中國小說，檢討革命後官僚制度的根源。主角王守信是煤公司的會計，故事揭露她如何利用職權和性吸引力來爬上官僚梯子。

在文革期間，她組織了自己的造反集團，後來，她取得了地方軍政委的歡心，被擢升為企業的經理。她掌管着公司的錢財，賄賂幹部（如縣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省級幹部），令她可以積聚更多煤來建立她「自己」的公司。最後，她成為整個企業的頭子——一個小獨裁者。

這是整個中國官僚層的縮影。這個主題貫穿了大量的新文藝作品。

以十萬計的人能夠讀到這個作品和其他異議文學作品，因為文藝刊物與民刊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合法的。

《人妖之間》作者劉賓雁，正如其他上面提過的作家一

樣，有着反抗官僚層的長期歷史。在百花齊放時期，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刊物《中國青年》的主編，劉賓雁寫了批評官僚層的文章，因而被清算和被送下鄉到勞改營，直到二十二年後「四人幫」被清算後才獲釋。

問：對於異議者爭取出版自由的運動，官僚層的反應如何？

答：在要求的壓力下，鄧小平迫於向整個異議運動反攻。在八〇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的一萬名黨、政、軍高層領導和幹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目前局勢和任務的報告」中，鄧小平明確說明了這點。

在報告中，他列出了八〇年代三個主要目標：

首先，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必須與蘇聯的霸權鬥爭。

第二，完成「祖國」的統一，即收復台灣。

第三，必須加快經濟建設，即實現「四個現代化」。

這三個目標的中心是經濟計劃，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完成。鄧說，不幸地，現在有一個新的因素影响着「安定團結」。

「現在有一些社會思潮，特別是一些年青人中的思潮，需要認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單牆』的許多東西……如果讓它漫無限制地搞下去，會出現什麼事情？……」

「還有……所謂『民主派』，所謂『持不同政見者』這類人，就是魏京生之流……他們那個旗幟是相當鮮明的。儘管有時也說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實質上是要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還有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無政府主義份子和極端個人主義份子等等。這些都是不安定的

因素。儘管這幾種人的性質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況下，他們完全可以糾合在一起，成爲一股破壞勢力，可以造成不少的動亂和損失。……

「……我們要學會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對違法犯罪份子手軟，只能危害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危害現代化的大局。

「共產黨員，黨的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在這場反對各種犯罪份子的鬥爭中必須立場堅定……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份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絕不允許任何人背着黨同這些人發生聯繫……

「總之，在對反革命份子、破壞份子和各種犯罪份子作鬥爭的問題上……態度都要十分堅定，不能有任何猶疑不定、含糊不清的表現。」

鄧在談及官僚層對新文藝的態度上也很明確：

「我們講，對寫什麼，怎樣寫，不要橫加干涉，這就加重了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和對自己工作的要求。我們……不繼續提〔毛的〕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考慮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

關於大字報，鄧說：「我們堅持發展民主和法制……但是……不能用『大鳴大放』的辦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動亂。…『四大』……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因此……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就在這個對異議者的惡意攻擊下，鄧明確表達他想整個消滅異議運動的意圖。

問：鄧小平的關於異議運動的反動意見，是否為中共採納為正式立場？

答：這並未明確。今年二月召開的五中全會通過了鄧小平取消「四大」（即禁止大字報）的建議。五中全會似乎對異議刊物仍未作出決定。舊官僚層與共產主義青年團之間有明顯的分歧，反映於廣東共青團省支部在四月召開的一次討論全會決定的座談會上。被邀請參與座談會的有《人民之聲》、《人民之路》、《浪花》、《生活》等民刊的編輯和廣州各大學、青年組織和工會的代表。他們甚至邀請如王希哲，陳一陽和李正天等異議者。

所以，一方面鄧在轟擊異議者，另一方面，共青團的廣東團委竟然邀請異議者參加座談會討論黨的決定！在會上，民刊不但不被否認，反而以異議作家被邀請出席而實際上承認之為合法刊物。

座談會上的發言值得我們在這裏重覆一下。差不多全部人都表示反對五中全會取消「四大」。其中一人甚至說：「我們國家現在的民主還很薄弱……現在為什麼不可以用『四大』為武器來對付官僚主義呢？」學生們同意全會替劉少奇平反，有些人認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打倒劉少奇。

其他人表示全會並未能夠有效解釋華派（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的罪行，雖然他們已被迫在五中全會上辭去政治局委員和黨內的職位。

在廣東青年座談會召開之前，廣東省黨委會已處理「民刊」的問題，它並沒有禁止民刊，而李正天則建議委員會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刊物合法化的問題；他強調說民主和四個現代化是不可分開的。

這些意見在青年座談會上受到廣泛接受，顯示最低限度在廣東，人民與中央有分歧。

問： 似乎從鄧關於任務的長報告和最近的新聞資料來看，鄧已最後取得黨、政、軍的控制權。五中全會的決定，是否對華鄧派系鬥爭有決定性影響？

答： 鄧派強迫了四名華派中心人物辭去中央政治局和政府內的職位，因而大大摧毀華派。鄧同時重組中央書記處、任命胡耀邦為總書記，這是毛在一九六六年廢除這個書記處前鄧的職位。

因此，五中全會完全摧毀華派勢力，控制權穩穩操在鄧手上。正如魏京生所說，鄧小平真正是新的獨裁者。

問： 除廣東青年表達的反對派觀點外，另外還有沒有對五中全會的決定的反應？

答： 此外沒有見到關於對五中全會和鄧報告的反應的資料。但是，在五月二十日，一則法新社從北京報導說，十一個團體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呼籲成立聯合陣綫爭取人權和民主。

該宣言由過去一年來在北京、廣州、上海和其他城市出現的主要民刊編輯部所簽署。他們要求北京當局釋放《四五論壇》編輯劉青，劉青因散發魏京生審判案錄音稿而被捕。

他們抗議在七九年四月任萬定的被捕，任是「人權聯盟」的領袖，仍未被審判。

可見異議運動並未中止，相反地，它繼續在開展。

問： 從共青團座談會參與者表達的不同意見中，我們可否假設中共領導面對一個嚴重的新反對派？

答： 我們不能確定一個反對鄧領導層的新的有組織的反對派已存在，但我們可以確定地說，鄧派與尤其是共青團一些舊領導人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反映於青年座談會的討論中。而中共廣東省委容許年青人舉行這個會議，顯示它贊助新的意見。

當然，群眾中間有廣泛的、具爆炸性的反官僚情緒。在這個情況下，一些舊領導人和幹部可能會主張溫和的姿態，向異議者作某些讓步，因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讓運動發展。

問： 鄧小平會否支持一些舊領導人對異議者採取的容忍態度？

答： 照鄧的報告來看，他不會容忍對異議者採取任何溫和的態度。但同時，他又不能夠解決中國今日面對的所有重大問題。

例如，儘管對所謂「四個現代化」大力宣傳，但過去三年來並沒有真正的成就。現代化計劃只是紙上空談，因為官僚層本身的貪污、無能和特權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整個官僚層已從核心腐爛，不可能改良。

鄧小平企圖將歷史車輪倒轉，但他和他的追隨者將在歷史的車輪下被碾碎。將來是屬於異議者的，他們代表了今日

中國的新一代。

文藝界異議者敏銳地觀察，公開說：「新的一代是思索的一代」。「新的……詩歌作者……不僅僅是止於思索，必要時，他們就挺身而出，起來抗爭，震撼世界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有力的證明。」

附 錄

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與「文化大革命」*

問：在「文化革命」初期，被攻擊的人，都是藝術家、作家、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因此，我想請教你一些關於文學、藝術、教育等方面的問題。

首先，我想請你敘述和分析一下兩派（指毛林派和劉鄧派）在這些問題上的歧見，這些歧見想必是很重要的，可以使我們對敵對兩派的一般立場和路線，有更清楚的了解。

答：這倒是真的。如果知道了這些問題上的歧見，自然可以對兩派之間的鬥爭，獲得更進一步認識。

實際上，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運動，是從攻擊吳晗的「海瑞罷官」、田漢的「謝瑤環」和鄧拓的「燕山夜話」及「三家村札記」開始的。換言之，毛澤東是從攻擊文化界領導幹部開始的，因此，便稱之為「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知道，在斯大林主義的獨裁政制下，決不會有政治自由；人民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有很多不滿。這種不滿，通常都反映到文學和藝術中來，因為許多藝術家和作家，對他們周圍的世界，都非常敏感。他們觀察人民的日常生活了解人民的處境，人民的希望和人民的渴求。於是通過藝術和文學，將他們所觀察到的情形，無論是好的是壞的，都反映出來。

正因為這個道理，斯大林主義的政策，總是嚴格限制文

* 本文是陳碧蘭一九六七年六月接受安東尼奧·法利安訪問的記要。譯自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法國出版的《世界展望》。

化生活，不讓壞的情況（包括官僚政制在內）給暴露出來。於是，文學和藝術，不再反映真正現實，變成單純是歌頌官僚政策和個人崇拜的宣傳。

這種情形，在斯大林統治的時候，是很顯著的；日丹諾夫對文學和藝術已製訂的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

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政策，也是如此，也許限制得更嚴厲更苛刻些。是以中國文學和藝術，幾乎經常產生對毛澤東政策的抵制。目前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清算，決不是第一次，不過這次清算是最大和最嚴重的一次而已。

問：請你簡略地說說，毛澤東在什麼時候開始清算文化界方面的人，爲什麼清算他們？

答：毛澤東限制文學和藝術的政策，始於一九四二年，即延安時代。當時，毛澤東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就是準備清算一位著名作家的。

在這篇冗長的講話中，毛澤東除了引證列寧的幾句話拿來作權威之外，要求文學和藝術要同黨的政策相一致，只能替工農兵服務；他反對任何對延安政權的諷刺和暴露。在他看來，作家只應歌頌共產黨的新民主、革命英雄等等；他而且指出，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有很多缺點，需要進行一次清算運動。

當時，有些作家寫了一些文章暴露延安的真實生活，例如著名女作家丁玲，寫了「三八節有感」；著名詩人艾青，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而王實味則連續寫了幾篇文章，題名爲「野百合花」。王實味的文章，對延安某些方面，暴露得很徹底。他批評延安缺乏民主，並將官僚的特權生活和群眾生活相對照，這些文章在人民中，尤其在年青共產

黨員中，引起很大的注意。

毛澤東不能容忍這些批評，因此召開會議討論文學和藝術問題，發表講話，這次會議和講話，不僅是一次清算的先聲，而且替共產黨的文學和藝術上的基本政策奠定了基礎。

上述會議和討論舉行之後不久，又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來清算王實味。許多黨方的大官，如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及文學和藝術方面的幹部和其他作家，都參加了那次會議。

或者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對一個作家要如此大張旗鼓？——理由很簡單。王實味於一九二六年入黨，是一位老黨員，而且是中央研究院的重要分子之一；他曾將馬克思、恩格思和列寧的著作譯成中文達二百多萬字。他是一位能力很強的作家，大家都尊敬他，尤其是青年人。所以，清算王實味，在延安時代是一樁很重大的事件。

會議開始十六天，在會議上，王實味面對領導幹部和黨官員的嚴厲攻擊，發表自己的意見，為自己意見辯護。有許多文化工作者同意王實味的意見，對他表示同情。但有些黨領袖指責王實味是反黨分子、反馬克思主義者、托派分子，尤其是現在文化革命領袖的陳伯達（那時他是毛澤東的私人秘書），更惡意批評王實味，使得很多人不寒而慄，只好噤口不言。但是，王實味自始至終仍堅強地為自己觀念辯護。

會議結末時，王實味被定了反黨、反馬克思主義、托派的「罪名」，被開除黨籍，囚在獄中，備受折磨。最後，他承認自己是托派，跟着被殺。

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青年讀者有具大的吸引力，無論是黨方和青年組織的成員和中

共的同情者，都對它感到興趣。這本書曾被人以手抄本的方式，不斷在全國到處流傳。我過去讀的一本，也是手抄本，從一位中共的同情者那裏借來的。

王實味因為非常勇敢地抵抗惡意攻擊，堅持他自己意見的正確，由此大大出名，有關那段時期的歷史，都有他的名字。

問：王實味之後，還有什麼別的清算事件？

答：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後，毛澤東的文化政策，即在全國推行。

最初起來抵制和批評這些政策的是胡風。他是一位著名的左翼文藝理論家。胡風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機械論，因此他說：「機械論統治了中國文藝界二十年……思想僵化……言必稱毛澤東思想，也是夠叫人惱火的就是了。」（見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載「紅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胡風認為真實是藝術的最高準繩。他反對文藝只替政治目的服務，認為這是過份簡單化的政策，他反對毛澤東所建議對文藝主題的限制。因此，他堅持所有作家都有權選擇自己的主題。

上面所敘述的胡風意見，都是大家均可接受的原則。但是在毛澤東看來，這些觀點已經越軌了，所以於一九五五年開始發動清算胡風一幫人的運動。此運動進行幾個月，在全國範圍展開。

不僅胡風一幫人受攻擊、被批評，甚至連各大學、各中學、各文化機關裏僅僅同情胡風的人，也都受到攻擊和清算。據當時發表的報導，大約有一百三十餘名胡風分子被囚禁

或關進勞改營裏。自此以後，便不再有胡風及其分子的消息。

清算胡風之後不久，於一九五七年四月至六月間，便產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在這個時期，有許多左翼作家批評毛澤東文藝政策，例如丁玲、艾青、馮雪峰等。馮雪峰是當代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這三位都是中共文化界的領袖，特別是丁玲和馮雪峰，前者是全國文藝工作者協會的主席，後者是副主席。

六月間，毛澤東開始壓制「鳴放」運動，這批人便受攻擊。

例如九月間，在北京特別召開一次清算丁玲的會議，大約有一百人參加，包括許多文化界高級官員，如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副部長周揚等。

這次會議和延安清算王實味的會議一樣，整整開了十六天，大家相繼攻擊她，指她是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對丁玲極盡折磨的能事。「人民日報」後來發表攻擊，將她同王實味拉在一起，說她和王實味「蛇鼠一窩」。

會議之後不久，丁玲、馮雪峰、艾青和許多別的作家，都被囚入獄或送進「改造營」。他們的命運和胡風分子一樣，杳無音訊。

關於丁玲，我應該講幾句話。一九二三——二四年，她是我在上海大學裏的同學，我們同住在一個房子裏，彼此成爲親密的朋友，所以我很了解她。她很有個性，很富於民主精神。

在「鳴放」運動期間，沈雁冰的態度也很值得注意。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央統戰部召開一次會議，沈雁冰在

那次會議上表示他對文藝的觀點。他說：「拿文學藝術來說，究竟是專門學問，沒有這門學問的基礎，專靠幾本『幹部必讀』不能解決業務上的具體問題……怎麼辦呢？捷徑是教條主義，行政命令。」很清楚的，沈雁冰這段話是批評文化部門整個機構的。

沈雁冰認為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普遍存在着「『乾巴巴，千篇一律』的毛病」。他說：千篇一律的病源在於公式化，在於題材的狹窄。但總的說來，由於未能貫徹「百花齊放」，由於缺乏「百家爭鳴」。

沈雁冰的全部批評，無疑暗指毛澤東的文藝政策限制了作家的自由和創意，因此使作品變得乾巴巴，千篇一律，毫無生氣。

問：沈雁冰既然當了文化部長，那是文化界的最高領導職位，他怎會說出反對毛澤東政策的話，為什麼又不會和別人一起受清算呢？

答：答覆這個問題，需要簡單敘述一下沈雁冰的個人歷史。沈於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共，那時，他已經寫了好多篇文章，而且是「小說月報」的主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他脫離中共，但仍繼續從事寫作，以茅盾的筆名，出版了幾本書，其中有幾本很出名，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正因為這個理由，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請他當文化部長。他當文化部長直至一九六五年一月請求退休時為止。

為什麼他會批評毛澤東政策而不受到清算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注意，他的意見，是在「鳴放」運動高峰時講的；其次，他不是黨員；第三，文化部實際上是受周揚控制的。

但是據最近的報導說，沈在目前這次清算中被捕了。他的被捕，很可能是因爲一九五七年發表了這些言論之故。

一九二五年——二七年革命時，我和沈雁冰曾有接觸，所以也很了解他。他是很小心謹慎的人，在我看來，他可能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一直沒有批評過毛澤東的政策。

問：既然你說文化部實際上受周揚控制，但周揚最近也備受攻擊，究竟周揚的觀點如何？他也和沈雁冰一致嗎？

答：周揚在文藝上的意見，不僅和沈雁冰相似，而且更深刻。我們只要看一看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紅旗」中所發表的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就可以知道周揚的意見。

例如，姚文元清楚地說：「周揚同胡風一樣，反覆鼓吹『藝術的最高原則是真實』」，「周揚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簡單化』『清規戒律』『宣傳作用』，認爲黨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對待文藝工作者的簡單化的、粗暴的態度』，『嚴重地束縛了作家、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在文藝如何爲政治服務的問題上』存在着所謂『狹隘的、片面的、不正確的理解』」。因此周揚鼓吹「『對於題材，不應作任何限制』……『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多樣性，歷史的規律性和生活的複雜性』」。「不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反映時代精神」。

周揚在另一篇文章中說：「用工人階級的觀點寫技術人員、知識分子是可以的。工人階級不應該宗派，不應只寫工農，無產階級文學只寫工農，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觀點。」

周揚特別反對文藝只替政治服務。他說：「作家『不是一定要寫當前的事』，『不要今天提出個政策，去寫，明天提出個政策，又去寫。』」

總而言之，周揚認為「作家『要根據他自己所感受到的、所見到的寫，也可能見錯了、感錯了，但也還要這樣。』」（以上三段引文見一九六六年七月卅日「人民日報李基凱、吳松亭、楊匡滿、侯聚元合寫的「『文藝報』的兩次假批判」一文——譯者按）因此，周揚鼓吹要保障寫作自由。

問：如果周揚不同意毛澤東的政策，怎會允許他當文化部副部長，成為事實上的文化部總管，去執行毛澤東的政策呢？

答：這個問題很重要，的確需要加以解答。在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統治下，有許多黨領導分子和黨幹部不同意毛澤東的政策，但是他們却被迫要執行毛澤東的決定。周揚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他常常處於矛盾之中，他不相信毛澤東的政策，要講和要寫自己的不同意見，却又不得不被迫在實際上執行毛澤東路線。

例如，在一九五五年清算胡風之前，在討論胡風的座談會上，周揚說：胡風「『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鬥爭上』，是『同黨站在一起的』」。（見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換言之，周揚不希望將胡風事件搞得太嚴重。毛澤東命令要將胡風當作反革命來清算，周揚只得被迫執行他的命令。

一九五七年，當丁玲、馮雪峰、艾青等被攻擊時，周揚也同在胡風事件中一樣，陷於矛盾之中。就因為這個道理，姚文元指他為「兩面派」或「反革命兩面派」。實際上，在毛的壓力下，許多幹部都是被迫執行他們所不同意的政策的。這正反映出毛澤東和黨幹部之間的矛盾；目前的危機，只是這種矛盾達到爆發的頂點而已。

問：可否說周揚的意見是文化界其他幹部意見的代表？

答：可以這麼說。周揚的意見似乎甚至代表大多數群眾的意見。

例如，文化部另兩位副部長夏衍和林默涵，以及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小組書記陽翰笙，都同周揚意見相同，而且陽翰笙的意見，比周揚更激烈。因此，他比其他的人受到更嚴厲的批評。

問：你可以談談陽翰笙的意見嗎？

答：可以，不過，我先得說幾句關於陽翰笙個人的歷史。一九二三——二四年，陽翰笙也是我在上海大學的同學。那時，他已經是共產黨黨員，在革命運動中很積極。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他仍留在上海，作地下工作，就在這個時候，我與他以及他的妻子過往頗密。一九二八年初，他寫了幾篇小說，後來，就成爲中共文化工作的重要幹部。

因爲他仍舊忠於中國第二次革命時共產黨的某些傳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對作家和藝術家的諸多限制，並對這些限制加以嚴厲的批評。

例如一九六二年，在廣州召開的一次編劇和演員的會議上，（即廣州話劇、新歌劇、兒童劇創作會議——譯者按）陽翰笙說：黨的文藝政策（也即毛澤東政策），「用『十條繩子』捆住了作家的手足……這『十條繩子』造成了『五個一定』，即所謂『一定要寫重大題材；一定要寫英雄人物、尖端人物；一定要參加集體創作；一定要限期完成；一定要得到領導批准』引起了『五個不敢』，即所謂『不敢寫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不敢寫諷刺劇；不敢寫悲劇；不敢寫英雄人物的缺點、失敗；不敢寫黨員的缺點、領導的缺點，使得作家『顧慮重、下筆難』，使得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在結論中，他大力主張「要破『創作規律』問題上的幾條「框框」……要尊重『創作規律』」，即創作自由。（見一九六六年二月廿七日《人民日報》「痛斥陽翰笙『十條繩子』的謬論」）

陽翰笙因為上述意見和許多別的事情，受到毛派重大攻擊。一九五七年，陽翰笙和田漢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紀念。他們在蘇聯，看了許多戲劇，如「前程無限」(INFINITE PERSPECTIVE) 和「藍色知更鳥」(BLUEBIRD) 等。這兩個劇本暴露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斯大林對反對者的清算。劇本將斯大林的統治，寫成「像沙皇的統治」，指出「蘇聯不再需要這種恐怖時代」。

陽翰笙和田漢回到中國後，陽翰笙說：蘇聯的演員真「大胆」，「我們太懦弱了。我們應該努力改革，要大胆創作。」（見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七日《工人日報》《陽翰笙是修正主義文藝的宣傳員》一文）

爲了這些事情，毛派攻擊陽翰笙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實際上，陽翰笙只不過表示同意蘇聯的非斯大林化而已。毛澤東卻不能容忍這一點。

問：吳晗、鄧拓和田漢，是中國著名的作家，他們當然不是第一批被攻擊的人，但是他們受到毛派非常猛烈的攻擊。他們曾經就文藝表示過他們的意見嗎？

答：吳晗、鄧拓和田漢，當然不同意毛的政策，但據我所知，他們從未公開表示過。不過，他們曾經寫過劇本和文章，間接批評毛的政策及其個人崇拜和獨裁。吳晗的「海瑞罷官」，和田漢的「謝瑤環」，這兩個劇本，用歷史故事去批評毛澤東及其政策，倒是很好的例子。

鄧拓也寫過許多文章，間接攻擊人民公社政策和毛澤東永無錯誤的神話。關於這方面，在你訪問彭述之的時候，已經談過，我無需重覆。這裏，我只想指出一點：即使是間接攻擊，毛澤東也不能忍受。

問：文化界的領導分子，如周揚等，對毛的其他政策有反對嗎？

答：凡不同意毛澤東文藝政策的人，差不多也不同意毛的全盤政策，因為在文化界工作的領導分子和幹部，同直接在群眾中工作的作家和藝術家經常有接觸，透過這些作家和藝術家，可以了解到群眾的感情和願望。

例如，在一九六二年在大連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有全國各地作家參加，他們絕大多數表示出不滿，對「大躍進」政策，特別是人民公社以及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加以批評。他們感到「農民的日子愈過愈困難」，「實行總路綫是暴發戶心理」。又感到「實行大躍進……是吃了興奮劑」，「人民公社是冒進主義」。周揚自己則說：「大躍進是主觀唯心主義」，「人民公社辦早了」，他甚至說要「大搞『自留地』，大開『自由市場』」。(見上引「『文藝報』的兩次假批判」一文)

周揚和其他作家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抨擊，就是響應彭德懷一九五九年的批評的。因此，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在全國文聯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毛澤東下面這段話，是針對周揚和他所控制的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而發的指示，不是在全國文聯會議上的演說——譯者按）「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果不認

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見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

從毛澤東這段話看來，很清楚的，他懼怕文化界的知識分子。而且從中也不難了解爲什麼他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清除所有反對者。毛澤東害怕在中國發生像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那樣的局勢，他担心像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會出現，因此開始清算，將文化界這些幹部踢出去。

.....

問：在你看來，「文化革命」的後果如何？換言之，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對中國文化的全面影响會如何？

答：毛澤東的清算，幾乎包括所有在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和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工作的幹部，以及作家、音樂家、畫家、教育家、教授等，這些人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清算這些人，等於摧殘中國文化。這裏，我要指出兩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作例子，說明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對中國文化如何破壞：

（一）自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開始「文化革命」以來，幾乎所有作家都不敢寫東西。文化雜誌都差不多停止出版，電影的攝制幾乎完全停頓；許多外國和中國書籍的出版和再版已經終止；許多電影院和劇場已停止演出。換言之，幾乎所有文化活動，都已不再存在。

（二）所有中學和大學，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以來，都停止上課，沒有一間大學復課，只是到了今年三月，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有一部份中學復課。在「文化革命」和清算運動之前，教授和教師已經非常欠缺；現在，當然更不夠了。

最糟糕的是，從小學到大學教科書都嚴重缺乏，因為差不多所有印刷機構都過量印毛澤東選集。例如過去半年內，《毛澤東選集》印了一千五百萬部，每部四大冊，《毛澤東語錄》印了八千萬本。此外，另有八千萬冊《毛選》準備在今年付印。因此，其他的書，如教科書，文學著作，甚至馬、恩、列的著作，差不多都停印了。

總而言之，我可以說，自毛澤東開始「文化革命」以來，不僅文化活動停滯了，而且中國文化正遭到極度的破壞。

最後，我想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理論而言，是荒謬的。無產階級在一國取得政權之後，最大的任務是推翻世界上殘留的資本主義，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資產階級未曾摧毀之前，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可是到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後，無產階級本身也要開始消失了，換言之，階級以及階級矛盾，也要開始消失，社會主義文化自然開始建立起來。因此，決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文化。

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際上也是愚蠢的。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如此落後，有許多地區的生產還是處於原始狀態。就文化而論，絕大部份農民和差不多半數工人仍是文盲。在這種情形下，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立「四新」——新文化、新思想、新風俗和新習慣——不但無知，也顯出不切實際和愚蠢的理想主義。

如果毛澤東真的要提高工農的文化水準，他應該在群眾中開始剷除文盲。這樣，首先必須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增加他們收入，減少他們工作時間。這樣纔能讓他們有時間有精力去學習，去參加文化活動。

但是毛澤東的政策剛剛相反，他既不改善工農生活水準，反

要求他們延長工作時間。毛澤東最近的反「經濟主義」運動，拒絕對工人階級任何讓步，這也清楚表現了他的態度；就是說，工人階級只能成爲替官僚利益而生產的工具。毛澤東利用「無產階級」招牌，給反對者加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只不過使自己對他們的攻擊和清算合理化而已。實際上，毛澤東並沒攻擊中國現存的真正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分子。這就夠證明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實行清算，以確保自己的官僚統治和個人崇拜而已。

彭述之選集

第三卷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次版

出版：十月出版社

九龍大南街321-323號4樓A座

3·862780

印刷：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18樓A2

定價：港幣三十元